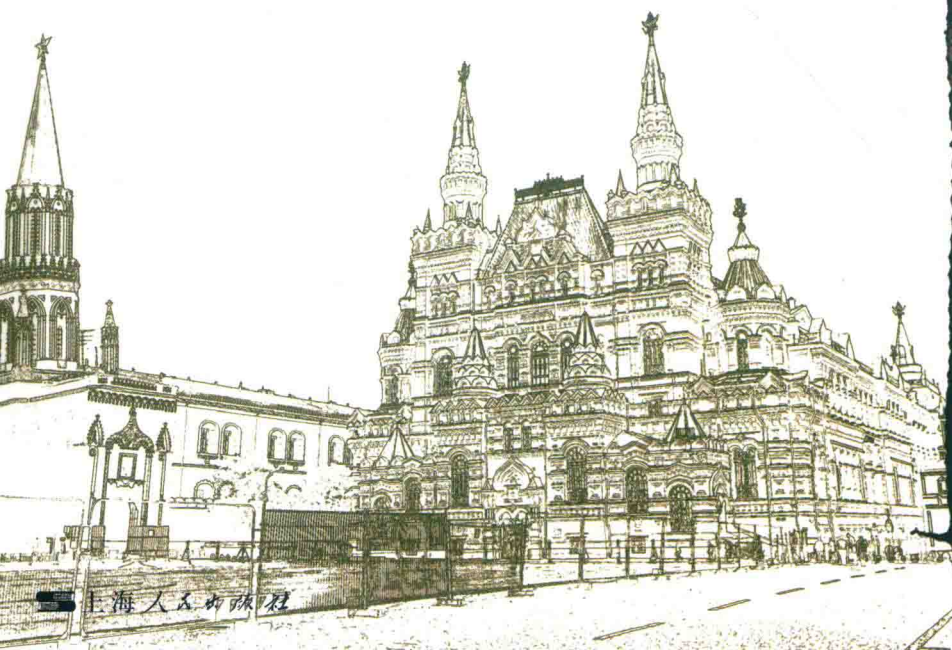


郑异凡◎著

改建与易帜



亦
联
台
火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世界历史

ISBN 978-7-208-15167-3



9 787208 151673 >

定价：258.00元（全三册）

易文网：www.ewen.co

苏联春秋 改建与易帜

郑异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春秋.改建与易帜/郑异凡著.—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67-3

I. ①苏… II. ①郑… III. ①苏联-历史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9774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苏联春秋

——改建与易帜

郑异凡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71.5

插 页 12

字 数 1,134,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67-3/K·2748

定 价 258.00 元(全三册)

序 言

“二战”结束，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和平发展时期。

苏联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有理由得到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权利。然而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反，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对外同西方进行冷战，继续维持紧张的国际关系。一句话，胜利的人民并没有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过安宁的和平生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内出现了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что делать——“做什么”、“怎么办”的大问题。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斯大林体制已经难以为继。这一点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间看法是一致的。因此，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新班子一成立，立即开始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调整对外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释放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的犯人。贝利亚是“新政”的主角，好多措施出自他之手。尽管赫鲁晓夫发动政变，除掉了贝利亚，但两人之间并无实质性的政见之争，赫鲁晓夫上台后执行的是与贝利亚相同的政策方针。

赫鲁晓夫在更大的规模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这作为突破点,改变斯大林的统治方针,这是拯救苏联的“补天”行动,史称“解冻”或曰“改革”,尽管这个改革没有能够深入触动斯大林体制,但是他把斯大林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公开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以至罪行,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仅此一举已经足以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震撼了整个世界。西方各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动荡,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东欧国家发生了动乱。这一切确实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但追根溯源,根本原因不在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在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了斯大林本人的错误和罪行,才有了赫鲁晓夫的揭露报告,才有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这是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不去谴责斯大林的行径,反而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倒因为果了!

虽然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可惜的是,第一,他的改革没有能深入下去,没有触动斯大林的体制;第二,改革进程被勃列日涅夫那伙“在册权贵”发动的宫廷政变所中断。此后出现了二十来年的回潮,出现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把苏联引入更为深重的危机之中,丧失了挽救苏联的最佳时机。

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撒手人寰的时候,整个苏联已经处于积重难返的境地。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被推上最高舞台,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不过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只能进行最后一搏。他给苏联提出的任务是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俄文为 перестройка,直译是“改建”或“重建”。戈氏选用这个词,而不用常见的 реформа,大概是因为 реформа 同改良主义联系在一起,名声不好! Реформа 通常译作“改良”,本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使事物变得更美好之谓也。但苏联不断批判“改良主义”,“改良”的名声被搞臭了。戈氏另选 перестройка 一词,用“重建”或“改建”来代替“改良”,这样公众接受起来也容易一些了。

改建意味着改造苏联,一座建立了七十来年的苏维埃大厦确实有倾覆之势,许多地方脱离了现代文明,亟须改造改建。彼得堡许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外表没有变化,内部却不断装修更新,增添各种现代化的设施,里面的生活工作环境完全变了。戈氏的“改建”想要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保持苏维埃大厦外貌前提下,改造其内部的设施装置,改变大厦的管理办法。

无论赫鲁晓夫的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建,都要触及特权阶层的利益,苏联的特权阶层有一个特定的名称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我把它译作“在册权贵”,这是一股能量相当大的势力。他们不仅发动政变赶走了赫鲁晓夫,还在戈氏的“改建”中发动“八一九政变”,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这是对改革的反动,结果被叶利钦激进派所利用,趁机夺权,取缔苏共,解散苏联,根本改变了俄国的发展方向。

一个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党解散了,它的党员们对此无动于衷;一个存在了七十来年的联盟国家解体了,各加盟国家兴高采烈,连联盟国家的“龙头老大”俄罗斯联邦也不要这个联盟了,苏维埃大厦轰然倒塌。值得庆幸的是,它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这一历史剧变的,这是俄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从曾经是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各国的角度看,尤其是从被苏联占领并吞的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角度来看,从群众运动遭受过苏军镇压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看,苏联的消亡,脱离苏联的控制是他们国家的一次大解放,是他们获得新生的开端,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本卷文章论及的是“改建”与“易帜”的问题,重点在戈尔巴乔夫的改建与苏联解体,还有苏联后的一些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有的已经成为历史,有些人和事我写作之时还在进行中,还算不上历史文章,现在事过十多年也已成为历史资料了,所以也收入本书。

这些年来,我关注的重点是苏联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源头,即列宁和斯大林时期,从这个源头可以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二三十年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导致苏联失败的某些征兆、某些东西。一尾是苏联后期,几代人为消除斯大林模式的消极后果做的种种努力,但终于无力回天,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地震。苏联历史上的这一头一尾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要搞清苏联兴亡的原由还是需要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历史,正因为如此,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来研究和撰写九卷本的《苏联史》。2013年,《苏联史》中的五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包括我写的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这是我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五卷书摆在案头,感慨颇多,曾写有一诗记之:

剑磨十年始出鞘,乱麻易斩情难了。

翻天覆地苏维埃,腥风血雨赤色潮。

书生指冷敲史记，马翁播龙得跳蚤。

改旗易帜民心事，百年一梦任凭吊！

在这三本文集出版之际，要感谢一下我的夫人耿子，她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同班同学，一起分配到中央编译局，起初还同在“国际室”，她从事“灰皮书”中第二国际人物的著作的编译工作。在“文革”中我被当做“五一六分子”审查批斗，她承受极大的压力，何况她从事的也是“灰皮书”的编译工作。所以“文革”还没有结束，她就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译需人的机会，“跳槽”去编译局的另一部门从事马恩著作的编译工作了。退休以后，20 来年我能够集中精力，每天坐在电脑旁边读书写作，多亏她承担了全部家务。我们的住所有一个小园子，那些花花草草主要也靠她去侍弄。过去没有电脑，她帮我誊抄稿子，自从用上电脑，誊抄的工作免了，不过有时她还得帮我看清样，这是一项枯燥乏味又必须细心的工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周崢先生仅仅看到我开列的文章篇目，就同意接受此书稿，对他和鲍静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谨表衷心的感谢。我还要趁此机会对几十年来与我合作，发表我的文章的报刊编辑朋友们表示我的谢意，这些报刊的名称都刊载在每篇文章的后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郑异凡

2016年2月28日于北京蓬莱公寓

目 录 | Contents

- 1 / 序言
- 1 /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
- 7 / 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 27 /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 36 / 白与黑
——赫鲁晓夫的墓碑
- 44 / 魂归何处？
- 50 / 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总书记
- 56 / 伏特加与俄罗斯
- 67 /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
- 70 / 农民出身和苏联改革
——读《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 世纪的精神教训〉》
- 80 /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 90 / 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之考察
- 96 / 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
——读《苏联兴亡史论》
- 107 / 苏联共产党丧权的教训
- 119 / 苏联崩溃与地缘政治
- 123 / 从另一视角看苏联解体
- 126 / 苏联剧变:违背历史规律的结局
- 132 / 俄罗斯·俄国·前苏联
——译名与用法
- 134 / 俄国·1992
- 171 /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两难处境
——评俄共党纲关于苏共历史教训的总结
- 178 /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社会主义观
- 183 / 俄共拒绝普京改名“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议
- 187 / 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访谈录
- 191 / 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俄国”运动和“复兴俄国”党
- 205 / 苏联剧变后俄国左翼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 227 / 上下求索,各陈所见
——俄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1992—1997)
- 339 / 俄罗斯养老金改革方案的争论

- 345 / 叶利钦现象析
- 357 / 苏联史研究在中国
——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367 / 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
——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①

引言

今天,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到挫折,在这种背景下俄国人重提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看起来似乎离现实远了一些。但是,读完俄国学者鲍·斯拉文的《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一书后,发现这恰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大问题,它同苏共的丧权,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基础课题。

对中国的理论界来说,鲍·斯拉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其前身是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真理报》编委,目前是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新生活报》主编。苏联解体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之一,他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著述甚丰,200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过他的《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该书原名为《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作者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做文章有两个原因。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的攻击和否定,需要从源头上论证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性。其次,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到失败,需要从马克思社会理想的视角来探讨失败的根源。

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我们通常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然而斯拉文认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

^① 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社会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共产主义通常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财富的共同占有及平等的分配,而没有涉及人的自由活动和人与人之间自由交往,而这正是人类历史之谜的实质和答案。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共产主义”一词的威信。因此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说,把马克思的理想称为他多次谈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要确切一些。

斯拉文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把马克思的著作前后贯通起来考察,从而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所谓解放,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后时代才能实现。人不是自我封闭的自然物,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必须解决人与社会的异化的矛盾。消除这个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过程。马克思将克服了社会异化和由真正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直接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消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是对私有财产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这种“人的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以非常明确的语言作了科学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斯拉文认为,这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最简练、最准确和最科学的定义。这是包含自由主义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精辟而言简意赅的表述。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所有的批评都是针对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的。

真正人道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十分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和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提出更完善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使未来的、非异化的“人的社会”更加具体化,这个理想始终是所有左翼运动反对建立在人的异化、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最终目标。“人的社会”的建立标志着自发的“人类史前阶段”的结束和“真正的”及自觉创造的历史的开始。

“人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即不仅能够按照必须的规律进行创造,而且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人。在未来的人的社会

中,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界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来源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并不是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历史。

马克思在 1843 年指出,新学派不仅应当回答人类“从哪里来”,而且应当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要通过批判现存社会,推断出“新世界”。“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这过去的思想,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捍卫人的自由解放思想的天才思想家的思想。马克思研究过古希腊哲学,他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雏形。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和政治观尤其吸引年轻的马克思。他要用民主国家取代等级制度,因为在等级制度下是没有任何自由和人的尊严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不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优势。英国是经济,法国是政治占优先,而德国是精神领域即哲学和宗教。马克思在研究自己的社会理想时,首先研究的是哲学和宗教问题,因为这最充分地反映了人的精神上的异化。马克思不仅受德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也受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他强调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密切联系。马克思认为,用纯粹的政治手段,既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也不能解决宗教问题。只有消除了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后,民主和宗教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从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才能完成人的解放,即摆脱宗教和各种个人利益的束缚。马克思的这段话,第一次揭示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必须的那个主要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劳动同资本的对立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的。他不仅看到劳动积极的一面,还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即异化的、强制的一面,消极面是同社会的对抗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变成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因此,马克思提出利用人的自由的、创造的活动取代雇佣劳动以实现劳动解放的要求。他是从资本主义现实中,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中推断出共产主义社会的

到来的。他把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自由社会,看作是扬弃私有制、恢复人的类本质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僵死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人道的或“人的社会”。

苏联的教训

在20世纪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的辉煌时期。从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进行了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实验。然而在多数国家,这种实验是不成功的。斯拉文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在实践中制定出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关系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联系的、系统的政治措施和行动。

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对私有制的态度,对消除私有制的时间和方法问题的态度。共产主义的概念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经常被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然而斯拉文指出:1.这里谈共产主义所指的是明确的社会运动。2.俄语翻译不准确。原文说的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德文 *aufheben*, 俄文 *снятие*)私有制。对斯拉文的这个说法存在异议,但是斯拉文的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当私有制还能促进生产发展的时候,就不能废除、消灭和摧毁私有制,而应当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十月革命后苏俄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农业集体化,说明过早地全面取消小私有财产的尝试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停滞,甚至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苏俄经历了两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和列宁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通过兵营式的官僚主义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社会主义,完全忽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验。而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则要求仔细研究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的前提下,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模式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其本质而言,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即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制度,政权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劳动者。列宁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新经济政策取代了错误的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切实地考虑到俄国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特点,恢复了市场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最短时间内巩固了工农联盟,恢复了被破坏的经济。

斯大林掌权后,新经济政策被中断,而军事共产主义和非常措施重新确立起

来,建立起领袖个人权力的集权制度。斯大林称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是“致命的理论”,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理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强化国家的理论。斯大林主义歪曲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并使其变形,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崩溃准备了条件。斯大林模式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且在纯经济方面都遭到彻底破产。破产的主要原因就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说。

斯大林阐述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目标,是可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并利用任何暴力手段也要实现的目标,这种斯大林式的阐述给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造成了并且继续造成很大的危害。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中世纪的阐述,使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核心。马克思总是在共产主义和“真正的人道主义”之间画等号,直接称自己的社会理想是“自由的人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目的本身。斯大林不明白这一点,把历史上的暴力绝对化。这种模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不文明的”模式,或者是带着由此而来的全部后果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模式。如今那些试图恢复这个模式的人,将会对整个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致命的打击,最终损害社会主义思想的威信。

斯大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根据。斯大林的现代追随者也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把共产主义的概念同全面的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个平均主义世界里,“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里“生活的唯一目的”是“物质的直接占有”。

斯拉文写道: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彻底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方针,不过早地取消小私有经济和消费合作社,不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而是使社会主义更加民主,悲剧就不会发生。然而,斯大林模式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被消灭,这只是人类进步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曲折,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也会停止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理想从此消失,这些思想和理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改革的榜样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纲领的实行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正确性。

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未来

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与反资本主义有机地

联系在一起,而资本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尚未结束。斯拉文预言:不久的将来将会再次出现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研究热潮,因为,(1)经典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曾经多次指出过这种可能性。(2)俄国再次出现资本主义。(3)西方著作中并不存在能够替代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理想。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这个社会最深刻的基础上的,以此作基础,可以对社会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测。劳动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劳动的解放。

马克思有一个历史观点,即人的发展的三段论:从过去人的不自由,经过今天对物质的依附,走向未来的人的自由。这个具有深刻人道主义内涵的历史观既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即实现自由人的社会的深刻哲学基础。当代历史“演出了”三种历史发展模式:以市场生产效率和忽视社会因素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模式;实现社会保障思想,但受到生产效率问题困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行政命令经济、集中计划和平均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三种模式都没有解决劳动雇佣性质、人与财产、权利和文化的异化问题。

未来社会将是建立在人类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所创造的统一的技术基础之上的一体化结构。在这种文明中既能够实现效率,又能够实现社会公正;既有现实民主又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只有那种能够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其他人的团结和自由的条件的人的联合体,才能够适应这种文明。马克思称之为“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

该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并不是书斋中的问题,而是反思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斯拉文在书中表述的某些观点是他根据俄国和世界的现实推论出来的,是否符合实际尚有待实践的检验。对作者的观点自然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可回避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须探寻答案的问题。

《学习时报》2006 年 8 月 28 日

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破获了“贝利亚叛国案”，官方报道，贝利亚于12月经审判被枪决。此案震惊世界，也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多年之后，此案的种种疑团逐渐显露，种种迹象表明，这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仕途中有过三次政变。第一次是剪除贝利亚；第二次是1957年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发动的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但弄巧成拙，赫鲁晓夫反政变成功，反而把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第三次是1964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发动的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在苏联历史上，一个领导人亲历三次政变，实属罕见，而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政变当数剪除贝利亚，这是一场流血的政变。

贝利亚1938年下半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的职务为：1938年8月22日至12月8日，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1938年12月8日至1945年12月29日，任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8月20日至1953年6月26日，任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第一专门委员会主席；1950年4月7日至1953年3月5日，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是唯一的“苏联荣誉公民”。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位置仅在马林科夫一人之下，处第二位。那时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居第五，没有政府职务。在他之上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是中央一级的领导人，贝利亚可以说是当时苏共中央里最能干的领导人，并且有安全系统的支持，而赫鲁晓夫是从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上来的，此前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两个职务都还算

不上是全国性的,只能算是地方性的领导人,凭他的位置和实力是无法同贝利亚对抗的,只有非正常手段才能排除其上升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官方的说法

按照官方的说法,贝利亚案的经过大体如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他弥留之际,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组成了新的苏联党政领导班子。会上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斯大林逝世后,开始了贝利亚的“百日新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现行的国内外政策。6月26日,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会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7月10日,《真理报》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12月23日,对贝利亚及其同案6人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这个说法存在许多疑点。我们从此案的结局开始倒过来逐一考察。

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少校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攻克柏林战役,1953年在克里姆林宫从事保卫工作,曾受命看管被捕的贝利亚,并亲自参加了对贝利亚死刑的执行。他回忆道:

6月26日,他和另外50名卫兵被召集在一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们等候在克里姆林宫正门外面。夜里,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和同事押送贝利亚前往秘密关押地点——莫斯科中心奥斯班考大街的一所地下室。关押贝利亚的房间只有20平方米,四周没有窗户。在以后等待审判的六个月中,古尔维奇一直住在贝利亚隔壁的房间,全权料理贝利亚的生活。在关押期间,贝利亚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是无辜的,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等我出去以后,要好好地报答你。”1953年11月以后,贝利亚的审判正式开始,古尔维奇每天陪他上法庭。贝利亚的死刑判决下来后,古尔维奇给贝利亚买了一套黑色西服,供他在行刑时穿。行刑当天,古尔维奇给贝利亚戴好手铐,送他到地下室中的另外一个房间。那里有5名军官等着他。古尔维奇回忆:贝利亚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叮嘱古尔维奇把他死去的消息通知他的儿子。几分钟后,苏联空军参谋长巴茨斯基中将在近距离内向贝利亚开了第一枪,然后命令其他行刑队员开枪。古尔维奇也掏出了手枪,在距离贝利亚2米远的地方开枪射击。行刑完毕,其他军官迅速离开了,留下古尔维奇一个人处理后事。

他用帆布裹起贝利亚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在那里,古尔维奇把贝利亚的尸体推进了焚化炉,最后又用巨大的鼓风机把他的骨灰吹得一干二净。^①

然而关于贝利亚的死亡情况,官方的资料存在许多疑点:(1)案卷中没有留下贝利亚的手印,而摁手印是必须的手续。(2)案卷中没有贝利亚的最新照片。按规定,囚犯入狱后必须拍摄正面和侧面照片,而贝利亚只有一张较为年轻的不戴夹鼻眼镜的正面照片,照片中人比54岁的贝利亚要年轻10岁左右。这张照片显然不是入狱时拍的。(3)审讯记录中没有贝利亚的签字。(4)贝利亚案卷中没有判决书的原件。无论判决书还是审讯记录都没有法官的签字,只有科涅夫元帅一人的签字。(5)在贝利亚的案卷中没有枪决后确认死亡的医生签名,而同案其他6名被枪决的均有医生的签名。(6)6名被枪决者的遗体均留有火化的相关文件,而贝利亚没有火化的相关文件。

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贝利亚是否真的在12月23日被枪毙了。因为这些手续是常规应有的,经办者决不会疏忽的。

贝利亚于6月26日被捕,7月8日才写出逮捕贝利亚的决定。这种做法在苏联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当局曾做出一个决定,审讯完毕立即执行,不得上诉。贝利亚的“审讯记录”所标的日期为7月23日至8月26日。这就是说,贝利亚很有可能在审讯结束后立即被执行枪决,所以在所谓正式审判和执行枪决时已经不存在活着的贝利亚了,也就无法形成所需要的文件。

贝利亚被捕后,7月2—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揭发批判贝利亚的罪行。这时候贝利亚还没有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共,按理他有权出席全会,为自己辩护,但他没有在全会上露面,被剥夺了这一权利。据说会上宣读了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三封信,这也许能够证明贝利亚还活着。然而,专家认为,这三封信不是贝利亚的笔迹和签名。头两封信是用印刷体书写的,用这种写法通常都是不愿让对方认出是自己的笔迹,第三封信写得比较匆忙,但也不像是贝利亚的笔迹。拿这三封信同贝利亚以前在文件上的批语和签名对照,可以清楚看出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三封信是伪造的,不足以证

^① 《环球时报》1998年8月9日。

明贝利亚此时还活着,还呆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①

全会上某些人的发言用语也表明贝利亚已被消灭。例如,卡冈诺维奇在全会上说:“中央委员会消灭了冒险分子贝利亚……”“现在,当我们了结了阻碍我们前进的奸细贝利亚……”^②赫鲁晓夫在会上谈到贝利亚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式。

这就有必要再往前回溯到1953年6月26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官方的说法是,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到底是什么会议说得并不清楚,一种说法是部长会议,另一种说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三种说法是先是部长会议的会议,然后改为主席团会议,以便让非政府成员的主席团委员能够合法参加会议。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公开说的是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同时邀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时,把它说成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就可以讨论党内问题了。

(2) 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官方的说法是会上逮捕了贝利亚。怎么逮捕的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或者他的助手发出了暗号,另一种说法是马林科夫紧张得找不到桌子下面的电铃,赫鲁晓夫动手掀了电铃,发出信号,闻讯进来了几个将军。谁逮捕了贝利亚?朱可夫说,是他拧住了贝利亚的双手。莫斯卡连柯说,是他迫使贝利亚举起双手。巴季茨基说是他抱住贝利亚。而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逮捕时贝利亚把手伸向公文包,他怕贝利亚去拿枪,就急忙去摁住他的手。就这么一个逮捕贝利亚的过程,当事人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细节的不同说明有人说的不是实话。人们不由地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在会议上逮捕贝利亚这回事?

(3) 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那么逮捕或者枪杀贝利亚的事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一个说法是那一天领导们观看大剧院的歌剧《十二月党人》,贝利亚在回家的路上被逮捕。另一个说法,是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回家时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乘同一辆车回家,途中被后两人制服逮捕。这两种说法缺乏旁证支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第三种说法是26日贝利亚在自己家里的办公室被击毙。

^① 例如,在2010年上演的电视片《Дело тёмное》中,彼得堡著名女记者普鲁德尼科娃把贝利亚的三封信同贝利亚签署的其他文件的字迹对比,认定信是伪造的。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1. С.192—194.

一位国家二号人物的逮捕或死亡存在这么多的不同说法,而且是出自当事人之口,并且离事发时间并不远,这就说明里面肯定存在问题,肯定有人要对公众、对历史隐瞒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用倒叙的写法,一项项地排除官方的说法:贝利亚不是在12月23日被枪毙的,在7月中央全会期间贝利亚已经不在人世了,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逮捕贝利亚一事不可信。现在我们来看看比较可信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是贝利亚儿子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贝利亚是在住所的办公室里被枪杀的。

最大的可能——贝利亚在办公室被直接枪杀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无论是12月,还是11月、10月、9月和7月,我父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都不能够给正在奔向权力巅峰的赫鲁晓夫同志写“忏悔”信,也不能提供有关证词,因为他已经于1953年6月26日在莫斯科市被杀害了,既无审判,也没有调查。^①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上面提到的种种疑问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引谢尔戈·贝利亚的另一较为详细的回忆:

1953年6月26日父亲在官邸。我走得早一些,大约在8点钟,一小时后已到克里姆林宫(父亲的办公室在对面大楼)。下午4点钟我们要向父亲报告实施核爆炸的准备情况……约12点钟,万尼科夫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我这里,让我接电话: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我们的飞机试飞员阿梅特·汗来的电话。他对着话筒喊道:“谢尔戈,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不过你要坚持着!你们的房子被军人包围了,你的父亲非常可能已被打死。我已经要了一辆汽车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你坐上去机场。趁为时未晚,我打算把你拉到什么地方去!”

我开始往父亲的秘书处打电话。电话没有声音。大概他们把它掐断了。官邸和住宅也没有人接电话。所有联系都断了……于是我给万尼科夫(时任

^① 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装备部部长)去电话。听到我说的,他也去打电话,用的是自己的专线。这一天,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召开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万尼科夫查明,会议被取消了,出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怕我一人被抓走,鲍里斯·利沃维奇同我一起去了市内位于花园环路的官邸。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军人封锁,在万尼科夫再次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之前,久久不让我们进入院子。最后,得到他的准许,让我们进去了,这也证明了他参与了所发生的事情。我父亲房间的那面墙被大口径机枪的子弹打出好多弹坑,窗被打碎,门被打掉。我正绝望地看着这一切,一位警卫跑来对我说:“谢尔戈,刚刚从房子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上面盖着粗帆布。”^①

谢尔戈的说法得到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索夫少将回忆录的证实。布尔加索夫从1950年起在一个秘密小组工作,研制防护细菌、化学和核武器的材料。布尔加索夫写道:

6月26日在工作场所工作,12点30分,我从小卖部回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突然,苏联装备部部长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像一朵乌云从我身旁飞过,他们几乎把我撞倒。万尼科夫没有停下来,沿着楼梯奔跑,这是罕见的事。并且贝利亚的儿子白天也从来没有在我们这里出现过。我同鲍里斯·利沃维奇的关系非常好,我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坐着,脑袋耷拉在桌子上。然后抬起头来对我说:“我们的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没了。今天他在莫斯科自己的住所被枪杀了。我到那里去过……”还说,一位军人给贝利亚儿子去电话说,他父亲的房子被士兵包围了。万尼科夫和谢尔戈立即驱车去了那里。贝利亚房子周围停着军车,院子里有冲锋枪手走动。一位上尉告诉万尼科夫,15分钟前从房子里抬出一副有死人的担架,用篷布盖着。贝利亚办公室的玻璃被自动步枪击碎。这就是万尼科夫对我说的。而你们知道,在1953年6月26日那一天,没有召开任何中央全会,没有似乎逮捕了贝利亚的会议,像后来所写的那样。斯帕斯基大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我们的房子和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办公室等处的警卫没有更换。站岗的还是原先那些哨兵,我对他们很熟

^① 这段话可以同谢尔戈《我的父亲贝利亚》对照阅读,见该书,第412—413页。

悉……就在那一天,6月26日,我突然被调到总参谋部的另一个分部。这救了我。因为后来开始了告密、安全机关传讯。我也被传讯,但没有事。而我的所有同事都遭到镇压。万尼科夫的遭遇不明……”

布尔加索夫将军还有一段类似的回忆,现一并引述如下:

至于所谓逮捕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实际上他于1953年6月已被野蛮杀害于其住所,作为事件的目击者,我要说明如下:一天的下午3点钟,谢尔戈·贝利亚来到分部。他走进万尼科夫办公室,又迅速与鲍里斯·利沃维奇离开办公室。午餐休息(从5点至7点)后我去见鲍里斯·利沃维奇打听不寻常的情况。他显得忧郁,久久看着我,然后慢慢地,几乎像耳语那样告诉我,发生了极大的不幸: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在自己家的办公室里被直接枪杀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告诉我,在告知谢尔戈关于发生不幸的消息之后,他同谢一起乘车去了尼基塔路上的官邸。住宅的围墙外停了许多军车,院内有军人走动。其中一人对来人说,半小时前从房子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身体用篷布盖着。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办公室的玻璃被打碎。这就是真实的历史。^①

1997年第22期俄《星期》周刊刊载了C.戈利亚伊诺夫(民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记录的科学技术博士A.韦杰宁的见证。韦杰宁1952—1953年在莫斯科郊区内务部特种分队训练班学习。他的说法如下:

我们开始收到关于贝利亚及其亲信的情报资料。这些专案资料是克鲁格洛夫的人送来的,克鲁格洛夫是贝利亚的第一副手,我们知道的他的名字是尼古拉·科罗特科……曾制定几个消灭的方案。

6月26日早上6点左右我们得到通知,将在今天行动。起初打算采取“车祸”的方案,快8点钟的时候来了实施“官邸”方案的命令。快10点钟,我们分乘3辆“胜利牌”卡车到达卡恰洛夫大街28号的贝利亚官邸。小分队由科罗特科领导。克鲁格洛夫通过高频电话与贝利亚通话,说科罗特科要带3名警卫送机密文件。这时我们已经得知,官邸内除贝利亚本人外,还有4个人。科罗特科和我们中的3名“随从”顺利地进了大楼,其他人根据预定行动方案分

^① Бургасов П.Н. Я верил ... М., 2001, с.103—104.转引自 А.Б.Мартыросян Мифы о Берии. Убийство. 2010-12-17 <http://delostalina.ru/?p=1831>.

别抢占了大楼正面和院内规定的位置。两三分钟后传来一阵枪声——我听见5声,也可能是6声。我当时紧挨贝利亚办公室的一扇朝向院子的窗户。从办公室射出的两发子弹打碎了靠楼拐角处第二扇窗户的玻璃。几分钟后,科罗特科从楼内走出来,命令我们都进楼去。3人被击毙:两个警卫和贝利亚本人,我们无一伤亡,显然这是精心准备和突然行动的结果……科罗特科把贝利亚家中的所有文件统统运走,我们则回到莫斯科郊区的基地。贝利亚档案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克鲁格洛夫以后的遭遇都同这些文件有关。^①

这就是说,击毙贝利亚的是其副手谢尔盖·克鲁格洛夫,并且地点就在贝利亚官邸的办公室。这个说法同贝利亚儿子谢尔戈及布尔加索夫的说法是一致的。

斯大林去世后,克鲁格洛夫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内务部副部长。他组建并领导了特种分队(第11分队),枪杀贝利亚的就是这支部队。克鲁格洛夫负责特别警卫对象的安排,不仅能够接触所有严格保密的对象,并且负责组建其警卫队,每一个对象至少有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密派小厮”。

除去贝利亚之后,克鲁格洛夫立即担任了内务部长。也许因为在贝利亚事件中有功,他是贝利亚同事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清洗的高官,1952—1956年担任了中央委员。但是这样一个人掌握安全部门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不安全的。1956年1月31日,克鲁格洛夫被调任电站建设部副部长。1958年7月退休。然而他过得并不安宁,1959年被取消将军级养老金,搬出权贵的住宅,次年因“参与政治镇压”被开除出党。1977年被火车轧死。他的这段经历似乎也能说明一些什么。

那些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开会的莫斯卡连柯、朱可夫、巴格里茨基等将军们去了枪杀贝利亚的现场没有?没有任何材料提到。不过可以设想,将军们参加会议之前去了贝利亚官邸的现场,像枪杀贝利亚这样的大事,仅仅让一个内务部副部长去执行,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国防部和莫斯科军区的将领们去坐镇,这就显得合理一些了。贝利亚事件的研究者穆欣(《钢铁的人民委员》一书的作者)、彼得堡的著名女记者普鲁德尼科娃(《贝利亚,他没有罪》一书的作者)认为:26日巴格里茨基将军和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卡连柯在贝利亚的住所在逮捕他时将其击毙。完成任务

^① <http://tretiyvozhd.ru/110/>.

后他们去克里姆林宫出席主席团会议，一方面汇报解决贝利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主席团委员施加压力。

穆欣还提出一个间接证明：“我给最后一位活着的当时的中央委员 H.K.巴依巴科夫去电话。在谈论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我问他，是否记得 1953 年的 7 月中央全会。当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回想的时候（他已 90 岁），我突然问他：‘您在全会上是否知道贝利亚已经被打死？’他迅速回答说：‘不，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停顿一下之后，他接着说：‘不过事实是，他已经被打死了。’”

替身之说

如果说贝利亚在 6 月 26 日已经被枪杀，那么在此之后出现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有一个说法，被关押和枪毙的不是贝利亚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根据是：(1) 审判庭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什维尔尼克曾对贝利亚的儿子说：他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活的贝利亚。另一审判庭成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尔也对他说，坐着的完全是另一个人。这两人同贝利亚是很熟的，不会辨认不清。其他主席团委员都没有亲临审判现场，而是在办公室听现场转播的。(2) 贝利亚被关进莫斯科军区的地下室后，经常戴一顶一直压到耳朵的帽子，他进出的两旁楼上的窗户都被涂上红颜色，为的是不让楼上的人看到。(3) 贝利亚案的其他案犯都关押在内务部的监狱里，唯独贝利亚关押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这种做法违背常理。据说把贝利亚关押在普通监狱不安全，他的党徒会帮他逃脱，但为什么其他被捕的内务部高官没有这种危险呢？令人不解。(4) 27 日上午，贝利亚的两位副手克鲁格洛夫和谢罗夫曾来到禁闭室要求见自己的领导，但莫斯卡连柯不放他们进去。问题很简单，如果被关押的是替身的话，那马上会被揭穿。(5) 负责看管囚禁中贝利亚的希日尼亚克·古尔维奇少校曾写有回忆文章，记叙关押中的贝利亚的表现以及被枪决的过程。但此警卫原先并不认识贝利亚，他的见证并不能证实关押的就是贝利亚本人。(6) 逮捕贝利亚后的第一个措施是更换总检察长，把萨弗诺夫换成听话的鲁坚科。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此后的各种安排。

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被关押在司令部地下室的不是贝利亚本人，而是其替身。因为是替身，所以不能让内务部以及其他部门那些熟悉贝利亚的人员看到。

替身的出现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某一个装扮成贝利亚的替身在 26 日 13 点左右被送达克里姆林宫，16 点 30 分被送出。把假贝利亚运出去之前，其车上的警卫被更换，这是为了防止警卫反抗，也为了消除使用替身的见证。

第二种说法：替身很可能是在从莫斯科军区禁闭室转移到军区地下室过程中被换上的。贝利亚根本没有被押到专门的审判厅大楼，而审判厅就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那里。贝利亚的 6 个战友就是在那里接受审判的。

使用替身对苏联政坛不是新鲜事，斯大林就曾有几个替身，真假难辨。如果说贝利亚被枪杀后使用了替身，那么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一场预谋的政变

枪杀贝利亚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而是蓄谋已久的政变。对准备过程，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录。1953 年 3 月初，斯大林因脑溢血病倒，中央主席团委员轮流值班看护不省人事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写道：

一天傍晚，布尔加宁和我值夜。我对他说，斯大林的病是治不好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时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会为自己攫取什么地位？布问：哪一个职位？我答：他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他是为了要毁灭我们才想谋取这个职位的……布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就开始商量具体防范措施，决定由我去做马林科夫的工作。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前，我找马林科夫谈“该怎么办”，但被马林科夫顶回去，说：“现在谈什么？等大家一起来了，咱们再谈吧。所以我们要开一个会。”^①就是在这次会上，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改组后的内务部长。互相提名的事实说明贝利亚同马林科夫有着良好的关系。要扳倒贝利亚必须首先离间这两人的关系。

此后经常出现如赫鲁晓夫所说的“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一方，以主席团为另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5—466 页。

一方”之间的冲突。赫鲁晓夫继续做领导人的工作,争取他们来共同反贝利亚。他首先说服了马林科夫,然后陆续串联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在同伏罗希洛夫谈话时遇到了一点麻烦,伏罗希洛夫一张嘴就称赞起贝利亚,说他是“多么杰出的人啊!”这就封住了赫鲁晓夫的嘴,最后只好让马林科夫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最后只剩下米高扬不配合,“米高扬反对解除贝利亚的职务,他说,贝利亚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等等”。但赫鲁晓夫这边已经构成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同上述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的不是贝利亚到底有什么罪错,而是说这个人对他们的危险性。这就说明,赫鲁晓夫反贝利亚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对贝利亚这个老牌安全官员的害怕和担心,需要除去自己飞黄腾达路上的障碍,因而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就开始拉帮结派,暗算贝利亚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还承认:“40年代后期,我已经深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党的末日。”^①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断说贝利亚搞挑拨离间,实际上在斯大林逝世前后从事挑拨离间勾当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

卡冈诺维奇曾描绘过最后一次同贝利亚会见的情景(6月25日):“告别时他握了我的手,只有我听见,我也答以‘热烈的’握手:好吧,坏蛋,最后一次握手,明天2点钟我们等着你。我们不是同你握手,而是逮住你的尾巴。”这就公开承认,在事变的前夜已做好了准备。

关于逮捕或者杀害贝利亚的经过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剪除贝利亚所使用的手段完全是政变的手段,动用了国防军的元帅将领,出动了坦克。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说法,鉴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是内务部的卫队,所以决定取得军队的帮助,“我们把拘留贝利亚的任务交托给防空司令莫斯卡连柯和五位将军。这是我出的主意。到了会议前夕,把朱可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人也包括了进来。”这个说法得到莫斯卡连柯回忆文章的证实。

莫斯卡连柯写道:

上午9点钟赫鲁晓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打电话找我,问候之后他问道:“您周围有没有同您关系密切,并且像您这样忠于党的人?”我想了想,回答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绝对忠于党。”然后赫鲁晓夫要我带这些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3页。

人到克里姆林宫原先斯大林工作的办公室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林科夫。他补了一句,要我带上防空计划和雪茄。我回答说:“我带上所说的一切,但我早在战争期间,在1944年就戒烟了。”赫鲁晓夫笑着说:“需要的雪茄不是我所想的。”到这时候我才想起要带上武器。最后他说,他立即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去电话。赫鲁晓夫关于要带武器的暗示使我想到,要执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按了一下电铃,招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军官B.尤费列夫少校、参谋长A.巴克索夫少将、政治部主任H.祖布上校,我告诉他们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并带上武器,但他们手头都没有武器,所以我叫来参谋部警卫队长希日尼亚克少校,命令他分发给他们手枪和子弹。由于人数不多,我又打电话给内卫部队参谋长(原防空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叫他带上武器到我这儿来。

接着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给他去了电话,建议我先去他即布尔加宁那里。我带着武装好的几个人到了国防部长那里。布尔加宁单独接见了。他说:“我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所以就召你来了。需要逮捕贝利亚,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卫队人多势大,并且忠于他。你有几个人?”我回答说:“5人,他们全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绝对可靠,忠于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人民。”他回答说:“这一切都很好,但人太少了。”随即问我:“你认为还可以找谁来?但不能耽搁。”我说:“您的副手瓦西列夫斯基元帅。”不知为什么,他当即否定了这位人选。我问他:在有影响的军人中谁现在在部里。他说:格·康·朱可夫。于是我建议让他来。他同意了,但要朱可夫不带武器。不过,我们人还是少,所以他问:“你认为还可以请谁参加?”我首先提议总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我在战时认识他,那时他在第一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是位勇敢的将军,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中我多次见过他。我提的第二个人是沙季洛夫中将,也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前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三个是坦克军中将格特曼,原前线坦克军团司令。第四个是炮兵上将涅杰林,是我在战时认识的。第五个布尔加宁建议邀请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A.M.普罗宁上将。^①

^① 基·谢·莫斯科连科:《贝利亚是怎样被捕的?》,夏风译,《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4期。

为实施政变，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调兵遣将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只在于把他们派到克里姆林宫呢，还是贝利亚官邸的办公室？看样子，官方以及某些军官的回忆录没有说真话。

6月26日下午14点左右，坎特米洛夫师接到出动坦克的命令，这是在主席团会议开始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候，是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下的命令。这时候主席团委员们大概知道了贝利亚被击毙的消息，某些人不同意把事情说成是逮捕贝利亚，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了斗争。15点左右莫斯科街头出现坦克，坦克开往红场并把炮口对准克里姆林宫。这是要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主席团委员施加压力。结果苏共中央领导达成了统一的口径——人民敌人贝利亚被捕，这样就可以继续导演以后的一系列演出！

军队将领们出席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应是在击毙贝利亚之后。据谢尔戈说，贝利亚同朱可夫在战前和战争中关系一直很好。朱可夫的回忆录出来后，谢尔戈有机会同朱可夫谈过话，并且是朱可夫主动提出的。他对谢尔戈说：“所有关于我参加逮捕贝利亚的说法都纯属臆造！”

从1949年至斯大林逝世前，国防部长一直是瓦西列夫斯基。3月5日重新任命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他在1947—1949年担任过此职务）。布尔加宁的副手是朱可夫，不过朱可夫在军队中的威望大大高于布尔加宁。正因为如此，需要召朱可夫参加主席团会议，用他的威望迫使委员们倒向赫鲁晓夫。朱可夫、莫斯卡连柯和巴季茨基到主席团会议来，合理的解释是，汇报在贝利亚住所击毙贝利亚的经过，同时也展示军队的支持。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26日事变的经过：当天出动了两支武装部队，一支由元帅将军率领直接去贝利亚的住所，将贝利亚击毙。一支坦克部队开往红场威慑某些持异议的主席团委员。然而，一位国家的二号人物就这样被杀死，是很难交代的，所以需要继续演戏，把事情说圆，这样就有了以后的逮捕、审判、枪决、火化等演出。

政变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剪除了贝利亚，却倒过来指控贝利亚企图发动政变、逮捕中央主席团委员们。

贝利亚可能发动政变吗？

1953年6月，贝利亚奉命赴德国处理那里的工人骚乱事件，在德国待了10天。

6月25日,刚从德国回来的贝利亚请求马林科夫在26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及其副手柳明的活动,以确定他们在捏造一系列案件中的个人责任——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等。一个准备发动政变的人是不会在政变前夕外出到德国去的,他需要坐镇莫斯科指挥政变。

1953年6月25日深夜,贝利亚同马林科夫曾有一番友好的长谈,谈话毕,贝利亚送马林科夫回格拉诺夫街的住所。据司机说,他们下车后又友好地谈了约10分钟,然后马林科夫进自己的家,贝利亚乘车回自己的住所。在政变(推翻马林科夫的政变或者剪除贝利亚的政变)前夕,是不可能有这样友好的谈话的!

如果真的存在强力部门的政变阴谋,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就不会在27日轻松地去看歌剧《十二月党人》,而会躲在可靠的安全地方。这就说明,那时没有任何危险,对手已被剪除。

1953年7月2—7日的全会是声讨贝利亚的会议,然而会议记录上看到的对贝利亚的指控都是些小事,没有一项涉及政变阴谋。

赫鲁晓夫的政变是客观存在,而所谓贝利亚政变纯属捏造!

贝利亚的“百日维新”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本来比较好。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度把马林科夫调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派他去中亚细亚。贝利亚向马林科夫伸出援手,为他调回莫斯科做了安排。从那时起,贝利亚同马林科夫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①

斯大林逝世后,他俩是真正主持工作的掌权人。马贝组合也许是比较理想的组合:马林科夫长期替斯大林管理党务和政府事务,但有点缺乏魄力。莫洛托夫对马林科夫的评价是:“马林科夫是个非常好的执行者,我们把他叫做‘守电话机的人’。”“马林科夫没有主见,意志薄弱。”“他是个十分墨守成规的人,他可以照章办事,但依我看,他无力更深入地和具有批判性地分析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②

贝利亚精明能干,脑子灵活,从他主持原子弹和火箭的研制并在短期内取得重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1页。

^②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404、413页。

大成就来看,确实是个干才。莫洛托夫对贝利亚的评价:“他很精明。他只干那些对他有利的事。他甚至不是野心家。”“他是个有才能的人。他不考虑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他干事很有把握。”“他讲俄语文理通顺,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是个优秀的行政领导人。看来也是很有天赋的肃反人员,但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给谁效劳都行。”^①

莫洛托夫同这两人长期共事,他的评语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从后来安全部门人员如安德罗波夫主政来看,由于职业特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里这类人比较了解国内外的真实情况,不会被假象和虚假信息蒙蔽,办事干练果断,知道使用什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贝利亚的这些才能在100多天的执政期间得到充分表现。这段期间他对内外政策所做的修正为以后赫鲁晓夫的改革拟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简单列举如下:

(1) 贝利亚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议在节日停止在建筑物上悬挂和在游行队伍中举领袖像。

(2) 斯大林逝世后立即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终止了“医生谋杀案”,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从集中营、流放地和监狱释放了100多万人。限制内务部特别会议^②的权限,制止刑讯逼供。

(3) 改革户籍管理,规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农民可以领取临时护照,开始结束苏联农民几十年没有身份证的历史。

(4) 从具体情况出发,主张在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不搞集体化。

(5) 在民族关系上主张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多用地方民族干部。为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案平反。

(6) 提出苏联防御性炸弹已够多,主张战后要缩减军费,多发展经济。

(7) 主张缓和国际局势。认为两德统一不可避免,不要求东德搞社会主义,认为和平的德国符合苏联的利益。

^①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402、405—407页。

^②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4年的决定,成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特别会议。特别会议的领导有权签署判决书。起初特别会议有权不经审判把人犯流放、送劳改营、驱逐出境,甚至可以作出直至死刑的任何判决。1953年9月撤销了特别会议,那时贝利亚已经下台。

(8) 主张恢复和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①

这是苏联历史上罕见的“百日维新”。在短短的 100 多天时间内能提出并实施如此多的重大改革措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充分说明贝利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和问题有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想改变斯大林的不得人心的政策的。苏联著名外交家特罗扬诺夫斯基是这样评价的:

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②

这些措施在“贝利亚事件”中统统成了他的罪状,虽然后来赫鲁晓夫继续实施了这些政策。

在这百日里,贝利亚并没有关注自身的安全,而是集中精力搞改革。赫鲁晓夫恰恰就是这时候在幕后积极活动,把矛头对准贝利亚。说贝利亚企图发动政变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就在赫鲁晓夫们策划逮捕贝利亚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德国处理那边的工人骚动问题,回国不久就落入赫鲁晓夫们所设的圈套。一个要搞政变的人是不会在紧要关头到国外去,而不在国内坐镇的,并且官方至今没有能够拿出贝利亚准备发动政变的具体证据。

贝利亚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呢?(1)他控制的安全部门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安全部门是斯大林消除竞争对手、潜在敌人、异己分子的强有力的工具。虽然前两任安全部门的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都没有善终,但其余威依然存在。(2)贝利亚手中拥有最令人不安的关于每一位领导人的个人资料。斯大林喜欢用有问题的干部,这是控制他们的辫子。为斯大林收集领导人的资料是安全部门一项重要的机密任务。正因为如此,斯大林一闭眼,新领导人的首要工作就是接收斯大林的档案。莫洛托夫说:“他(贝利亚)掌握所有人的专案文件(досье)。也掌握斯大林的专案文件,当然,也有我的。”^③(3)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他

^① 对此我国学者早已有论述,如杨存堂《体制造就了复杂的贝利亚》,《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7期;徐葵《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决》,载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桂香《“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载《苏联真相》中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转引自王桂香:《“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载《苏联真相》中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75页。

^③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跟不上,却看到这是非常得民心的举措,贝利亚可以因此而更加得势。这样,贝利亚就成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好在贝利亚的改革措施确实是苏联无法回避的改革方向,苏联要走出死胡同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不开始纠正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能不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贝利亚出师未成身先死,但他所开始的改革事业却无人敢中断,只是进程被推迟了。

贝利亚与镇压

作为安全机关的首脑,贝利亚最受诟病的就是他手上沾满无辜牺牲者的鲜血,他的名字经常同他的血腥前任亚戈达、叶若夫并列在一起。

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了镇压机关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契卡),后来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再后来把其职能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二战”后改名为内务部)。这些机构是国家机器中执行镇压职能的机构,掌握了生杀大权。如果说在革命之初镇压是必要的(虽然错杀的也不少),那么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及时转向国内和平或者国内和谐。20年代初确实削减过契卡的权力,并进行过改组,但是斯大林执政后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声称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这个错误的理论为大规模镇压提供了虚假的理论依据,正是在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镇压反而达到高潮。那时他对在镇压中出了大力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感到不满,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与日丹诺夫联名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电报称:亚戈达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件事情上耽误了四年时间,应当让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于是换上了更加残酷的叶若夫。1937—1938年,苏联大地刮起了“叶若夫旋风”,国内的镇压达到疯狂的程度。

1938年上半年,结束了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审判,至此斯大林对手已消灭殆尽,斯大林决定降温。但是靠屠夫叶若夫来降温是不行的,于是从老家格鲁吉亚调来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

从最近公布的《贝利亚日记》看来,贝利亚本人并不怎么愿意来莫斯科,他在1938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日记。而现在想起写了。收到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

他建议我去莫斯科从事契卡工作，担任叶若夫的第一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斯大林）是个复杂的人。他干了镇压的蠢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充满亚戈达和托洛茨基的人员。柯巴（斯大林）写道，我是整个党的领导中一个了解契卡工作的人，只有我是唯一能够整顿工作的人。用觉悟来逼我，说把契卡整顿好，然后如果愿意你可以回老家。

但柯巴信任我，给我权力，我已把格鲁吉亚搞得无人可比。等一切都搞好了，就把你拉夫连季调开，跑到莫斯科去。逮间谍去……麻烦事很多，而满意的很少。谁知道，这些坏蛋把谁交出去，不把谁交出去。要好好地检查一切。

就是这样，拉夫连季。柯巴不怜惜你，不让你安稳地呆在家里。

1938年8月29日日记写道：

进入莫斯科生活。尼古拉（叶若夫）保持距离。我说了，对任命不感到高兴，本人没有提出请求，我最好在格鲁吉亚工作。但命令就是命令。

从日记看，贝利亚对镇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计算了一下，如果格鲁吉亚镇压多少万人，那就有多少万人会受牵连。1938年8月5日日记写道：

……将是沉重的。这两年国内流了不少的血……要抓最活跃的。如果在格鲁吉亚要把所有的都抓起来，那就要抓大约5万人，如果这样，就会有20万甚至更多的人不满。这里需要掌握分寸……^①

他的想法同斯大林“降温”的打算不谋而合。

斯大林选中贝利亚不是偶然的。1935年贝利亚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历史中的问题》的小册子，大力吹捧斯大林，第一次提出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提出两个领袖论——列宁和斯大林，两个革命中心论——列宁的彼得堡和斯大林的外高加索。这自然博得斯大林的欢心，为此授予其“列宁奖金”。他在格鲁吉亚担任过共和国安全部门的头，后又升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就是说，他既有安全工作的经验，又有党的工作经验，是符合斯大林要求的。

^① Рассекречены дневники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и: «Еще не всех врагов мы вскрыли...». ОКОПЛАНЕТЫ 12-05-2011.

当然,加强镇压或者缓和镇压都不是哪个内务人民委员所能决定的,他们不过是执行斯大林意志的工具而已。贝利亚于1938年下半年来到莫斯科,1938年11月25日至1945年12月29日任内务人民委员,这时候斯大林大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因此贝利亚对30年代的大镇压“贡献”并不大(当然在格鲁吉亚的镇压是他领导的)。在30年代的镇压中,那些曾在死刑决定上签过字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身处格鲁吉亚的贝利亚。当然他上任后的40年代,在实施镇压中是尽了力,包括卡廷事件。最近公布的卡廷事件档案显示,对波兰军官的屠杀是他以内务人民委员身份给斯大林打的报告,建议对他们处以极刑——枪毙,最后由斯大林等人签署批准实施。

从1946年起,他已不再担任内务部长了。1946年3月18日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次日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46—1953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原子弹和火箭的研发,在这个领域他为苏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战后不久,斯大林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这时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贝利亚在斯大林的镇压中是起过作用的,手上肯定有无辜者的鲜血,但其所应当承担的罪责,不会超过斯大林,更不会超过斯大林的那些亲密战友。也许是这个缘故,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能够放开手。

* * *

贝利亚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只能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指出较大的可能性。不过无论贝利亚是怎么死的,剪除贝利亚本身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大量事实说明,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划的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他离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策动其他主席团委员密谋反贝利亚,动用国防军将领,搞突然袭击,不经法律程序除掉了党政第二号人物,然后又编造种种谎言,掩盖其无法无天的做法。这是斯大林镇压的继续,手段极其残酷,难怪几年后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要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请求保留他们的性命。

政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政见之争,为实施自己的政策方针路线而发动政变,另一种是权力之争,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赫鲁晓夫反对贝利亚的政变,是一场争权斗争,从赫鲁晓夫后来实行的政策看,他同贝利亚并无原则分歧。这场政变消除了赫鲁晓夫腾飞路上的最大障碍,并为以后摒除马林科夫、独揽

大权准备了条件。^①

莫洛托夫承认这是赫鲁晓夫主谋的一场政变。丘耶夫同莫洛托夫谈话时问道：“简言之，策划了政变。可以这样说吗？”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在政治局把他抓起来了。”莫洛托夫指证：赫鲁晓夫是“整个事件的组织者”，“对付贝利亚的措施，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②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1期

① 本文部分资料译自“110 лет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Лаврентия Павловича Берия”. Сайт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9 мая”. 17 Апрель 2009.

②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页。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一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强烈反响,毁誉不一。尤其是在中国,起初给予肯定,认为这个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不久又予以否定,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是需要的,不能否定,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来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开始出现不同的评价,但否定之声仍不绝于耳。2016年是苏共二十大召开60周年,有了60年的历史检验,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可以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做比较冷静客观的审视了。

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的决定

在评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往往把这看作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因而认定赫鲁晓夫出于个人动机而大反斯大林,把秘密报告所造成的影响归咎于赫鲁晓夫个人。

现在已经清楚,这个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的决定。

斯大林的执政,尤其是其晚年的所作所为,给苏联留下了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1953年3月他一闭眼,他的后继者们立即采取措施,实施改革。其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放人,开始了所谓的贝利亚“百日新政”。与此同时,党内的争权斗争日益白热化,第二号人物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发动的政变所清除。

不过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955年1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

委员会,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牵头,调查联共十七大选出的党内高层人士受迫害的冤案。1956年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调查结果的报告,分送主席团各委员。2月9日,中央主席团开会审议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等人对报告内容虽没有提出异议,但反对公开这段历史。他们的理由有三:(1)如何解释他们在斯大林当政时所起的作用?(2)担心带来的后果。(3)谁也没有要我们这样做,也就是说此事可以不做。可以看出反对意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担心揭露带来的后果——主要对他们那一伙人带来的后果。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主席团的每一个委员都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表示自己的看法,即使所谈的看法同总结报告规定的路线不尽一致。这个论点迫使反对者同意在大会上作报告,会议决定把有关个人崇拜问题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

二十大前夕,1956年2月13日主席团通过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由赫鲁晓夫向大会作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的建议,中央全会经表决批准了这个建议。

1956年2月14日二十大开幕。这时候报告还没有最后完成,波斯别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继续起草报告。这个报告只写到卫国战争前为止。赫鲁晓夫对报告不满意,于是以波斯别洛夫的报告为基础,亲自向中央书记谢皮洛夫口授了一个报告草稿。据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就是用这份还来不及誊清的草稿在会上作报告的,在报告过程中有“即兴”发挥的东西。“即兴”的内容是什么?据会议参加者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透露,波斯别洛夫起草的第一稿中“曾经企图为罪行辩护,指出实行迫害政策是由于某种历史需要,重提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地下反对派组织、斯大林的反对者处心积虑要复辟资本主义等的套话。在赫鲁晓夫本人做的报告中只剩下原稿的总框架和具体事例。而对违法行为增添了许多疾言厉色的批判。

报告长达5小时,没有外国代表团参加。报告结束后,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宣布:对报告不讨论,也不提问。会议通过两个决定:(1)赞同报告的内容。(2)报告文本分发各党组织,不得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

文件起初只分发给党的各级领导人,后来扩大到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我国有的留学生也听到过报告的传达。为此,对报告的文本作了相当大的编辑加工,盖上“仅供工作用”的印章。

苏共中央还决定提供一个版本给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报告在波兰落入一名记者手中数小时，他复印了报告，寄给以色列的朋友，此人把文件送到美国。1956年6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报告全文。

60年代初，我参加编译“灰皮书”，需要把托洛茨基的某些言论同秘密报告做比较，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冯修蕙借给我一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64开的小册子，不知是从俄文本还是英文本翻译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秘密报告的全文。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做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而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是对是错，都不能由赫鲁晓夫个人负责。即使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有“即兴”发挥，但整个报告最后也是经代表大会批准的。当然赫鲁晓夫个人在这中间起了重要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

秘密报告的问题不是全面否定斯大林，而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秘密报告出来后至今有人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种说法在早先是可以理解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正式公布报告全文之后，只要不怀偏见地仔细读一下报告的全文，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1) 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报告一开始就交待，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过去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报告的任务是要揭示问题，即个人崇拜问题。并且赫鲁晓夫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在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中的作用。

(2) 赫鲁晓夫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各种错误，特别是镇压大量无辜人员的错误，这是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纠正错误，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在这方面，与其说赫鲁晓夫做过头了，不如说，限于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出于各种考虑，做得还很不够。但开这个头是必要的。他所举的事实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那时已经开始从集中营和监狱放人，大批“犯人”开始回归社会，对此需要作出解释，否则全社会将会陷入混乱。

(3) 赫鲁晓夫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同各种反对派的斗争，把对反对派的镇压说成是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秘密报告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

投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1928—1929 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它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的“功绩”。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全盘否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关于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有一个是非问题,本文不可能详细评述,这里只指出一点:击败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使斯大林得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反对托洛茨基派,但在打倒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执行了比托洛茨基更极端的路线。他反对布哈林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以在打倒布哈林之后斯大林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更有甚者,在反对派投降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止步,又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分子。赫鲁晓夫是斯大林 30 年代大镇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当然多少知道内情,知道有些是冤假错案。在二十大之前他还问过新上任的总检察长鲁坚科:30 年代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以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很多知名人物提出控告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真实的事实根据?卢坚科回答说,从司法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者提交审判。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判的合法依据的。但是出于各种考虑和内外部的阻力,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实话。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非常后悔。

(4) 赫鲁晓夫报告的根本缺陷是把问题归结为所谓个人崇拜,而没有揭示出实质问题,即体制上的问题。他把个人崇拜作为斯大林一切缺点、失误乃至罪行的根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是存在的,个人崇拜导致个人极权,应该否定,但个人崇拜并不是出现各种弊端的根源。例如,斯大林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用个人崇拜是解释不通的。人们对你顶礼膜拜,祈求保佑,对你那么驯服,你为什么要把他们于死地?个人崇拜的说法解释不了。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众多的顶礼膜拜者!使用“个人崇拜”的说法是赫鲁晓夫的无奈之举,既要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又不想触动那个制度、体制,只好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个人崇拜。

(5) 正因为用个人崇拜来解释一切,所以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突出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用个人性格、个人对权力的追求、个人的猜疑心理来说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性格粗暴,这一点列宁早就指出过。但是性格问题只有同体制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为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任命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①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改组工农检察院等,都是想从体制或制度上来加强防范措施。列宁的这些设想就体现在他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也就是改革政治体制。

遗憾的是,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不进列宁的忠告,继续把“无限的权力”授予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一再容忍、纵容甚至助长,把斯大林的独断独行合法化,从制度上固定下来,最后形成高度集权或者个人专制的体制,这就使斯大林得以为所欲为。而这种体制一旦确立下来,就是发现问题也难以纠正了。魔法师用符咒召唤出魔鬼,但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送走,以致最后魔法师本人也会成为牺牲品。直到斯大林已不省人事的时候,苏共中央主席团才通过决定,解除斯大林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时候已经意义不大了。由于问题没有触及体制,所以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往往给人以对人不对事(体制)的感觉。

(6) 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苏共二十大后,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陶里亚蒂和南斯拉夫的铁托都指出是“制度”问题。那时还没有找到“体制”这个词,所以人们一听说是“制度”问题就特别紧张,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他们指的就是苏联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这个体制使得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可以为所欲为。赫鲁晓夫用“个人崇拜”来解释苏联出现的问题,显然没有说到点子上。“个人崇拜”的说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这种说法是不够科学的。由于没有认识到体制问题,所以纠正错误的措施也不在点子上,没有触动体制,只有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340页。

修补补的性质。斯大林参与了这个体制的创造,他本人也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历史说明,不改变体制,还会产生俄国学者所说的“斯大林现象”。说“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这个“全盘”并没有包括斯大林的体制,不全啊!

(7) 秘密报告也有不准确的东西。例如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一著作据为己有,迹近剽窃,他说:“《简明教程》是集体写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说:“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其实斯大林这里说的是实话,《简明教程》中对各种事件、人物、理论的评价都出自斯大林手笔,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两人只是提供某些素材,剩下的就是对斯大林撰写的文字叫好而已。但是由于书中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著作和指示,存在大量吹捧斯大林的言辞,直接作为斯大林的著作出版毕竟有所不便,才最后使用了所谓“特设委员会”作为编著者,而斯大林本人隐身于后。《斯大林全集》只出到第13卷,有材料说本来第14卷或第15卷是准备收入《简明教程》的,因斯大林逝世后开始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全集》中止出版。

“个人迷信”还是“个人崇拜”?

苏共二十大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俄文 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译作“个人崇拜”是准确的,完全符合原意。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有人改作“个人迷信”。从表面上看两者好像差别不大,但背后存在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人认为需要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个人崇拜”不能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实际上这是用文字游戏的手法为“个人崇拜”辩护。

“崇拜”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指对所信奉的精神体(如神、仙、鬼、怪)表示尊崇而采取的某些行为(身体的动作,念或唱某些祈祷、赞美词)。目的主要在于对所信奉的对象进行感恩和祈求护佑。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如自然宗教有自然崇拜,部落宗教有图腾崇拜,文明社会的宗教有偶像崇拜、神灵崇拜,故崇拜对象也是对宗教进行分类的依据之一。”

《大俄汉词典》对 культ 的解释是:“1.祭祀,祭礼,宗教仪式。2.崇拜,崇拜物,偶像。”其基本含义都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愚昧的产物,都是不能予以肯定

的,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上反对的“个人崇拜”是非常明确的,是反对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里的崇拜一词是完全否定意义上的用词。

如果说在自然界出现的崇拜现象是人们的无知造成的,那么在苏联出现的个人崇拜则是人为的有意制造培植的。可以对比一下列宁和斯大林。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当然是存在的,但主要是列宁逝世之后出现,列宁生前是反对搞他的个人崇拜的,列宁那时也没有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他承认,他多次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主张无法通过。1920年曾经为列宁五十大寿举办庆祝会,列宁避席拒听对他的歌功颂德。1929年斯大林五十大寿,《真理报》连续几天连篇累牍地刊载歌功颂德的文章,甚至刊载歪曲国内战争历史、借以抬高斯大林的文章,而这一切自然是在斯大林的默许纵容下进行的,斯大林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可以说五十寿辰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起点,而个人崇拜是他走向个人专权、个人独裁的一个重要环节。多个国家的历史证明,个人崇拜是通向个人专权和个人独裁的一个重要环节。

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对任何个人的崇拜。《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领袖观。这就是说,对“救世主”的个人崇拜,对“神仙”的崇拜,对“皇帝”的崇拜,统统是要不得的。共产党人不能搞个人崇拜,不能培植个人崇拜,不能鼓励个人崇拜!不能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掩护下搞“个人崇拜”。因此,我认为在反对把某一领袖神化的时候,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 还是译作“个人崇拜”比较准确。用反对“个人迷信”来肯定“个人崇拜”是错误的。

谈点因果关系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强烈的反应,出现所谓信仰危机。西方国家共产党出现退党潮,东欧国家出现动荡,一些搞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下台。有人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咎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没有这个秘密报告,世界就会太平无事,国际共运就能够继续发展壮大。人们把十恶不赦的罪行扣在赫鲁晓夫头上,而不去谴责斯大林的错误或者罪行。

这就不得不谈一下因果关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发了长期被隐瞒、被掩盖的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包括个人崇拜、个人专制、滥杀无辜、制造冤狱、迫迁少数民族等问题。这些问题不管谁揭露的,也不管什么时候揭露的,都必然会在世界上

引起强烈反响。当年法国作家纪德访问苏联后写了一本小书《访苏归来》，如实地讲了一些所见所闻的苏联阴暗面，如对斯大林的崇拜、粉饰太平的波将金村的做法、封锁外部世界情况的愚民政策等，这就掀起轩然大波，被苏联官方指为造谣污蔑，纪德本人立即从“苏联之友”变成“苏联之敌”。纪德那时还不知道斯大林的大清洗，如果他知道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些事实并且予以公布，那么早在30年代世界各国就发生大地震了。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贝利亚没有被赫鲁晓夫所清除，那么，做秘密报告的很可能是贝利亚，而不是赫鲁晓夫。贝利亚作为内务部的头头非常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大量的清洗事实，斯大林死后，他和马林科夫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提出批判个人崇拜。斯大林大清洗的高潮是1937年到1938年的上半年，贝利亚是1938年底才从格鲁吉亚调到中央来的，这时候斯大林认为清洗已经大体达到目的，可以降温了。接替叶若夫的贝利亚的任务正是给清洗实施降温的。因此贝利亚对清洗并不承担太多的责任，如果由他来做“秘密报告”，对他个人来说并非难事，是可以为自己辩解的。可以断定，如果由贝利亚在1953年做秘密报告，那么1956年以后发生的一切就会提前，而不是避免。还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其后果应当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只揭露了当年清洗内幕的一小部分，主要是联共十七大代表以及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们的悲惨遭遇，一些典型人物遭受刑讯逼供的个案，一些将领遭清洗的事实。据秘密报告揭露：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代表大会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这些数字是有代表性的，虽然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具有爆炸力。

不妨再假设一下，如果这个秘密报告延迟至80年代由安德罗波夫或者戈尔巴乔夫来做，那么在他们上台之前的那些年就会是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继续统治的岁月，苏联就会处于更加不可收拾的境地，如果这时候做秘密报告，就会揭露出更多的罪行，人们会知道被镇压的人数达2000万之多（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雅柯夫列夫提供的数字），其冲击波很可能会使苏维埃大厦立即轰然倒塌。

1956年离斯大林逝世已经有三年了,继续走老路已经不行,苏联有大量迫切的工作要做,政策需要调整,对一些现象也需要做出解释。例如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放出大量“犯人”,官方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农业面临许多问题,要提高农业生产,必须改变某些政策方针,国际上需要缓和紧张局势,要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要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同斯大林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不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苏联就难以继续前进。抛弃斯大林的种种政策、做法,即使不触动斯大林体制,也是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苏联所处的这种境况是外国共产党人所知不多,或者一无所知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会使长期为斯大林唱赞歌,把斯大林奉为神圣的那些共产党陷入难堪的境地。例如为莫斯科三大公审案的受害者平反就是赫鲁晓夫遇到的一个难题,阻力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外国的共产党,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过遗憾。

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荡的是赫鲁晓夫报告中所揭露的那些事实,评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时候需要分清,谁是罪魁祸首?是制造罪行的人,还是揭露罪行的人?不去探讨引发动荡的根源,不去谴责制造罪行的人,而把揭露者当做罪人,不能不说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有过错吗?!

《随笔》2016年第6期

白 与 黑

——赫鲁晓夫的墓碑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去世。中国报纸用“赫鲁晓夫死了”六个字的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这是苏联唯一一个没有在任期上去世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去世时缺少这一头衔，麻烦就来了。当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后事，而是去搜查赫鲁晓夫的房子，没收所有的文件以至各种录音带——特别是此前已经闹过轰动世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事件，当局更是不放过片纸只字。死亡的消息是安葬的当天(13日)才在报上发布的，目的自然是尽量减少参加的人数。不过此前，赫鲁晓夫的儿子已经通过电话把消息传给西方通讯社，告知亲友。为避免举行追悼会，新圣母公墓的有关当局特意撤去可以发表演说的台子。赫鲁晓夫的儿子等人只好站在土堆上发表悼词。整个葬礼只是个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葬礼。没有官员出席，只有从当天报上得知消息的米高扬在丧礼快结束的时候送来了花圈。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赫鲁晓夫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在联合国“敲皮鞋”，多次轰动过全世界。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应该说，赫鲁晓夫有不少战友、朋友、上级、下级。然而，在他下葬的时候，到来告别的却无一个宦官人士。这里的问题远不是世态炎凉，而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使然。而他的墓碑的树立，其曲折简直可以写一部不大不小的小说。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任上去世的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一场宫廷政变把他赶下了台，成为“下台干部”，此后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当然，当局对他的关注并没有减少。作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他本可以在为他提供的别

墅里平平静静地了此一生。不过此人生性好动,除了在他的小园子里继续他的庄稼种植试验之外,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在那时的苏联写回忆录可不是一件小事,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基里连科告诫赫鲁晓夫所说的:这实际上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述党的历史、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者的事情。因此政治局要求他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当时的苏共中央显然是通过窃听器得知赫鲁晓夫口授回忆录一事的。对这一套窃听技术,赫鲁晓夫当然并不陌生,他在台上的时候恐怕也没有少用。窃听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把重要的谈话放在园子里或树林中进行。布哈林在其“遗书”中针对苏联的特工机关说过:这个万能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的。赫鲁晓夫曾参与制造并且也利用过的这个机构显然也有本领来对付赫鲁晓夫自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口授、写作以至在国外出版,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同他过去曾经控制过的机构的斗法过程,也许由于他了解个中的奥秘,所以他成功地往国外偷送和出版了回忆录。

赫鲁晓夫官至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在10年期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红场上却没有他的葬身之地,虽然那里还埋葬着一些地位远不如他的党政要人,不过这些人都是在位时去世的,所以葬身之地也不一样。难怪苏联的终身制如此难以打破——谁都想要死在任上,这样,别的不说,至少可以在红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在任这一点很重要,哪怕你只当了一年的第一书记,也是有权埋在红场上的!

就信仰而言,共产党是最反对等级制的,不过红场上的墓葬却是按等级安排的。

处于特级地位的自然是在红场上的“陵墓”,历史上只有两人享受过此殊荣,一个不必说是列宁,另一个是斯大林。

列宁在最后一年已经不能视事,尽管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没有被取消。他是死后身不由己地被安放在红场上特建的陵墓中的。那时列宁已经没有表示意愿的可能,但据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坚决反对保留列宁遗体的。

斯大林曾被安置在这里,与列宁并躺在一起——虽然从“遗嘱”看来,列宁在最后时日并不喜欢这个人,显然也不会愿意和他并排躺在一起。那时“列宁墓”一度

被改名为“列宁斯大林墓”。

第二等是埋葬在列宁墓后面的红墙下，刻有石碑，立有半身塑像。80年代初我们通过电视曾看到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这些在第一书记位置上寿终正寝的领导人在此下葬的情景。

第三等是把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上。办法是在墙上取出砖头，放进骨灰盒，然后安上刻有其姓名和生卒年的大理石墓碑，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等人的骨灰都被安放在红墙上。

赫鲁晓夫是“下台干部”，属另类，进不了红场，只好埋葬在市内的新圣母公墓。这是莫斯科的一个著名的公墓，有点像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里面长眠着无数旧俄和苏联的各界名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些“下台干部”如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等人后来也埋在这里。这是每一个到莫斯科的人必访之地。而自1975年赫鲁晓夫的墓碑在此建成之后，新圣母公墓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景点，成为国内外游览者寻访的对象。

赫鲁晓夫是个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盖棺论定”的人物。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葬礼上发表的悼词中说：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做出自己的判断，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面目，对每个人做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谢尔盖也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

谢尔盖的说法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个争论在苏联时期没有结束，在如今的俄国也没有结束，在我们中国还在进行中。不知道在新的世纪是否会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和时代一样，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是一个过渡时代：旧的斯大林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而取代斯大林模式的新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赫鲁晓夫那不顾一切的莽撞是冲破旧模式所需要的，而他的理论以及整个修养的欠缺，又使他难以找到合乎苏联具体情况的新道路。他以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突破点首战告捷，但下一步怎么走却不甚了了。他揭露斯大林的恶行，但看不到体制的弊端。提出集体领导，但地位一稳，慢慢地又是个人说了算。平反冤假错案开了

个头,却不敢去碰 30 年代的几个关键性大案。支持“解冻”,支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但又围攻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不能容忍抽象艺术之类的“异端”。同南斯拉夫修好,又去镇压波匈的民族民主运动。想结束冷战,又不得不投入军备竞赛,如此等等。时代是矛盾的,赫鲁晓夫个人也是矛盾的。

墓碑的设计者是颇有戏剧性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特内。他给赫鲁晓夫的墓碑设计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色——白与黑。

涅伊兹韦斯特内是雕塑家、抽象派画家。在 60 年代初曾经被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这段历史值得一提。

涅伊兹韦斯特内在库什卡读完军校,卫国战争期间他 17 岁上前线,当过空降兵,立过功受过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脊椎被打断。本来需人终身照顾,但他战胜伤病,去接受了高等美术教育和高等哲学教育。这是个颇有天分的年轻人。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在纪念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 300 周年的纪念碑方案征稿中,涅伊兹韦斯特内的《班杜拉琴的演奏者》一举中标。然而,他的这一雕塑似乎并没有建立起来。

他报名加入美协莫斯科分会,顺利通过。但随即有人找他做私下交易,告诉他,雕塑家稿费很高,可以过得不错。但必须轮流坐庄,今天你中标,明天要让给别人。涅年轻气盛,回答说:“应当公平竞争,我要靠才气把你们统统击败。”然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行不通的,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对方冷静地回答说:“离开我们,你通向艺术的大道就堵死了。”

诚如所言。尽管他在各种设计竞赛中频频中标,但却很难得到落实。例如他为俯首山设计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碑方案一举中标,但遇到艺术界同行的强烈抵制,纪念碑迟迟不得开工,而方案却被人剽窃,用到伏尔加格勒的纪念碑上了。而现在人们看到的俯首山上的纪念碑已不是他设计的了。

1962 年底,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 30 周年,在马涅什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现代美术展览。起初展出的作品都是一些得到官方认可的画家的作品,并未引起观众多大的兴趣。后来出人意外地中途邀请了一批非常活跃的民间画家参展,他们的油画挂在二楼展厅。1962 年 12 月 1 日,他们应邀站在各自的作品旁边,以随时作讲解。画家们不知就里,实际上是因为这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要来参观。赫鲁晓夫领着一班人很快看完了一楼展厅,穿上大衣准备告辞了。这时

他的同僚劝他到二楼去看看那些抽象派美术作品。据说，他身上的大衣几乎是被人硬给拽下来的。赫鲁晓夫不大情愿，但还是上楼去看了。涅伊兹韦斯特内记述道：

他开始到这里来巡视，里面挂着比留亭和我其他几位朋友的油画。他口出恶语，令人害怕，对这些作品越来越生气，最后竟然大发雷霆。声称“一头毛驴用尾巴都能比这画得好”。我试图让他明白，他被人愚弄了，因为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在美学领域里他只是个文盲。他表示，过去他当矿工时是不懂，可“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了。”我对他说：我们这场冲突实际上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这个阴谋的用意不仅是破坏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也不仅是针对知识界，针对我的，而且还是针对他本人的。

后来知道，实际上这一切是党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及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德·阿·波利卡尔波夫事先策划的。他们有意让赫鲁晓夫出面去整非官方的青年艺术家们。他们这一招果然颇有成效。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接见文艺工作者。在会上再次把涅伊兹韦斯特内骂得狗血淋头：

您的艺术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钻进厕所，藏到便桶的木圈下边，还从这里，从便桶圈底下往上看，看它上面有什么，是不是有人坐在上面。从下面，从便桶圈可以看到身体的这一部分。这就是您的艺术。而且这也是您的立场，涅伊兹韦斯特内同志，您坐在便桶里边。

这段话相当“生动”，颇有赫鲁晓夫语言的特色。可惜这同艺术批评、同政治指示毫不相干！我们知道，在苏联共产党内出现过一些颇有文学修养的领袖人物，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他们的艺术评论完全可以同专业评论家平起平坐，甚至高出一头。拿赫鲁晓夫同他们比，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这位矿工出身的领导人，并不因为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就成了天然的艺术评论家！

当然，评定艺术的好坏，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在我国，应由人民来决定。而谁是人民？党是人民。谁是党呢？我们。我们就是党。也就是说，将由我们来决定。”

涅伊兹韦斯特内的俄文是 Неизвестный，意为“无名的”，“不为人知的”。赫鲁

晓夫以为这是个笔名,当涅告诉他“这是我的姓”后,他竟然责问:“干吗要姓涅伊兹韦斯特内?”

记得在60年代“三家村”有一篇短文,说的是金龟子身上含有黄金。到了“文化大革命”,有文章批判说,金龟子俄文是 Хрущ,与赫鲁晓夫的姓同,因此“三家村”是往赫鲁晓夫脸上贴金!这样,人们也不妨问问赫鲁晓夫,干吗要姓这个祸延“三家村”的“金龟子”呢?

马涅什事件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不安,他们担心思想解放运动遭到扼制。于是,一批知名艺术家和文化人联名上书赫鲁晓夫,为二楼的画家们辩护。其中有爱伦堡、西蒙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叶甫图申科等。

话说回来,就是这位涅伊兹韦斯特内被赫鲁晓夫的儿子请去为其父设计墓碑。这当然有点像是历史的讽刺。不过,涅本人对赫鲁晓夫倒不记仇,他明白,马涅什事件并非出自赫鲁晓夫本意。赫鲁晓夫很矛盾,但实行了诚实的进步政策。这次画展是故意举行的,展品都是临时拉来的。在马涅什他不过是受人挑动而已。他认为他本人的厄运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极小,赫鲁晓夫本人也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的受害者。所以他痛快地答应了谢尔盖的设计墓碑的请求。

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对此表示过后悔。他在回忆录中说,记得粗暴地批评了涅伊兹韦斯特内,说他起这个名字是为了使他的作品始终莫名其妙。像我这样身据国家高位的人,说了一些可以被人用来错误地反对某一个人的话,这是不能原谅的。如果我现在遇见涅伊兹韦斯特内的话,我要为所说的话向他道歉。

赫鲁晓夫的儿子并没有找错人,这是最合适的人选。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用现实主义的具象是很难表现的。最多就是立一个大理石柱子,上面安置一个头像——像到处可见的那样。在这里抽象派艺术方法可以发挥作用了。就如诗人叶甫图申科对赫鲁晓夫说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用旧式的绘画风格已无法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风貌。那时就得求助于其他的艺术风格了。抽象艺术正是这里所需要的。涅伊兹韦斯特内准备搞一个反映赫鲁晓夫个人威望、矛盾和悲剧的墓碑。于是他借助于抽象的黑与白。他给赫鲁晓夫设计的墓碑是:一块竖起的石头,一半白色,一半黑色,中间一个头像,下方是一大块平板。

对此,设计者自有他自己的思考。按照涅伊兹韦斯特内本人的构想,墓碑的构思包含了永恒的矛盾,革命的进步的因素同保守的反动的因素之间的斗争。他认

为,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斗争中进行的。我们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也就是与那扼杀它自身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例证。原子弹就是这样的东西。这种看法在神话里的化身是半人半马。在我们的墓碑中黑与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假设: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的看法。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象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石块应当是不规则的,相互咬合,形成一个整体。墓碑的主要成分为白色大理石,它那动作刚强的形式向黑色花岗岩发起进攻。黑暗在反抗,不退出自己的阵地。这里自然也包括人自身内部的斗争。

具体到赫鲁晓夫,他说:“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础是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动对静。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要往后拉。这一生活发展的基本思想很适合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开始让我国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们都看到了曙光,它预示着太阳很快就要出来。光明开始驱散黑暗。”

起初,作者打算什么肖像也不要。他认为,只有在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希望保留他的外貌,以免从记忆中消失的情况下才需要肖像。我们需要象征性的东西。不过赫鲁晓夫夫人坚持要有肖像。所以最后加上了赫鲁晓夫的头像。头像是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的,非常逼真。

方案有了,但还要得到俄罗斯联邦艺术基金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建筑规划总局艺术委员会的批准,要取得各种各样的物资材料,特别是作为战略物资的青铜。处处都是难关,到处都遇到关卡。而最糟糕的是方案久久过不了关,审查者要求作各种各样的修改。有人建议改用灰色花岗岩,有人建议用红色斑岩。有人建议在石柱上竖胸像。有人建议降低墓碑的高度,等等。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黑白相间的搭配,他们千方百计地揣摩黑白的真正含义。

为解决问题,谢尔盖甚至把电话打到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但都遭到了回绝。最后赫鲁晓夫夫人只好直接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求助。柯西金发话:既然家属赞同这个方案,办公室或者其他人就不必干预了。这才算最后解决了问题。

1975年7月2日,涅伊兹韦斯特内设计的墓碑安装完毕。立即引起纷纷议论。黑白相间的搭配引起的议论最多。这恐怕就是抽象艺术的最大好处,它留下巨大

的空间,给观者留下遐想的余地,思考的余地,议论的余地,甚至争论的余地。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白色表示好事,黑色表示坏事。作者表达的是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一半好,一半坏,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五五开。也有人认为这里表达的是善与恶、生与死,赫鲁晓夫命运中的成果与挫折。不管怎样,赫鲁晓夫的墓成了新圣母公墓中的一个新的热点,每天都在墓碑旁聚集一堆人在议论。墓碑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兴趣,对50年代的回忆复活了。这自然是当局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新圣母公墓挂出一块牌子:内部修理,停止对外开放。这一关就是十多年。

据说,有一个由原斯大林劳改营囚犯组成的代表团特地找到涅伊兹韦斯特内,把他们募捐的钱亲手交给他,以感谢他塑造了这个墓碑。然而,设计者本人却已经无法留在苏联了,墓碑建成后不久移居美国,现在还不时回俄观光。

历史学家亚·米·涅克里奇参加了赫鲁晓夫的葬礼,他感慨地说:命运之神真是嘲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将永远长眠在艺术家、诗人和学者当中,一句话,长眠于这些知识界杰出成员当中;当初他曾不公正地对待知识分子,可今天却唯有知识分子还在深情地怀念他!

比起红场来,新圣母公墓有一大优势,这就是进出不受限制。这样,每年怀着不同动机到赫鲁晓夫墓前凭吊、参观、游览以至猎奇的人要比去红场墓地的人多得多——它更接近群众!

《万象》2000年第11期

魂归何处？

1992年秋，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久别的红场，想去看看列宁墓。这是因为，苏联的红旗降下前后，他们国内一直有一个列宁遗体如何处置的争论，怕以后再见不着了。

20世纪50年代，每次经过莫斯科都去列宁墓瞻仰，那时墓中并排躺着两个人：列宁和斯大林。在昏暗的墓室里人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他们的遗体。斯大林着大元帅服，列宁只是一件深色的西装。有一束红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看上去列宁比斯大林年轻许多——列宁逝世时才54岁，是英年早逝，而斯大林逝世时已是74岁的老人了。难怪30年代克鲁普斯卡娅去看望列宁的时候不禁感叹：沃洛佳（列宁的爱称），沃洛佳，你还是那么年轻，而我已经老了。在这里人们会有时光倒错的感觉。

经过30多年，列宁容貌依旧，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尽管一直传说，很多部位已经腐烂。从1924年算起，列宁已经在此躺了60多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苏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制定的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打发“见鬼去了”；他身旁的亲密战友们一个个成为“人民敌人”消失了；他曾警告不要与农民为敌，这些农民被斯大林赶进了集体农庄，成为“国家农奴”，从此苏联的农业一蹶不振，到50年代初还没有赶上沙俄1913年的水平；他手下那些善战的将领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以至德国入侵之初，曾经战胜多国武装干涉的红军一溃千里；他曾经要求撤销其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竟然和他并排躺在同一个陵墓里达数年之久；他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万人围观中关闭了总部，自动解散了；他曾经设想万一联盟维持不下去，可以倒退到只保留外交、军事方面的联盟，然而连这样的联盟也不可得，苏维埃联盟国家一夜

之间土崩瓦解了……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莫此为甚，想来躺在陵墓中的列宁是无法瞑目的！

通常都说，社会主义是最讲平等的社会，不过，实际上苏联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仅活着的时候，就是去到天国之后也是如此，葬身之地各不相同。

最高等级当然是列宁，其遗体安放在全国政治中心的红场。列宁逝世之前，高层已经酝酿其身后之事。斯大林、加里宁等力主保存遗体，举办一个世界上最宏伟壮观、前所未见的葬礼。虽然有布哈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至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强力反对，认为这是列宁生前竭力反对的“造神主义”，但无济于事。

保存领袖遗体，这在世界上是空前的（除了古埃及的木乃伊）。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也有许多开国元勋，也有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但是没有一个被保存遗体。巴黎在荣军院陈放着拿破仑的棺柩，但荣军院不是专门为拿破仑修建的，只是利用了现有的建筑而已，人们到此也只是凭吊而不是膜拜。巴黎还有先贤祠，里面有许多贤人名士的灵柩，但不是总统总理高官就能进入的，必须是真正的名人，确实对人类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有严格的进入制度。

斯大林是保存领袖遗体的始作俑者，他死后倒也曾经享受保存遗体、安放在红场这种荣光，不过好景不长，不到十年就被挪走了。所以 1992 年去看时陵墓门上已经去掉斯大林的名字，只有“列宁”两个字了。这时红场也不再是革命的红场，虽然有一些举着“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牌子的老人在游行。红场上压倒的声音是大喇叭传出的做弥撒的布道声。在这种声音的伴随下步入列宁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1 年，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出，埋在列宁墓的旁边。至今国内还有人讲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焚尸扬灰”了，甚至一本关于苏联兴亡史的学术著作也重复这种无稽之谈，说“大会还决定搬尸焚尸，作出把斯大林的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并予以火化的决议”。这完全是想当然。事实是，1961 年 10 月 31 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认为在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当晚就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墓中搬出，安葬在列宁墓旁边。安葬前，取下了他身上的“社会主义劳动

英雄”的金质勋章，并且把他元帅服上的金纽扣换成铜质的。当时只在墓上立一个有生卒年的碑子，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安放上斯大林的半身大理石的雕像，下刻斯大林的名字和生卒年。入土为安，这是斯大林的最好归宿了。否则，苏联解体后怎么处置斯大林的遗体，一定会成为大热点。

掩埋斯大林的那块墓地在列宁墓的后面，人们从列宁墓出来后都要经过的。这是苏联第二等级人员的墓葬地，在任去世的党政领导人的墓地，如总书记（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以及其他一些死在任期上的重要领导人都葬在此地。应当说，斯大林埋在这里规格不算低了。

再下一个等级的人物是把骨灰盒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就是在红墙上取出几块砖，把骨灰盒放进去，然后安上一块刻有名字和生卒年的大理石碑。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著名作家高尔基的骨灰就安放在宫墙上。游客可以看到一大片宫墙已经变成墓墙了。

下台干部，哪怕你曾经是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也进不了红场的墓地。他们的位子大多在莫斯科的一个名人墓地“新圣母公墓”，这是由坐落在那里的“新圣母修道院”得名的。传说，当年这里是鞑靼蒙古人掠夺俄罗斯姑娘献给金帐汗国的地方，修建修道院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少女们。墓地经过历代整修和扩大，现在占地 7.5 公顷，有 26 000 座墓。20 世纪 30 年代莫斯科好多修道院的墓地被毁，其中的一些名人墓被迁葬到新圣母墓地。公墓入口可以索取一张墓葬图，上面标有名人墓地的位置。

这里埋葬着大量的各界名人。下台干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墓地就在这里。我去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去世不久，墓是新修的，好像是用红色的花岗岩筑成的，干净且有气派。不知道为什么，莫洛托夫的墓似乎没人管，他的一张照片落在地上，似乎还有人踩过。

赫鲁晓夫墓颇有特色，墓碑的设计者是因抽象艺术曾经遭到赫鲁晓夫痛骂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特内。他给赫鲁晓夫的墓碑设计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色——白与黑。他要以此表现两个原则之间的对抗：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反动，动对静。一个要向前走，另一个要往后拉。他认为这一思想很适合于赫鲁晓夫，他开始让苏联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让大家看到了曙光，但也有人往后拉，要倒退。本来雕塑家准备只要互相咬合的黑白大理石，但由于赫鲁晓夫夫人坚持要

有赫鲁晓夫的头像，所以又加上大理石的赫鲁晓夫头像。1975年7月2日，涅伊兹韦斯特内设计的墓碑安装完毕，立即引起纷纷议论。黑白相间的搭配，给凭吊者留下议论、想象、思考的余地。赫鲁晓夫墓的位置很好，参观者很容易找到，并且随时可以来，不用排队，不用等候。赫鲁晓夫能够跻身于知识分子之间，离群众这么近，这恐怕是他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新圣母墓地就像一个雕塑公园，随逝者的职业身份声望不同而立有不同的墓碑、雕塑。这里名人成堆，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亚·托尔斯泰、爱伦堡等等都葬身此地。2001年我再访时候，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去世不久，远远就看到绿荫丛中一尊白色的大理石舞者的身影，非常显眼。

这里有两位第一夫人的墓，一座是斯大林的夫人阿利卢耶娃的墓。阿利卢耶娃死于1932年11月，死因至今众说纷纭。墓上有一座她的大理石头像，右手放在颈部。有人说，这是暗示向这里开的枪。原先雕像是开放的，不知什么时候加上了玻璃罩，该是防护措施吧。另一位第一夫人是苏联唯一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这是新建的墓，有一个墓主的白色大理石全身塑像，占地相当大，显得豪华。

顺便说一下，1921年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逝世，莫斯科苏维埃在报纸的头版发布讣告，用专列把他的遗体从外地的德米特罗夫运回莫斯科，安放在红场旁边的工会大厦供各界告别，甚至为此从狱中暂时放出关押的无政府主义者，让他们同自己的领袖告别。克鲁泡特金被葬在新圣母公墓。此后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就成为同苏联党政领导人遗体告别的传统地方。

还有一个著名的名人公墓不在莫斯科，这就是位于圣彼得堡的沃尔科沃公墓，占地26公顷，比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要大。这里也埋葬着大量的文人和科学家，如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门德列耶夫、巴甫洛夫等。2002年，我去彼得堡参加普列汉诺夫国际学术讨论会，适逢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成立75周年，与会者去给普列汉诺夫墓献花，因此得以进入墓区。管得很严，不让乱走，不准拍照。十月革命后初期，布尔什维克党还多少能够容忍异己，所以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孟什维克领袖死后能够举行盛大的葬礼，在名人墓地能有一席之地。给普列汉诺夫墓献花后，我们顺便到附近墓地走了走，在不远处看到一块乌里扬诺夫家族的墓地，埋葬着列宁的母亲、姐妹以及其他亲属。传得纷纷扬扬说列

宁曾要求把自己葬在母亲墓旁边,指的就是这里。这里树木青翠,极其宁静,有大量名人在此安息,着实是个不可多得的长眠之地。苏联崩溃后,列宁遗体的命运一直成为俄国国内争论的热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当时的领导人不折腾出一个位于全国中心的陵墓,按照通常的方式把领袖遗体埋葬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把列宁迁葬于此,也是不错的选择,不妨让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两位巨人在地下去讨论十月革命的成败得失。这比把列宁同斯大林放在一起要好得多!

以上都是有名有姓埋在著名墓地的,不管是在红场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至少有一个葬身之地。其实在苏联历史上有更多的领导人是死无葬身之地或者说不知葬身何处的。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说,托洛茨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说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和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1917年10月反对武装起义那件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说布哈林(《真理报》主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说皮达可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然而就是这些受到列宁好评的人物以及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在列宁逝世后陆陆续续被斯大林送上了断头台(皮达可夫是自杀身亡的),至今不知葬身何地。苏联解体后发现多处“万人坑”,也许他们的尸骨就混埋在那里。在斯大林时期这样死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些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他们没有死在沙皇政府的屠刀之下,却背着骂名,死在“自己人”的枪下。斯大林在1925年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义正词严地斥责“新反对派”要布哈林的血,斯大林保证:“我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斯大林的话赢得了大会热烈的掌声。但是十几年后,他自己要了布哈林的血,他把布哈林的血留给了自己!布哈林在遗书中无奈地说,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全集》所刊载的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的讲话删去了以上内容。

列宁预见到党中央的稳定取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的关系,为此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去世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听不进列宁的忠告,让斯大林掌握党国最高权力,击败了托洛茨基并把他驱逐出境。一位和列宁一起打下红色江山的领袖,有家难归,有国难投,不得不重新过起流亡他乡的生活。但是,斯

大林还是不放过他,经过多次尝试之后,1940年终于派特工在墨西哥的科约阿康刺杀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安葬在他的最后住所的院子里,墓碑极其简单:上方是他的英文名字,名字下方雕刻着镰刀锤子!

《万象》2011年第11期

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总书记

《苏联史》中的五卷出版后，有读者来信说，《苏联史》第八卷《勃列日涅夫的十年》第420页有一张题为“奖章的爱好者”的照片是恶搞的照片，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是不应当使用这种照片的。

这张照片是我选的，当时只觉得很符合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像一张漫画，就采用了，但没有标明这是经过PS的恶搞作品，这是我的疏忽。

一般说来，史学著作是否可以刊载此类图片或者诸如讽刺画、笑话（我们现在叫“段子”）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这是反映真实的情况，而不是恶意捏造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是社会意识、舆情的一部分。中国的一些史书也常引用一些民谣、儿歌来反映当时的民情和民意。我们的史学著作如果能够关心此类东西，在著作中适当使用此类材料，将会使我们的史学著作变得生动起来，而不仅仅是板着脸孔列举一项项枯燥的史实，当然，在使用时需要交代清楚。

就照片而论，苏联时期伪造、修改涂抹的照片太多了。例如1920年5月5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开赴波兰前线的红军战士讲话的照片，本来有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两人在场的，但是到了30年代，照片中这两人被抹去。30年代有一张斯大林和被封为“国家安全总委员”的叶若夫一道行走的照片，叶被枪毙后，照片中斯大林旁边的“国家安全总委员”也随之消失。那时还没有PS技术，但修改照片的技术是有的。这种篡改反映的是政治生态，而不是民情民意，但它应当留在史书上，作为篡改历史，或者说，“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动写照。

勃列日涅夫是奖章的爱好者，这是闻名遐迩的，民间流传大量的有关段子，这些段子如果能够记录在史书和传记上，将使文字生动不少。段子是民众编造的，是

社会舆论、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现抄录几段与读者共享。

如果鳄鱼吞食了勃列日涅夫,那会怎样?

它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那些金属奖章。

听说莫斯科发生了地震,是什么引发的?

勃列日涅夫的上衣掉地下了!

勃列日涅夫要做扩胸手术。

为什么?

因为他的胸部不够挂勋章的了。

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又一枚金星奖章后发表讲话:

同志们,传言我接受许多奖章,来者不拒,这不是事实。例如不久前我就拒绝了毛里塔尼亚授予的国家最高奖章——鼻子上的金环!

听说要授予勃列日涅夫苏联大元帅的称号,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条件是他要会念“大元帅”这个词,如果他能念出,还会授予他人民演员的称号(俄文大元帅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一词比较拗口)。

勃列日涅夫凭什么获得苏联元帅的称号?

因为他攻克了克里姆林宫!

勃列日涅夫死后获得了第五枚苏联英雄奖章——因为他解放了克里姆林宫!

纪念普希金诞辰,悬赏征求纪念碑的雕像,评奖结果:

获铜奖的是普希金读勃列日涅夫的书的雕像。

获银奖的是勃列日涅夫读普希金的书的雕像。

获金奖的是勃列日涅夫读勃列日涅夫的书的雕塑!

这些段子当然是民众编撰的,不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确实反映出真实的勃列日涅夫,用文学的语言说,反映了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勃列日涅夫一生到底获得过多少奖章呢?其说不一。

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共获得苏联勋章15枚、奖章18枚,外国勋章42枚、奖章29枚。据俄国一位作者的统计,勃氏获得勋章共16枚,奖章22枚,外国奖章52枚。没有看到官方提供的确切数字,但在苏联领导人中间,他拥有的奖章数量名列前茅,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

从斯大林开始,领导人逢十的生日都要颁给奖章。斯大林六十大寿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稍后获“镰刀锤子”1号金质奖章。七十大寿获“列宁勋章”。赫鲁晓夫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他五十岁生日获“列宁勋章”,六十大寿获“列宁勋章”和“镰刀锤子”金质勋章,七十大寿获“列宁勋章”、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季米特洛夫勋章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金星”奖章。勃氏及其亲信更使这一传统登峰造极。他五十大寿被授予“列宁勋章”,六十寿辰获“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七十大寿获十个国家的14枚奖章,74岁第二次获“十月革命”勋章。

苏共总书记勃氏获得一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4次“苏联英雄”奖章!除他之外,只有朱可夫元帅获得过4枚这样的奖章。勃氏拥有5枚“金星”奖章,这个纪录无人能够打破。1992年我在莫斯科蜡像馆就见过他满身奖章的蜡像。

还有专门为勃氏设立的奖项。1981年给他颁发了“在苏共党内50周年”纪念章。他在接受奖章时说:“接受这一荣誉奖章我无比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而是对伟大列宁党的深深感激之情。”两个月后,再一次打破纪录,这是他75岁大寿,获得八个国家13枚各种各样的奖章。

除了国家奖项,勃列日涅夫还获得不少部门奖章,例如1977年获得苏联记者协会的会员证,与此同时获得佩戴记者协会证章之权。

勃氏获得国外奖项,根据不同统计为50至70枚不等。其中有阿根廷、阿富汗、几内亚、越南、保加利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民主德国、古巴、老挝、朝鲜、也门、蒙古、秘鲁、波兰、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的勋章和奖章。

不过社会上也流传一些夸大的说法,例如:

“勃氏葬礼上有 44 名军官抬着他的奖章。勃氏的奖章超过 200 枚。”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任何史料的证实。不过他的葬礼上确实展示过他的大量勋章和奖章，这是有照片可证的。

“勃氏获得苏联的全部奖章，除了‘母亲英雄’奖章。”

实际上，苏联共设立 20 种勋章和 55 种奖章。勃氏拥有其中的 7 种勋章，19 种奖章。

“勃氏的制服加奖章重达 6 公斤。”

勃氏生前没有人能去称这个重量，干这种事会被抓去坐牢的。死后其全部奖章都被送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勋章收藏室保存。勃氏从来没有同时佩戴过全部勋章和奖章，他有几套制服，每套制服上佩戴 4 枚金星奖章、1 枚“镰刀锤子”奖章和列宁奖金的证章的复制品。出席庆典时，勃氏在制服上佩戴勋条。

勃氏是极其爱虚荣的人，不仅表现在拥有奖章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并不长于写作的总书记，找了几个记者捉刀替他写了《小地》、《复兴》和《荒地》三本回忆录，不仅大量出版发行，而且还获得了列宁文学奖金。有好事者编了一个段子说：“他埋在了荒地，上面盖上了一层小地，只是不能复活了（‘复兴’与‘复活’是同一个词）。”尽管勃列日涅夫的“三部曲”曾红火一时，甚至上了教科书，然而 1987 年夏，“三部曲”被当局定为伪劣作品，被下令从书店下架了。

用奖章来证明自己的功勋，来提高威望，这种做法并不靠谱。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给自己授奖授勋是易如反掌的事，谁都明白他是靠什么获奖的。不过，奖章既然可以授予，当然也可以剥夺，就像可以以领袖的名字命名某一城市，也可以取消此命名一样。一般情况下领袖去世时会获得勋章以表彰他生前的功绩，但勃列日涅夫没有获此殊荣，不仅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还剥夺了他的苏联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和波兰的“勇士勋章”（*Virtuti Militari*）。

顺便说一下，勃氏的爱好颇多。一个著名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种豪华轿车，据不同的说法，勃氏拥有 49 辆甚或 324 辆轿车，这在苏联时期是绝无仅有的，那时一般人拥有一辆车子就非常了不起了。他的这些豪华轿车大多是外国赠送的。据勃氏的私人保镖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回忆，勃氏出国访问前，通常由外交部出面事先同访问国谈妥赠送轿车事宜。勃氏不仅爱车，而且喜欢高速驾驶，这往往危及外国政要。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都描绘过乘坐勃氏驾驶的轿车的惊险经历。

勃氏的另一个爱好是狩猎和搜集各种枪支。勃氏使整个国家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当然是体制的原因,不过玩物丧志恐怕也是因素之一。

就本性而言,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人物,而是一个相当平庸的领导人。记得还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有一个电视剧,讲密谋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的,一群党政领导人在密室开会,推选勃列日涅夫为政变的领衔人。这时勃列日涅夫大声喊道:“为什么是我?”他显然不愿充当这场政变的领头羊!实际上当时有实力和能力领导政变的并非勃氏,而是“灰衣主教”苏斯洛夫或者克格勃的主席谢列平。不过在政治上最后充当领袖的往往不是最有才干的人,而是平庸的人,这是平衡的需要,有了这样的人各派力量就可以得到平衡而不至于发生内乱。正因为如此,后来当勃列日涅夫病得不能理政,打算辞职的时候,他周围的人都一致坚持要他留下,硬扶他出镜,让他念别人写好的稿子。

一个国家和党的元首不去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不给人民以舒适富裕、自由民主的生活,而想借助于给自己颁发勋章奖章来提高声望,实在是南辕北辙。你就是全身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各种各样的勋章和奖章,实际上还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勃氏执政 18 年,有很多的机会改革斯大林模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扩大国内的自由民主,使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他不思进取,以维持现状为己任,不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好机会,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而在对外关系上继续俄国的扩张主义传统,出兵阿富汗,坚持勃列日涅夫主义,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使国家陷入重重危机。这一切岂是身上挂几枚奖章所能掩饰和挽救的。这种不思进取的维稳政策的人事表现,就是一批老人管理这个国家。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四只脚,四十颗牙齿,这是什么?

鳄鱼。

而四十只脚,四颗牙齿,这是什么?

这是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统治国家 18 年,无所作为,自然也无所建树,被称作苏联的停滞时期,为苏联的变天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对此民间流传一个段子说:

列宁证明了,国家可以由全体人民来管理。

斯大林证明了,国家可以由一人来管理。

赫鲁晓夫证明了，国家什么人都可以管理。

而勃列日涅夫证明了，国家可以不要人管理。

领袖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民众的口碑，这是永远不会被遗忘被抹去的东西，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随笔》2014年第5期

伏特加与俄罗斯

俄罗斯人一向以豪饮为民族的骄傲。根据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改编的电影就描写了一个苏联战俘因豪饮而死里逃生的故事。士兵索科洛夫，战前是司机，战争中被俘。在德国军官面前连干了几大杯白酒，令德国人惊奇不已，免他一死，还让他当上司机。后来他还驾车生俘了德国军官。实际上他的酒量并不大，出了营门走起路来已经步履不稳，踉踉跄跄，但面对德国人时挺住了，站住了。这里表现的是俄罗斯人的豪气。

俄罗斯是北方国家，其人民的性格有如我国的东北大汉。我们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俄罗斯人大杯喝酒，却不一定要同时大块吃肉——拿起一块黑面包闻一闻也就够了。他们从不慢斟细酌，而是讲究一大杯一大杯地干杯。葡萄酒是属于女人的，男人是不屑于喝的。

在俄罗斯，酒是能治百病的良药，头疼脑热，疑难杂症，他们认为一杯伏特加入肚，管保酒到病除。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同学正在苦读，准备考试。一个苏联同学告诉他，对付考试很容易，只要考前干一杯伏特加，就能应答自如。这位同学敬聆教诲，干了一杯去赴考。结果领了口试题目，在准备答题的时候就倒在座位上呼呼睡去。也许这只是一个笑话，不过倒也反映了他们对万能的伏特加的崇拜。

俄罗斯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的伏特加酒。这种白酒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有白酒和曲酒之分，在曲酒中又有酱香型、清香型等之分。他们并不喜欢我们的曲酒香型。对俄国客人，请他们喝茅台，实在有点“浪费”（“中国通”除外）。伏特加就只有一种，酒味中透出一股酒精的香味。北京的二锅头与此相近，但度数比伏特加

高多了,伏特加一般也就40度左右,接近我们近年流行的低度酒。目前被认为最好的伏特加据说是斯米尔诺夫牌的。在莫斯科,这种牌号的伏特加有两家。一家是从美国来的,其厂家在十月革命后去了美国,现在又打回莫斯科,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宗。真实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俄罗斯人爱酒,也许是因为他们那里天气实在太冷的缘故。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喝上一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和享受,也是一种需要。在战争中,许多士兵水壶里装的往往不是水,而是酒精!据说,俄罗斯人对酒精的耐受度相对较高。东南亚人则很容易喝醉,这与亚洲人体内普遍出现的基因突变有关,基因突变使乙醛(乙醇分解产生的一种有毒物质)在血液中迅速积累,导致人体在大量饮酒后出现不适,这种不适能让人停止饮酒,从而保护身体。由于基因的特性,俄罗斯人酒后血液内的乙醛含量是亚洲人的1/10。因此俄罗斯人的酒量是天生的。不过,基因对善饮只有40%—60%的决定作用,社会环境、个人意志力和受教育程度也有很大影响。

俄罗斯人不像我们国人,通常喝完酒在家里或卡拉OK厅里热闹。他们喜欢跑到街上去大喊大唱,有时就不免躺在冰天雪地的马路上。因此冻死冻伤的不在少数。自己大喊大唱倒也罢了,有的还回家去打老婆、儿女,对此高尔基笔下有生动的描绘。斯大林的父亲,那个鞋匠,也经常喝醉酒打老婆。斯大林对他的父亲没有好感,大概起因于此。沙俄末代皇帝的宠臣妖人拉斯普京就是在醉酒的状态下,被一些大臣谋杀的。

酒给俄罗斯人带来严重的危害。1999年《论坛报》的一篇文章《酗酒——俄罗斯社会的一大弊端》披露说:

俄国有1.46亿人口,年死亡100万,死亡率比出生率高60%。约1/3的死者是有劳动力的人。最近十几年男人的平均寿命从63.8下降到57.7岁。比西方短15岁。65%的早亡者死于心血管病,其中多数是饮酒和过量吸烟造成的。醉酒使人失去理智,虐待家庭成员,导致离异,甚至造成大量自杀和凶杀案。俄全国有酒鬼250万,这是医院和醒酒所的统计,实际数字要高几倍。这些数字如果属实,那确实是惊人的。

十月革命和“酒精攻势”

我们知道有“糖衣炮弹”,却不知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还曾遭遇过“酒精攻

势”，它甚至威胁到革命的成败。

沙俄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举行宫廷舞会和酒会。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美酒和美女都是不可或缺的。冬宫和贵族的地窖里珍藏有世界各国的美酒。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冬宫以及彼得格勒城地下酒库的美酒几乎葬送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洛茨基对此有生动的记载。他在自传中写道：

街头的社会渣滓开始掠夺首都和宫廷的大酒库。有人领导这场危险的活动，企图用酒精来烧毁革命。马尔金马上感觉到了危险并立即投入战斗。他保卫好酒库，无法保护的就予以摧毁。他穿着高统靴子，趟着没膝的高级葡萄酒和玻璃碎片往来巡查。酒浸润着积雪，顺着沟渠流进了涅瓦河。酒鬼们就在沟边舔酒。马尔金拿着左轮手枪，竭力为保卫清醒的十月而奋斗。他常常浑身湿淋淋、散发着佳酿美酒的醇香回到我家，我的两个孩子总是心情紧张地等待着他归来。马尔金打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看来，这酒库的美酒完全有可能醉倒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文中提到的尼古拉·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炮手、布尔什维克，同托洛茨基一家的关系很好。那时他还肩负着保卫托洛茨基的任务。

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也有关于“劫酒骚动”的记载：

最近发现立宪民主党人所维持的特殊组织在士兵中间进行扰乱。它们向营房打电话或送信，说在某处发酒，并说明确实地点。当士兵跑到指定地点的时候，有专人迎接他们，并指给他们酒窖。

人民委员会任命一个专门的戒酒委员，他不仅要无情地镇压一切关于劫酒的残杀，而且要销毁储藏的酒；同时要打碎和倒空千万只酒瓶。冬宫酒窖里藏有许多名贵的酒，总价在500万美元以上，已遭到同样的命运。起先在那里把瓶子打碎或倒空，后来把剩余的运到了喀琅施塔得，在那里把酒瓶和酒桶打碎或倒空。

在这个工作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托洛茨基称他们为“革命的荣誉和自豪”——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毅力和纪律……

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之争

革命后酗酒一直是妨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酒误工，因酒花光工人一个

月的工资,造成社会、家庭的不安定。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曾经禁酒,想借此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禁酒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发明,苏联历史上曾多次打算禁酒,至少是限制酒的生产,但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国家处于极端矛盾之中。酒类专卖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是国家预算的重要一笔。在20年代就有过开放酿酒还是禁止酿酒的争论。托洛茨基大概有过酒精攻势的教训,是开放酿酒的最坚决反对者。

酒是盈利的大户。在20年代中期,一瓶伏特加值1.75卢布,一普特粮食仅值1.20卢布,而一普特粮食能出10瓶35度的烧酒,比粮食值钱多了。1923年6月俄共中央全会上有人建议,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允许自由酿造和销售酒类。那时托洛茨基正在休假,没能出席全会,听说此消息后马上给中央去信,表示坚决反对。他在信中写道:

我国的预算只能依靠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输出粮食、木材等)的成就。试图把预算置于酿酒的基础上是欺骗历史的尝试,因为这就使得国家的预算不再取决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工人的工资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但工人阶级整个来说仍然精神振奋。如果酗酒现象卷土重来,那一切又要走回头路,下坡路。做群众工作的鼓动员就我进行的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回答说:两个基本因素改变了生活,第一,是8小时工作制;第二,是工人喝酒少了,打老婆孩子少了。我们将毁掉工人阶级这一上进的运动,败坏党的作风。更不必说,这种向旧时代的回归将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声誉。

托洛茨基向中央提出一个禁止议论此问题的决议草案。

实际上当时的俄共和政府处于两难境地,酿酒确实能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源泉。一旦禁酒,国库收入马上受影响,而且农村中酿私酒的现象会立即泛滥。然而,根据俄国的传统,酒类一开放,工人那有限的工资在领到手的头一天就会喝得差不多,工厂的生产秩序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会变得紧张,大家知道,俄罗斯人酗酒闹事打老婆孩子是有名的。20年代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不少就是反映此类问题的。

1925年有个叫普里瓦洛夫的人给《农民报》写信,要求同酿制白酒作斗争。他在信中说: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925年，农民中酿私酒之风非常盛行。有关当局积极展开了反对这一行业的斗争，对被捕的公民课以罚款并交付法庭审判，受审的公民被罚以强迫劳动。但是他认为，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消灭这种祸害。因为，俄罗斯人民世代染上了酒瘾。这是第一。第二，不管你怎样惩罚他，不管你怎样对付他，只要一释放，他那上瘾的机体马上就要求喝酒，重操旧业。他们不会考虑酒精对人体的害处，甚至会使人丧失理智，致人死命。写信者认为，消灭烧酒的唯一办法是执行列宁提出的三项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只有靠科学的帮助，才能消灭这一祸害。为此要吸引医务工作者来研究酒精的害处。他对为增加国库收入而开放酿酒行业提出不同看法。他说，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是可以用于国家周转的千百万卢布的资金，可是我们失去的却是我们千百万人的智慧。在发展烧酒的情况下，我们的农村过去没有繁荣起来，将来也不会繁荣起来。这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问题。如果农村愚昧无知，我们国家的建设也不能有力地开展起来，这就难免再受奴役。为了千百万卢布，我们会丧失我们人类的千百万人的智慧。现在人们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这种智慧对国家有用吗？”当然，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智慧好，两个更好。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止步不前，我们的工业、运输、技术、农业等都将不断得到发展。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从卖俄国烧酒得来的这千百万招灾惹祸的卢布，而是从自由的、健康的劳动得到的亿万卢布，而烧酒这种东西是违背人类常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另一位读者康达柯夫于1925年夏给一家报社写信说：

谈到酿私酒，爱喝酒的村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消遣和满足。老是拼命干，没命干，可是有时总得休息一下，娱乐娱乐。节假日喝喝酒，消除疲劳，心里痛快。而国家酿制的烧酒没劲，家酿酒更有益。”酿制私酒的器具每村都有十来套。农村的钳工制作一套酿私酒的器具，要价6普特粮食，这倒可以提高生产。每逢节日，家酿酒像河水一样流淌。结果，没有一次游艺会，没有一次青年聚会不闹事，不打架的。维杰尼柯夫两兄弟被人开枪打死了，塔拉索夫斯基被人打死了，兹维列夫斯基被人杀死了等等。这就是开放酒禁的代价。

不过，在充实国库和禁酒之间，权衡利弊，还是国库重要。托洛茨基的禁酒建

议并没有被接受。禁止的仅仅是那些逃税的酿私酒行为。

酒与总书记

俄国人爱喝酒,领袖自然也不能例外。除几位患病的领袖如列宁、安德罗波夫偶尔饮用葡萄酒外,如我们近来流行的说法,其他领袖都是“久经(酒精)考验”的。当然,各人的情况并不相同。

斯大林喝酒是家传的。他常说他父亲酒喝得很多,以致要把腰带卖掉来换酒钱。一个格鲁吉亚人只有在极其贫困的时候,才会出卖他的裤带。斯大林说:“我的父亲曾好几次卖掉过他的裤带。当我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指头在酒杯里蘸一下,让我咂它。甚至我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已经在教我喝酒了。”不过,执政之后他只喝专门为他调配的格鲁吉亚干红、干白,他本人并不醉酒。对他来说,喝酒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他以酒宴来取乐。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经常在夜间召一些政治局委员到他的别墅去宴饮,席上除了议论某些政务外,更多的是寻开心。有的政治局委员如谢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对此心领神会,常常把自己灌醉,以博斯大林一笑。谢尔巴科夫终因饮酒过量而“殉职”。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喜欢看身边的人们陷入窘境甚至丢脸的境地,以别人的出丑为乐。他记得有一次,斯大林要他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面前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间舞)。于是他不得不蹲下臀部,踢出脚后跟。而这些动作对他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正如米高扬所说:“斯大林叫你跳舞,你如果是一个聪明人,那就要跳。”

赫鲁晓夫的说法得到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证实。在长夜里,战友们聚坐在斯大林那里,讲些粗野的笑话,让战友们喝个酩酊大醉。而战友们不敢不从命,因为拒绝意味着对领袖的不忠;但是他们又担心,怕酒后吐真言。他们经常玩一些并不高级的玩笑,例如当一个人起身敬酒时,其他人就把一个西红柿放在他的座位上,或者往他的酒杯里撒盐,或者把他推进院中的小水池里。这当然已经是一种恶作剧了,参与者并不觉得好玩,但正如赫鲁晓夫必须蹲下肥胖的身子跳舞一样,既然领袖需要,那就必须做个“聪明人”。

酒离不开政治,或者倒过来,政治离不开酒!

1928—1929年,布哈林“右倾集团”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失败。1930年的新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手提葡萄酒去敲斯大林的门,向他祝贺新年,也

希望以此和解。然而斯大林要的不是这种平等的和平，不是这种平起平坐的友好碰杯。他要的是这三个人的屈膝投降，是他们的悔过。他们的关系自然不会因几瓶葡萄酒而得到改善。

1935年春，斯大林举行盛大的军事学院毕业生晚会，布哈林应邀出席。斯大林举杯祝酒，令人意想不到的，他的第一杯不是为军人，而是为布哈林干杯。斯大林举杯说：

同志们，让我们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干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热爱他，而谁要是老记住过去的事，那就请他滚蛋！

会场发出一片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

然而……干杯后的两年，斯大林把布哈林从中央全会直接投入监狱，再过一年，又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和“热爱”的布哈林送上了断头台！

1945年5月，苏联的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在招待会上，斯大林举杯祝酒，说：“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既然民族有“最杰出的”，自然就会有“不杰出的”，甚至“反动的”。正是如此，斯大林在大力赞扬俄罗斯民族的同时，也在采取措施，以在战争期间有人投敌叛变为由，把德意志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等等各民族从他们的世世代代的居住地迁走，以示惩罚。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各个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都有人投敌叛变。为什么单单俄罗斯族该受表扬，而其他民族却要全体受到惩罚呢？列宁说过，“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这位格鲁吉亚人就是一例！

安德罗波夫是所有总书记中最不能喝的。但在必要时还是会舍命陪君子的。1957年在镇压了匈牙利事变之后，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捷克外交官。捷大使同安德罗波夫打赌：“看谁喝得多？”每人面前放6个杯子，每杯倒满200克伏特加。这正是需要俄罗斯人显示气派的时候。两人不吃任何东西就喝起来。捷大使喝到第5杯时就不行了。而安德罗波夫喝完第5杯后竟然没有停下来，尽管他已经赢了，又喝了第6杯，晃动着身子举起双臂高呼：“苏联！”不错，苏联在镇压中胜利了，在干杯中也决不能示弱。

酒中定政策。据说,阿富汗战争是勃列日涅夫同三四个亲信在酒后做出的决策。大家知道这场战争几乎把苏联拖垮,以至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千方百计地设法从阿富汗撤兵。而苏联干预的后果至今犹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是贪杯之徒。据说赫鲁晓夫喝上半升伏特加,照样能在卢日尼基体育宫作3小时的报告,看来并没有因贪杯而误事。勃列日涅夫后来因身体多病,只好节制了。

曾任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是伏特加的忠实爱好者。他有一句名言应当铭刻在俄罗斯的伏特加博物馆的大门上——如果有这样的博物馆的话:“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

改革从禁酒开始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以后,苏联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酒运动。禁酒运动的负责者是戈氏的副手利加乔夫。

当时苏联流行的一种叫做“巴尔莫杜什卡”的酒首当其冲,这是一种不是用葡萄为原料的酒精度高的甜酒,价格便宜,因此被看作特别有害的酒。自然,俄罗斯人引以为骄傲的伏特加也在其列。不幸的是后来还扩大到白兰地、干葡萄酒,甚至香槟酒也在禁止之列。这一措施发布之后立即引起争议。赞同者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巩固家庭,有利于生产。反对者则警告说,这一措施会使葡萄种植业破产,大部分酒厂倒闭,将使国家财政损失几十亿卢布。不过禁酒初期还是有所收获的,由于酗酒的人少了,犯罪和伤人事件确实有所减少。戈尔巴乔夫声称:“我们将恪守戒酒法,毫不动摇。我们将坚持原则,善始善终。”

“善始善终”,谈何容易!不久国库就感受到禁酒的沉重打击,尝到了“苦酒”,有关部门要求放缓变革的进度,至少不要“扩大化”。连1985年的十月革命招待会也受到禁酒的影响,会上只有矿泉水和果汁招待,因此来宾人数骤减。以后所有的招待会又不得不摆上葡萄酒!禁酒令更是引起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酒喝只好找代用品,于是花露水等凡是含酒精的东西都成了畅销品。白糖是可以制酒的,于是白糖脱销。以前坚决要求禁酒以挽救家庭和丈夫的妇女们如今又写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销售量。许多地方私酒泛滥,国库却收不到酒税。

时代不同了,苏联已经不是20年代的苏联了。其实这时苏联面临的根本问

题,并不是禁酒,而是改革根本早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斯大林模式。禁酒这种小打小闹的举措一点也解决不了苏联面临的问题,反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显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缺乏调查研究,仅凭心血来潮所采取的决策。真是出师不利!那时,他是抱有振兴苏联的雄心壮志的,然而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好在那时老百姓对这位年轻的总书记还抱有希望,对他还没有因此失去信心,所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他的改革还是全力支持的。

病夫加酒徒

叶利钦和酒有不解之缘。年轻时他在建筑工地经受过酒精的考验。当然,喝的是伏特加,当上州委第一书记后才改喝白兰地。据说,一个下级在列车上因为没有跟他喝一样多,竟被在一个荒凉的车站赶了下去。他可以喝一升,接着十分清醒地给党的负责干部下指示。他还有一个嗜好,是开怀畅饮后到冷水中去游泳,这是“俄国熊”的本领。对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改革”,叶利钦是否定的,认为是愚蠢的举动。叶利钦在自传中写道:

当利加乔夫要求关闭莫斯科的所有酒厂,停止出售所有酒类产品,甚至包括出售干葡萄酒和啤酒时,我们之间就反酗酒运动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发起的整个反酗酒运动荒唐透顶、极度无知。无论是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是政治后果,事先都没有加以考虑,就这样蛮干。戈尔巴乔夫采取静观的立场。我认为,对酗酒这个几世纪以来的恶习进行骑兵突袭,其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很快许多地方开始大规模酿私酒,吸毒人数剧增。人们一见像酒的东西抱住就闻,拿来就喝。喝酒的人不见少,但卖酒的全部收入国库分文无收,全落进了酿私酒者的腰包。中毒人数,包括中毒死亡人数猛增。

叶利钦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任职俄联邦总统期间常常接连一两个星期不露面。在莫斯科只要几天不见这位总统,马上就有传闻叶利钦又喝多了,需要静养解酒。果然几天之后又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醉酒倒下,谁也弄不明白。不过总统曾经因为醉酒而误了大事是确实无疑的。

叶利钦在《总统马拉松》中就自己贪杯问题写道:

我并不认为自己贪杯如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为酒是减轻我工作、生活和内心压力的唯一办法。不过,也有因为喝酒差一点误了大事或者当众

出丑的事。1994年参加苏军撤出柏林检阅仪式时,我就喝醉了,以至于只好拄着拐杖出场,差一点就当众出丑。我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只想喝几杯,以解除苏军从此撤出柏林的复杂心情和内心压力。……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好几位助手给我写了一封联名信,说我当时的表现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有损俄国总统的形象和俄德双边关系……如果不改掉这个毛病,他们就谁也帮不了我了!看了这封信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得继续工作生活下去,我得找回我自己!这之后我才慢慢地改掉嗜酒的毛病。现在我还在喝酒,不过绝对严格按照医嘱,每天只喝一小杯。

实际上,因酒误事,对叶利钦来说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他后来喝的是干红或啤酒。

何时出现清醒的俄罗斯

当今俄国总统普京在爱好啤酒的德国多年从事情报工作。入乡随俗,他的口味变了,是啤酒的爱好者。总统身边的人说,除了德国啤酒以外,普京也能喝葡萄酒,但从来不喝伏特加。据说,他品尝啤酒的能力不亚于专业评酒师。有人就此评论说,看来,当今总统在对酒的态度上找到了一条黄金分割线——如果他滴酒不沾,会让人起疑;如果他嗜酒如命,会引起公愤,特别是在女性公民中间……

普京在视察同车臣恐怖分子作战的前线军官们时,军官们向他敬酒,他举杯回答说,等你们凯旋时我再干这杯酒,为你们庆功!俄罗斯的伏特加成了激励将士的武器。

2000年6月30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布一条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开始忌酒。据总统专机的空姐说,专机不久前已经禁止饮酒。在叶利钦时代在哪里饮酒都属正常,每当总统出行总要给总统专机整箱整箱地装伏特加以及下酒的太平洋鲑鱼。然而,现在陪同普京总统出差的人再也喝不上酒了。

几个世纪以来,酒已经是俄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要想通过一项法令予以禁绝,显然是一种幻想。解决酗酒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整个经济的发展,整个文明的提高,民众素质的提高。最近有消息说,俄国人饮酒的习惯已开始有所变化,开始爱上酒精度低的啤酒了,而且俄国的啤酒质量也上升了,不像过去那样给人以“马尿”的感觉。近日笔者去俄国访问,在半个月的时间真的没有见到一个

躺倒在地上的醉鬼,但在街头巷尾倒是出现了另一种风景线——在地铁口,在路边小卖部,在公园的长椅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围在一起,或坐或站,举着酒瓶喝啤酒。啤酒成了俄国人的新爱!

普京也许会带来一个清醒的俄罗斯!

《万象》2001年第12期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

上台之初,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并没有新看法。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形势的推动下逐步明确起来的。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定苏共是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党,改革的目标是从极权官僚制过渡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1991年8月8日,发表党纲草案《社会主义、民主、进步》,其中规定苏共是社会进步、民主改革、社会公正、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的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进步,不再提共产主义的前景了。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效益好的混合经济,实行政治和思想多元化的公民社会,真正的人民政权,以人道主义理想和全人类价值为取向的文化,全面的自由,等等。草案接受了趋同论。这个草案把苏共社会民主党化了。

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戈氏从20世纪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其社会主义观中有三个核心要素:人道主义、民主和全人类价值:

(1) 社会主义思想有多种来源。马克思、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都是其思想来源。就戈氏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而言,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列宁晚期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改革的尝试、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2) 社会主义有多种模式。除苏联和中国外,印度、埃及、索马里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的目标,均属社会主义。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里,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

(3) 社会主义的内容是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等等。

(4) 对全人类的利益的关注。全球化使世界各个角落都纳入全球共同的发展道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核战争危险、全球生态危机面前,世界上确实存在共同的利益,在一些决定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全人类的命运高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民族的命运的现象是不能否定的。

(5) 反对用暴力达到目的,反对用暴力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

(6) 人类社会正走向趋同。未来社会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分法中作出一种选择,而是另一种,全新的东西,是趋同,两者的合题。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1)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虽然是戈氏提出来的,但苏共接受了这种社会主义,因此应当把它看作是苏共的正式主张。

(2) 这一切不过是纸上的东西,它甚至没有时间来付诸实施。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苏共未来的实践纲领,不如说是对过去极权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对苏联人民的一种安慰和许诺。这个纲领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苏共就遭禁,苏联就解体了,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作用。

(3) 认定“一言兴邦”或者“一言丧邦”,那就未免夸大了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粗略地查过苏联解体后的俄文文献,几乎没有看到俄国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人道,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民主,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否定这些基本价值观,那就容易对社会主义概念造成混乱,有损社会主义本身形象。

最后,从历史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东欧国家早就提出过“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历史上有不光彩的一页——不人道,不民主。不改变形象,社会主义必然走进死胡同。

现在戈氏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但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说,共产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内涵是不同的。戈氏是把共产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同暴力、专政联系起来的。

如果承认社会民主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戈尔巴乔夫目前所主张的主义叫做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同极权的斯大林主义相比,

同野蛮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说,戈氏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

在目前的俄国,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多数党派的旗号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中间主义的主张和因素,这些主张得到广泛的欢迎。然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述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得到的支持目前并不多,出现思潮与政党脱离的奇异现象。从根本上说,这里的问题还是在于谁能够真正代表俄国的这一中间思潮,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要代表一种思潮必须有恰当的组织或政党,需要有具有威望的、有号召力的领袖,还需要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单靠自封、自命是不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能否在俄国崛起,还有待观察。

《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2期

农民出身和苏联改革

——读《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 世纪的精神教训〉》

20 世纪已经过去，过去这一个世纪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什么？它在上半个世纪就带来两次世界大屠杀，接着又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日本而言，它发动了几乎遍及整个亚洲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就俄国而言，一个世纪经历了三次革命，有过胜利的辉煌，也有过滥用革命成果给俄国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斯大林独裁时期，最后又不得不吞下联盟国家解体的苦果。俄国人民在这 100 年时间里，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他们通过革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逃不了希特勒发动的侵略，经受了悲壮的卫国战争。仅仅这几件大事，就足以让人们去思考这 20 世纪给人类留下的教训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看来几乎截然不同的两位世界级人物的对话录：《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 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对话开始于 1993 年，历时一年半。1996 年 7 月出书，已有俄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韩文等译本。

池田大作是日本的著名佛学大师、东方思想的哲学家，著名的创价学会会长，而戈尔巴乔夫则来自有东正教传统的俄国，曾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总统，无神论者。这样两人的对话，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通读全书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就是作为佛学大家的池田利用各种机会，宣扬佛学，宣传他的恩师的学说，把佛学有机地运用到自己的论点中去，相对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戈氏，却不见系统地引证和宣扬自己的导师马克思或者列宁的学说和教导，他所说的大部分只是一个政治家的话语。至于东正教的教义，看来戈氏不甚了了，他能引证的反

而是普希金、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当然,在总结 20 世纪的精神教训时两位对话者是有大量的共同语言的,这已经是涉及人、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的命题了。

对这部长达 500 多页的对话,作为史家自然把关注点定在戈氏对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阐述上。从这个角度看,“对话”给戈氏的经历以及后来改革的思路做了有益的阐述。

回顾苏联的改革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从掀起改革浪潮的人到逐浪者,从企求复兴联盟者到联盟国家的颠覆者,大多出生于 1930 年前后。这些人出生不久就遇到苏联的全盘集体化和大饥荒,经历了斯大林的大镇压,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饥荒和镇压的牺牲者。内难未已,又遭遇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进行了卫国战争。一句话,他们的童年是在磨难中度过的。在他们进入青年时期,身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参与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他们成为党政干部的时候,还眼见东欧各国的改革波澜——50 年代的波匈事件、60 年代的布拉格之春、80 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等,与此对应的则是自己国内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这些大体相似的经历促使他们怀着不同动机投入改革的大潮,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苏联的改革和解体的舞台上表演。

当然,这些共性并不妨碍他们各具特色,毕竟每个人的路是个人走出来的。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有他本人的特色。在对话中,戈尔巴乔夫声言:我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将 70 多年来我们国家期待已久的事情尝试着去实行。那么,他是怎样选择自己的命运的呢? 是什么东西推动他选择了改革的道路的呢?

悲惨的农村与农民

农民家庭的出身在决定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俄国,农民经常是处于最底层的群体。沙皇时期的农奴不必说,就是在苏维埃时期,他们地位的改善也很有限。十月革命后的军事共产主义几乎把农民整得一无所有,因此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反对粮食征收制(或称“余粮征集制”)的农民纷纷揭竿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新经济政策。应该说,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的生活和经济得到了初步改善,拥有了较多的自由来支配自己的田地和产品,甚至有了租佃、雇工的可能。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也不让他们

发财致富,农村不断地重分土地,稍有富裕,就有被打成“富农”的危险。到了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打发“见鬼去”,开始了强制集体化,不仅剥夺了“富农”,而且把全体农民也剥夺得精光。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被彻底消灭,出现了“集体农庄庄员”这一新群体。这是什么样的群体,且听戈尔巴乔夫下面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的故乡是斯塔夫罗波尔,它位于高加索。那里的人多半是移民的后代,他们形成哥萨克人的村庄。这里民族杂居,很难分清谁是俄罗斯人,谁是乌克兰人。那地方的人,有着独特的南俄人的特性。有学者指出:北高加索出身的人,比其他俄国人显得更为开放,而且十分豪爽。他们具有进取的秉性,富有活力,并诉诸积极行动。戈氏则称,他的天性中想探索、相互妥协的倾向性,恐怕也正是源于北高加索的精神文化,而不是由于自己性格的软弱所引起。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农民。在斯大林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尝辛酸的正是苏联农民。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们被当成了“农奴”,被迫在集体农庄从早到晚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得到的只是微薄的报偿,被看作是一批会说话的牲畜。即使在丰收的年份,他们仍然过着三餐不继的贫困生活。而如果有人敢把集体农庄中自己种植的农作物拿回自家,一经发现,就会被送进牢房。苏联的农民没有身份证,不能自由流动,更不能随意进城就业。

戈氏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祖辈都是以耕田劳作为生。我出生在1931年,那是一个恐怖的饥荒年代到来的前两年。造成饥荒的原因,至今仍是历史学家议论不休的话题,是彻底消灭农民而引起的人祸,还是缘于恶劣气候的天灾呢?当时旱灾确实严重,但戈氏认为不能将之全部归咎于天气。由于实行全盘集体化,那经历了几百年而形成的传统的生活基础崩塌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相袭的农事、生活方式等等,全都分崩离析、彻底解体。而这些“人祸”正是造成此次毁灭性饥荒的最致命因素。

在30年代饥荒期间,戈氏一家所住的普里奥利诺耶村,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左右的村民死于饥饿,全家饿死而绝户的家庭达数百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破烂不堪的农舍依然残留在村子中。戈氏的祖父安德烈生有6个子女,其中3人饿死了,而他自己则被捕了,理由是他未能完成播种计划,也就是所谓怠工。

在戈氏同池田对话的时候,恰巧电视播放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在斯大林时

代的1932年,有3户人家为逃避集体化,逃进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的密林,在那里躲藏了60年,近日才重见天日,回归社会。池田感叹说:在俄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我认为承受最大政治压迫的始终是农民和农村,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乌克兰人因人为的饥荒而造成数百万人饿死的事件,而乌克兰是被称为“欧洲的粮仓”的富裕肥沃之地。

战后的苏联还闹了一次饥荒。戈氏说,战后农村那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贫困现象,至今依然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之中。没有一家像样的房子,只有一排排土坯房,到处是一片破败贫穷的景象。即使在俄国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地区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也是如此。

对苏联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的评价至今众说纷纭。亲身经历集体化并尝到其苦果的戈尔巴乔夫对池田说,与城里长大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不同,“集体化”、“集体农庄制度”,这些概念对他来说是很真实的东西,而他们对此却无切肤之痛。“集体农庄”和“集体化”是何等不合理,通过自己双亲、祖父母们所经历的严峻而又真实的体验,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他们那一代人,仍然坚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集体化和饥荒以外,还遭遇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戈氏说: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命题,其实是由少年时期的切身体验及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所形成的。对他个人来说,斯大林的残酷镇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感同身受的。因为,他的祖父被关进了牢房,进了劳改营。他们的家成了谁也不敢来往的“反革命家庭”,邻居见面不敢打招呼。30年代的那种切肤之痛就这样深深沉淀于他的心灵深处。

戈氏少年时代经历的第三个磨难是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从1942年8月3日到1943年1月21日,他的家乡普里沃利诺耶村曾被德国人占领。卫国战争打响之后,戈氏的父亲参加红军,奔赴前线。这样,家里的许多事就落在小戈尔巴乔夫的肩上。戈氏说:少年时代,为了生存,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们必须四出寻找食物,那时他们一夜成长,踏入成人世界。那时母亲从早到晚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解决全家人口腹之食的宅旁园地(自留地)只好由他来收拾。不管是哪户农家,都是这样。顺便说一下,集体化之后,集体农庄多半是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农庄庄员全家的生活则主要靠宅旁园地的收获维持。这种状况在战时尤甚。戈尔巴乔夫这一

代人又被叫做“战时之子”。

在农村中成长的背景对戈氏具有重要意义,加上后来又担任了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戈氏有根据说:我了解俄国的国情,知道俄国农民呼吸的节奏的真实情况。而对我持批判意见的某些自由派、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他们能作为根据的只是书本知识而已。这种话戈氏说过多次。他说,他那时候虽然还小,对于3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悲剧的真正原因不甚了了,但是却亲眼看见过不公正的场面。此后,他虽然成了共青团的干部,后来又加入共产党,但这种体制却成为他的“反面教员”,使他产生疑问。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疑问也随之增加。

像戈氏这样30年代出生,40年代的“战争之子”,后来又直接参与了赫鲁晓夫的“解冻”的这一代人,后来就成为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者,从不同的角度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国家的掘墓人。戈氏说:在体验过斯大林主义的悲惨与恐怖之后,再仔细端详那些无罪的人们的苦恼与悲伤,经历和忍受过战后饥饿时代的人们——如我以及我的同龄人,所追求的几乎是一种本能的、立志于自由精神,也就是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遗产,完全获得解放。戈氏对池田说:决定改变生活模式,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完全决裂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作为“战时之子”的我们这一代人。

应该说,他们各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挖苏维埃大厦的墙角,千方百计地要推倒这座大厦;有的人则想挽救大厦于既倒;有的呼风唤雨,一心要埋葬苏维埃国家;有的修修补补,想把大厦扶正……但不管怎么说,尽管动机各不相同,他们的合力却导致大厦的倾塌。斯大林不知道,他在使用暴力消灭农民、镇压无辜的时候,也同时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政权培养了掘墓人!历史的报应就在半个世纪之后。

改革的动因与特点

戈氏的改革自然有他自己的许多创造,但从总体上看,他改革的基本依据是回归列宁,他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仿效的新经济政策,他的合作社计划,他的公开性、民主化等等都来自列宁,至少是借列宁这位“尊神”的名义做文章。

戈氏简短地概括他的列宁观:(1)我至今仍然信仰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对于

“社会主义在历史过程中存在其规律性”的列宁主义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2)列宁是苏俄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对他有相应的评价。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列宁将共产主义与理性进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戈氏强调,列宁的理论不是先验的公式,他总是把现实作为本旨的第一要义来考虑。我们反复引用他的话:“我们必须以既有的现实作为出发点。”然后,我们把调整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提上日程,其依据是列宁所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所有的不幸都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被“歪曲”了。改革的动机,就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从学生时代起的憧憬与祈愿。戈氏说,这证明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派,说他们是造成许多错误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修正者更为恰当,他们是以体制内的改革为目的的。

戈尔巴乔夫说,从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的所作所为来看,可以说不管哪个方面都是我的个性、人生观以及人生经验的一种自然的归结。从理论上说,当上总书记时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可以萧规曹随,一成不变地维持原来的体系及做法,也可以选择改革的道路。不过实际上,在被推到苏共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已经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当时整个国家处于很不正常的状况。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接着是连续不断的几位苏共总书记的葬礼,因此“想找一个比较不容易死的人来接班”。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产生了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没有出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证明“大规模(公有制)集团生产”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可以用铁幕把苏联人民与所谓西方思想的有害影响隔绝,但这是乖离时代的错误。当时的苏联仍然有“政治犯”,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民主舆论受到禁止,不能自由出国,苏共中央的学术部行使警察职能,掌握知识界的生杀予夺大权。面对这种背离时代的现象,社会呼唤改革,要求改变现状。这样的生活无法再忍受下去了!——这种发自大家内心的呼声是至高无上的命令,正是这种呼声把这些身处党的领导层的人逼往改革的方向去了。

改革发轫之初并没有要彻底转换社会主义体制这样的念头。当初并没有将对体制的变革列入日程,只是想对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进行改良,而不是摧毁,所

考虑的是激发其潜力及可能性,这一点成为改革的第一要义。大家坚信,只有这条道路才是重新赋予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最平坦的快捷之路。

推动改革的另一个因素是东欧的影响。7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比西方各国带来更大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巨大影响。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1980年夏的波兰事件,这一切唤醒了苏联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观察东欧各国改革的形势,认识到东欧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权利与自由,他们也应该拥有。

面对这种情况,戈氏声称,1985年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对是否改革已无选择之余地。驱使我们行动的,是一种想清算斯大林的“负资产”的愿望。对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与幸福去达到国家目的的极其有害的做法必须立即结束,也可以说是“依法治国”和“恢复公正,了解历史真相”的愿望推动我们去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情况,这就是不能公开抵触意识形态这条底线,总书记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透露,就任总书记之后,他就借列宁批判共产主义浪漫化的语言,特别是有利于民主的论据及其思想,批判那些教条化、形式主义,并把这些贯穿到意识形态之中。当时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打开通往良知的突破口。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相信,如果列宁没有早逝,能够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话,那么一定不会产生那种强制集体化运动,不会有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等灾难发生。当死神逼近列宁时,他的最后工作就是提出渐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这一点被后人叫做“列宁的政治遗嘱”。因此我们将1929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归结为脱离了列宁制定的这条渐进路线。

第二个情况是,苏联的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苏联的国情是,共产党一党独大,不存在具有相对影响力的反对派势力。国内虽然存在反体制运动,如萨哈罗夫为维护人权进行的斗争,但这些运动不具有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大部分老百姓习惯于妥协,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抱有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希望。这种民族气质在斯大林统治岁月被异化成畸形和木然的状态,即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时代也残留着这种逆来顺受的思想。

所以在苏联,改革者只能出自党内,他们是体制内的反体制势力。反对改革的共产党人,激进民主派和政界的各种势力,都是从苏共内的特权阶层中分离出来的。

戈氏指出,这一切就决定了苏联改革的性质是:

(1) 党的干部主动倡议,即“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

(2) 改革初期在现存体制范围内,只能突出完善体制这一方向。

(3) 把极权主义的根基从内部清洗销蚀,以渐进性的改革争取成功,这是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

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假如当时不坚决实行民主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不断地积累起各种各样的不平和不满的情况下,也许最终会导致内乱和内战。

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本书译作“资讯公开化”)。

戈氏指出,70年代以来苏联人对公开性的诉求持续高涨,这与斯大林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原封不动的意识形态之间早就产生极大的矛盾。与马列主义学说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官方史稍有背离,或对之稍加批判的作品,无论是国内的著作,还是外国的著作,一概都在禁止之列。70年代中期,一些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使国家的意识形态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多次受到杀一儆百的批判。必须把社会从检查审阅与“禁条”中解放出来。

对当时实行的公开性,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放松思想上的异端与实行资讯公开化使国家走上了自毁的道路。戈氏表示无法赞同这种看法。苏联当时是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度,要继续保持资讯真空的状态已经不可能。言论自由隐藏着“善的自由”与“恶的自由”两种因素,既可以推动向“善”与“理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可以诱发向“暴力”的方向走去。但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民众因此就根本没有权利去了解真相呢?或者说,是否俄国人民永远都是幼稚的,不能将资讯、知识的获得权等很好地用于对自己有用的方面去呢?并非如此。不让人活在谎言之中,就意味着让人们去讲述20世纪产生的悲剧的历史事实,让人们去弄清集体化、斯大林时代的清洗等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运动。戈氏认为,之所以应该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归还给人民,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养成担当历史主角的自觉性与责任感。这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信任。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都是建立在对民众的信任之上的。

戈氏承认,公开性是在俄国的历代统治者中前所未有的,这是对历来存在的言论审查制度和“文字狱”发出的挑战书,但也因这种倡言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过戈氏坦言,立志改革的我们,在着手这一转变时,把民主改革看作我们的最大愿望。

而它的实行带来的结果虽然令我们失去已握有的权力,甚至还失去人们的尊敬,失去感谢和掌声,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实行了这个既定目标,在这一点上,作为个人,我们是幸福的。当一个人坐上“权力”的宝座时,要失去它也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权力”是不值得我们自损心灵的尊严而去获得的。选择走这条道路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论前面的路如何曲折漫长,不管最终成功与否,都必须保持一种自信、风雨不动摇的精神状态,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即使丧失一切权力,即使身败名裂,也要潇洒地活着,绝不低头!

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对话时告诉池田的,这也许是一种真心的表白,也许是一种无奈的心声,也许是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无论如何,戈氏个人为他推行的改革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失去了连沙皇也未曾拥有的无限权力。至今对他的评价各异,在俄国有人为苏联断送在他的手下而骂他,在国外有人为结束冷战而赞扬他,是名垂千古,还是千古骂名,仍在未定之中。不过,比起反特权起家的下台总统叶利钦来,他下台后的境遇要差得多,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译文的几句话

《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书对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心路历程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译者对日本文化较为熟悉,对池田的言论译文的处理是成功的。不过这样一本内容涉及苏联和俄国的书籍,译文最好能经过熟悉俄文的专家看看,这样就能够避免一些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而出现的差错。举几个例子:

第 354 页。“在当今的俄罗斯,人口约 86% 是俄国人……”。我们已经习惯于“俄罗斯”的国名了,在一般情况下也还过得去。然而这句话却有严重的语病,86% 是俄国人,那剩下的 14% 是哪国人? 正确的译文似是:“当今的俄国,人口约 86% 是俄罗斯族人……”类似的句子还有 321 页:“俄罗斯归属于自认为是俄罗斯人的所有的人。”这句话应当是:“俄国(Россия)归属于自认为是俄国人(россиянин)的所有人。”俄联邦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可以认为自己是“俄国人”,但不可能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

第 127 页出现的人物“瓦吉姆·梅德维杰夫”,脚注里介绍的却是“罗伊·梅德维杰夫”的生平,张冠李戴了。瓦吉姆生于 1929 年,1986 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1988 年起任政治局委员。

第 315、320 页“巴尔干半岛三国”，是“波罗的海三国”之误，是指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波罗的海沿岸三国。

第 228 页“列维·布尔什维克”，应是“左派(ЛЕВЫЙ)布尔什维克”。

第 396 页“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榜样”。这句话不通了。其实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了。我手头没有俄文本，提出的问题是根据文字揣测的，也许不当，仅供参考。

《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4 期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苏联的历史真是个争议人物辈出的国家。远的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不说，近一点的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人虽已逝去，但却无法盖棺论定，在俄国，在我国，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在争论不休。后来又添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一对冤家对头，对他们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的解决靠逻辑推理、靠义愤感情显然是不行的，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尺子去衡量也显然不够，需要把他们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样也许能够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这是对苏联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纵观苏联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始终的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一条是建国初期以军事强制手段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即后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型），另一条是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以经济的方法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模式。列宁时期这两种模式都曾经试行过，最后摒弃了军事共产主义，而采用了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源头和依据。

20世纪的大事之一，无疑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苏联的解体原因可以说目前谁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清楚，这将是新世纪的一个世纪课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过研究应当现在就着手。问题可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分析。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个方面就是看看当事人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出版介绍了一批苏联改革时期头面人物的回忆录,其中叶利钦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好几种,为我们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资料,可惜的是处在漩涡中心的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回忆录在我国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要评价戈氏的所作所为,要解开苏联解体之谜,要认识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不听听戈氏本人的说法,自然是不全面的。目前问世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原书名为《生活与改革》)弥补了这一欠缺。

“解冻”时期的“新人”

戈氏不是坐火箭直飞莫斯科苏共中央的。他开过拖拉机,上过大学,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做过基层的共青团的工作,然后转做党的工作,当上权力极大的斯塔夫罗波尔州委书记,这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州。他就是从这个职位被提拔到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主管农业的。他受过法律专业的教育,经过应有的地方工作的锻炼,对苏联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他走过这条道路是那时多数苏共领导人所走过的路。

他是赫鲁晓夫时代成长的干部。这个时代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的先辈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尝过行政命令体制的苦头,也看到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他们在“解冻”时代前后接受高等教育,参加工作,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做法没有直接的牵扯。这些人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有切身感受。所以戈氏说:“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他看到,批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实质上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即使批判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对体制存在本身构成威胁。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

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对了解戈氏的改革有重要意义。他写道,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而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然而,他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巨大意义,他使大批的人得到平反,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不过他的历史作用存在矛盾:一方面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反潮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公式的束缚,不能也不愿揭露现象的深层原因。在对外政策中也同样如此。这不仅反映出赫鲁晓夫本人的认识水平,也显示出各种政治

力量的影响。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他可以走得更远。戈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如一的人。他的改革触动了许多干部的利益,他想加快干部轮换,使他们无法“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上,但在党的“军官层”中引起消极的反应。戈氏认为,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使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戈氏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他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国内极权模式的一种保守的反动。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导致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时候国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勃列日涅夫奉为“经典作家”,给新的领导套上死的框框。另一种是在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改革创造哪怕一点机会。

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体制弊病的领袖,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可惜的是天不假以时日,很快就病倒了,在台上仅仅 15 个月。戈氏认为“安德罗波夫现象”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但是,安并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究其原因,除了健康的因素外,还因为它毕竟是旧时代出来的,他的加强纪律的措施,未能离开克格勃的那一套方法。据说安在逝世前选中的接班人是戈尔巴乔夫,但是抓到最高权力的却是掌握党的中央机关的契尔年科——又是一个年老体弱的病夫!他甚至没有能真正挑起管理国家的重任,一年后就辞世了。

三年死了三个总书记,还有一批政治局委员,这个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登台执政了。全国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力壮”的 54 岁的总书记身上(时代不同了,对年龄的概念也不同了,列宁逝世时是 54 岁,在党内已被称为“老头子”了!)。戈氏的回忆录披露了苏联最高权力交接的内幕,这里完全缺乏一种正常民主的权力更迭机制。名义上决定接班人的是各地的诸侯——担任中央委员的各州委书记、共和国中央书记,总书记是由他们最后投票决定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安排妥当,几个拥有实力的政治局委员们事先已经内定好人选,到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大局已定。总书记本人的水平和才干在这里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起作用的是“我们的人的利益”,是否能够贯彻“我们”的主张路线,保护“我们”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戈氏作为中央的核心人物对几位总书记产

生经过的描述,让读者看到其中之一斑。

戈氏本人谈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把改革的目标定为:消除对历史的扭曲,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在苏联历史上他看到的一根改革主线是赫鲁晓夫、柯西金、萨哈罗夫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乃是这些人的事业的继续。

戈氏把他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1) 1985—1988年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希望纠正制度上的许多弊端,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未敢突破以往的清规戒律。

(2) 1988年春到1990年初,是为“民主化时期”。这时候他看到,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政治制度不进行根本改革,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难以奏效。于是在短时期内举行自由选举,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使反对派合法化——“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3) 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时候的根本问题是苏联的存在问题,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这种分期也许比较接近实际。早在上台以前,戈氏已经显示出一种锐意进取的劲头,摩拳擦掌,有改变现状的雄心壮志。不过,显然缺乏具体的设想。这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从禁酒令到加速发展战略就可以看出。这时候,他仍然寄希望于“计划加动员”的老办法。问题是旧的模式和体制不改变,靠什么来加速呢?改革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这恐怕是一个共同的规律。应该说,加速战略并不是他上台执政以后进行改革的开端。苏联的旧体制就像一部老掉牙的机器,你有加速的愿望,它却根本运转不起来。走过的这段弯路才迫使戈氏走上改革的道路,其目标就是改变旧的体制和模式。戈氏改革的真实历程是:在旧体制下“加速”不了,才转入经济改革,经济改革遇到严重的阻力,进行不下去,转而求救于政治改革,以消除“障碍机制”或“制动器”。不是按照他所设计好的计划,而是形势逼他一步一步地往下走的。他本人的回顾表明,他本来想搞的是“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之内的革新社会计划”。然而,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难免使整个国内局势失控,结果事变进程一步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戈氏的社会主义观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 20 世纪之谜。在 20 世纪出现了一批叫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但是到它们发生剧变之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这就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它们在近一个世纪或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到底搞了些什么主义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看到过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最后还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句话,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说此话的时候是 1985 年 8 月,戈氏正打算进行他的改革,这时候他自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最多只能说是在着手探讨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过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的看法。

戈氏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模式。它不仅能够适用于苏联和中国,也适用于其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印度、埃及、索马里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宣布为发展的目标,不仅如此,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里,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运用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

社会主义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还可以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

全人类的内容在戈氏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所理解的全人类的内容包括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把某一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戈氏断定,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并没有否定这种观点,而是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暴力。但是苏联和 20 世纪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条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够较快地解决某些问题,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为这种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成绩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戈氏继续发挥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的思想,认为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未来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主义的体现,而是在全人类价值无条件主导下的多种发展道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国际社会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除非其本国的专制独裁者在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每个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要求;

如今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安全保护,防止战争,而且还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保护大自然,承认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应当明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槛上,它的思想准则已经确立,而且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但在具体实行上大大滞后了。这座文明大厦基本上还是几张图纸,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结构。戈氏表示相信,世界能够克服通往这座世界大厦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让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人道主义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某种完整的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可以看出,戈氏的社会主义已经同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合流了,两者的基本价值观已经相当接近。2000年3月成立了俄国统一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任党的主席,2001年11月又与其他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戈氏任党的领袖。这样,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戈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了。

苏联共产党在戈氏改革中的地位

自十月革命之后,党的作用在逐步变化。列宁在晚年的时候,看到问题的存在,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职能。然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生前没有得到解决,而到了斯大林时期情况变本加厉,党政结成一体。戈尔巴乔夫多次说过,在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管理机关。在党中央机关设有与政府部门相对应的机关,例如“有机硅生产处”,连市场上连裤袜脱销问题也要交到政治局去讨论解决。党还直接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有鉴于此,戈氏决心通过政治改革,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种做法就是要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而其后果则是使一大批人失去特权,降为平民百姓。改革成败就完全取决于苏共对改革的态度。戈氏在书中多次提到所谓的“障碍机制”：“改革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单官员,还有体制阻碍公开性的开展。这是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戈氏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但是戈氏不明白,在一个由共产党管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里,这个党业已成为一架管理国家大小事务的国家机器,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对这台机器

只能修理、改造、改善,而不能轻易打碎、抛弃、砸烂。到了改革后期,这个党尽管扮演不了先锋队的角色,但是管理国家上仍然离不开它,一旦抛开它,整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在规定苏共变成一般政党的时候,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组织、运动、政党、机构能够接替它来管理国家,进入竞争的实际上仍然是原先的以政党形式,或虽不以政党形式,但仍然是由原先政党头面人物组成的国家机器——叶利钦依靠的是俄罗斯联邦这一原先由苏共管理的最大的国家组织,而不是另有什么其他新成立的政党来同戈氏的政权对抗,它通过把苏联架空的办法剥夺苏联总统的权力,并取而代之。所以戈氏的做法在现实中是不堪一击的。他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但他从198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的结果看到:“只要人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会一落千丈。”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事实。由此得出的结论有两种:一种是退回去,继续一党专政。而戈氏认为,需要的是深化改革,“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彻底地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正如他本人所说的,他“拥有的权力可以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他显然没有用好自己所拥有的无上权力,把国家改造成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共产党的政权重新取得合法性。历史表明,他的种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够结束“分裂的局面”,反而使整个苏联,使整个社会发生严重的分裂。

面对复杂的局面,失去垄断地位的共产党立即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长期的垄断使这个党不知道如何去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既不会进行合法斗争,也不会进行秘密工作,一句话,失去了控制全局的力量。

在整个“八一九事件”中,苏共中央站在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政变失败后,苏共的地位和影响更是急转直下。这对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是一大打击,他已经不能再依靠这个中央了。所以事变后他很快做出决定,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党组织自己决定其今后的活动问题。戈氏解释此举的原因时说: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机关出卖了自己的领袖。也许这是戈氏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总书记应当对全党,对那时还拥有的1500万党员负责。另一方面,戈氏也忘记了自己权力的来源,一旦失去了苏共,他也就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同叶利钦对抗的基地。在这以后,他在叶利钦的逼迫前步步退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当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会议

上签署禁止苏共的命令的时候,他只能发出软弱无力的抗议。

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

关于苏联解体,毫无疑问戈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客观地说,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却另有其人,这就是策划和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的那几个领导人。

民族问题是戈氏改革过程中中途杀出来的程咬金。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各届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国内各民族已经团结一致,成为统一的苏维埃民族了。谁也没有想到苏联还会有民族问题以至民族冲突和对抗。戈氏最初的改革设想中并没有把民族问题包括在内。不幸的是,苏联确实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苏联形式上是国家联盟,实际上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加盟共和国不过相当于一个州,那些小一点的共和国的首脑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赶不上一个大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苏联的历史上,只有归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施退出联盟的权利。而改革一方面暴露和揭示出存在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怀有独立倾向的国家以机会,给那些觊觎最高权力的人以借口。

戈氏逐渐看清原有的有名无实的联盟形式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需要革新联盟以维系这个大家庭不致解体。对这种联盟,列宁在成立之时就有点担心,他在最后的书信中曾经作过最坏的打算——让联盟退回去,“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①。1991年7月23日达成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体上就是这样的联盟——联盟国家保存下来,而各共和国和主体的权力增加。但是国内左右两派对此都不满意。一派人想继续维持原先的联盟不变,即保持实质上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另一部分人觉得给予的权力不够,而想建立多个国家的联盟。各方都在幕后做应变的准备。

1991年8月19日,保守派利用戈氏休假之机首先发难,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其主要目标之一是阻止定于8月20日起陆续签订的新联盟协定。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了,但阻止协定的签署的目的却达到了。当然这里起作用的还有权力的争夺。据戈氏透露,7月底,戈氏曾经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其中议论了协定签订后新的权力机构的人事安排,让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退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5页。

谈话被录音窃听,于是有紧急状态委员会之举。从委员会纯属乌合之众看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八一九事件”之后,戈氏虽然采取一些措施,谋求建立革新后的新联盟,但时机已经丧失,回天乏力。因为在“八一九事件”期间,波罗的海国家乘机宣布独立,此后各共和国的独立浪潮势不可当。连在苏联起主导作用的俄罗斯联邦也宣布其主权高于苏联,要求独立,这无疑等于宣布俄不管其他共和国了。这更给其他国家以宣布独立的根据。9—10月实际上所有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再想用“主权国家联盟”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已经不可能。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叶利钦的力量增强,威望上升,而戈氏完全被架空,手头已经没有足以与之对抗的力量了。12月19日,戈氏在同德国总理科尔通电话时说: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解体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了。

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办法来结束苏联的存在。俄、白、乌三国元首在明斯克附近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戈氏接受了这个现实,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终于和平地解体了。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没有权利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

事已如此,协议“离婚”,和平分家,对苏联境内的各共和国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结局,苏联解体没有引发南斯拉夫现象,这对世界来说毕竟也是个幸事。

* * *

有一句洋俗语: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话倒过来自然是说失败者必须受审判。这大概也是我们常说的,“胜者王,败者寇”的逻辑。不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说,这种做法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我国的历史上就有不少失败的改革者(变法者),他们未必就都必须受谴责。

对于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的消失,至今全世界议论纷纷。俄国有不少人至今不能原谅戈氏的责任。就事情本身而论,作为一国的元首——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总统,戈尔巴乔夫对发生的一切自然难辞其咎,但就历史的发展而论,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不是个别人物的意愿、意志、才干,而是大多数人以及各种因素所起的合力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俄、白、乌三国当时的领导人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所起的直接作用,要比戈氏大得多,但即使他们也不是个人的意志在决定历史

的发展。应当说,是这个党,这个体制,这个联盟过去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离心力,最终导致超级大国解体,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精辟论断: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历史的观点,也是我们观察苏联解体问题应当掌握的方法。

《南方周末》2002年3月7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9页。

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之考察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简言之就是居民对该政权的认同性,并由认同进而支持,为之奋斗。而一旦失去广大群众的认同,失去他们的支持,其合法性也就随之消失,就会由其他的阶级、阶层、集团取而代之。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历史上改朝换代多数场合是通过暴力解决的,一般都是通过推翻原先的王朝,取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其根据就是所谓“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表面上看,雄厚的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源,实际上仅仅凭借武力坐天下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在武力征战的同时还要打出“吊民伐罪”、“替天行道”、“为民请命”之类的旗帜。“迎闯王,不纳粮”是用以吸引和动员农民群众的口号。用舆论工具,强调自己是“真命天子”,“皇权天授”,是封建帝王取得合法性的舆论手段。秦始皇想让他的王朝传之万世,遗憾的是到二世就完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否定其王朝合法性的根据!清军入关,统治全中国。它取得政权的手段首先当然靠的是武力,是他们游牧民族善于骑射的优势。但是如果要长期统治整个中国,仅仅靠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取得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认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落后民族面对先进民族,要获得认同,唯一的办法就是融入先进民族的文化中去,使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异民族,外来分子。清王朝为此实行了汉化,这是它得以统治近300年的奥秘所在。

合法性不是能够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解决的问题,必须与时俱进。新的社会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政权不断去解决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取得群众新的认同。通过选举取得执政的合法性是现代通用的法则,但不是唯一的途径。通过政变、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推翻反动政权也能取得合法性。问题不在形式,而在

于是否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我们看到有些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人物或政党,到了后期往往也会失去合法性。于是或者通过选举,或者通过政变,而被推翻。根据这种合法性的观点,我们总结一下苏联共产党存在 70 多年来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十月革命的合法性来自“自由、和平、土地、面包”这四个民主革命的口号

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高举“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得到工兵农的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支持。十月武装起义依靠的是赤卫队的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说的是手段,枪杆子必须有人来使用,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否则,枪杆子也只是一堆废铁而已。列宁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断然放弃自己的土地国有化纲领而直接借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其目的就是要取得广大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的拥护,形成革命的多数,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来,十月革命就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布哈林早就说过,十月革命是恩格斯所期望的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的结合。试想如果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仅仅代表俄国的无产者的利益,这个政权就缺乏统治整个俄国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有两个数字很能说明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居民中的比重:1913年的俄国居民(以100计算)的社会成分:工人和职员为17(其中工人14.6),农民占66.7,资产阶级、地主、商人和富农16.3。1924年:工人和职员为14.8(其中工人10.4),集体农民和合作农户占1.3,农民75.4,资产阶级、地主、商人和富农8.5。^①在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工人在国内都是少数,光靠工人的力量是无法统治整个俄国的,哪怕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

新经济政策使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新的合法性

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艰苦卓绝的三年国内战争,打败了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取得了反复辟的胜利。但是出乎人们的想象,在胜利之际不但未能庆功,却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问题很简单,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在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全部被收走,即使有点剩余,也禁止

^① 《苏联国民经济70年》,莫斯科1987年版,第11页。

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对农民还有什么意义呢?就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言,也许还赶不上沙皇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要农民长期支持这个政权是做不到的,农民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得不到面包,只能靠一份有限的口粮维持生命,红军战士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在复员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却发现还是处在缺吃少穿的境地。可以说,用以动员革命的口号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兑现。这些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执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尽管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和已经结束的时候已失去合法性,遭到国内大多数居民的反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行不通,何况某些措施并不是战时的需要所致,而是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观念的产物。如果不改弦更张,苏维埃政权就有丧失的危险。

正是在“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种情势的逼迫下,列宁采取紧急措施,放弃传统观念,抛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买卖,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回到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这个政策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了苏维埃政权这一边来,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同盟者。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遇到死抱教条不放的党员顽强反对,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猖獗一时的农村暴动平息下去,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在20年代工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文化事业也有长足进步。

中止新经济政策,实行个人专权、恐怖统治, 使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

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中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苏联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消灭所谓富农,高速度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在国内实行大规模镇压,在党内剪除异己,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利益,在全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党内出现地下的反对派(如“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国内出现农民骚动,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斯大林不是去改变不得人心的政策,反而加强镇压,企图用高压、镇压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满——镇压——更大的不满——更严厉的镇压……在整个30年代有以千万计的人们惨遭杀害,几千万农民遭到剥夺,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大饥荒。一个政党的统治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如此严重的恶果,其统治的合法性

早已丧失殆尽。凭暴力当然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从长远看已经岌岌可危。1941年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卫国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救了斯大林,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外敌的入侵促使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德。甚至受到严重摧残的东正教也在这抗敌斗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使斯大林的政权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这个政权得到群众的确认。但是斯大林没有利用战争胜利的良机去改革国内的政治环境,例如休养生息,放松对政治生活的极权控制,给农民多一点自主权。他在晚年继续加强镇压,通过日丹诺夫在文化思想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利用安全机关接二连三地制造一个个莫须有的案件。只是斯大林的逝世中断了进一步的大规模镇压,使国内出现新的生机,获得形成新的合法性的机会。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得到新的确认

赫鲁晓夫上台后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通过改革现状来重新获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除去了安全部门的首脑贝利亚,这是一箭双雕之举:使党摆脱了安全部门的控制,又可以把大镇压的罪行推到贝利亚身上,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一个2亿人口的国家,有2000万以上的人被无端镇压,而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说,一个把1/4甚至1/3的人口当作敌人对待的政权是谈不上合法性的。因此平反冤假错案就成了那时的当务之急。这是争取民心,使政权获得认同的无法回避的重要的一步。苏共二十大的重要贡献就是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下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是同他揭发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某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例如撤销控制农民的机器拖拉机站,使农业生产资料回归生产者,提出物质刺激原则,开始注意轻工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采取措施缓和国际形势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勃列日涅夫主义造成合法性的新危机

由于赫鲁晓夫本人的错误,更由于他的改革触犯了某些人、某些集团和阶层的利益,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下台,出现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苏联走上了一个漫长的缓慢发展以至停滞的时期,出现自己不改革又镇压其他国

家改革、干预他国内政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苏联处于停滞状态,同西方国家的距离拉开。更有甚者,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但年老,而且久病,实际上已经丧失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和可能性。这样,苏联又面临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人们期待变革。对安德罗波夫曾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他是克格勃出身,也是个病夫,在改革上难以有所作为。他所采取的所谓改革措施实际上还是克格勃的那一套,用强制手段整顿劳动纪律,并无多大新意。当然在劳动和工作纪律松懈的情况下,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毕竟是有好处的,但并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重建合法性的最后一次尝试

连续经历三个老人和病夫治国的教训,社会期盼一个年轻力壮、富有思想活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他推出“新思维”,倡导“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取得执政合法性的需要。他需要对抗斯大林那反民主的、不人道的“社会主义”,向人民做出新的许诺。他先用新的政策(“新思维”)缓解冷战局面,改善国际环境,在国内改变沉闷、恐怖的政治生活。公开性和民主化在一个长期实行高度强制、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是一把双刃剑。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是一个高明的剑客,他所举起的剑既击中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由于控制乏力又伤及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本身。但是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其实,苏联共产党早已不成其为先锋队的党,早已蜕变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它失去多数居民的支持。叶利钦下令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的时候,广大居民,包括苏共党员在内,聚集在总部外边围观看热闹,而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保卫苏共中央。要知道,这是一个有1 800万党员的党!这再鲜明不过地显示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它已经失去同人民的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不是自愿而是被强制吞并的。对这些共和国来说,苏联的存在并不合法,缺乏合法性。苏联的解体正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搞到最后,苏联这种联盟的形式失去了各民族的认同,甚至历来扮演领导角色的俄罗斯联邦也要宣布自己的主权高于苏联,弃其他联盟国家于不顾,而其他各国也纷纷宣布自己的主权高于一切,这时候

作为联盟国家的苏联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其解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也许用高压手段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对一个政党来说,不断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成为取得合法性的根本关键和要求。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行动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政党需要不断地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先进性、代表性去赢得执政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还需要从民主制度上去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可以用专政的办法建立政权,实现少数人(无产阶级在俄国是少数)对多数人的统治,那么经过若干年之后,就应当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并且通过选举来确认这一点,然而苏共长达七十多年的政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苏共给我们留下的一大教训。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2期

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

——读《苏联兴亡史论》

200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陆南泉、姜长斌、徐葵和李静杰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以下简称《史论》),这是我国研究苏联兴亡的新成果。

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开始,关于苏联剧变就引起世界各国和我国学者、史家、政治家的极大关注。十年来我国报章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分析剧变的原因,出版了不少专著,详略深浅不等地论述苏联的兴亡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两本由社科院学者撰写,后两本由国内不同单位学者撰写,其所表述的观点各具代表性。其中,《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对苏联演变的考察是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的,实际涉及的苏联历史并不长。《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是《史论》的中间产品,实际上是论文集,作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史论》却是从沙皇俄国开始,上溯彼得一世,循着历史的轨道,一直考察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把在1991年红旗落地这一瞬间的世纪性事件,放到俄国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给读者以厚重、扎实的感觉。

以史立论,史论结合

该书采取“史论”的形式,是颇具特色的。总结一个国家的兴亡必须从这个国

家的历史实践出发,以这个国家的历史为出发点,进行评说,而不是以某种理论或者公式,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脱离实际的理论判断是无的放矢,也许讲得头头是道,但并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把人类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类。马克思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他的所有理论都立足于坚实的史实的基础之上。没有对历史的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写下了《历史笔记》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书中按编年顺序摘抄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请注意,当时没有电脑这一类的先进工具,一个字、一个标点都是手工书写的。马克思的劳作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要了解社会,要了解社会的变动、国家的兴亡,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它的历史进行仔细的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去寻找其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论从史出,以史立论,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史论》的立意和设计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

历史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把对苏联兴亡的研究同俄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考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历史是有延续性的,苏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能割断历史。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病固然是在它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其成因却往往同它的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史论》用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去谈“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高度集权的、个人专断的、追求霸权扩张的、严酷的斯大林模式是植根于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传统之中的。某些东西并不需要去发明创造,只要从过去的历史中移植过来就行了。这种历史的考察非常重要,这样才不至于把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病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作者有理由说:“与其说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俄国历史的产物更为确切。”

俄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呢?本书概括了彼得一世改革的三个特点:一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无情地、大批地铲除异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二是尽可能地压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奴,以牺牲广大农奴的起码生存条件为代价进行改革。三是在严格等级制的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同时倾全国之力发展国防工业。其总目标就是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实行领土扩张。这个目标直到沙皇制度覆灭一直没有改变。斯大林本人对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颂扬并非秘密,人们在30年代的苏联不难发现彼得一世的影子。

读者也许会感到书中关于沙皇俄国的历史讲得多了一些,细了一些,但耐心读下去,对理解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是有好处的。当然,这部分如果能够适当精简一些,把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提纲挈领地勾画出来,可能更便于读者阅读,给读者留下更为鲜明的印象。

作者们对“史论”这种形式做了难能可贵的尝试,可惜未能进行到底。就全书而言,该书对沙俄历史和苏联早期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述评,给人以鲜明的“史论”的感觉。相对而言,对苏联中后期历史的评述“史论”的色彩就淡化了,“史”的叙述往往不见了,读者看到的仅仅是“论”,当然,论证中也有不少资料作为根据,但“史”的成分少了。并且有些章节过多地引用他人的议论,作者自己的论证相对少了。这可能同作者队伍的结构有关,但无论如何这是很可惜的。在苏联解体问题研究上,如何做到“史论结合”,如何坚持“论从史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有待史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

苏联兴亡的轨迹

《史论》在历史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顺序给读者大体描绘出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盛衰兴亡的曲线,向读者揭示出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逝世之后是怎样由鼎盛而一步步走向衰落,并最后解体的。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主要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作用,苏俄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取消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企图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全部控制起来,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在这种制度下,从事小生产的广大农民群众被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因素,属于限制和消灭的对象。当时实行的“余粮收集制”(这个词直译应当是“粮食征收制”),实际上是把农民手中的粮食统统收走。苏维埃政权成立时通过的土地法令,名义上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使用,但是既然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不能用粮食去交换生活必需品,那么农民就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因此当战争环境一旦结束或者说临近结束,农民就自发地起来造反,反对“康姆尼”。

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列宁亲自参与制定和实施的。但是一旦发现其弊病,列宁并没有坚持错误的方针,而是及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甚至政敌的意见,摒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种主动实行改革,自己改正错误的做法,

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做法。由于改行粮食税,运用了商品货币机制,允许农民经商做买卖,国家的动荡的局面迅速消除,在以后的整个20年代虽然也出现过某些危机,但整个国民经济是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创造的一种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截然不同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是具有生命力的模式。现在某些论者往往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说没有达到“市场社会主义”的认识。其实这有点苛求于古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那时的当务之急,列宁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新经济政策,运用市场机制,就能够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做,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会更快。列宁说的一句话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①人们在赞扬斯大林的速度时,应当好好想想列宁的这一重要论述。至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下一步如何走,那是以后的事,不能否定新经济政策为以后走上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20年代的经济改革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保护,尽管列宁在病榻上曾经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但他本人随即病倒不能视事,而他的战友们却忙着“王位空缺”时期的争权斗争。随着在党内斗争中的节节胜利,斯大林手中集中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他打倒布哈林这个最后的对手之后,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也就宣布了列宁开始的改革的失败。应该说,这是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社会进入了斯大林模式时期。《史论》作者说的对,理解“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实质,是揭开苏联兴亡之谜的关键,因此理所当然,它成了该书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一模式的成因,以往通行的说法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随时有战争的危险所致。不过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20年代以至30年代前期,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的战争危险。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如何动员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利用市场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77页。

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要解决的首先是农民农业问题,但并不限于此,他要在此基础上,均衡地发展国民经济,让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地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史论》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成因是,“它重蹈俄国历史传统的老路”,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极大程度地照搬并强化俄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它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政治手法、经济途径,同彼得大帝等沙皇的做法极其相似。斯大林是“强国主义者”,他成功地把苏联经济转变为备战经济,这使得苏联在德国突然袭击后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但是,作者认为,不能把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为,第一,战胜法西斯还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贡献。其次,俄国历史上还有过封建的俄国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不能根据卫国战争的胜利过高估计斯大林模式的作用,因为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所付出的代价毕竟太高昂了。

就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而言,这个模式有三大支柱: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政治上的大规模镇压。而就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言,它由三部分组成:高度的中央集权;以扩军备战为主导的国家统制经济,即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以闭关锁国这一慢性自杀方式为特征的僵化体制。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归根结底是不能保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的。我们看到,农业问题在斯大林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历史给了斯大林 20 多年的时间!他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强迫命令,更严重的是剥夺以至消灭农民),他的大规模镇压,对社会主义声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至今仍难以消除。卫国战争胜利本来是苏联对原有模式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然而斯大林却做出错误估计,认为战争的胜利证明了他的那一套是正确的,因而一方面加强对国内的控制,恢复 30 年代的镇压做法,继续制造莫须有的案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然而这一切并不证明斯大林模式的生命力,而是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模式已难以为继了。到了斯大林晚年,改革斯大林模式,或者说抛弃斯大林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史论》作者说得对,“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社会主义并没有错,错的是斯大林—苏联模式。”

赫鲁晓夫承担了着手改革的历史任务。“赫鲁晓夫是苏联的第一个改革者”,《史论》的这句评语不太确切,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项伟大的

改革。但说赫鲁晓夫是改革者,无疑是对的。他借反对“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鉴于国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这里需要引用一下作者对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意义的阐述:使人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必须改革,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进程。此外,赫鲁晓夫在经济、政治和党内制度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里既有成功的东西,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此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赫鲁晓夫的最大局限性、最大弱点在于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抛弃斯大林体制的必要性,他的许多行动都局限于斯大林体制范围之内,在斯大林体制内改革斯大林体制,最多只能起修补的作用。

赫鲁晓夫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这一事实说明,改革是一场触及各界人士切身利益的事业,就是赫鲁晓夫这种没有触及斯大林体制本身的改革,也不见容于那些顽固的斯大林分子。

推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执政。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国人的看法也有巨大的差异。有人认为是苏联的“鼎盛时期”,该书的作者认为,勃氏执政的18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剧变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在政治体制上突出的表现是朝集权化方向发展,其表现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的恢复和加强,个人崇拜盛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在经济体制方面,勃氏上台之初,由于惯性的作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的柯西金改革,但不久即行中止,接着大批“市场社会主义”。勃氏不但自己不改革,而且还禁止东欧国家改革,推行“有限主权论”,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国内经济停滞,但通过扩军和争霸,倒是把苏联的军事实力推向“鼎盛”时期。停滞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化,经济增长递减和停滞,而同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拖垮了整个苏联经济,如此等等。一句话,勃氏执政18年给苏联留下沉重的遗产。

勃列日涅夫之后,接着两个病夫老人治国,面对同样病入膏肓的苏联,安德罗波夫心有余而力不足,契尔年科则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

历史跨进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应该说,戈氏上台是众望所归,他在此前的表现,也使人们有理由寄予希望,他看到苏联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把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视为时代和苏联现实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力图通过改革重建

苏联,振兴苏联。”

同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是个争议人物,不少人把苏联剧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归罪于他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特别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史论》对戈氏的这些主张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原则上讲,提倡公开性与民主化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使社会日益陷入失控状态。“新思维”作为调整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为国内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地球本身的存亡问题,但是,抽象地将它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进行实际操作,是不切实际的。至于把苏东剧变归因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说法值得推敲。一个事实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苏联才刚刚付诸实践(可以说,甚至没有来得及实践),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戈氏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践踏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使社会主义无法表现其优越性。

然而,戈尔巴乔夫毕竟失败了。究其原因,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戈氏上台之初提出的“加速战略”实际上还谈不上改革。它是企图在原有体制之内加速,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忽视了农业,改革不仅没有从农业开始,而且长期未采取必要措施去解决农业问题,尽管戈尔巴乔夫当过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氏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严重错误,逐步失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在实施经济改革后发现,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把经济改革进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拥有不可逆转的保证。这个思路没有错,但是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铺得过宽,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能运行起来,苏联成了随波漂流的“无锚之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苏共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实行党政分开,共产党不管行政,这就形成行政权力真空。所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口号,因为这时候的苏维埃早已不是十月革命期间的苏维埃了,即使把权力交给它,也未必能够承担起领导和管理国家的重担。此外,当时确实也存在阻碍机制。“客观地说,到了这个时期,要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已经十分困难了,已是积重难返。”诚如斯言。不能因为戈氏的改革失败了,就对其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在对苏联

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能把戈氏六年改革说成是一个“闹剧”,其实对社会主义历史来说,倒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制度。它需要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一部苏联史是一部改革与反改革的历史。苏联的成败兴亡,就看是否能适时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否对头,措施是否恰当,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得是否彻底,等等。

这就是《史论》给读者描绘的苏联兴亡的轨迹。对某些细节某些提法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全书勾画的这个轮廓,这条轨迹,是大体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体制和党

该书主要论述苏联兴亡的原因,而研究这问题的主线是体制问题。《史论》紧紧抓住苏联体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败这条主线,对苏联的兴亡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这里说的体制是指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以后时期未能根本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如作者所言,“不抓住这条主线,就难以科学地回答苏联兴亡的原因,因为体制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这是长时间以来人们在研究苏联问题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铁托提出苏联出现的问题在于“体制”(他用的是“制度”一词,那时还没有发明出“体制”的用语),此话引起对他的猛烈批评,其实他作为南斯拉夫改革的倡导者,对斯大林的体制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才能出此惊人之语。

国家兴亡的奥秘只能到这个社会,到这个社会的体制中去寻找。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穷尽其发展的潜力,这就加大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竞争的难度,加上自身政策措施的失误,这就更使苏联在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即使在某些方面占了上风,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不能要求它立即拥有完善的体制,这必须在运行中不断调整、改革。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及时抛弃不合时宜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改行新经济政策。然而,列宁逝世之后,他的后继者没有按照列宁的思路走下去,又把苏联拉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这种僵化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最终把苏联引向解体。

对这种体制邓小平有过评论。1986年他对波兰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①1985年在同穆加贝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比较好的思路被僵化的模式所取代，这就是苏联悲剧之所在！

一般来说，抓住体制问题进行分析是正确的。不过我们所要研究的苏联这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在谈体制问题的时候，还应当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这种体制是怎样形成的，是谁创造的，是谁维护和加强这种体制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苏联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在形成和运行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苏联共产党。正是这个党不听列宁的忠告，不仅未加强监督机制，不仅不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反而一步步地给予更大、更多的权力，使他最终成为凌驾于党之上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专权者。发展到最后，党本身对他也已经无能为力了。什么“集体领导”，什么“民主集中制”，对斯大林来说都已经不再存在。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就是这样造成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体制一旦形成，要摆脱它就不容易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在东欧国家也许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外力强加的），而是联共（布）制造出来，并授予斯大林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讲清楚，可惜，《史论》在这一点上讲得不够充分。

历史的报应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一种报应现象。人类滥伐森林，“征服”自然，大自然就会以生态平衡失调、干旱水灾等给以报应。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横征暴敛，践踏民意，滥杀无辜，置民众于水火之中，诸如此类的暴政，诸如此类的暴君，在历史上无不受到应有的报应，只不过报应迟早不同而已。有的发生在其生前，有的在其身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败家亡国的原因有时还得到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父乃祖那里去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从积累到爆发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历史的报应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更替，王朝更换，帝国崩溃。这种更替从总体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当然这中间也难免出现局部性的暂时的倒退和反动。

只要像《史论》那样认真地回顾一下苏联存在的 70 多年的历史，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确实祸延子孙，严重动摇和损坏了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败坏了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报应没有直接落到斯大林本人头上，但是历史的报应是无法逃脱的，权力甚至极权，面对历史的报应都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在俄国已经看到过丧失民心的制度轰然倒塌的先例。1917 年 2 月，俄国的沙皇制度就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就民族性而言，俄国人一方面崇尚暴力，而另一方面，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并不动用暴力，听任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1991 年底，在苏联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现象，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员众多的苏联共产党，在没有发生暴力进攻，也没有经历暴力的抗争的情况下，就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除非用“气数已尽”来解释，否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说通的。“气数已尽”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是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是人心向背的结果，是矛盾发展积累到一定的阶段的总爆发。俄国出现的现象是进步，也是退步。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推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改革好的，或者说，没有来得及完成对斯大林模式改造的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而直接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斯大林模式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的倒退。

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红楼梦》里贾府的衰落传到贾宝玉一代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谁也无回天之力了。不是贾政治家无方，不是王熙凤管家不力，不是探春改革不得法，不是宝玉蔑视功名利禄，不图上进……而是这个大家族“气数已尽”，宴席到了该散的时候了。宝玉本来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但是这块顽石不想也无法挽大厦于既倒，回天乏力。

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是否有点相似的东西呢？

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上，我们听到了颇有分量的、较为系统的一种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论》把我国苏联剧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是一部

值得关心苏联剧变的人士一读的学术著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本书已经解决了人们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说这本书已经十全十美。并非如此,书中还有一些提法、判断、表述乃至历史事实,都还有值得推敲、质疑、订正的地方。

《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

苏联共产党丧权的教训

我国把1991年发生在苏联的事变叫做“剧变”，这是一个中性词，既无褒义，也无贬义，只是确定一个事实。

关于苏联剧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另一个是苏联作为联盟国家的解体。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不一定就导致作为联盟国家的苏联的解体，另一方面，苏联的解体（即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行使民族自决权，退出联邦）也不一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不过在苏联这个具体国家，这两者又是具有密切联系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一个问题，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

导致剧变的诸多因素

我国学者对苏联崩溃的认识十年来有一个从浅到深的变化过程。最初某些公开发表的看法是“外因论”，把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归之于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颠覆、经济侵略。但是，一向被看作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先进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敌不过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的意识形态，而最后土崩瓦解呢？外因论回答不了。实际上有不少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应当到苏联社会内部去寻找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经过多年的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有关剧变的原因可以说大体上都涉及了，但对导致剧变的根本原因或者主导因素存在不同看法，往往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看得比较重，政治学家对政治因素看得比较重，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学者们提到的各种原因大体归纳如下：

(1) 体制上的因素。苏联实行僵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缺乏民主,滥杀无辜,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反而失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或者没有认识到体制上的问题,或者改革措施不当,终于回天乏力,社会主义垮台。

(2) 经济因素。苏联自 30 年代形成的经济体制否定市场作用,实行单一的中央计划管理,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畸形发展,经济失去活力,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

(3) 民族因素。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联邦制的名义下实行单一制,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压制迫害少数民族,兼并邻近的小国,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离德。而俄罗斯民族也没有从斯大林的政策中得到什么实际好处,他们认为自己为支援各落后民族做出了过大的牺牲,出现了力求摆脱其他民族的“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这样就在苏联全境出现对联盟的离心倾向。

(4) 苏共本身的问题。长期以来以党代政,党内缺乏民主,形成个人集权专制,党内出现官僚特权阶层,严重脱离人民。也有学者认为,苏共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变了党的性质,使党社会民主党化,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造成党变质的罪魁祸首。

(5) 冷战与对外扩张。长期与西方处与敌对状态,实行对外扩张、追求霸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扩军备战,不仅消耗巨资,而且不得不把军事工业放在首位,致使畸形的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调整。

(6)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应该说,上述各种因素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和苏联解体中起了作用。但何种因素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党是关键。

关键因素——苏联共产党

在探讨苏联剧变原因时,被提到首位的经常是体制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

实行什么样的体制,当然非常重要。一个僵化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是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体制是怎样形成的,

是谁制造并维护这种没有效益的体制的？显然，体制不可能自行产生，必须有一种力量去创造、生成、培育、维护这个体制。

经济因素在苏联崩溃中起重要作用。从斯大林时期起，实行僵化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国民经济片面发展，从勃列日涅夫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末期，国民经济更是每况愈下。然而，把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比戈尔巴乔夫时期搞得更糟糕，但为什么叶利钦政权能够存在达十年之久，在总统选举中胜过共产党呢？经济的因素在苏联剧变中肯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似乎同政权的丢失并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

这样我们就需要追寻在政治经济体制后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执政党本身——苏联共产党。

20世纪初列宁曾经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他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决定性作用。果然，过了十多年，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

无产阶级在俄国占居民的少数，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单独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它必须取得多数居民的支持，这个多数就是广大农民。十月革命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不是仅仅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口号，它也是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的口号。这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布哈林把十月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

1922年3月24日，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承认，“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党）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他强调指出：“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②可见，在落后的俄国，决定政策的实际上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代替无产阶级进行领导的为数不多的“党的老近卫军”。试问，如果这一个老近卫军阶层不再享有那“独有的巨大威信”了，甚至被消灭了，那么谁来决定党的无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9页。

产阶级政策呢？实际执行的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政权兴衰的根本。这些条件如果予以具体化，那就是领导的政党使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结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适时提出符合绝大多数人民要求和利益的口号、措施、政策、策略、路线，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过去把苏联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苏联共产党，同样，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的也应当是党。在苏联，可以说“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联共(布)是怎样培育出斯大林体制的

斯大林的体制，或者斯大林模式，是在排斥和消灭“老近卫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也是消灭党内民主的过程。不妨考察一下这个过程。

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处理好。然而，这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家的民主化又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为前提。如果党内都没有民主可言，国内就谈不上任何民主。国内战争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因为处在战争状态，党内不得不实行高度集中的“战斗命令制”。这是一种非常措施，而不是一种常规政策。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改行“工人民主制”是及时的、必要的，可惜没有得到实施。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大大放宽了各种限制，开始运用当时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比较符合俄国国情。但政治体制上变化不大，列宁实施的改革缺乏政治体制的有效保障。列宁在最后时日希望“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①，但仅仅来得及提出一些设想。整个政治体制仍然延续原先的“党专政”。而所谓党专政，实际上是一批领袖(列宁时期)甚至一个领袖(斯大林)的专政。列宁承认“党专政”的提法。他把阶级专政同党的专政并提。但是他看到少数人代替阶级实行专政的危险，考虑要对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如政治局、总书记实行有效监督，但这个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他在晚年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或者根本没有被他的后继者所接受，或者在执行中遭到歪曲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或者本身就不大现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页。

民主问题始终是苏联党内和国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1921年,喀琅施塔得兵变中的水兵提的基本要求就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工人民主制”,自由选举苏维埃。尽管喀琅施塔得兵变遭到了镇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是通过了实行“工人民主”的决议。1923年秋,在列宁卧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在党内争论(关于“新方针”的争论)中再次提出党内民主问题。1925年出现的“新反对派”,实际上是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联合起来反对已经出现端倪的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高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物”,其含义就在于此。1928年,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反对斯大林把“非常措施”变成常规。布哈林敏锐地看到针对农民的“非常措施”也可以用来对付其他阶层的人,构成对国内民主生活的严重威胁。布哈林的预感是正确的,到了30年代,斯大林果然把非常措施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各界,进行大清洗,实施大镇压。

为了实施监督,为了保持权力制衡,列宁建议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改组工农检察院。然而列宁逝世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反而大大削弱了。在党内斗争中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不是为了保证党内民主,而是为了保证斯大林在全会上拥有多数(中央监察委员会受斯大林控制)。到了30年代,中央监察机关变成了附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失去对中央进行监督的权利。列宁提出的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对政治局和总书记进行监督的建议被抛到九霄云外,掌握无限权力的总书记不受任何监督。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里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对执政党特别是最高领导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检察院和法院保证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实施,30年代苏联举行的三次大公审只不过证明苏联的司法机构完全听命于一个人,是执行某一个人意志的工具。

在斯大林形成个人专权的过程中,党的其他领袖或由于短视,或缺乏认识,或力不从心,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消极甚至有害的作用。1923年秋,在托洛茨基为党内民主呼号的时候,其他领袖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布哈林当时为《真理报》起草的社论《打倒派别活动》就是一例。由于“派别活动”的罪名成了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棍子,到了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布哈林尝

到了自己参与酿制的苦酒,时时担心“派别活动”这顶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而斯大林果然用反对派别活动的棍子击败了布哈林。

在列宁时期有一个传统,重大问题由党的最高机关——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即使在国内战争的紧张岁月,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总是如期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还定期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这个传统列宁逝世以后就被打破了。1925年召开十四大,1927年召开十五大,1930年召开十六大,1934年召开十七大,1938年召开十八大,1952年召开十九大——间隔越拉越长。一些重大决策斯大林往往是“先斩后奏”,如采取“非常措施”、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策都是斯大林先宣布,由中央全会追认的。到后来连“后奏”也取消了,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就是最高命令。党的十七大干脆把斯大林所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直接作为联共(布)中央的总结报告予以通过,“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①一方面斯大林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们对这种破坏党内民主制度,取消党内民主的做法容忍、认同,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不同时期个别领导人的抗争,都被斯大林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以失败告终。终于在党内和国内出现斯大林一人号令天下的局面。

列宁要求严格划分党和政府的职能,但越往后党政不分的问题越严重。列宁担心斯大林会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而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的权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扩大了,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这种权力是列宁所没有的。其秘密在于斯大林首先掌握了党权,利用组织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他通过打倒托洛茨基,夺取了军权,安插了自己人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是过渡人物),通过打倒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他夺取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首都,通过打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夺取了共产国际、人民委员会、工会以及舆论的控制权。通过20年代的党内斗争再加上对各部门的清洗,斯大林控制了全国党政军以至文化科技教育各界,使自己的权力覆盖全国。

由于苏联实行的是党政一体的制度,谁拥有党内最高权力,谁也就拥有国家和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55页。

政府的最高权力。党内的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缩影,政府不过是执行党的决定的机器而已。而一旦党内实行高度的集权制度,那么国家和政府也必然实行高度集权的制度。列宁曾经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主张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目的是避免国家计划委员会内专家们制定的计划被有关领导轻率地否定。然而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专家们制订的几个方案以及所谓“最低方案”很快就被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以体现领导意志的“理想方案”(最高方案)所取代,以后又对各项指标随意加码。

高度集权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关键,斯大林就是凭借这种权力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对全国进行克格勃特务统治的。如果说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具体内容,那么这一切都是由党内推行到全国去的。

斯大林上台执政之后,特别是打倒所有的反对派之后,在党内和国内建立了个人专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党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人文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以至普通工人农民大开杀戒。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统计,不算被当作“富农”消灭而至今没有得到平反的农民,被镇压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①大镇压的后果所影响的不是一代两代人,它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声誉。无端的镇压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相互告密搞得人人自危,也严重毒化了人们的心灵。镇压一人,株连一家,牵连亲友,累及后代。平反工作至今没有完成(由于苏联的解体,也许已经没有平反的必要了)。大规模的镇压不是政权的行为,而是党的决策,甚至不是党的决策,而是领袖个人的专断。它借党的名义下达到政权机关,政权机关是执行者,总导演是总书记斯大林。

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是想通过修正党和国家的性质来挽回影响,让党和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这样就不再需要对全体人民实施“专政”了。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专政历来是少数对多数的专政,只有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才需要专政。如果处于多数,只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就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了。当然,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是否已经到了“全民党”的阶段,那是

^① 俄电子图书馆,一周访谈,2000年11月4日。

另一个问题。

多数无权决定任何问题

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就有一个民主问题,因为决策、分配等都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来妥善解决。民主同社会的文明程度既有联系又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强调只有文明社会才有可能实行民主,那么原始社会就无民主可言。我们把人类最早的社会叫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显然是存在民主原则的。这里的民主无需以现代文明为前提。只能说,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民主制将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得到有效的实现和执行。以物质匮乏、文化不高为借口拒不实行民主制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苏联几十年来实行的是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统治。这里缺乏民主的机制,少数领导人可以完全不听多数群众的意见而自行其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也同样如此。

苏联末期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人口的少数。1991年5月,曾由美国人操作在苏联的欧洲地区进行过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即总计有69%的居民赞成社会主义。只有17%的人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①在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保留革新的苏联。

为什么多数人主张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保留苏联,而只有少数人主张资本主义,结果实行的却是资本主义呢?在这个社会里到底是谁说了算?

还是党的领导人在这里决定一切,因为他们多数人已经不要社会主义。据统计,苏共上层精英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广大居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②

这就是说,共产党内大多数精英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又一次“为民作主”了。

^{①②} 见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

美国总统选举因票数接近而难产受到举世的嘲笑,但是这里实行的百分之五十点几的胜出原则毕竟比无视多数意愿的“专政”好一些。如果俄国是一个有民主传统,有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么经过全民公决通过的保留苏联的决定就没有人能够随意推翻。

苏联剧变到底是否丧失了社会主义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回答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措施而言,它实现了共产党的独一无二领导,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实行了普遍的虽然是低水平的福利制度,保障人人有工作。这些措施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相近的。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就基本特征而言,在苏联存在时期世界上没有第二种社会主义。苏联的剧变丧失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规定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应当服务于这一根本宗旨,其他的各种政策方针都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上述国有化、工业化、集体化、计划经济等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从这个观点看,苏联的所作所为是背离这一目的的。国有化没有转化为社会化,国有资产却转化为私人财产。马克思要求打碎旧国家机器,消灭官僚阶层,把国家的工作人员变成人民的公仆,而苏联的在册权贵(即列入中央和各级组织部门花名册的由上级任命的官员)演变成新的统治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的状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必要保障,也是人的自由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马克思说过,我们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为了以后建立新的书报检查制度。然而苏联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言论自由遭到剥夺,就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党的第一书记一旦失去手中的权力,也没有写“回忆录”的自由。正如久加诺夫所说的,共产党垄断了“真理”。而历史证明,共产党在执政期间犯了大量的错误,其指示、决定、路线并非都是真理,因而它所垄断的并非全是“真理”。人要生存,要发展,这是基本的人权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理应给予保障的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无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起码宗旨。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捍卫这种社会主义,这种共产党。俄国的一些学者政

治家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变形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说,苏联剧变并没有丧失社会主义(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是不会丧失的。

充其量可以说,苏联失去的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苏联共产党早已名存实亡

苏联共产党还在被查禁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失去了先锋队的性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个党曾经有美妙的目标,给人民以种种许诺,但是在它领导的七十多年里,虽然使落后的俄国跻身于强国,但这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强国长期以来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较高的改善,而先进的导弹是不能当饭吃、当衣穿的。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社会,如果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亲人无辜惨死在监狱、集中营、刑场的话,苏联人不要这种“社会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的机会。斯大林逝世之后是一个机遇,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然而他对斯大林体制上的问题缺乏认识,没有触动体制,没有根本改善党内制度,上台之初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到后来也名存实亡。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匆匆结束了柯西金的改革,退回到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对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向斯大林体制的冲击运动实行镇压。这一切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失去挽救社会主义的机会,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

如同赫鲁晓夫提出“两全”一样,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挽救社会主义声誉的最后努力,因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既不民主,又不人道,而人道民主乃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决不会因讲人道民主而灭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在社会的民主化方面有所进步,人们开始享受到某些自由,但其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一般说来,改革必须给老百姓可以感觉到的实惠(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持久支持,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看作改革的阻力,想绕开党和苏维埃,通过新设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贯彻自己的改革方案。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自然是想依靠党来实现自己的设想的,然而历史表明这个党在推进改革上已经起不了先锋作用。基层党员不关心,对一切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许多领导干部是既得利益获得者,他们

首先要做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不允许改革打乱自己的生活,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是叶利钦的以恢复私有制为目标的“改革”。这样,原先由他们掌管的国有财产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合法地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私产。俄国的寡头多数都是由共产党的官员们演变而成的。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在叶利钦时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据统计,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①这些数字是颇能说明苏共的精英们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的。

在苏共总部被查封的时候,拥有1800万党员的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表示抗议,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顺从地走出老广场的总部,而广大群众则围观看热闹。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 * *

苏联的体制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创造的。这个创造者就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其创造过程是从党内推向党外,先有党内的领袖专政,然后有国内的个人极权。采取什么政策方针路线,全都取决于党的决策,而党的决策又取决于党的第一把手,其个人的品德、学识、性格、文化水平、马克思主义修养都直接影响最高决策。消灭国内民主是从消灭党内民主开始的。党内容许领袖一个人说了算,国内必然出现个人专权。党内容不得不同意见,国内必然出现对“异己”的压制和镇压。侵犯人权先从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开始。苏联共产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僵化的党,列宁提出过新经济政策,列宁以后党内仍有不少熟悉马克思主义,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的领袖人物,他们曾经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不正常的党内制度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致使党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最高领导人受不到有效的监督。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主张可以强加于党。在列宁时期对各种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而斯大林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党内就不再有什么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争论了。党内“完全一致”,国内“完全一致”!实际上不满甚至反抗的情绪在积聚,随时有喷发的可能。一旦释放出来,就足以使

^① 《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社会主义”大厦倾覆。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特殊性,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模式的选择、制度的变迁最终都取决于执政党的抉择。一旦做出错误的抉择,又坚持错误,久久不予以改正,就不免有崩溃的危险。这是苏联共产党丧权留下的严重教训。

《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苏联崩溃与地缘政治

普京在 2005 年的国情咨文中说：“苏联的崩溃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国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的千百万同胞被阻在俄国境外。”^①

我国有人盲目接受普京此语，用来评价苏联解体，也把苏联崩溃看作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然而，对普京此言应当作具体分析。对俄国来说，确实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因为它失去了沙俄几个世纪开拓掠夺得来的疆土，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通婚是平常事，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许多家庭成了多国家庭，亲戚之间的来往变成了国际交往，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先前居住在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等，现如今变成侨居他国，被阻在国外。这对俄罗斯人家庭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但是苏联的崩溃却不能用“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来概括。20 世纪地缘政治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都发生过极大的变化。二战后苏联从地缘政治的变动中取得了很大的好处，获取了大片土地，把东欧国家变成自己的卫星国，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次苏联的崩溃是二战后地缘政治变动的继续，这个变动对各个国家来说影响是不同的。

谈俄国地缘政治变动的时候，应当记住俄国地缘政治演变的历史。沙俄通过对周边地区的蚕食扩张，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变成地跨欧亚的大帝国，这种扩张是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0 页。

靠“剑与火”实现的,而不是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带去圣经与文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的是沙俄的版图,沙俄的地缘政治。只有小小的变化——让波兰和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独立。但是这个变化对苏联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苏联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与此相关。1921年,苏俄出兵占领并兼并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而在此前不久俄联邦和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刚刚签订相互承认的条约。二战前夕,苏联以国防的需要为由攻打芬兰,割其领土,说是用其他土地交换,但仅是一句从未兑现的空话。接着出动红军占领并兼并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把这三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已不可能回归苏联,但通过同德国希特勒签订的密约,实施了对波兰的瓜分。战后还重新划分了西部边界。这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就完全恢复了沙俄帝国的地缘政治。不仅如此,从20年代初开始,苏联就策划蒙古独立,二战结束前后吞并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扶植蒙古独立,肢解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

莫洛托夫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在同丘耶夫的谈话中说:历代俄国沙皇为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按:如果各国外长都以扩大版图为己任,那世界肯定要大乱)。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苏联在二战中共夺得687 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苏联版图的扩大是斯大林牺牲他国利益,包括我们中国的利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如果有社会帝国主义的话,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帝国主义!那些为斯大林大元帅歌功颂德的人们,是不

是应当想一想战胜国的中国在斯大林的烟斗一挥下的遭遇呢？

苏联地缘政治的变化并未到此为止。二战结束后，苏联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以及部分亚洲，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大家庭”，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主义，只是保障苏联自身安全的地缘政治。

苏联崩溃确实造成了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对有关各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灾难，中国人用不着为之惋惜。

苏联的宪法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地缘政治的变化是苏联各共和国的自主行为，是它们人民自己的选择。它们在并入沙俄帝国之前都有自己的独立历史，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再受强制的统一的模式的约束，不受统一的中央的指挥，按照本国的国情来安排本国的发展，未必是坏事。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多次宣布民族自决权，宣告各民族拥有分离的权利，后来苏联为维护苏维埃帝国的存在不再允许在国内提自决权，各民族共和国稍有独立的表示，立即受到镇压。20多年前苏联的各民族共和国行使民族自决权，脱离苏联而独立，既不违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也不违背苏联宪法，是合理合法的事。至于各国独立后的发展情况如何，也是他们国家人民自己的事，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有些国家发展得还相当不错。

对东欧各国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是由于二战后红军的进入而发生的，是红军枪杆子下出的政权，很难说是自愿的选择。它们有的（如德国、捷克）在二战前已经是相当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走在苏联前面。而在苏联的控制下，东欧各国经济发展缓慢，大大落后于先前比他们落后的国家，政治上听令于苏联老大哥，走苏联的路既搞不成社会主义，也搞不成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这种状况是无法忍受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振兴国家先后采取改革措施，以图挽救社会主义，挽救国家。就是这样的改革，苏联也不能容忍，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都被红军的坦克碾碎了，致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多次失去挽救社会主义的机会。

地缘政治的变化起初对东欧各国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经互会的解散打乱了原先的经济秩序。但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苏东剧变二十年来，这些国家大多数成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经济上也有长足进步，有的已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连当时最落后的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讲地缘政治不应当只从苏联或者俄国的角度来看,更应当从各国人民的选择的角度来观察,对苏联治下的某些国家来说,获取独立是世纪的梦想,而对东欧各国来说,摆脱苏联的控制,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从国家的发展来说,其意义不下于二战后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

苏联的崩溃确实造成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有利于有关各国发展的历史的进步。

《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12 期

从另一视角看苏联解体

从世界的角度看,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庞大的帝国迟早是要解体、崩溃的。苏联帝国的形成是继承沙皇帝国的遗产,继续其地缘政治。沙皇帝国是通过对周边的蚕食由一个莫斯科公国扩大成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帝国的。苏联继承这笔遗产之后,又继续兼并了它所承认的独立国家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四个国家,侵占了中国、芬兰和东欧某些国家的土地。抢来的东西吐出去,理所当然。这种帝国垮台不足为惜。反对苏联解体者往往引用苏联宪法,认为做法违宪,但不知为什么不援引苏联宪法中退出联盟的自由这一条,虽然在苏联存在的60多年时间里,看到的是只进不出,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真正享有退出联盟的自由。

从各加盟国共和国的角度看。首先俄罗斯联邦就不愿继续留在苏联,不愿用自己的资源去“养活”其他共和国,认为自己吃了大亏,要求摆脱不堪承受的重负。它宣布俄罗斯的主权高于苏联。领头羊自己都不干了,别人说三道四干什么。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在被并吞前一直是独立国家,被并吞后一直要求独立,这是他们的历史权利,他人无权干涉。乌兹别克是产棉花的共和国,但是他们国内没有棉花加工的企业和工厂,纺纱织布均在其他共和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控制这个国家。苏联的做法同世界上其他对待殖民地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本来人们还希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能够继续结盟,然而正是这三个国家带头在判处苏联死刑的文件《别洛韦日协议》上签字,苏联解体后它们也不愿再结成新的斯拉夫国家联盟。这不能怪这些国家,只能怪苏联的民族政策。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曾经独立过,对成立苏联,它曾经做过保留,不

那么情愿。而长期以来,乌克兰稍有独立嫌疑的言论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它自然不愿意在摆脱苏联后再给自己套上牢笼。

二战胜利后东欧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是苏联输入的,是红军带进去的,即使南斯拉夫,虽然是自己解放的,但也逃脱不了苏联的控制,一旦企图脱离这种控制,也免不了苏联的威胁,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国家二战后由多党国家、多党竞争,到取缔资产阶级政党,只剩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被取缔,左翼被共产党吃掉,从而建立共产党独家天下,所有这些事情,都有苏联的手在操纵。波兰历史上多次遭到瓜分,沙俄和苏联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卡廷事件在波兰人心目中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作所为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国家都对苏联式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弊病深有体会,它们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曾经为改善社会主义做过努力,寻找较好的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这是拯救社会主义的机会。然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不许革命”、“不许改革”,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都遭受苏联坦克的镇压。既然不让改善社会主义,那最后等待它们的只能是抛弃社会主义。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它们历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二战胜利从法西斯德国占领下之解放。事实表明,东欧各国的民众并没有为苏联的垮台而惋惜、哭泣。他们从此走上了正常的现代的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的发展虽然情况不同,有好有坏,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华约、经互会与北约、欧盟。当年东欧国家参加华约和经互会是强制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并且不能自由退出,而加入北约和欧盟,则要申请,请求加入,国内要经过全民公决,现在原苏东地区的许多中东欧国家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一次是自愿的行动,没有什么强迫,是自己哭着嚷着要加入的。中国多次宣布,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有人忘不掉的还是他们的“社会主义”这块金字招牌。不过如果尊重历史事实的话,应当承认,这种金字招牌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所许诺的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即使被苏联作为橱窗竭尽全力予以扶持的民主德国,在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联邦德国面前也显得寒酸。

普京在 2005 年的国情咨文中说:“苏联的崩溃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

难。对于俄国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我们的千百万同胞被阻在俄国境外。”^①

然而，对普京此言应当作具体分析。对俄国来说，确实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因为它失去了沙俄几个世纪开拓掠夺得来的疆土，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通婚是平常事，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许多家庭成了多国家庭，亲戚之间的来往变成了国际交往，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先前居住在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现如今变成侨居他国，被阻在国外。这对俄罗斯人家庭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但对那些被苏联并吞，被强拉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则是获得自由和解放，绝对不是“灾难”。

庞大的苏维埃帝国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地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其垮台瓦解，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进程，任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都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

2012年3月21日稿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苏联剧变：违背历史规律的结局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历史这门学科，对所遇到的历史现象做过深刻的研究，对某些历史问题提出过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他们尤其关注欧洲历史的发展，对这里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能够立即根据所掌握的丰富资料，对事件作出及时、精湛、透彻的分析，给后人留下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

苏联兴亡的原因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很可惜，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够活到现在，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们对某些现象的论述，对我们还是大有教益的。本文提出迄今没有引起注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我们也许会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一个由列宁首创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口口声声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据说已经开始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一个千百万群众曾经为之献身奋斗的国家，为什么最终垮台、解体，而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跳越阶段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①

1917年，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点，认为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当时列宁采取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而不谈的办法，没有直接回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责，恐怕也难以回应，而是采取干起来再说的做法，直接去夺取政权。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年时间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直接过渡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对此列宁做了深刻的反省。1923年初，列宁病中翻阅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承认了俄国的发展水平不够，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前提。然而对列宁来说，既然政权已经在手，自然不能倒退回去，他找到的为苏维埃政权存在辩护的说法是：历史发展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在俄国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

这是列宁的创新，不失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不过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不忘社会主义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资前提，把发展生产，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放在第一位。列宁是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之后领悟到这一点的。很可惜，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数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利用政权的力量去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却千方百计地走捷径，企图用改变生产关系这种简单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20世纪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世纪，除了被正式列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外，亚非拉还有不少国家在国名上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不幸的是，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基本上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捷克曾是发达国家，奇怪的是就是这样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也能把它变成落后国家。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又急于求成，就不得不借助于暴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苏联借助暴力消灭了“富农”和私商、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之后，从生产关系上说，国内就不再存在剥削阶级了，于是斯大林在1936年迫不及待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这时候苏联离1932—1933年饿死数以百万计饥民的大饥荒仅仅三年，人们仅仅有饭吃而已！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波尔布特的血腥杀戮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的疯狂暴行。但是凭借暴力是进不了社会主义的，相反，只会把整个社会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恩格斯说过，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但孩子并不是助产婆自己能够生产的，暴力本身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当然有所发展，但是长期以来重点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仅仅这两个部门的发展是进不了社会主义，更进不了共产主义的。人们迷信暴力，借助暴力夺取政权成功之后，又企图借助于暴力跳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在苏联就有了名目繁多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说法，如“一国社会主义”、“建

成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20年进入共产主义”等。说到底,都是想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

整个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能够证实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的潜能已经发挥完了,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到处点火,甚至出钱出人在一些国家直接组织工人暴动,试图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但都无功而返。落后国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虽然能够取得政权,但应当承认,这个政权是早产儿,必须细心呵护。采取跳跃,甚至“大跃进”(这是苏联30年代的用语,而不是中国的发明)的办法超越阶段,只能是欲速而不达!在20年代,布哈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想遏制一下急躁冒进的超越阶段的企图,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预期目标与最终结局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历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行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行的手段的。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后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后果,往往是恰好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只有从属的意义。

恩格斯就此进一步提问:“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

动者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他回答说：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探讨促使群众行动起来的动力，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

这里之所以大段援引恩格斯的话，是因为在七十四年的苏联历史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这种预期和结果、动机和效果相背离的状况。苏俄的共产党领袖们怀着良好的愿望，设定共产主义的目标，要带领人们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但是他们走过的七十四年历程却离目标越来越远，终于垮台。尽管领袖们一再宣布他们发现并掌握了“规律”，所发现的“规律”如何正确，他们对规律的运用如何英明，他们的预期如何百分之百得到实现，然而历史毕竟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一切违背历史规律的东西都不免遭到失败和破产。

列宁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遭到广大农民以及工人的反对，农民暴动蜂起、工人罢工频发，直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这是列宁中止粮食征收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其首要目的是便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取得粮食，自然也不排除以此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然而集体农庄并不是能够促使农业发展的组织，农民在集体农庄干活是为国家，在自留地干活才是为自己一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到50年代苏联的粮食产量还赶不上沙俄1913年的水平，俄国本来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苏联却变成了粮食进口国。斯大林在国内实施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异己，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以为这样就可以长治久安。这种残暴的做法，剪除了国内精英，留下一批二流甚至三流的政客，到了晚年，斯大林都不知道到底依靠什么人才能放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而在国内造成人人自危，广大群众同政权和共产党离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49页。

离德,使权力丧失群众基础。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等,只是当局一次又一次开出的空头支票,可以骗民众于一时,但不能永远骗下去,骗局最终是要被揭穿的。

一部苏联兴亡史如实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实际上,苏共某些领导掌握的并不是什么规律,而是权力,他们依靠权力恣意妄为,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人民群众的诉求与呼声,无视世界历史的潮流,这就难免一朝崩溃,遭到历史的审判。

群众和民族起来行动的动因在苏联和苏共覆亡的时刻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各民族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连最大的统治民族俄罗斯也不要这个联盟了。广大群众以至广大党员对苏共被取缔无动于衷,完全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情景!

“叛徒论”能解释清楚垮台的原因吗?

有人把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以至赫鲁晓夫,认为是党内出了“叛徒”,“叛徒论”至今不绝于耳。很难想像,一个大国、一个大党能够被某一个领袖,某一个叛徒出卖。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内都出现过货真价实的叛徒,但都没有能够搞垮党。因为决定党的命运的不是个别领袖,而是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列宁曾就此写道: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①

列宁这里强调的是,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的转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群众对苏共“不太客气”,是因为它已经“不中群众的意”,换言之,不得人心!当苏共中央总部被查封,其中的工作人员走出总部大楼的时候,围观的群众没有一个人表示声援,而是冷眼旁观,甚至嘲笑。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卷,第679页。

不言而喻，这不是否定领袖的作用，领袖对促进或者推迟历史的发展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1871年4月17日，恩格斯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偶然性的作用，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人物的性格”，让我们想想列宁对斯大林“粗暴”性格的分析！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意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

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②

同样，用“叛徒论”来解释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解体，一个老党的灭亡，虽然简单方便，也符合某些人的心意，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解决问题。像恩格斯所说的从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这才是根本的办法，当然，这样做要困难得多，然而舍此别无他途！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0期
《大众日报》2011年10月11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俄罗斯·俄国·前苏联

——译名与用法

现在通常都把“俄罗斯联邦”简称为“俄罗斯”。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俄罗斯联邦的人,我们能笼统地称他为“俄罗斯人”吗?我们知道,俄罗斯联邦包含几十个民族,“俄罗斯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是唯一的民族,其中还有诸如“乌克兰人”、“鞑靼人”、“车臣人”等。“俄罗斯人”的说法不能包括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其他众多的民族,正如汉族仅仅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一样。为此,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启用了古俄语中的一个词 россиянин——俄国人,以区别于 русский——俄罗斯人。有鉴于此,把“俄罗斯联邦”简称为“俄罗斯”就显得不妥了。较好的做法是参照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的办法,把“俄罗斯联邦”简称为“俄国”,而凡拥有俄国国籍的人不论其民族归属统称为“俄国人”。在“俄国人”中再细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等。与此相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可简称“俄共”,而不宜简称为“俄罗斯共产党”。列宁当年曾多次强调党取名为“俄国(российская)社会民主工党”,而没有叫“俄罗斯(русская)社会民主工党”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党,而不是俄罗斯一个民族的党。列宁写道:

党为了消除认为党具有民族性质的种种看法,而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①

党在 1898 年诞生时就是“俄国的”党,即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党。^②

^① 《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2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335 页。

在苏联成立之前,正式国名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有时简称“苏维埃俄国”或“苏俄”,这是为了区别于“沙皇俄国”。现在有些好心的同志想把目前的俄国同沙皇俄国区别开来,因此把前者叫做“俄罗斯”,把后者叫做“俄国”。这实在没有必要。苏联剧变之后,叶利钦政权恰恰要强调它同沙俄的历史继承性,因此它的议会不用国际通行的“议会”或“议院”称呼,而沿用沙俄时期的“杜马”名称。目前俄国历史学家们写的国史,用的也是“俄国史”的名称,“苏联历史”仅仅是俄国史中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或者是俄国史中的一个断代史。例如,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苏维埃俄国史》),这里的“苏维埃俄国”指的就是俄国历史中的苏联时期。这里如果把 *Россия* 译作俄罗斯,意思可能就完全变了,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其实这些概念对俄国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苏联”这个名词的用法问题。现在我们谈到苏联时往往说“前苏联”。这种用法在某些场合是必要的,如说“前苏联地区”,“前苏东国家”,否则有可能发生混乱。但在多数场合并无此必要。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在那时代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苏联时期的事,完全可以直呼其名曰“苏联”,而不必画蛇添足加“前”字,如“苏联史”就不能说是“前苏联史”。实际上现在俄国人说到苏联的事时在多数场合也不加“前”或“原”字。如“苏联人民演员”这个称号在演出报幕时照用不误,并不加“前”字。原因很简单,历史上他们只有“苏联人民演员”,而不存在“前苏联人民演员”这样的称号!正如在民国初建之时把清朝叫做“前清”一样,在剧变之初加“前”字还可以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使名称逐步规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8月28日

俄国·1992

与倒爷同行

1992年秋,应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之邀到他们的历史系作短期高访,于是有了中断33年的莫斯科之行。

8月底的北京还处于夏末,夏日的余威仍存,还不能给人凉爽的感觉。我享受的待遇是,来回莫斯科,只能一趟火车,一趟飞机。这倒符合我本人的愿望,自从1959年毕业回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再见到过俄国绮丽的风光,很愿意乘火车再一次好好观赏一下沿途景色。

8月26日星期三有一趟列车开往莫斯科,这天一早就赶往北京站。近年出国访问都乘飞机,对国际列车的状况一无所知。直到车站一看,真有点傻眼了,人山人海,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扛着大包小包的人群,多半是条状的编织袋,一个个匆匆忙忙地往车上装运。大概只有我一人拎着两只箱子,轻轻松松地上了车。

四人的车厢已经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编织袋。我的位置在上铺,所以把大小两个箱子放在靠自己铺位的一边。刚安顿好,过来对面铺位上的旅客,他板着面孔,一看马上指责我一人占那么多的位置,要我腾出来,让他放货物。此人态度蛮横,一看就不是善类,但我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下铺的两位年轻人一见此情景,赶忙腾出下面的一块地方,让我把行李放在那儿。这位客人占上位置,把他的货物堆在那儿和自己的铺位上,但这以后就很少在包厢露面,一直和他的伙计们呆在另一个包厢里。

两位年轻人告知,此人姓X,北京的板爷出身,改革开放后从事炒汇,最后成了国际倒爷,在道上颇有名气。此人没有文化,但有一副暴发户的派头。对这种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惹他。

这都是在开放年代，哪儿赚钱就奔哪儿的人物。车上还有一位人称“老 M”的人，原先也是炒汇的，是北京的四大领袖之一，后来上了报告文学，出了名，他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改行，成为国际倒爷。他说，他不赞成“切汇”，还帮助一些受害者弄回一些钱。他做的规模比一般倒爷大，通过各种关系，弄来好多麻袋的皮夹克，这个车门不让上，就改上另一车门，反正所有货物都能上车。在路上，倒爷们手头的货物售光后，可以到他那里取货出售，他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卖不完，还可以退货。他的经营有点批发的意味了。

下铺的两位年轻人倒是很好说话的小伙子，我们很快就熟了。一位叫小邵，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造船专业，毕业后分配在交通部工作。后来看看机关工作太清苦，就请了长假，不再造船，而是直接下海，做跨国生意。另一位个子较高，叫小王，是回城的知青，读了夜校的法律专科，拿到了毕业证书，但没有去搞法律工作，而是选择了下海当倒爷。那时在罗马尼亚拿绿卡很容易，他们没有费什么劲就有了绿卡的身份，不过要保持绿卡，每年必须到罗马尼亚去续办签证。每年都要为此跑一趟，顺路带一批货物出售，这样不但来回的全部费用齐了，甚至还有剩余。这年头赚钱还真是容易，不过必须舍得抛弃铁饭碗。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来回走的都是满洲里那条路，这次列车没有走满洲里，而是从二连浩特出国，经蒙古，再进入俄国。车行甚速，晚上已经到达二连浩特，然后进入蒙古。位处中俄之间的蒙古，一片黄色，很少见到绿洲。这大概是千百年游牧生活造成的，常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个“逐”字用的很好，哪儿有水草往哪儿去，无需植树造林。在它的南北两头是农耕社会，特别是进入俄国，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大片大片的森林迎面而来，人的心情也不再感到那么干燥乏味了。特别是到了贝加尔湖畔，一整天都可以往左看到郁郁葱葱的森林，往右欣赏那烟波飘渺的一汪清水，真是难得的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

一位青年边防军官

进入俄界，车子开动之后，俄方的边防人员开始进入包厢进行例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携带的外币。俄国奉行的政策是肥水不流外人家，你带多少外币（主要是美元）入境，也就只能带这个数量的外币出境，高出部分一经查出，予以没收。所以

出境的时候,检查得非常严格,翻箱倒笼,连穿的鞋也不会放过——鞋底经常是藏外币的地方,这是谁都知道的。小王告诉我,一次有人干脆把外币放在桌上的茶杯里,这一次却逃过了边防的眼睛!这是一项斗智斗勇的工作。

倒爷们携带的是货物,这些货物要变成卢布,到莫斯科后再到黑市去换成美元,然后携带回国。所以在入境的时候,必须设法多报携带的美元数量,以便以后合法携带出境。而倒爷们携带的美元通常只是区区几十元,只够应付旅途的一般开销。所以在填报美元数量时往往把携带的20元写成2000元。不过要蒙混过关并不容易,边防人员是要当面清点所携现金的。进入我们包厢检查的是一位年轻的边防军官,小伙子非常精神。我的旅伴填好报表,随报表夹上10元美钞,青年军官看了看,笑笑摇摇头,在表单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俄文“Ноль”(零),把钱退给了本人。第二人看情况不妙,以为给的钱不够,于是在报表里夹上20美元,军官同样看了看,还是摇摇头,写上“Ноль”,退回到手的美元,敬个礼,走了。这一幕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只有他一人在我们包厢单独执行任务,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这到手的30美元。如此行事,一个车厢跑下来,少说也有数百美元的进项。但是,这位青年军官竟然拒绝了。

在国内就听说,苏联官员腐败,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海关更是如此,这是导致苏共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却不料在列车上亲眼目睹这一幕,不禁想起,如果苏联的所有官员都像这位边防军官这样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想来庞大的苏联也不至于这样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一路叫卖声

苏维埃政权初期,是禁止一切商业活动的,当局的目标是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买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行为,是投机倒把。城乡之间中断了所有商业联系,城里买不到粮食,乡下买不到日用品如火柴、肥皂、铁钉等。但是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于是出现一批“背口袋的人”,他们从农村背粮食进城,又从城市背日用品到乡下,这些人风餐露宿,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活跃了城乡联系,也拯救了不少饥民的生命。据《真理报》报道,到1921年8月初,“背口袋的人”从农村运往城市的粮食多于国家收购的。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经常有他们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他们被叫做“背口袋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倒爷”,区别只在于

他们当年是在城乡之间奔忙的小贩，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俄两国之间堂而皇之地从事国际贸易的倒爷。“背口袋”的买卖是非法的，而国际倒爷活动是合法的商业行为，中俄两国政府谁也没有予以禁止。

车过蒙古，进入俄国，这是旅途的第三天。人们大喊“上班了”，整个车厢，整个列车，立即涌动起来，倒爷们纷纷打开五颜六色的编织袋，倒腾出货物，生意开张了。此后每到一个车站，都要热闹一番。轻车熟路，倒爷们清楚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站有生意可做。他们不懂俄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的买卖。一件皮夹克，只要伸出五指，巴掌一正一反，口喊“bia-ji bia-ji”（俄语 Пять——5），买主马上明白，这是5500卢布——第一个“bia-ji”是5000，第二个“bia-ji”是500。所以每当列车停车的时候，站台就响起一片“pia-ji pia-ji!”的叫卖声！

倒爷出售的主要是两种服装：皮夹克和羽绒服。这里没有摊位，更没有店铺，买卖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的，倒爷们多半把夹克穿在身上，作为样品，在月台上兜卖。看中了，如果尺寸合适，交完钱，脱下来交货。如果成批购买，看好样品，谈好价钱，上车取货。把样服穿在身上，而不拿在手上，是防止有人劫了衣服，撒腿跑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快开车的当口，倒爷是不可能去追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衣服消失在车后。这种事件我亲眼目睹了至少三回。做大宗买卖的，还可以上车看货，看好后交钱提货。

有的车厢没有停靠在月台上，交易就在车厢的窗口与路旁的顾客之间进行，倒爷在窗口展示衣服，顾客看好了，把钱放在拴着小绳的小篮子里，倒爷提上篮子，收好钱，然后把衣服递下去成交。倒爷们是讲信用的，即使车子已经开动，也一定会把衣服送下去。

购买衣服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俄国倒爷，他们看过货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编织袋、一编织袋地扛走，他们要的是便宜。另一种是买来供自己或家人穿的，这部分人，特别是老太太，挑得非常仔细。这是自然的，在苏联解体，国家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他们拿出这笔不小的开支，为自己或者亲人购买衣服，不能不仔细一点，他们要的是价廉并且物美。

倒爷们贩卖的衣服虽然价廉，但真说不上物美。那时候俄国一直有人嚷嚷，中国倒爷贩卖的是假冒伪劣产品，中国向俄国倾销假冒伪劣产品。其实，倒爷倒卖的货物大体上分两种，一种确实是伪劣产品，有的羽绒服里塞的是没有经过怎么处理

的鸡毛。有一天,我的旅伴问我有没有香水,他说,这羽绒服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了,里面的羽毛没有好好清洗。另一类应属廉价产品,是真材实料制作的,只不过是次等的,同它的价位相当。常言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算不上高级产品,但也不是伪劣的东西。这就像粗布同绸缎相比,不能因为粗,就说粗布是伪劣品一样。这种货物符合那时俄国人的消费水平。莫斯科的一些高档商店也有大量的高档商品,例如意大利的皮衣,价位在几万以至几十万卢布之间,除了“新俄国人”,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列车里两种货都有,就看顾客的需要和运气了。应该说,那时倒卖到俄国的大量商品是同他们老百姓的购买力相当的,也确实填补了他们短缺的市场。我的旅伴也常说,把那些劣货卖给那些善良的俄国老太太们,实在于心不忍,但有什么办法呢?!

利润是可观的。那时1美元大约可换200多卢布。一件皮夹克,猪皮的,在北京的小商品市场的价格是70至90元,到车上卖5000至5500卢布,后来我在莫斯科商店看见中国产的皮夹克标价为8000至10000卢布。一件羽绒服,进价50至60元,短的卖5500卢布,长的卖6000卢布,利润高于皮夹克。不过刚开始的时候,皮夹克比羽绒服好卖。据我的旅伴估算,一列车的货,出手后可换美元100万左右,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列车没有限制携带货物的重量,装的货更多,赚的钱也更多。旅伴们说,他们给国家赚了外汇,给“浙皮”(指北京郊区浙江人聚居的浙江村)创造了就业的机会,也帮处于水深火热的俄国居民同志解决了物资匮乏之苦,一举多得,功劳大大的!当然,这一趟跑下来,他们来回的国际旅费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在俄境内的头两天大家都忙着做买卖,只有伊尔库茨克大概是大站的缘故,是禁止做买卖的。俄国老百姓非常听话,在这儿谁也不敢有所动作。传统上老百姓对警察是畏惧的,“民主化”并没有使警察失去威严。所以买卖中遇到麻烦,如抢东西、打架,警察的干预很解决问题。

到第三天,车上的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到了鄂木斯克大部分人手头已经无货可卖,我们的包厢显得宽敞多了,终于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为防窃贼撬门,不仅锁上门,而且卸下车窗上的金属棍把门顶上。不过每当列车停下来到这时候,即使是深夜,还总是不断有人敲窗,问有衣服卖没有?我的旅伴们开玩笑说:“真是对不起‘苏联老大哥’,对不起俄国老百姓,带的东西太少了,没能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度过

难关!”

“古老行业”开张了

货物卖完了，车上开始了另一种买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

服装买卖开张了，皮肉买卖开始了。列车上来了一些漂亮的姑娘，通常是两女一男成为一组，男的是彪形大汉，任务是保护姑娘。旅伴告诉我，女的叫“鸡”，男的叫“鸡头”，这自然是我们国产的说法。

姑娘们“工作”的时候，“鸡头”在外面候着，他的工作是收钱、保镖。他说一次10美元，最好给美元。

倒爷们不懂俄语，但是 Sex 这个词都会说，交易只要一个手势就能成交，双方都是轻车熟路。包厢已经腾空，所以往往是两男两女同进一个包厢。守候在外面的“鸡头”，看着手表，超过20分钟就会敲门警告。这时候，外面的倒爷会设法制止鸡头敲门。语言不通，就借用手势：竖起一个手指头，用另一只手敲门，那个指头立即垂下，接着向鸡头摇摇手。意思是表达得相当清楚。完事后，倒爷往往提着一瓶二锅头去厕所，他们还是害怕传上什么毛病的。

来我们车厢的两个姑娘相当漂亮，一个是金发碧眼的俄国人或者白俄国人，另一个是黑发黑眼睛的南方人。在倒爷们中间走过的时候，有人占便宜，伸手去摸女孩的大腿，这时候，只听姑娘严肃地说：“小伙子，要付钱的！”

我们车厢厕所的门锁不上。两位姑娘上厕所的时候，往往有人无意中去推门，这时候就会听到姑娘的尖叫声。“工作”之余，她们是正常的人，一样有廉耻之心！

快到莫斯科了，古老的行业中止营业，不知道姑娘们在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回头去迎接下一趟列车的客人们了。

中国的倒爷贩卖衣服赚俄国人的钱，俄国的美女用身体来赚中国倒爷的钱，这也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平等“交易”！

这个行业古已有之。沙俄时期自不待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小说常有记载和描写，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库普林的《亚玛》。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妓女的命运在不同时期各不一样。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妓女是被禁的，她们的活动甚至被同军事联系在一起。例如，1918年8月列宁致信下诺夫哥罗德的领导人费多罗夫，说鉴于白卫分子在酝酿暴动，建议立即采取群

众性的恐怖手段，“把勾搭上士兵、旧军官等等的数百名妓女枪决或驱逐”^①。这大概是担心妓女扰乱军心所采取的措施，但妓女做买卖“勾搭”是必须的，为此被枪毙实属冤枉，并且即使出卖肉体，也罪不当诛！1919年彼得格勒为妇女建立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其中60%是出卖肉体的妇女。

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有人鼓吹“性革命”，“一杯水主义”，妓女的活动也处于半公开状态。据说，有40%至60%的成年男性得到过妓女的服务。当局曾试图恢复对妓女的强制卫生检查，卫生人民委员部想把警察镇压措施同社会预防措施结合起来，成立了专门的防治所，使“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牺牲者”的妓女社会化。但从1929年起，对妓女恢复了严厉措施。她们被送进强制劳动改造的专门机构，获释后如再犯，往往被送进内务部的集中营。1937年，原妓女的防治所纳入古拉格系统。在30年代初对被指控卖淫的妇女通常还只是行政流放，即流放到边远地区，而在斯大林的大恐怖年代她们就在各种罪名下被遣送到古拉格，这时候妓女已经列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了。与此同时，报刊上关于妓女的一切信息统统消失，造成苏联已经根除卖淫的印象。

实际上地下的妓女继续存在。50年代我去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参加青年联欢节，在宾馆的餐厅就见到一位女郎频频应邀与男士起舞，舞毕就坐到舞伴的桌上饮酒。我间接待的朋友，这是什么人。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现在还有这种特殊行业的女人。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妓女作为社会现象重新得到承认，一些报刊的记者开始公开报道有关现象，如《夜猎者》、《白色的舞》，这些报道使《莫斯科共青团报》的发行量打破了纪录。后来又出现像《国际女郎》这样描绘国际应召女郎的电影。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个关于“一位女大学生”卖淫的长篇采访报道，实际上所谓“女大学生”云云只是一种招揽生意的手法，那位从事皮肉生意的女孩并非什么大学生，仅仅是普通的女人而已。

苏联解体后，妓女的数量急剧上升，有一个统计称，当前俄国约有18万妓女，其中3万在莫斯科。另一个估计，仅莫斯科就有8万至13万妇女从事这一行当。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142页。中文版此处把 проститутки“妓女”译作“卖身投靠者”，是错译，见《列宁全集》第48卷，第275页。

互联网上开设有妓女的专门网站,明码标价。“鸡”在倒爷专列出现毫不足怪。

8月31日下午6点左右,列车抵达莫斯科,大约晚点了五个多小时。货已卖完,一月台的中国人,没有肩扛手提的大包小包,只带随身的行李,轻轻松松地进入了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曾派车来接,但没有遇到。在众多的黄皮肤中国人中间,要单找出某一个人来是不容易的,而我也没有想到会派人来接,没有注意看接客人的牌子。只好乘地铁去莫斯科大学了。

再访列宁墓

阔别30多年,到了莫斯科,第一件事是赶快去红场,去列宁墓看望久违了的世界革命领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结。50年代留学的时候每次路过莫斯科都要去“列宁斯大林墓”瞻仰,那时对列宁这位世界革命领袖确实是无限敬仰的,如今有些不一样的感觉。苏联末期已经有不少人议论要把列宁遗体移出陵墓,入土安葬,这种议论至今不绝。说到底,这是共产党自己找的麻烦。列宁虽然对自己身后事没有留下遗嘱,但他一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造神,反对搞个人崇拜是众所周知的,他绝对不会同意把自己制成东正教圣人那样的干尸,供人顶礼膜拜。其实,还在列宁病危之际,党内领导层已经对此有过争议,斯大林、加里宁力主建筑陵墓,保留遗体,作为永久的纪念,而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则坚决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造神”。然而,列宁逝世后,某些人悄悄地把准备好的土葬变成保留遗体,供人瞻仰。证据之一是起初对遗体仅仅做一般的短期防腐处理,为的是让公众能与领袖告别。永久保留遗体是在这过程中做出的。这种做法,在苏联后期引起争论,应当说,始作俑者乃斯大林也。我这次去列宁墓是告别的,怕以后土葬再也见不着了。

斯大林本人也曾享受过这种躺在红场陵墓的待遇。1959年回国路过莫斯科曾去同列宁告别,那时在他旁边并排躺着斯大林。斯大林死于74岁,列宁死时才54岁,和斯大林相比,面貌显得年轻得多。那时陵墓上刻着“列宁斯大林墓”的字样。这次再去,斯大林的名字已经不见了,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另行埋葬。但是中国一直有人把此事说成是把斯大林“焚尸扬灰”了。这个说法至今还有某些历史学者相信,《苏联兴亡史纲》写道:苏共二十二大“还决定搬尸焚尸,作出把斯大林的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并予

以火化的决议”。事实是,1961年10月31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认为在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当晚就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墓中搬出,安葬在列宁墓旁边的红场墓地。安葬前,取下了他身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质勋章,并且把他元帅服上的金纽扣换成铜质的。当时只在墓上立一个有生卒年的碑子,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安放上斯大林的半身大理石的雕像,下刻斯大林的名字和生卒年。入土为安,这是斯大林的最好不过的归宿了,否则,苏联解体后怎么处置斯大林的遗体,一定会成为大热点。

参观列宁墓的人不少,在红场上排着长队。队伍静静地往前进,和以往不同的是,红场上空不断传来做礼拜的布道声音——自然不是为列宁祈祷。

墓室内不准摄影,所以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必须存放在专设的寄存处。墓内光线灰暗,人们可以走近水晶棺,列宁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一道红光照亮着列宁的面部,还像过去见过的一样,时间好像凝固在1924年,凝固在50年代,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传言列宁的遗体大部分已经腐烂,因为决定保留遗体时已经过了最佳时间,而且寻找保存方法又花去一段时间。1941年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匆匆忙忙用火车把遗体运往西伯利亚的秋明,长途运输以及秋明的保护条件都对保存遗体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外部世界和俄国翻天覆地的剧变,躺在墓中的列宁是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曾经希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被打发去“见鬼了”,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被搞得面目全非,共产党信誉扫地,以至于一年前苏共总部被查封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人站出来哪怕表示一下抗议。俄国传说中不乏勇士,不过这时候的俄国勇士已经不愿意站出来捍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怨谁呢?在那艰苦的20年代,修建这样一个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豪华陵墓本身就是这个党蜕变的一种征兆。抚今思昔令人想到马克思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陵墓内的气氛是压抑的,虽然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走出陵墓并不能自由行走,得按规定路线走,这就要经过陵墓后面的一个墓地,这里安葬着那些在职逝世的总书记(第一书记)以及其他名人,由于实行终身制,除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之外,其他总书记(第一书记)都是死在任期上的,所以都有权埋在红场墓地,这里有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人的墓。

墓地的上方是安放名人骨灰的克里姆林宫墙,大文豪高尔基、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骨灰就安放在这里。把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自然是极大荣誉,但是说实话,并不“显著”,没有几个人会仔细端详宫墙上的大理石墓碑。倒是埋葬在新圣母公墓的那些名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不断享受游人的凭吊或者观光。下台干部赫鲁晓夫从红场搬走了斯大林,但他本人却不能享受斯大林那样的待遇,不能留在红场,不能进克里姆林宫前的墓地,也上不了克里姆林宫宫墙,只能埋在新圣母公墓。他的传奇经历总是引发游人去探访他的墓地,尤其是他那独特的黑白大理石墓碑,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在黑白、善恶的斗争中,赫鲁晓夫到底属哪一方,他身上有几分白,几分黑?又有几多善,几多恶?谁赢了,谁输了?十年功罪,任人评说。不过他造了斯大林的反,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让百万人走出古拉格群岛,这个功绩是难以抹杀的。

莫斯科城市日

按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为莫斯科城市日,这是全城的节日,热闹异常。

这一天正是莫斯科城市日。从列宁墓出来,去了邻近的马涅什广场,那里人们正在热热闹闹地庆祝自己的城市节日,有演杂技的,有跳民间舞的,还有儿童剧院表演的,一些青年男女相拥而舞,一派节日气象。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自己的子女在这里或做游戏,或欣赏歌舞演出。有一位黑袍老教士推着坐着瘫痪妇女的轮椅,穿行在游园的人群之中,这一场景是在俄国艺术作品或电影中能经常看到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菜色,衣着也不褴褛。特别是那些在广场上做游戏的儿童,更是兴高采烈,跟以前在节日游行时看到、感觉到的氛围没有什么异样。从精神面貌看来莫斯科人仍然是乐观的,快乐的。

离开北京的时候,一些同学想要我多带食物去救助挨饿的在俄国的同学。然而,这里看到的是和想象全然不同的景象。物资短缺,但人们并不挨饿,莫斯科不是挨饿的城市。

苏联历史上有过几次大饥荒,基本上都是人为的灾难:1921年有天灾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粮食征收制造成的,名义上征收的是余粮,实际上连口粮、种子粮、备荒粮统统收走,而这三种粮食是农民进行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农民名义上得到了土地,但是有土地,却不能拥有土地上收获的粮食,要这个土地何用? 1932—1933年的饥荒完全是全盘集体化造成的恶果,集体化不仅剥夺“富农”,而且剥夺了全体农民,使他们统统成为一无所有的“国家农奴”,是对农业生产的一个大破坏,农业生产不能完成预定的任务,而国家征收的粮食和出口的粮食却年年增加,于是正常年景下出现了大饥荒,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二战后还发生过一次全国性的饥荒,虽有战争后遗症的因素,但更多的也是政策造成的。城市的一次大饥荒是列宁格勒的900天德军围城造成的,50年代上学的时候听苏联同学说,由于长期围困,列宁格勒城内食物严重短缺,路上行走,如果看见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是不敢去扶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很虚弱,只要你去扶,一样会倒下不起的,人连最后的力气也没有了,人相食的悲剧时有发生,当然这是法西斯德国围城造成的。

瞿秋白1920—1921年赴苏俄采访,写下《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反映了当时苏俄的真实,不过后人写的《新饿乡纪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离马涅什广场不远是列宁博物馆。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年人举着标语口号在集结,准备到红场游行。他们的标语口号各色各样,有“打倒资本家的统治”,有“叶利钦下台”,还有“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时期不要说在红场游行,就是在一般的街道游行,都是绝对禁止的,会受到军警的镇压。如今游行已成为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一群老人在红场游行,军警只是在旁边监视,维持秩序,并不干预。有人要打倒斯大林,有人要打倒叶利钦,这是各人的自由,当局不管,也管不了。

旁观者对我说,这是干蠢事。克里姆林宫的一位50多岁的女导游说,没办法,这些人是经多年教育出来的,已经僵化。目前一些反对当局的左派人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提不出能吸引广大群众的纲领性口号去同叶利钦对抗,有些口号只能引人发笑,如:“谁领取私有化证券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景色依然

国家变颜色已经将近一年,但从表面看,景色依然。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堡,社会主义时代的东西到处可见。

位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附近的“俄国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的前身是“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名字改了，内容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大厅内张贴着新的条例，说明档案对俄国公民和世界各国人士一律开放，这里以前可是戒备森严的地方，不仅常人难进，就是专家学者要进去也不容易。1988年我去联邦德国参加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苏联也有代表团参加，代表团里只有苏共马列研究院的专家能看到布哈林的档案材料，而来自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却难以看到，我亲耳听到他们向马列研究院的那位学者抱怨不公。大楼内的布置还是过去的，里面的宣传张贴板上还是苏联时代的说明，例如说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怎样关怀档案馆的建设，等等。每当地铁列车经过列宁图书馆可以听到浑厚的男中音报出的站名：“列——宁——图书馆站”。从莫斯科大学去市中心，一天至少要听到两次列宁的名字。红场上排队参观列宁墓的队伍还是很长，只是人们朝圣的感觉少了，或者说没有了，并且红场上还能听到教堂牧师的布道声。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仍然矗立在那里，可以看到有几个少年在广场上溜旱冰，这种神圣的广场以前是不允许嬉戏玩耍的。列宁雕像到处可见，克里姆林宫内有一座列宁塑像，导游很不满意地说，这里原先是某沙皇的雕像，十月革命后被炸掉，却换上了列宁的雕像！莫斯科红场旁边的列宁纪念馆照常开放，展品和解说词没有任何变化。有一个展厅按原样布置着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我很想拍一张照片，但怎么说也不让拍。几年后在哥尔克列宁故居看到了也是列宁办公室的复制品，交费后让拍了。

彼得堡的位于涅瓦大街上的著名的“书屋”是我50年代经常光顾的大书店，现在依然可以买到马列经典著作，只是其旁边还陈列着也属经典的宗教书籍，马列同宗教和平共处了！

也有新的展览设施。一天，偶然走进一个展览会，展出的是苏联剧变的历史，有各种文物，如街头的标语、横幅，各种传单、呼吁书，各种游行抗议活动的照片，有关“八一九事件”的实物和图片等，是了解苏联剧变过程的极好资料。参观后有一个记者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作为历史学家，我高度评价搜集和展出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的做法，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具体的历史过程，这对后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展览馆出去，纯属偶然，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蜡像馆。馆里展出了沙俄和

苏联时期的著名人物。按照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照片制作的蜡像,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沙皇一家被布尔什维克政权枪杀,显然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罪行来展示的。列宁的蜡像也是根据照片制作的,是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演的塑像,龇牙咧嘴,看起来是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制作这样的形象显然是有意的。被从苏联历史中抹去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的蜡像也出现了。基洛夫的蜡像同斯大林放在一起,勃列日涅夫的蜡像颇为显眼,衣服是其家属捐献的,胸前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奖章,充分表现了他生前的爱好。有一个蜡像我怎么也辨认不出是谁,最后只好去问讲解员。她告诉我,这是赫鲁晓夫,这是他退休后的样子,已经变得瘦瘦的了,衣服也是其家属送的。有一尊马克思的蜡像,是德国人送的,因为是外国人,没有和俄国人在一起,摆放在俄国人的对面,显示内外有别的意思吧。有两个颇为珍贵的蜡像——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蜡像,是用他们逝世时所作的面膜翻制的。

十月初,到彼得堡访问,老同学廖尼亚陪我去普希金公园游览。正值金秋时节,园中一片金黄,美得醉人。不料一天后下起大雪,再去普希金城访友,金色的树丛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已是另一番景色了。这有点像俄国的变化,其实人类历史也大体如此,变幻无常,但历史在延续,历史不会中断,也不会终结。俄国的历史在继续!俄国人的历史在延续!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时还看不清楚。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也许可见分晓。彼得堡的普希金公园内有一座著名的雕塑“少女和水瓶”,一个坐着的姑娘,旁边是翻倒的水瓶,水不断从瓶中流出。廖尼亚颇有感慨地说道:不到两百年前普希金看到过这位女孩,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位女孩。正是古今同一明月!

俄国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国家,是谜一样的国家。有时充斥血腥暴力,有时会和和平妥协。20世纪的几件大事,如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正因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所以社会没有发生剧烈震荡。应该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在1992年没有看到“法西斯专政”、“千百万人头落地”。人们过得艰难一些,但也自由一些。所以彼得堡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授说:现在日子过得艰难,但过得愉快。

改名潮

虽说景色依旧,但变化还是不少,其中之一是好多地名都改了。莫斯科最主要的中心大道是高尔基大街,现在恢复为特维尔大街。最有名的是列宁格勒市恢复为圣彼得堡市,但有趣的是列宁格勒州并没有改名,一仍其旧,还叫列宁格勒州。改名与否同城市的当政者有颇大的关系。

俄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地名的热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同德国交战,由于“彼得堡”的名称含有德国的味道,因此更名为“彼得格勒”,“格勒”是俄语“城”的意思,彼得格勒变成一个纯粹的俄国名字。这次更名是个案,没有形成潮流,只有叶卡捷琳堡想仿照改名,但未成。

苏联人好像特别喜欢改名,起初大概把这看做一种移风易俗或纪念的措施,后来就发展成一种奖赏,对某一领导人的奖赏。第一次改名潮是在1924—1929年间。列宁逝世,为纪念列宁,把“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1925年,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此后纷纷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不过,这种命名办法并不靠谱,本想借此永久纪念或表彰某一领导人,然而到了30年代大批领导人遭镇压,这些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也就不得不再次改名。十月革命后曾经有几个地点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后来又重新命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1962年出现了第二次改地名潮:“莫洛托夫”恢复为“彼尔姆”,“伏罗希洛夫”改名为“乌苏里茨基”,“古比雪夫”改称“别洛戈尔斯克”,“谢尔巴科夫”改为“雷宾斯克”,等等。第三次改名潮是在1985—1995年间,“列宁格勒”恢复为“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恢复为“叶卡捷琳堡”,“高尔基”恢复为“下诺夫哥罗德”,“奥尔忠尼启则”改为“弗拉基高加索”,如此等等。

街道改名更是不计其数。斯大林时期更改莫斯科街道地名时都说“为永久纪念某某……”,莫斯科市民讽刺说,“莫斯科要成为新圣母公墓了”。现在凡有苏联色彩的地名都恢复原来的名称,如“捷尔任斯基广场”恢复为“卢比扬卡广场”,这是克格勃总部所在地,曾经把千百万无辜的人们送上断头台,如今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倒,在其基座上树了一个木牌,上书:“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2001年再访的时候,这块木牌不见了,换上了从索洛维茨集中营地运来的一块巨石,以纪念遭镇压的牺牲者。“集体农庄广场”恢复为“苏哈列夫广场”,这个广场在20年

代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是个大自由市场,也被认作投机倒把之场所,后被取缔换名,现在恢复历史的名称。“十月(革命)50周年广场”改名为“马涅什广场”,“哥特瓦尔特街”改以农学家恰亚诺夫的名字命名,“亚·托尔斯泰”街改名“斯皮里多诺夫卡街”,“公社广场”改为“苏沃洛夫广场”,等等。

莫斯科没有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但有更庞大的计划——曾打算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苏共中央档案记载,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曾给最高苏维埃递交报告,要求把莫斯科更名为“斯大林达尔”,说是应“劳动群众”的要求。有位女市民写颂诗道:

思想飞得比鸟儿还快,
斯大林送给我们幸福的礼儿。
首都的美人
不是莫斯科,
而是斯大林达尔!

不过斯大林没有批准这个建议。有人建议设“斯大林勋章”,勋章的模型已经做好,送斯大林审查,斯大林见后批道:“现在不要,等我死后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斯大林相信,他死后会出现一个纪念狂潮。

果然如此,斯大林去世的公报发表后即有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西南建一个“纪念斯大林同志”的区,修建一座安放斯大林遗体的类似埃及金字塔的建筑,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斯大林博物馆”、“斯大林科学院”,以斯大林命名的最大的世界各族人民大会堂、苏联中央剧院、科学宫、体育运动中心,如此等等。甚至建议把以罗曼诺索夫命名的莫斯科大学改以斯大林命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斯大林共和国联盟”,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斯大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勋章改为“列宁斯大林勋章”,列宁共青团改为“列宁斯大林共青团”,等等。所幸斯大林去世不久,苏共领导层即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建议没有付诸实施。只做到一项,这就是把斯大林的遗体放进列宁墓,在红场出现“列宁斯大林墓”。

到彼得堡访问,非常热心的同学伊沃奇金娜请了一批老同学在家里招待我,我在聚会上说:“Товарищи,很高兴能够回到阔别20多年的列宁格勒……”话没有说完,我们原先的班长哈里东诺夫马上插话说,大家注意,异凡首先叫我们“同志”,其

次叫“列宁格勒”！Товарищи 一词既有“同志”的含义，也有“同学”的含义，他当然做“同志”解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时候人们之间已经不再以同志相称了，大多改称“先生”（господин）、“夫人”（госпожа）了，这种称呼我听着也感到有点儿别扭，因为“先生”和“老爷”俄文是同一个词。至于列宁格勒，我说，我在列宁格勒生活了5年，我回来看的自然是列宁格勒城，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同学们，这是历史事实啊！这次安排我住的彼得堡大学宿舍位于造船者大街，这块地是苏联时期填海造成的。我开玩笑说，这块地不属于彼得堡，是真正的列宁格勒的地盘！

一个地方频频改名，有的是有道理的，有的则可以说毫无道理可言。把一个名字赐给某一个领导人是相当不靠谱的，命名时说“永久纪念”，但随着政治行情的变幻，就永久不了了。苏联时期一大批地名使用当时得宠的领导人的名字，但随着清洗，随着失宠，这个名字就会从地图上消失，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名字就彻底消失了，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城市街道名称的变化，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记得西蒙诺夫有一首诗叫“等待我吧，我会回来的！”地名改来改去，他回来后即使手上有房门的钥匙，也会找不到那个城市，那个区，那条街道，那条胡同，那个家的。

现在还有人要求把“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资料，据伏尔加格勒市长估计，更名后仅更换市民身份证就需要1.018亿卢布，市民个人要花1.77亿卢布，而2013年全市预算仅为7.86亿卢布，此外还要重新登记法人文件，修改各种文件和地图、交通信息等等，是一个相当劳民伤财的举措。

随意更改地名可以说是公权滥用行为，你可以借助于权力来命名，人家也可以借助于权力来改名，来个否定之否定，甚至否定之否定之否定。能让人永远记住的是思想，是文化。因此我们记得苏格拉底，记得柏拉图，记得狄德罗，记得列·托尔斯泰……而另外一些人物，尽管生前权力盖世，但很快会被历史遗忘的，如果人们还记得他的话，也是他的劣迹，这叫遗臭万年，历史的审判是无情的！

又见教堂

50年代很难见到有宗教活动的教堂，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有许多教堂，但在留学的五年里从来没有看见有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只在基辅旅游时进入一个大教堂看见过宗教活动，不少男女在里面做礼拜，当时非常惊奇，以为宗教在苏联已经消灭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善男信女在做祈祷、画十字！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庄

严肃穆的宗教音乐,唱诗班的歌声与革命音乐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

这次访俄,又见教堂,我说的是有宗教活动的教堂。

从马涅什广场出来,往红场方向走,在红场边上看到一座用木头临时搭起来的小教堂,善男信女进进出出,熙熙攘攘。进去一看,原来是在募捐,为重建 30 年代被炸毁的救世主教堂募捐。

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的命运值得说一说。

救世主大教堂(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颇有来头,它不是一般的宗教教堂,是为纪念 1812 年抵抗拿破仑入侵牺牲的将士而建的,刻有为国捐躯者的名字。1839 年奠基,1883 年建成。此前,1882 年曾在此上演过柴可夫斯基的“1812 年序曲”。以后在此多次举行重大的庆典仪式,如沙皇加冕、1812 年卫国战争 100 周年、罗曼罗夫王朝 300 周年等。这里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资金严重不足,教会珍宝就成为关注的对象。1921 年俄国发生严重的饥荒,当局曾以救灾为名,没收教会的珍宝,镇压反抗的神职人员,实际上,没收所得并没有用于救灾,而是直接进入国库。从 1928 年起,开始了第二轮的反宗教运动,大量查封教堂,揭取教堂装饰用的黄金,收取回炉教堂的大钟,把教堂改作生产车间、仓库、住宅和俱乐部,甚至反宗教场所,而修道院则充作监狱和教养院。

1930 年 2 月 24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处给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秘书处打报告,要求准许揭取救世主教堂圆顶上的黄金,说上面有 20 普特的优质黄金。揭取黄金后并没有予以重新装修粉饰,而是准备在这里建造一座庞大的苏维埃宫。

加里宁主持的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31 年 7 月 13 日通过决定,“建造苏维埃宫的地点选在莫斯科城的基督大教堂所在地,拆除教堂并扩大必需的面积”。

1931 年 12 月 5 日教堂被炸毁。由于建筑相当坚实,不是我们常见的豆腐渣工程,一次爆破未成,教堂继续挺立,经第二次爆破,才完全摧毁。

1930 年,诗人尼古拉·阿尔诺德(Николай Арнольд)风闻要炸毁此教堂,曾写诗“作别”:

别了,俄国光荣的守护者,
金碧辉煌的基督大教堂,

闪耀在首都上空的
 我们头戴金帽的巨人，
 ……我们没有比这更神圣的东西了！
 难道这不是耻辱，
 把“黄金铸就的帽子”
 扔在断头台的斧头之下！

决定在此教堂废墟上建一个莫斯科最高的苏维埃大厦，上立列宁的塑像，成为莫斯科第九座斯大林风格的大厦。30年代中期已经动工，1941年德国入侵，兵临莫斯科城下，遂中止。50年代还想继续此工程，没有弄成，不过直到1957年莫斯科地铁还设有“苏维埃宫站”，1959年改为“克鲁泡特金站”，这是因为在救世主教堂原址建苏维埃宫的设想最后被放弃了，改在克里姆林宫内建造。

克里姆林宫虽然是政府所在地，但可以购票进入参观。走进克宫，可以看到这座克里姆林宫内唯一一座现代风格的“苏维埃宫”，同整个克里姆林宫的风格全然不同，很不协调。

十年后重访莫斯科的时候，救世主大教堂已经挺立在克里姆林宫的旁边。这是一座非常精致的金碧辉煌的建筑，与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全然不同。圣·瓦西里大教堂外形美观，但里面的装饰相当粗糙，我的感觉是好像专为修道士的苦行生活准备的，而新修复的救世主大教堂则里里外外精雕细刻，金碧辉煌，是投入重金精心建造的。

革命前俄国80%以上的人都信东正教，因此教会是一支相当有影响的力量。争夺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共产党反宗教活动的一个重大目标。只有苏维埃政权处在困难的关头才会去求助于东正教，例如在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请东正教的领袖出来呼吁居民同心同德一致抗敌。1943年7月的一天，斯大林接见了莫斯科都主教谢尔盖、列宁格勒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基辅都主教尼古拉，高度评价了教会的爱国活动，并且询问：“我们现在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请提出来！”会见中，任命莫斯科都主教谢尔盖为大牧首，答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城市设神学院，出版教会图书，等等。斯大林懂得东正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1992年的游览中还有两个大教堂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在圣彼得堡。

10月初到了圣彼得堡。第一个去的是伊萨基大教堂。本来和一位老同学约

定在教堂门口会合，她陪我参观。但久久没有见到，只好一个人购票进去参观了。第一眼看到的变化是大厅正中央的一个装置不见了。为了进行无神论教育，原先在大厅中央从圆顶垂下一根长绳，悬挂着一个摆锤，因地球自转锤的摆动产生位移，以此证明地球自转，不存在神。这在许多天文馆都可以看到，不过由于此教堂高达百米，所以效果显著。现在的教堂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彼得堡旅游的一个必去之地，是彼得堡的一张名片。

伊萨基大教堂有过辉煌过去，1858年建成，是皇室洗礼之地，可容纳12000人，据说其闪闪发光的金色圆顶远在芬兰湾都可以看到。1928年改作反宗教博物馆，50年代到此参观是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教堂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雕塑、祭祀法器、藏书，等等。德军围城期间，如何保存这些文物是一个大问题。有一个传说，有人建议不必外运隐藏，此教堂是列宁格勒的重要地标，德军不会轰炸，一旦炸毁，他们的空军和炮兵就会失去地标，所以文物就留在教堂里了，最后果然没有遭到轰炸。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实际上当时给整个教堂披上了灰色的迷彩伪装，才得以躲过劫难。在教堂的一面外墙上至今还留有弹痕，成为旅游的一个看点。

伊萨基大教堂在50年代就是可以参观的，在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庆的时候，曾经修饰一新。1992年参观的时候不许拍照。我刚举机想拍照，一只大手就挡住了镜头。不过再过十来年只要交几个卢布就可以随意拍了，这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不仅如此，2001年重游故地，买一张票可以爬楼梯登上43米高的教堂鼓形层，俯视全城，这是我在列宁格勒五年也没有享受过的。登高远望，对面是圣彼得堡大学，它旁边是普希金广场，是当年上学必经之地。再远点是我们住了五年的梅德林斯卡亚49号宿舍，换一个方向，可以看到冬宫，涅瓦大街，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

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另一个大教堂是彼得堡“救世主滴血大教堂”。1992年还在修缮，不对外开放。我的一位学艺术史的女同学阿丽雅，在俄国博物馆工作，由她领我进去参观了一番。里面正在装修，地面和围墙正在用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铺设，围墙上面在镶嵌圣像和各种图案，地上堆满各种建筑材料。阿丽雅告诉我，装修在80年代末已开始，进展缓慢，现在正在加速进行。

教堂是为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修建的。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格里涅维茨基炸死，第二天当局决定，在沙皇流血的地点建造一座教

堂,所谓滴血教堂指的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血。教堂修建了24年,于1907年建成,可容纳1600人。在20年代末掀起的反宗教热潮中,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1930年10月30日决定关闭该教堂。德军围城期间破坏得很厉害,这里曾被用作停尸房,停放牺牲的官兵和居民的遗体。战后60年代初在圆顶里还发现有未爆炸的炮弹。教堂一直由小歌剧院租用,没有对外开放。正因为如此,在50年代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参观过。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君主,1861年进行农奴制改革,解放了农奴,是为俄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农奴制改革后,亚历山大二世又进行了地方自治制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国民教育改革,等等,为促使俄国走上现代化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81年3月1日早晨,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批准洛里斯-梅里科夫的宪法草案,他对两个儿子说,“我不讳言,我们正走宪政之路”。他的遇刺身亡中断了俄国的立宪道路,其继承者采取了许多反改革的措施。过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1905年的革命才迫使尼古拉二世回到立宪道路,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能够实现君主立宪,就爆发了二月革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颠覆。当然,作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具有两面性,他需要保存和巩固他的罗曼诺夫王朝,因此尽管他搞改革,却不能容忍那些试图推翻罗曼诺夫专制王朝的革命者,蓬勃兴起的民粹运动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措施,1877—1878年举行了193人审判案,流放、处死了一批革命者。俗云有压迫,就有反抗,亚历山大二世曾多次遇刺,都幸免于难,因此每次出行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刺这一天出行时也临时改变了路线,让守候他的民意党人落空,不过沙皇还是被及时追踪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民意党人格里涅维茨基引爆了炸弹,第一次沙皇并没有受伤,随从劝他赶快撤离,但他不仅没有撤,反而下车说要看看伤者。他转身看到了刺客,问道:“是你想杀我么?”话音未落,第二颗炸弹爆炸,亚历山大受致命伤,在冬宫逝世。历史是吊诡的,民意党人为美好的社会(他们也把它叫做“社会主义”)而献身,亚历山大为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结果,刺客与沙皇同归于尽,杀了一个改革的沙皇,来了一个保守的沙皇,俄国的历史进程就这样被延误了许多年。

在莫斯科游览到处可以见到修葺一新的教堂,甚至在俯首山胜利广场旁边也有一个教堂。它的位置很巧妙,人们参观了牺牲了几千万苏联人的卫国战争纪念馆之后,会不由地步入教堂,倾听为死者奏出的安魂曲,为世界和平祈祷。

人总得有所信仰,有所寄托。过去信仰马列和共产主义,甚至把某些领袖当作神来膜拜。现在在原苏联这片土地上,马列被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被否定,精神寄托何在?于是宗教发挥作用。

一位在圣彼得堡农业大学教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副教授,我的同学塔季扬娜说,在她那个哲学教研室里没有人不去教堂的。她本人至少可以肯定不再是无神论者了,虽然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信教。她曾遇车祸,小车翻了几个个,但无人死亡,一周后都没事了。神父说这是多亏神的保佑。现在有小汽车的人都把车子送到神父那里接受洗礼,以求上帝的庇护。很多人都信特异功能,用以治病。她本人也学了一些,还给我做了表演。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虽说是唯心的,但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摧毁的,只要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求助于宗教,以求心灵的慰藉就是一条人们常选的道路。在苏联,不仅一般平民百姓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连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等在斯大林手下也有朝不保夕之感。宗教被明令取缔,但人们心中的信仰是很难以剥夺的,外部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并没有能够取代老百姓的东正教信仰。不要说摧毁宗教,就是摧毁宗教活动场所的教堂,也不会一劳永逸。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旦统治者失去手中的暴力,教堂还是会重建的。戈尔巴乔夫的 перестройка,中文译作“改革”,其本义是“重建”,别的没有重建成,倒是包括救世主教堂在内的一批教堂重建成了,一些被挪作别用的教堂也恢复了本来的功能,个中含义颇值得玩味。

短缺的社会

按照捷克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

赴俄之前,一些留苏的同学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那里江山变颜色后,同学们是否安全,另一个是俄国物资短缺,同学们是否饿肚子,要我给同学们带食品去,这是因为我们有过三年饥荒的切身感受。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能够解决俄国的经济问题,经济越来越紧张,市场越来越萧条。叶利钦接手的是一个经济紧张、物资短缺的社会,不过居民并没有饿肚子,没有出现我们60年代初那样的人人面有菜色,个个浮肿的景象。商店里可以买到牛奶面包,只不过不像过去那样随时都有,商店一旦上货,马上会排起长长的

队伍。好在俄国人排队的传统，他们排起队来有耐心，守秩序，不会有人“加塞”！

物资短缺是俄国常有的事。在苏联时期，50年代购只手表也要排长队。不过，那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物资供应是有保证的——这是历史上的两个首都，怎么也得保证供应。暑假去南方旅游，南方城市牛奶、黄油、香肠的供应就相当紧张，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苏联30年代搞全盘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而且消灭了全体农民，把他们变成集体农庄庄员，但是并没有能够解决粮食问题，直到50年代初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913年沙俄时的水平，这也正是赫鲁晓夫发动开垦荒地运动的原因。对开垦荒地有各种议论，不过到50年代末我们离开苏联的时候，市场上的牛奶、面包、香肠等等的供应确实有很大的改善，进食堂就餐，黑面包已经免费供应，仅此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莫斯科仍然像过去那样熙熙攘攘，没有萧条的感觉。不过经常看到一些老人拿出家中的旧物摆地摊出售。大商场百货公司都张贴着“禁止在店内私下买卖”的布告，但正是这些地方倒卖盛行。在“儿童世界”百货商场入口处，两旁整整齐齐地排着妇女和少年，手里拿着儿童用品和玩具兜售，他们并不喊叫，只是默默展示手中的商品，很有秩序。一说警察来了，立即一哄而散，淹没在人海之中。这是商店里的“游击战”！俄国的望远镜是很有名的，但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出售，我的一个观剧镜就是从“游击队”手中买来的。

小商铺到处都是，以小商亭居多。卖烟的国营商亭面前经常排着长队，多数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贩来到街头倒卖。

红场对面的古姆百货商店是莫斯科最著名的一家商场，现在走进商场恍如进入西方的商店，里面一个个商铺出售西方的各种商品，从时装到化妆品应有尽有，连标价也是美元、法郎、马克，很难找到俄国自己的产品，也许只有冰淇淋是他们自己的。

到莫斯科期间适逢实施证券私有化。所谓证券私有化就是把国营的和地方所有的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当然不是全部企业），办法是将其全部资产作价为14000亿，以证券的形式分配给每一个居民。当局提出平民主义的口号：“财产归还人民”，“使全体劳动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

搞私有化是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提出来的，后来出现几个私有化方案，最后实施的是时任总理丘拜斯的方案。按此方案，每一个居民，不管大人小孩，只要在储

蓄银行存 25 卢布,就可以得到一张价值 10 000 卢布的私有化证券。证券不署名,因而可以自由买卖。按丘拜斯的说法,一张私有化证券可以买两辆“伏尔加”小汽车,实际上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说,把国有企业作价分配给每一个居民,确实有点像把国家财产归还给人民,而不是转给一小撮人,是个公平合理的做法。但是对多数不懂经济的居民来说,拿了这张私有化证券,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有的以低价出售,有的用它作为购房的补贴,有的拿去换家具,有的更拿它去换伏特加酒喝,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充斥报端。

私有化证券的票面价值是 10 000 卢布,但市场上,10 月 12 日的收购价为 4 000 卢布,10 月 24 日为 10 美元,如果是大批的可以卖到 20 美元。那些有钱有权的工厂主、企业主、苏联时期的在册权贵以及发了国难财的人可以利用这机会以低价收购这些私有化证券,这样他们就迅速成为企业、工厂的控股股东,特别是那些盈利的企业。

我离开俄国的时候,证券私有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其结果如何还不清楚。不过,造成一个富有的私有者阶层,是搞证券私有化所追求的目标,这是没有疑义的。俄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既然苏联解体本身并没有能够产生出这样的阶层,那就需要制造出这样一个阶层。

虽说江山已经变色,但人们的心态并没有转过来。俄国的头巾是很有名的,是带回国送人的好礼品。这时候已经不多见了,但还可以碰到。有一天在一家商店见到此物,要了五六条,但是不巧口袋里带的卢布不够,我告诉女售货员,钱不够,她一听,满脸不高兴,不容分说,收回了头巾,指着自己的脑袋对我说,买东西要有脑袋。本来此事处理起来很简单,钱不够买六条,也许可以买两条三条,这样还可以做成一笔生意。大概在社会主义国营商店呆久了,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张口就训顾客,这是短缺经济下常见的现象。我等她处理完了(销了开出的条子),平静地对她说,要学会做生意,不要教训顾客! 20 年代初列宁就倡导“学会做生意”,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还是没有学会!

到一些学者家中做客,拿出来招待的几乎全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土豆、苹果、果酱等。科学院历史所特鲁坎教授是我在德国开会认识的,到他家访问,他只能请我吃自己在别墅地上种的土豆和个头很小的苹果。米丘林的苹果在我国 50

年代很有名气,学校课本上不断提到,实际上我在苏联求学的几年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又大又红的米丘林苹果,如果有的话,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也有从我国进口的。也许是气候的缘故吧!教授反复强调这都是绿色环保的食物,无污染,我去他家几次都没有见到他的夫人,说是到别墅去伺候自留地了。双休日在莫斯科很难找到人。学者们绝大多数都到城郊的别墅或园地去干活了。时值金秋,他们都忙着去采摘苹果,收藏土豆,熬制各种各样的果酱,制作果汁,以备过冬之需。一小块土地上的收成通常够一冬食用。特鲁坎教授自我解嘲说,我们这是真正共产主义生活,五天脑力劳动,两天体力劳动。往往有“不速之客”光临,因此老两口儿得轮流在别墅守着,以防不测,这种情况过去是没有的。不过他们家里现代化设备倒是不少,微波炉、煮咖啡机等等一应俱全,这是他到国外开会带回来的,他一边煮咖啡一边说,谁说资本主义不好,你看这些东西都很有用,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为我所用啊。他这说的自然不只是指这些先进的生活用品。到彼得堡的一位同学伊琳娜家,她请我喝咖啡,没有白糖,只能用一种不知名的蜜糖替代。据说,俄国人家里都有电冰箱,里面堆满了各种食品。不过对访问学者来说,就比较艰难了,由于莫斯科大学宿舍里没有电冰箱,买了牛奶必须一次、最多两次喝完,否则就变质了。

在莫斯科到各单位访问,一般都是只接待谈话,他们很热心回答各种问题,但谈完即送客出门,就是到午饭时间也不会留客吃饭的。这是很好的做法,不像我国洋人来访必设宴招待。不过那时的莫斯科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街上饭堂少了,很难找到,因此外出访问午餐经常没有着落。好在莫斯科的冰淇淋并不短缺,并且和50年代的一样美味,可以以冰激凌充饥,在访俄期间冰淇淋着实吃得不少。由于活动得多,饮食往往没有着落,食无定时,两个月下来,体重减了5公斤左右。我开玩笑说,下次要组织一个减肥团到俄国旅游!

社会分配不均日益严重,脑体倒挂相当严重。某电子研究所一位从事研究30多年的高级研究员,因工资实在太低而改行当清洁工,结果收入大大高于研究员。

今年俄国取消了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免费医疗。工资下降而医疗费用却飞涨,使广大知识分子(而且不仅知识分子)有病无法求医。著名卫国战争史专家萨姆索诺夫,前几年在史学界相当活跃,因得心脏病无钱装起搏器而不幸身亡。还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心脏病外科大夫,他的手术刀曾救活许多濒临死亡的心脏病人,而当他

本人需要更换起搏器时无钱购买。最后经德国报纸呼吁,由德国同行捐助才算救了一命。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一教师年初挨了一闷棍,脑部受伤,当时免费动了手术,现需作第二次手术,医院已改为收费,至今不知怎么筹措这笔费用。

境况最糟的是领养老金的人。圣彼得堡农业大学一副教授,也是我的同学,几年前退休,每月仅有1500卢布的养老金,根本无法生活。现上半班,全班为80课时,半班是60课时,工作量大,而工资只有一半。我同彼得堡大学宿舍一清扫女工闲谈,她退休了,一个月退休金仅1300卢布,现在只得再到宿舍当清扫工,每月可得200卢布。

物价贵吗?我的笔记本上记有1992年9月3日看到的价格:

1美元=210.50卢布(注意:这是重要的参照系)。

西红柿——30—40卢布(公斤,下同)

葡萄——150卢布

桃——150卢布

西瓜——15卢布

猕猴桃——50卢布(一个)

百事可乐——30卢布(一瓶)

啤酒——30卢布(一瓶)

俄国伏特加酒——110卢布(0.33升)

比萨饼——44卢布

证件快照——28卢布

电影票——20卢布

剧院票——20卢布

列宁墓存包——2卢布

折成美元,这样的价格比我国的物价要低得多!

简单点讲,自改革以来俄物价上涨约100倍,尤以近年为甚,然而工资仅上升10倍。过去教授月工资为400卢布左右,而现在(9月)为4000卢布。如以美元折算,俄物价甚至低于我国,但相对于他们的市场价格,工薪阶层就不免叫苦连天了。在莫斯科大学学生食堂一顿午餐就需30—50卢布。9、10两个月期间工资提高50%,教授可得月薪6000卢布,但物价上涨了2倍,生活更困难了。在圣彼得堡俄

国博物馆工作的同学阿丽雅说,现在工资只能全部用来购买食品,没有余钱购买其他必需品了,这种情况如再延续3—5年,我们就都无衣可穿了。

俄国人还没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街头可以见到出售鲜花的小亭。在一个饥饿的城市是不会有鲜花出售,也不会有人购买鲜花的。鲜花,给人以希望!

大学宿舍和电话

我是莫斯科大学的高访,到了莫斯科就住进了莫斯科大学宿舍。

50年代路过莫斯科都安排在莫斯科大学宿舍居住。那时的莫斯科大学是苏联最好的大学,宿舍是一个单元住两人,每人有一间单独的房间,全天热水供应。那时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列宁格勒大学的宿舍里往往是一个房间住四五个人,有的还要多,洗澡必须去外面的大澡堂。

这次住进莫大宿舍,第一个感觉是显得非常破旧。电梯口的设施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因为学生们怀疑房间里的一些设备是监视他们的,所以就把连接到位于电梯口的管理部门的一些设备都给捣毁了。过去每一层楼口都有一位管理员值守,现在没有人管理了,信件随便摊在一张桌子上,自己去找。

莫大宿舍有一层是专门留给中国留学生住的,被叫做“唐人街”。把中国学生集中在一层,自然便于管理,但是住在这样与其他学生隔绝的“唐人街”,首先语言的学习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当年住的列宁格勒大学的宿舍梅特林斯卡亚49号是专门供外国留学生住的,住着东欧和亚洲各民主国家(那时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同时也选派一些苏联学生和我们住在一起,以便于交流,特别是学习俄语。

宿舍的设备相当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和柜子,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机,还像以前一样有一个小喇叭,可以听广播。整天有热水供应,作为住所,也还过得去。莫斯科全城都有24小时的热热水供应,这是苏联时期留下的福利。

宿舍里蟑螂成灾,所有食品如敞开存放,就会有大量的蟑螂爬过来分享,所以无论什么食品都必须密封保存。宿舍管理当局也知道蟑螂为害,曾经实施过喷药灭杀。那一天只见房间、走廊到处是躺着不动的、垂死的和死亡的蟑螂,还有在地上挣扎、爬行的。难以想象,这个大楼里究竟有多少蟑螂。

走廊和学校大厅的大理石上有另一番景象,就是随处可见口香糖的遗迹,一块一块的很像趴在地上的蟑螂,看了很不舒服。

宿舍的房间里没有电话,非常不方便。

莫斯科的电话非常发达,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排排的电话亭,打电话也非常便宜,仅需 15 戈比,在莫斯科大学只要 2 戈比。打电话不成问题了吧?非也。那时物价飞涨,戈比已经被贬的一钱不值。商店对我们这样的人,根本不给找零,他们只给那些俄国老太太找零,那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由于手头没有戈比,只能对着电话亭干瞪眼。莫斯科大学四门外都有电话亭,我见到有一个电话亭里有人用砖头砸某个地方,据说砸通了可以打长途。在莫斯科你到某单位去访问,必须先电话预约,否则,对不起,不会接待的。为了打电话,有时只好步行到我国的大使馆去打,好在使馆离莫斯科大学不远,穿过大学植物园就到了,那里的电话是免费的。打长途电话必须到市中心的长途电话楼去,那里需要排长队等候,同彼得堡同学联系,只能去那里。整个莫斯科都在抱怨打电话不方便,据说有一个城市干脆取消话费,公用电话全免费,有人建议莫斯科市也采取同样措施,但未见下文。

有一个打电话的非法途径,就是到一位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房间里去打。访俄前,工运学院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叫刘红的莫大的研究生。这位中国研究生学农,是我在莫大遇到的真正认真学习的学生,她把爱人接来,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两口子一道做学问,相当勤奋。小两口待人真诚,我遇到什么事都找他们帮忙。在他们的房间里不知哪位以前的住户私下接通了校图书馆的电话,晚上图书馆关门,可以利用这个电话同外界联系,不过只能在晚上借用,白天打此电话会露馅。那年代,众多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设法赚钱,有的陪团,做导游和口译,有的到市场去练摊,都想利用出国的机会赚点外汇带回国。像这对夫妇这样埋头学习的确少见。可惜回国后这些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想来已经都是教授了。

地铁“惊魂”

莫斯科的地铁世界闻名,一个特点是深,第二个特点是美,还有一个特点是鲜为人知的,这就是使用了大量劳改犯的无偿劳动,用当时的话说,使用了“富农分子”的劳动力。

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人想在莫斯科建造地铁,20 世纪初,莫斯科的有关部门决定建造地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止了建造的计划。1931 年,联共中央全会听取卡岗诺维奇的报告后决定在莫斯科修建地铁。进展相当快,到 1935 年已

经通车。这自然得益于大量劳改犯的无偿劳动。在斯大林时期,古拉格(苏联的一个负责全国劳改营的机构)是苏联经济的基础之一,那时几乎所有大型建筑工程都使用劳改犯的劳动。这当然为国家省了许多钱,不过也是巨大的浪费,因为劳改犯中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高级技能,而在古拉格往往被当做一般劳动力使用,充当粗工而已。

莫斯科地铁的富丽堂皇是世界闻名的,许多地铁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全长300多公里的地铁有186个车站,其中44个是公认的文化遗产。我见到的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的地铁都无法与之比拟。

莫斯科地铁建成不久,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首都岌岌可危,政府机关往大后方疏散。1941年10月15日,莫斯科市委书记卡岗诺维奇下令做炸毁地铁的准备。10月16日地铁整天停运,这是莫斯科地铁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好在当天晚上取消了炸毁的命令,莫斯科地铁得以保存。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地铁发挥了大防空洞的作用。据统计,在战争期间共有217人诞生在地铁,他们护照上骄傲地写着:出生地——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的交通非常便宜,一张月票120卢布,可以乘坐地铁、公共汽车和电车。在莫斯科出行,距离长的坐地铁,剩下的距离乘汽车或电车,非常方便。上下地铁都有电动扶梯,换乘不用上上下下地跑,行走线路较短而合理。这比后建的北京地铁好多了,也许为了省钱,北京的地铁在转乘时经常让你爬上爬下,有的站上行有扶梯,下行就没有了,乘地铁成为老年人的畏途!当然,莫斯科的交通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和地铁不同,他们的公共汽车和电车是不报站名的,往往让不熟悉的人坐过车站。

相比之下,彼得堡的地铁修建要晚得多,50年代末才通车,这大概是因为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的彼得堡河道纵横,修建地铁需穿过涅瓦河等各种河道,施工有相当难度。50年代通车的只有一条线路。车站修建得相当朴素,没有什么装潢,和莫斯科不同的是一开始站台上就设有防护墙以保安全。

彼得堡的有轨电车继续运行,去郊区各旅游点如普希金城主要靠小电气火车,和50年代比没有什么变化。公共汽车破旧而且稀少,这是因为得不到更新。苏联搞“国际分工”,列宁格勒的公共汽车是由匈牙利生产的,现在匈牙利不供应了,无法更新,只好减少班次,用破旧的车辆来运客。街头有一种可以叫做议价车的小公共汽车,收费6卢布,车子新,服务也好。

我50年代上学的时候,宿舍在梅特林斯卡亚49号,就在彼得保要塞的旁边,每天去历史系走过建设者大桥,经过美丽的普希金广场,拐个弯就到了,非常方便。这次去彼得堡大学访问,住在造船者大街的新宿舍。这造船者大街一带是后来填海造出的陆地,可以说是纯粹的列宁格勒的土地,离城中心相当远。往返一般都得乘地铁,其终点站离宿舍还有一站多的路程,需要步行,不很方便。

一天访友回得晚了,照例乘地铁回住所,离终点站还有一站,突然乘客下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人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这使我大吃一惊,不禁毛骨悚然。不过静下来一想,一个人都没有,倒反而安全了,车子反正得继续前行,开到终点站。如果车厢里还有两三个人,他们又不怀好意,那才糟糕呢!下了车,接着步行回宿舍。在北国的雪夜,走在静悄悄白皑皑的雪路上,别有一番风味,这是五年求学期间都没有体验过的。那时候莫斯科的安全环境比较差,彼得堡则安全得多,果然如此!

另一次“惊魂”是在大白天,去看望一位从事考古的同学,都快到了,地铁列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纷纷下车,我继续坐在车上,以为像上次一样,那些乘客到站了,对他们的下车并没有留意。等一会儿车子开动了,但车厢内的灯却暗下来了,开到一个什么地方,不动了。我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车子如果在这个车库里停上一天,可就要遭罪了。我找到对话的按钮,大声呼喊,却没有人回应。好在过了约莫十来分钟,车子启动了,回到原来的车站,这才算解困了。

还有一次是在莫斯科,不过已经是2002年的事了,就一并说一说吧。那天傍晚从市中心返回莫斯科大学住所。地铁开到文化公园附近,车子好像开不动似的,开得慢悠悠的,车厢里的灯光时明时暗,乘客们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惊不乱。车到文化公园,传来广播,说车不走了,请大家下车,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出了地铁,站口已经挤满了人,由于地铁列车一趟一趟接连开来,站口的人就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公交车要运走这么多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巧的是天还真是在下雨。一家报纸的记者约定要来采访,心头非常着急。正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来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得知是中国朋友,她自告奋勇帮我们想办法,不久她果然给我们拦下一辆小轿车,让我们上去。车内已经有两人坐着,加上我们共4名乘客,这是辆私家车,我告诉了要去的地方,司机把我们送到了莫大宿舍,要了180卢布的报酬。

在莫斯科私家车载客是常有的事,路上招手可以叫到,只要你去的方向和车主

一致,他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载客的私家车。这次就靠这辆私家车摆脱了困境。不过约会的记者并没有来,我应当想到,在地铁停运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来访的。

一个以地铁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地铁一旦瘫痪,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经历这次遭遇,对此深有感触。

书市漫步

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下降原因之一是出书难。关于“改革”、“新思维”、“空白点”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图书已是明日黄花,读者不关心,书市上很难找到。出版社找能赢利的书稿出版,学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社。原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已改名为俄国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其研究人员整理了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已在出版社压了一年多。问题不完全在出版社身上,它们资金缺乏,财政困难,开不出稿费,怎敢做赔本生意。新闻出版社想出一个高招,把来稿的书目先送到德国去征订,如德国人感兴趣,先译成德文出版,作者有了用马克支付的稿酬,就可以用以补贴在俄国出版的费用。但此类书毕竟有限,并不能使俄国的出版界走出困境。

莫斯科人依旧爱读书,在公共汽车上、地铁车厢里,都可以看到手捧书卷阅读的人,甚至在地铁的上下行电梯上也可以看到有人打开书本读书——莫斯科的地铁由于深入地下电梯很长,尽管速度较快,也还有时间看上几行。

书店的外表一如既往。特维尔大街(原高尔基大街)上的书店的橱窗玻璃上仍然写着各类图书的广告,包括马恩列著作,书店内马列像依旧挂着,但马恩列的著作已经少见。谈改革的著作一度是热门书,现在书店里也难看到了,改革已经渐行渐远,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这类书只在街头、地铁的书摊上能够看到,都不太贵,大概因为人们已经不关心这个话题了,贵了更没有买主了。

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个书摊上竟然看到斯大林的一本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地球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书的封面上印着“Памятник Эпохи”(“时代的纪念册”或“时代的墓碑”)颇有创意。历史上的各种书籍,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只要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应当让它保存下来,供人们阅读和研究,禁书不是办法。这样的版本确实值得收藏,无奈此书家中已经有多种版本,担心书架“爆

满”，其他图书无藏身之地，只好割爱。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补天而无力回天，这是他的悲剧。书摊上评论戈氏改革的书不时可以看到，此类书往往都是戈氏的战友、同事撰写的，带有检讨、批评的性质，如原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的《改革：背叛的历史》，新闻出版社1992年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了。还可以看到雅柯夫列夫、索布恰克等人的著作。这两天《独立报》连载卢基杨科夫的《铁窗内的访谈》。总体上看，都是在反思过去。

西方克里姆林宫学专家B.索罗维耶夫和E.科列尼科夫合著的《鲍里斯·叶利钦》，也是今年的新书。这是克里姆林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他两部是《尤里·安德罗波夫：走向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历程》和《在克里姆林宫：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作者自称，这三部曲都是反克里姆林宫的。

一些过去难以见到，更难以买到的历史性著作现在纷纷重印，如《路标》，施略普尼柯夫的《1917年前夕》。

苏联解体前后，出现过布哈林热，后来又出现托洛茨基热。因为最早挺身而出反对斯大林的是托洛茨基，并且一反到底，始终不渝，被俄国史家认定是苏联最早争取党内民主的斗士。

近年来论述托洛茨基的论文相当多，但专著不多见，毕竟写一部书需要更多的时间。直到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才见到两部俄国人撰写的托洛茨基传。一部是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著的两卷本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这是作者撰写的三部曲之一，此前已经出版了《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其实此书名译作《凯歌与悲剧》更为贴切），稍后又出了《列宁——政治肖像》。书摊上还有历史学博士H.A.瓦谢茨基撰写的《托洛茨基——政治传记习作》。这两部书都是在1992年1月签署付印的。与此配套的还有瓦谢茨基编的托洛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史》，其中收进俄国读者以往根本看不到的20年代曾引发党内争论的《新方针》、《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文章。这是20年代以后首次在俄国重新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书中还收入像“致齐赫泽”、“致乌里茨基”这类并无代表性的私人信件。看来编者还想要强调托洛茨基是反列宁的。我接触到的一些历史学家都对瓦谢茨基的著作表示“不感冒”，原因是他在马列研究院工作时，写过不少激烈批判托洛茨基的论著，现在不免有赶浪潮之嫌。其实，由于在马列研究院工作，他是

最早能够接触到有关托洛茨基档案的少数学者之一。我没有读过此书,不敢妄评。不过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问题总算在俄国解禁了,可以公开议论了,说好说坏再也不受限制了,这是好事。

10月初到彼得堡访问。涅瓦大街上的“书屋”书店还在原地经营,这是彼得堡最大的书店,里面的图书仍然摆满书架。这里的特点是马列经典著作与宗教图书并排放在书架和书柜中,两种“经典”并列,和平共处。苏联在20—30年代查禁和焚烧过宗教书籍,书报检查机关也曾经明令禁止出版宗教图书,50年代我在列宁格勒读书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书屋”有宗教图书出售。目前的景象不禁令人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秦皇时代图书并不多,应该比较容易烧光的,但是还是烧不尽,仍有不少漏网之鱼。文化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以对异教徒及其文化的迫害,还是我们“文革”的“破四旧”,虽然无可挽回地毁了很多文物、图书,但是并没有能够中断文化的延伸和传承!

在莫斯科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摆地摊出售旧书,这是一座金矿,有时可以掏到非常罕见的珍贵旧书。莫斯科大学门口的台阶上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摆了个地摊卖书,都是社会科学的。我在他那里买了几本书,如《布哈林文选》、《恰亚诺夫文选》(恰亚诺夫是苏联的著名农学家,20年代末开展集体化之前,莫洛托夫还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但1929年斯大林就公开点名批判他,30年代遭镇压)等,他记得我,每当我路过都向我推荐图书,有时还攀谈几句。他说,苏联解体之后有些学者改行,就把一些过去珍藏的旧书拿来出售,换几个卢布补贴家用,他有这方面的朋友,如果需要什么书,他可以帮我找。问我马恩列斯的著作要不要?《俄国革命人物传记》要不要?这是从20年代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复印来的。我在80年代曾经组织翻译了其中四五十人的自传,都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编成一本《十月的群星》,南方一出版社曾准备出版,因1989年“政治风波”中止未成,稿子至今压在抽屉里。^①在他的书摊上发现有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到的马赫、阿芬那留斯、亚·波格丹诺夫等人的著作。我从他手中买了一批此类珍本书。整整装了两纸箱,我回国是乘飞机的,书太沉,带不了,把书交给一位乘火车回国的同事托运,很可惜,在过境时据说缺一个什么手续,没有能够过关,这些书就

^① 2017年此书以《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的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扣留在俄方边界了。苏联时期旧书出国是严格控制的，苏联解体后在混乱中有所放松，但这次丢书是真的由于“手续不齐”，还是另有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辛辛苦苦费两个月时间收集的图书大部分就这样丢失了，同时丢失的还有那位同事自己购买的图书、画册，等等。这些书如果烂在边境，那就太可惜了！

书摊上摆放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图书，科幻、侦探、间谍的图书占的比重很大，色情的图书也公开摆出。在彼得堡的一个地铁站口，有一个书摊摆放着进口的色情画刊如《花花公子》等，摊主生财有道，画刊供翻阅，每翻阅一本收费5卢布。

这都是新的文化现象。说到文化不能不提一下电影一类的其他艺术。

1992年的莫斯科，苏联电影很少见，电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的电影，以法国、美国、意大利的居多，配音很简单，有时一个人配下去，不分男女。我想找俄国国产电影，主要想听纯粹的俄语，但找不到。票价不贵，20卢布。色情电影随处可见。也许看多了，观众并不为之疯狂。有一部名叫《性奴》的电影，相当露骨，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放映，观众寥寥无几，既有青年大学生，也有白发教授。

剧院照常演出，我去剧院看了一场舞剧，票价竟然与电影一样，也是20卢布，这是要好多活生生的演员表演的呀！演出结束后，上台献花的粉丝们各找自己喜爱的演员送去，并不管主角还是配角。

展览馆、博物馆照样开放，莫斯科的特列嘉柯夫画廊、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彼得堡的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俄国博物馆，参观的人像以往一样多，很多家长带着子女来参观学习。票价像我国80年代那样，实行双轨制，外国人的票价大大高于本地人。例如艾尔米塔日的票价本地人大概10卢布左右，而外国人却要800卢布，叶卡捷琳娜宫也是如此。同学伊琳娜在德国人包围列宁格勒时呆在城内，享受免费参观的待遇。围城时的列宁格勒居民都享受某些特殊待遇。

火车票也是双轨制。我从莫斯科去彼得堡，到车站购票，也许因为售票员没有注意，给了我一张普通价格的车票，等到返回莫斯科时，售票员要我出示护照，购买外国人的车票，价格就不一样了。

油画和街头画像

俄国的油画是很有名的。俄国画派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新中国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油画家是由来华讲学的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举办的油画训练班和列宁

格勒的列宾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的著名画家如罗工柳就在此艺术学院学习过。

俄国画家那严谨的写实风格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和欣赏,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看得懂他们的画,知道画家所要传达的信息,认可他们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直到今天,到俄国访问的人都以带回几幅俄国油画,把它们挂在客厅、书房为乐事。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其价值显然不在俄国“套娃”之下。恐怕不仅对中国游客来说是这样,对西方游客来说也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就有好几个大小不等的油画和工艺品市场。有三个去处是最有名的。一个自然是众所周知的阿尔巴特街,这里的艺术品是以“老外”(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为目标的,其次是伊兹梅洛沃公园,这里要大众化一些,价格也便宜一些。再就是位于文化公园附近的画廊,它一半开设在一个地下通道,一半开设在广场的一个长廊上,地上地下都是名副其实的画廊,这里的游客较少,同阿尔巴特街上那熙熙攘攘的情景大相异趣。

俄国的白桦是举世闻名的。俄国人对白桦也是情有独钟,他们的祖先曾经穿白桦皮“草鞋”,用白桦皮写字记事。他们画白桦,唱白桦,跳白桦,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歌舞团就以“小白桦”命名。他们用白桦制作工业品,我手头就有苏联友人送的用白桦木做成的烟盒,用白桦木劈成类似麦秆那样的细丝编织成的“草”帽。苏联解体之前,莫斯科的高干特供商店也取名“小白桦”,名字起得很美,里面的货品也确实价廉物美,不过也让老百姓侧目——这种特权设施玷污了俄国人心目中的白桦。

话还说回来,几个世纪以来不少著名的俄国画家如库因吉、列维坦都有描绘白桦林的传世名作。我家现在还挂着一幅30多年前妻女用传统的俄国十字绣绣成的库因吉的“桦树林”,原作那高超的光影处理,那令人神往的俄国森林跃然画面,能勾起人们一缕俄国情思。也许正因为外来的游客对俄国到处都可以领略到的白桦林的那种爱好、情感,所以在画品市场上以白桦为题材的画几乎占三分之二以上。但是,说实在的,除了为数极少的画作以外,对多数描绘白桦林的油画或其他品种的画,实在不敢恭维,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大多是“匠人画”。在这里,俄国桦树林的秀美、灵气,或者浑厚、大气通通不见了,在俄国那独特阳光下变化万千的森林不见了,剩下的是那刻板的、千篇一律的,引不起人们任何审美情趣的几棵死板的树。

尽管我也非常想在俄国买到一幅具有俄国特色的桦林画,但是跑了几个地方

还是看不到能让人稍许满意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把目光转移到其他题材的绘画上去。正是退一步天地宽,你会看到有许多佳作在等待你去探寻、发现,因为表现俄国风光的不仅仅是白桦林,还有它的原野、湖泊、雪景、春光、花卉、静物、教堂、别墅等,目光一旦转入这一领域,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美不胜收的作品。笔者在文化公园附近就买到一幅题为“开春”的油画,那是个初春的雪景,河流开冻了,在一抹金色霞光的映辉下,远方出现如烟似雾的嫩绿,正是冬日将去了,春天将临的万象更新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俄国风光。

这幅画我一直以为是今人的创作画。2013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一个“到苏联留学”的画展,展出5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期间的绘画,突然发现有一幅临摹的油画,和我家中的油画一模一样,标签上书:齐牧冬临摹耶道古洛夫《初春》(78.5×112 cm)。这才知道这是一幅名画。回家后就去查这位耶道古洛夫是何许人,因为在熟悉的俄国画家中并未听说过此人。但是根据中文还原成的俄文去找,怎么也找不到。最后用找风景画的办法搜索,终于找到这位画家,他的俄文全名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Ендогуров(1861—1898),中文应译作“伊万·伊万诺维奇·延多古罗夫”。此人生于喀琅施塔得一位海军中将家,曾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喜欢绘画,放弃法律而专门从事绘画,是著名的风景画家,属巡回展览画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1889年在巴黎世界画展上获银奖)。因肺病英年早逝。1898年俄国三位大画家去世:风景画家希施金、肖像画家雅罗申柯和延多古罗夫,这是俄国艺术的巨大损失。

在伊兹梅洛沃公园,一般都是摆摊卖画,有挂在货架上,有靠在地上的,还有叠放在一起的,可以随意挑选。只有一家是在画室陈列出售的。迈进画室可以看到档次高一些的画作。我撇开了那些专为观光客制造的白桦画,寻找其他题材的画作,找了几幅颇有意境的山水、花卉画。此举引起售货员的惊奇,问我是不是画家,这是因为我这个老外没有冲着他们的桦树去挑选。于是她就不断地给我介绍另类的画作,她把这些画叫做创作画,显然是区别于那些千篇一律的桦树画。这样在这里也挑了几幅尺寸不大然而比较称心的油画。

同我国的惯例一样,画价是同尺寸挂钩的,画幅越大价格也越贵。所以我一看那大幅的画,那位态度相当友好的女售货员就告诉我太贵,知道我买不起。不过一幅画的好坏,绝对不是同画幅的大小成正比的。记得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参观,走

到伦勃朗的油画“夜巡”前面,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大师对光影的处理马上紧紧地吸引着我的眼球。其实在此画的旁边还有两张画幅更大的宫廷画,但它们并不引人注目。同样,在俄国寻画不必把眼光紧紧盯死在那些大幅画作上,其实有些像明信片一样大小的小油画也不乏欣赏价值。1992年,我在彼得堡就从一位年轻的画家亚历山大·波沃罗夫手中买到两幅我很喜欢的风景画,一幅画的是秋天的普希金公园,另一幅是著名的夏花园,大的比一本32开的书略大一些,小的同明信片差不多,但确实是地道的俄国风光,并且是传统的俄国的风景画派。一位中国著名的油画家王怀看了这两幅画,第一个反应就说,这是典型的俄国风格的风景画,给以颇高的评价。其实这两幅画的价格并不高,画家开口要10美元(约3000卢布),我带的卢布现金不多,还他2000卢布买下。他倒也不在乎,他告诉我,自己是列宾美术学院的毕业生,现在赶快把画卖掉,好继续去写生作画。现在,经过20多年,他也许已经成为大画家了!那时的俄国大家都生活得很困难,能有点收入就不错了。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再访俄国的时候就留心看那些并不起眼的小油画。在莫斯科文化公园附近还真的发现一些画得不错的小油画,画的是俄国春夏秋冬的风景,笔墨不多,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地道的俄国风光,是我在50年代一再见到过的、久久难忘的风光!价格相当便宜,约一个半美元一幅。可谓价廉物美了。

有的画作是在商店寄售的,放一段时间卖不出去就减价。我买了一幅瓦·波列诺夫的《池塘》的油画,是临摹品。原价600卢布,由于卖不出去,两次减价,最后以336卢布买下。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街头可以遇到给过往游人画像的画家,他们给那些俄国人,特别是俄国女郎画的像,有的还真惟妙惟肖。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曾经遇到一个街头写生画家,要给我画像。不知道他的水平如何,不想画,就推说今天没有时间,不画了。谁知第二天路过那里,这位画家立刻认出了我,硬拽我去画,想不出借口推托,想来俄国的画家一般水平还不错,那就画吧,讲好价格为500卢布就坐下了。画家告诉我,他原来在学校教美术,实在无法糊口,就干脆辞职出来在街头画像,收入比教书还多一些。在彼得堡给“老外”画肖像也许不多见,一个路过此地的中年人就举起相机照了一张,我见状也拿相机请他给我拍一张。这时发现还有两个人也在画我,也没有在意。过不多久,画完了。我取来一看,轮廓还可以,但是眼睛画得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碧眼、黄眼画惯了,不知道如何画东方人的黑眼珠,因

此一看就知道这是西方人的眼睛,而不是我这黑头发黑眼珠黄皮肤的人的!但是既然人家付出了劳动,酬金就按照约定照付了。不料这时候旁边也在画的另一个中年人把他画的也递了上来,还有一位同时作画的老画家也递上了他的画像,要我一并买下。三人的画风不同,但问题一样:画的都是西方人的眼睛。第一位画家显然同那位中年画家是一起的,拼命为他说话,要我不要去理会那个老头。但看起来最值得同情的恰恰是那位老人,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瘦个子,从它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真希望能拿到这微薄的一份钱。我想了想,拿出1000卢布,按约定的价钱给了第一位500卢布,另外500就分给了另两位画家,一人一半。等晚上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俄国朋友,他们看过三幅画像后大呼你今天挨宰了!挨宰就挨宰吧,画像这种事其结果是无法预见的,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产品,只有最后才会见分晓,有什么办法呢!认了。倒是在莫斯科红场一位艺人给我剪的剪影还比较像,价钱也便宜,仅20卢布。

买了画还有一个带回国的问題。按说,把一个当代不知名的画家的画作带出国,不是文物,不是国宝,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在苏联解体前后,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拿着登机带回国的。但是后来不行了,当局禁止旅客带油画出境,原因据说是怕一些以后也许会成名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流失。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养活自己的艺术家,又禁止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不让他们的产品出境,这就无异于扼杀这些也许以后前途无量的艺术家!俄国人的市场经济观念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为防止意外,我特意请画室给我开了证明。至于路摊上买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小油画放在箱子里,问题不大。那大一点的,箱子里放不下,又不能手提,只好取下画布,扔掉精美的画框,卷起来带走。由此想到,俄国人要搞活市场,振兴经济,非改变观念不可。旅客带一些俄国的现代艺术品回家,目的通常都是留作纪念,满足心中的俄国情结,恐怕很少有人打算用它来留待以后升值的。其实在那些俄国朋友家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书法、陶瓷、国画、工艺美术作品,有的是中国朋友送的,有的是有机会来中国访问时购买的。你一进入他们的客厅,简直如置身于国人的家里,真有如归的感觉!这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家家里陈列着俄国的油画、版画、雕塑、套娃、桌布、水晶杯等等一样。这种小艺术品的交流是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两难处境

——评俄共党纲关于苏共历史教训的总结

苏联解体的同时,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政党也不复存在。在原苏联地区成立的各独立共和国内或者出现独立的共产党,或者在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党。在俄罗斯联邦内则同时出现好几个共产党。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号称有 55 万—60 万党员。他们渡过了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在 1993 年炮打白宫事件之后,俄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参加议会的选举,并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参加议会选举是俄共一个重大的策略转变,然而仅仅迈出这一步还是很不够的。在俄共面前还摆着严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不用说,一个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的党,只有从失败中找到教训,才有复兴的希望。近年来俄共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久加诺夫在一些讲话中不断地涉及苏共的历史教训问题,但都显得零碎肤浅。1995 年 1 月,俄共三大通过的新党纲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它的第二节是“俄国的历史教训和摆脱危机的途径”。用专门的一节来总结教训,说明俄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

俄共是建立在前苏共的基础之上的,它也自认为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这就使它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从苏共那里有所继承,包括苏共的理论方针政策中的正确的东西和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同苏共的所有历史错误划清界限,这不是简单的否认、否定、抛弃,而是要认真的总结,同时对历史上的错误承担道义上的某种责任——这是一个继承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里的关键是分寸的掌握。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俄共落入了两难的处境。

对苏共的历史它不能像其他党派那样认为一无是处,骂倒一切,而必须做出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纲领肯定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空前社会成果。它指出俄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在 20 世纪,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产生了像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多民族的苏维埃联盟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前所未见的国家和社会机构。它们使这样一些人权,如劳动权、免费教育权、保健权、休息权、住房权、获取国内和世界文化的最高成就权等等,得到可靠的保障。我们的教育系统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使人飞向太空,成为全世界效法的榜样。”

这些社会成果无疑是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必须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纲领肯定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写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当时在军事、政治、经济破产,领土丢失,执政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在社会领域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自我保护的唯一机会。”

对这个起点是无可争议的。在国家面临崩溃,大难临头之际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夺取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国家夺得政权后怎么办,采取什么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追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共党纲肯定了苏联走过的发展道路,包括 30 年代开始提出的“赶超”任务,为国家工业化而加速农业集体化,但否定其强制性质和高度集中化。这里就出现问题了。首先,苏联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同高度的集中和集权分不开的,是同超高速分不开的。没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本不可能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在目标和方法上,不可能分开来肯定一点而否定另一点。其次,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加速实行”的问题。加速的办法固然不可取,但在农民或农业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是违背了列宁关于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示,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

另一方面,党纲在肯定 30 年代的“赶超”的同时,却又否定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赶超”任务,说“当提出在社会主义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时,又一次把社会主义思想简单化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越来越全面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一原则正确的口号,成了超历史的抽象。1961 年通过的第 3 个党纲的精神是回到以前的‘赶超’口号上去,即实际上回到这样的任务上:不加批

判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重复西方社会过去的模式”。

这种肯定和否定本身就陷入了自我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在劳动生产力上必须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摆在社会主义面前的一个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必须实现“赶超”,然后才谈得上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然而,这个任务直到苏联解体仍然没有完成。所以否定 60 年代的赶超任务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个任务不解决,怎么谈得上纲领所说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的解决,即在实际使生产社会化,创造同资本主义相比,新的、更高的人民生活质量,发展生产力,并在这基础上过渡到劳动集体的自治上去,对劳动施加更高的有效的刺激,为人的自由和谐的发展创造条件。“赶超”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应当清楚,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决不是可以用一两个运动在短短的几年里所能做到的。

纲领把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看作是“过时的生产力模式”,这恐怕是还没有认真地正视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可能性,而在这个论点的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观念。实际上赫鲁晓夫在 60 年代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发展,根本就没有把市场经济考虑在内。所以,应该说,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缓慢,问题不在于受“过时的生产力模式”的束缚,病根不在这里。

苏联的解体显然是同苏共本身的错误分不开的。党纲说的完全正确:“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的。”

然而在正确的命题下所作的分析却是值得推敲的。党纲说,苏共内部历来就存在对立的倾向,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民主的和官僚主义的倾向。十月革命后它们之间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由于人数众多和长期存在,“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所谓小资产阶级,而完全避开无产阶级自身的问题,这同列宁和布哈林比起来,是个退步,他们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指出了无产阶级本身蜕化的可能性,并发出过警告。

党纲指出党内存在“两翼”、“两股潮流”,它们之间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实际奉行的政治路线。“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祖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些矛盾,如群众的创造热情同 30、40 年代的镇压并存。只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才可能对像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可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

金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客观作用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在做进一步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对一系列历史人物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党纲仅仅肯定一个领袖——安德罗波夫,说“1983年安德罗波夫开始改革国民经济的管理,着手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一创举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诸如生产自治、选举民主化、言论和结社自由这样的政治方针,就是今天也不能予以拒绝”。对其他人,党纲的评价就截然不同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要对背叛党、无视民族利益、摧毁我们的祖国承担个人责任。”

苏联的改革,起因于斯大林时期推行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带来的后果,包括因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造成的畸形发展的国民经济,对农民的长期剥夺,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的盛行,缺乏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苏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已深感这种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作了多次的改革尝试。应该说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的代表。这里问题不在于个人,而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党内广大党员的要求和愿望。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错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但不能由此不加分析地用一句话对他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多次见过一些曾站在历史的潮流前面的人物最后被历史所抛弃的事例。对苏共的某些人也可作如是看。

俄共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它所处的两难处境。它需要强调对苏共的继承性,但又想同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因此就把过去的错误推给某些“叛徒坏蛋”。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未必明智。既然认为自己是苏共的合法继承人,那么他所继承的就应当既包括其正确的东西和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其所犯的 error,甚至罪过。仅仅强调光荣的传统是不够的。说要对过去的失误和错误承担必要的责任,特别是道义上的责任,并不是要揪住历史的错误不放,而是说,一个严肃的党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以后重犯这些错误。这里的困难是如何去分清是非,做出合理的解释,求得广大群众的谅解,从而再次获得群众的拥护。

在这一点上,其他一些政党和派别,例如社会民主派别的处境就要有利一些。它们可以割断同过去的联系,对过去的一切不负任何责任。1994年6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及俄罗斯这一流派的前景讨论

会上分发了一份供讨论的《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前景》的提纲。提纲也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其中指出,十月革命后头几年的实践已经表明,指望俄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是一种乌托邦。生活促使批判地重新评价革命口号,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新经济政策、和平共处等。但是俄国存在过的“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斯大林的热月而丧失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的变种“兵营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执政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国家的现代化的任务”。提纲肯定,苏联70多年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德国,并在战后成了强大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也揭示了企图用反民主的方法建立公平繁荣的社会是无望的。在6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速度已开始下降,科学技术领域不断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同西方的差距拉大。提纲认为,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冷战”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的结果。“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没有竞争力的经济政治体制,它们限制了对劳动和自由创造力的刺激”。提纲指出,斯大林逝世以后出现了改革苏联体制的现实可能性。“赫鲁晓夫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在于揭露了它的极权性质,谴责了大规模镇压,强调经济要满足迫切的社会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过,他在给予社会一点自由之后,并没有触动体制的基础。他被解职之后,解冻又被封冻所取代。勃列日涅夫恢复了斯大林制度的基本设置。在这时期,每次改革的尝试都半途而废,守旧的倾向占了上风。苏联不仅自己不改革,而且还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革新运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施加压力,以抵制寻求改革的力量。提纲给苏共二十大以积极的评价,指出在这以后主张改革的力量在逐步成熟,形成了一层人,他们不仅对斯大林的正统思想,而且对作为苏联模式的基础的陈旧的价值体系提出了怀疑。

提纲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毫不奇怪的。其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执掌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在加速技术进步和解放首创精神的口号下,奠定了激进改革的基础。经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导致对市场经济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承认;思想和政治的多元化;市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取消了极权官僚体制的基础和苏共的垄断领导,实行公开性,开始把单一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的联邦。按照新思维的原则,苏联为裁军铺平了道路并发起结束“冷战”。东欧各国人民获得了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提纲认为,改革的

重要成果之一是在国内建立了议会制的基础。出现了几十个政治运动,开始成立各种政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政党。第28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特别是得到1991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批准的新纲领草案,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这一切只是由于1991年的8月政变而中断了。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社会民主派并不寻求对苏共的继承性,对过去可以不承担责任,在总结历史的时候包袱较小,可以作为旁观者发表议论。撇开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不论,可以说他们所作的历史总结较为符合实际,至少比俄共讲的要坦率一些。当然,他们所做的总结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还得另议。但是他们摆脱了俄共那样的两难处境,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结历史教训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A.梅德维杰夫在《论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和总结教训》一文中写道:

“不理解作为理论观念、社会政治运动和现实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的危机的原因,就不可能认清社会今后发展的前景,不能正确估计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他认为,遭到失败的是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把它的某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社会保障变成了依赖别人养活,对社会过程的自觉调节变成了硬性的集中管理和全面的国家化,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结合变成了对个人需求的压制。

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更新的双重任务,必须予以解决,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一方面是消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缺点,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和背离。社会主义理论应当摆脱单维性和不容反驳的态度,不要妄想拥有绝对真理,不应有排他性——要排除一切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宗教教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新,使之同20世纪末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为下世纪初做出筹划。如果社会主义不对目前社会中的变动和文明性质的转变所产生的问题做出回答,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

至少在目前,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的重新思考的水平上,社会主义不应是一种最终完成的、硬性的结构,其中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具有单一的社会主义本性。然而,如像今天有人所讲的那样,仅仅通过价值体系去界定它,那也是不够的。社会主义既是现实的趋势,也是在全世界都在进行的社会生活的社

会化的过程,也是保障劳动者得到社会保护、社会保障,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管理的现实的社会机制。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的、根本性的、不妥协的,同时又是客观的和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仅是对它的某些具体结论,而且也是对更为广泛的、根本性的基础,包括方法论。

应该说,梅德维杰夫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及东欧各国遭到严重挫折的形势下,遭到失败的共产党,特别是像俄共这样的党,非常有必要正视历史的教训,认真总结教训,以求得再生。

《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5年第22期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社会主义观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目前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大的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失败的原因，探寻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的答案。

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失败，俄国当时缺乏一个把全国统一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为此叶利钦在1996年提出制定新的“国家思想”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思想失去支持的情况下，俄共也在努力寻找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传统结合的途径，制定出能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久加诺夫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这一问题。

1995年3月31日，久加诺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俄罗斯思想——把我国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谈话。招待会是为两本著作《当代俄罗斯思想和国家》(*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1995年俄国民族安全观》(*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в 1995 г.*)的出版而举行的。久加诺夫说：

大家都看到我国所处的局势，我们的社会，懂得局势已经到达危机的边缘，并在寻找摆脱戏剧性危机的出路。不管我们鼓吹过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构想，但每个人都有一系列价值观，它们具有并非一时的意义。这就是文化、高尚精神、生态、安全、健康、国家的领土完整、应有的民主交往等等。实质上我们的壮士伊利亚·姆罗梅茨目前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大车臣道路。一条是把国家变成大哥伦比亚，使政治同黑手党搅和在一起。第三条道路是民主发展的道路，它建立在俄国的国家性、高尚精神、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传统把过去和现在联结在一起，给予民族和人民以未来。为此许多专家学

者集中力量写出这两本大部头作品,我认为它们形成了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

俄国人民是团结的人民,是强国的人民,围绕斯拉夫核心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并且像历史所展示的,经过各种各样的混乱和动荡,俄国变成更巩固、更伟大、更名实相符的强国。我们也会渡过这自由主义的民主混乱时期。^①

久加诺夫在另一次题为《走幸福与公正的道路》的谈话中继续发挥这一思想。

记者问:我们的好多政治家都在谈论俄罗斯思想,有时赋予截然相反的内容。

按照您的看法,俄罗斯思想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久加诺夫回答说:俄罗斯思想的基础是两个基本价值观——俄罗斯的高尚精神,没有东正教的处世态度以及对自己在尘世的真正使命的认识,这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的强国精神,国家性。没有道德的净化,没有健全的精神,在广阔的大地上就不可能有局势的稳定。理解俄国文明的历史特点极端重要。^②

俄共正式提出一个论断,“俄罗斯思想”就是社会主义。

俄共纲领写道:“可以大胆断言,‘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久加诺夫在俄共三大的总结报告中解释说: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懂的最主要一点是,共产党人应当与人民共生存,尊重并热爱祖国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人民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我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历史继承性的坚实基础之上,并以俄罗斯的共同性、爱国主义、强国精神和人民性的文化和道德传统为依据。

可以大胆地断定,令西方感到如此神秘、如此不可理解的“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今天历史再次使我们祖国人民面对1917年与1941年那样的选择:或者是伟大强国和社会主义,或者是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沦为殖民地。^③

俄共这里说的是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有相当历史渊源的思潮。

“俄罗斯思想”一词最早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在1888年

① 久加诺夫:《我相信俄罗斯》,沃罗涅日1995年版,第219—220页。

② 《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同上书,第347—348页。

③ 久加诺夫:《我相信俄罗斯》,沃罗涅日1995年版,第204页。

首次使用的,然而关于俄罗斯使命的思想则在此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后来哲学家别尔嘉也夫和尼·奥·洛斯基^①曾就此写过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俄罗斯思想的基础是教士菲洛菲伊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历史哲学思想,他认为,在拜占庭——第二罗马崩溃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已从君士坦丁堡转到莫斯科,莫斯科是东正教徒的神圣首都,是最后的罗马。

俄学者弗·伊·柯罗塔也夫总结说:“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关于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预言的命运,也就是对“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的命运问题的回答。^②

安·尼·萨哈罗夫(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1996年在中国讲学时指出:

俄国人民今天感到痛苦的是国家解体和意识形态危机。国家疆域实际上回到了18世纪初,即彼得大帝时代的状况。意识形态也出现了真空,这样,维护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探索新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俄国目前所面临的两大课题。俄国地缘政治利益仍然在原苏联地区,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放弃这一利益。关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萨哈罗夫追溯了历史渊源。俄罗斯人一向有一种救世主的“世界使命”感。东正教认为从罗马、拜占庭那里得到上帝赋予的“救世使命”,俄国的马列主义又把这种救世主的“世界使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使命。

由此可以看出,俄共在其纲领中所使用的“俄罗斯思想”一语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历史使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的继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使命感并未消失,当时的苏俄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欧革命,另一方面又把莫斯科看作世界革命的基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负有解放全世界的历史使命。这样,“第三罗马”的观念就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下得到了发展。不难看出,俄共纲领中“俄罗斯思想”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俄共纲领强调了共产党人保持历史传统的必要性。纲领写道:

^① 尼·奥·洛斯基(1870—1965),俄唯心主义哲学家,俄直觉主义和人格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 弗·伊·柯罗塔也夫:《“俄罗斯思想”在苏联传统中的命运(20—30年代)》,阿尔汉格尔斯克1993年版。

俄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它的创造性传统和历史继承性的牢固基础之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和经济状况,使俄国成了下述文化和道德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传统的主要价值观是共同性(общинность)、集体主义(共议性, соборность);爱国主义,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的互相联系(强国精神, державность);对体现真理、善良和公正的最高理想的追求(高尚精神, духовность);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和其他差别一律平等和具有同等价值(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

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

党纲在这里连续使用了好几个传统用语,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共同性”,俄文为 общинность,源于俄国历史上的“村社”(община),直译就是“村社性”或“公社性”。村社往往被看作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然而,村社实际上是宗法制的组织,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从它所代表的生产力看,它未必是一种先进因素的体现。在党纲中“集体主义”等同于“共议性”。“共议性”俄文为 соборность,其词根 собор 有两解:1.古代召集比较重要的讨论行政或宗教问题的高级会议;2.大教堂。соборность 由此转出共同讨论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它也未必等同于我们所常用的“集体主义”。从用语的选择可以看出,俄共党纲竭力把现代概念同传统观念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理论同俄国历史传统结合的道路。

“俄罗斯思想”包括对俄罗斯帝国当年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这在俄共党纲和久加诺夫的言论中都是直言不讳地公开承认的。党纲写道:

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国内外破坏者主要致力于丑化我国的整个苏联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的践踏者们从而充当了一个伟大强国的掘墓者的角色。因此复兴我们的祖国和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两者是分不开的。历史再次使我国人民面临1917年和1941年那样的选择:或者是伟大强国和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沦为殖民地。

俄共坚持恢复苏联,从根本上来讲,是以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为出发点的。十

^①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2月2日。

月革命以后形成的苏联版图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在斯大林时期还有所扩大。俄国必须恢复苏联的版图,这是俄共的一个目标。这同列宁当年的政策并不吻合。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列宁曾经坚持民族自决权,主张让各民族自由决定独立或者联合。他说,可以让乌克兰尝试独立,以后如果愿意,也可回来重新实行联合。联合后如不满意,还可再分离。他并不主张各民族非得捆在一起,是否联合应通过民族自决决定。

俄共对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的全盘肯定,显示了他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们对俄国向周边扩展的历史作了美化。久加诺夫在谈到俄国历史上的扩展时说:“我们地域的开发和新大陆不同。不是高举刀剑,而是举着十字架往前走的。带去的是语言、知识,而不是毁灭。因此自古就住在这里的所有民族都留在俄国。把我国联结在一起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①

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继承了苏联时期的传统说法。历代沙皇经过数世纪的征战,把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扩展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同西方的殖民帝国一样,靠的同样是刀剑和枪炮。历史上俄国的民族关系自然有它好的一面(主要是在苏联时期),但决不是一切美好,在沙俄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和迫害是主流,正因为如此,列宁在最后时日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

俄学者布兹加林写道:

苏联的瓦解没有导致国际矛盾的解决,反而加深了矛盾。因为被摧毁的不仅是“中央”的官僚主义形式,还有我国各民族的经济、个人、文化的实际一体化。这产生了强大的相反的过程——社会不同的阶层追求国家的统一。但国际主义的基础蜕化成歪曲的大国倾向的形式。结果苏联各族人民重新一体化的客观必要性变成了恢复官僚政权的主观(但具有现实的根据)趋势,其使命是恢复秩序,恢复超级大国的原地缘政治并以此为代价解决国内问题。^②

这个评论是中肯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① 久加诺夫:《走幸福与公正的道路》,答《东正教莫斯科》报尼科里斯基(《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我相信俄罗斯》第347—348页。

^② 《自由思想》1996年第4期。

俄共拒绝普京改名“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议

2001年7月18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左派运动时建议俄共改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京认为,左派运动在俄国是有前途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如此。俄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悠久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也包括在内。俄联邦共产党是一个合法政党。他没有道义或法律上的权力在此向大家宣布,这个在国家享有合法活动权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问题在于,该党的领导人将如何谋划该组织的行动。普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立足于当代的价值观,不再对那些已经失去效力的东西和那些损害自身威信的东西念念不忘,那么,这一政党无疑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及时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对政治组织的要求也变了,它就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

普京说:“作为第一步,我在与该党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建议,应该恢复历史真实,还党以本来名称,即其缔造者列宁赋予它的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将是良好的信号,并使党朝着需要的方向迈进。”

普京的谈话发表后,俄共正式网站立即发表不署名文章予以拒绝,并且认为普京不懂共产党的历史。

文章说,普京不止一次使我们吃惊,例如他说斯大林曾经希望苏联加入北约,这一次总统的建议表明,他作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大学生,并没有牢固地掌握苏共党史。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毫无关系。这个名称是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列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当时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众所周知,后来列宁对大会通过的政治文件并不满意。而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党立即同党内的妥协派——孟什维

克划清了界限。后来,当孟什维克走上沙文主义道路并支持帝国主义的世界大屠杀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一词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就几乎等于骂人的话。这就是为什么1918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建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的原因。所以总统指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背离列宁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共是教条主义的党。它创造性地接受了列宁的遗产,其中包括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这是略知俄共纲领性文件的人都清楚的。俄共的未来不取决于普京的愿望与条件,而取决于以下局势,即普京企图在俄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即阶级的社会,其中存在失去生计的被压迫人民同暴富的寡头及其奴仆的对立。而代表人民,捍卫人民利益的是俄共,而不是亲普京的“团结”加“祖国”。

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库普佐夫则宣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俄共无须改名。但是他透露,俄共曾经考虑过改名社会民主党的问题。

普京谈话后不久,库普佐夫就共产党人不接受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主客观原因接受了《独立报》记者安娜·扎卡特诺娃的采访。7月24日《独立报》发表了访谈录。《独立报》认为,普京建议俄共改名,实际上是暗示,他们的政治斗争方法显然已经过时。但是实现总统的建议就会要求他们修改党的纲领,这又会造成“红色”选民的分裂和俄共影响的下降。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问:普京建议俄共改名,您好像坚决予以拒绝。然而党的领导又多次断定,俄共是苏共的继承者,因而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继承者。

答:普京的这一建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我们每一次都回答说,我们党不讨论这一问题,并且在最近十年也不会去讨论。从1993年起,一直有人向我们提出这一思想。起初,在1991—1994年间,由于那时党处于休克状态,我们曾积极地讨论过这一问题。当俄共被停止活动的时候,曾有过许多建议: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存在下去,如何实现合法化。那时出现以柳德米拉·瓦尔塔扎洛娃和罗伊·梅德维杰夫为首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有12万以上的党员。即建造了一个屋顶,许多共产党人在其下工作,而不考虑其名称是“社会主义”党还是“共产主义”党。1993年,在宪法法院取胜之后,在重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改名问题,目的是使党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把中间派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此后,党在最近五年里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党的改名问题不会根据总统的建议进行,而只能由党的组织提出来。然而在全部18000个基层组织中没有一个组织提出俄共改名的问题。

因此继续保持了原来的名称。它符合我们的纲领目标。即使我们改了名称,我们党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们仍然是反对党。

问:改变名称同时意味着修改你们的纲领。如果总统说俄共的将来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么他的意思不过是希望社会的一大部分人愿意选择稳定。

答:在上世纪之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党来说是一个好名称。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发生了严重蜕变,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它现在很少捍卫雇佣工人的权利,它限制社会保障,加强资本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的声望下降了,特别是现在13个社会民主党人政府支持大西洋公约,参加轰炸南斯拉夫之后,甚至在他们本国,其威望也在下降。我党纲领中的一些条文是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如承认私有财产权,政治多元化,对宗教的崭新态度等,但我们并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我们同西欧的任何社会民主党都有区别:俄共认为政权应当归人民,而不应当归寡头。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政权到处都归资本,在俄国政权也归资本。现在资本实际上已进入国家的权力结构。

问:不过,俄共不是也同企业主合作吗?

答:合作是一回事,而把政权交给寡头是另一回事。在把国家卖给西方资本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持为俄国利益工作的国家主义者?现在是这样一个人时期,只要普京还为俄国工作,我们就支持他。而当总统反对多数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不支持他,对土地法典、劳动法典、外汇调节法,我们做出了强烈反应。因为这里没有把国家利益和劳动者利益放在首位。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因为寡头们在组织上得到了巩固。现在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俄国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是寡头资本的政治局,它向总统发号施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任务是坚决捍卫多数人民的利益。

问:俄国有相当多的社会民主党。俄共是否有可能跻身其间?

答:提出这一思想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它们缺乏社会基础,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这些党的简单经验。俄国现在存在将近15个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其中有很多著名的活动家,如米·戈尔巴乔夫、康斯坦丁·蒂托夫、加夫里尔·波波夫、马丁·沙库姆、伊万·雷布金。它们提出了正常的建党任务,筹集到了经费,有社会党国际作为依靠,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但结果怎样呢?在俄国它们在社会上并不拥有多大的威望——投票支持它们的只约有1%。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

经验和实践说明,选民不信任该运动。

问:而您个人能不能同米·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坐到一起呢?

答:不。

问:传统上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是俄国正在产生的中间阶层,而支持你们的是民众的边缘阶层。

答:我没有看到在最近几年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能够有稳定的发展,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依靠中间阶层。在我们这四分五裂的社会里,总共有数千寡头加上5%—7%为该集团服务的人,而约60%的人是失去生计的社会保障极其有限的人们。作为愿望可以随便怎么说,但是目前社会是摒弃社会民主党人的:多数人宁愿要其他的政党,如俄共、自由民主党、“祖国”、“团结”、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人为地培植社会民主党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

问:一位左翼思想家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认为,俄共领导使用天鹅绒的斗争方法太长久了。也许你们错过了时间?

答: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是位值得尊敬的人,是大哲学家,但他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他有自己的路线和信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强国主义者。普罗哈诺夫像所有其他真诚的人一样,想要在昨天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现实生活表明,社会有待成熟。我觉得,我们的人只有经历5—7年之后才会开始懂得,他们的社会主义受到多大的损失。成熟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开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到秋天还会有所表现。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急剧提高费用)、土地改革、养老金改革,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杠杆,它们将激化国内的抗议运动。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5期

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访谈录

2001年9月6日,中央编译局学术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伊万·伊万诺维奇·梅利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是俄共第三号人物、杜马教育与科学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他在俄国家杜马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参加会见的还有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科西切夫。下面是梅利尼科夫对我的提问的回答。

问:苏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什么是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的主要因素?

梅利尼科夫(以下简称“梅”):关于苏共失败的原因,谁也无法最终回答这个问题。我党纲领谈到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失败不是注定要发生的,是形势发展的结果,是某些客观因素造成的。最有害的因素是党垄断一切。首先是对政治的垄断,国内看不到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不允许讨论。我是数学家,也能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更严重了。其次是对经济的垄断,任何创新都被扼杀,像俄国这样的大国不能仅仅靠中央来管理。我个人认为,如果从一开始能给公司企业更多的自由,使其具有市场的性质,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第三,对真理的垄断。我们的电视、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三、四版略有不同,这很不正常。一些人提出问题和建议不是反对党,而是帮助党完善,有助于对道路方案的探寻。主观因素,这也不是必然的。戈尔巴乔夫及其班子是缺乏能力的领导。有人说他是叛徒,我不这么说,不过至少可以说他是个软弱的政治家、管理者,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是如此。领导层中许多人放弃了共产主义,而现在他们处在社会的上层。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政治、干部政策上的错误。西方当然想从外部摧毁我们,但外

力是无法摧毁我们的,对此我们有所准备。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可惜我们目前忙于当前的事务,没有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理论分析。

问:俄共对普京政权持什么态度,它如何发挥反对党的作用?

梅:普京不是叶利钦,对他当政以后的政绩我们给以正面的评价,特别是他的外交政策,他执政以来陆续访问了中国、古巴、朝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限制了某些寡头的作用,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认为寡头不应从事国家政治活动。他以苏联国歌的旋律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不像叶利钦那样反共了。他同我党建立了某种联合。但他的活动中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他带我们代表去访问一些地区和国家,但我们的代表并没有能够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访问后就没有下文了。对待寡头采取了第一步,但没有看到第二步。一些寡头被排除了,但另一些寡头的影响仍然很大。最主要的是叶利钦的社会政治方针至今没有根本被改变。国家杜马在夏季讨论了土地法草案、劳动法草案和养老金问题。普京继续叶利钦的政策,并且更加强硬地加速推行。对这种做法我们持反对派立场。他的某些措施仅仅具有安慰的性质。

我们曾三次会见普京,每次谈话长达三小时,会见规模很小,人数不超过10人。他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会见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就像没有会见一样。我们说,如果会见仅仅是为了表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那就没有会见的必要。我们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的社会政治政策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老百姓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大臣不好。实际上一切都同普京有关。

问: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前途如何?

梅:我坚信人类的社会主义前景,非党群众也是这么认为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时候实现。这很复杂,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问题之所在。有的人希望很快就取得胜利,过了10年心理上就疲倦了。要做长期的准备,要做现实主义者。现在多数居民的立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这不会不表现出来。当然,也有别的价值观。我们的选票并没有因为老人的自然减员而减少,而是每年有所增长。

对土地法我们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对土地法有38个以上的联邦主体反对,按照审议程序的规定,一个方案未审查完毕,不能讨论另一个方案。而我们的杜马一个土地法方案还没有讨论完毕,就开始讨论另一个方案,这是违背程序的。我们的

农业不需要这样的法典。被私有化的土地是最肥沃、最有用的土地,是国家最好的土地资源。私有土地对外国人没有任何限制。这是从我们争得成果的倒退。工会的立场很坏,特别是工会的领袖们。关于政党法,其目的是减少国内的政党。法令为行政当局提供了对政党的监督,这给我们造成困难的局面。不过这是正常的社会所需要的正常的法令。

问:如何评价存在 70 多年的苏联?

梅:我认为好的东西比坏的多得多。这种社会模式的优势是存在社会保障。人们对未来可以预见,不会出现今天不知明天事的问题。当然我也不为坏东西辩护,但这是同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也有主观的错误。学者们可以对此进行冷静的研究。过去我们的生活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是进步的、为人的福利发展服务的制度。然而我们现在在摧毁一切,这样做社会是不能进步的。

问:怎样看待转型期的公正、公平问题?

梅:我认为公正、公平问题是转型期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转型期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机械地看待公正问题,今天实现了某种公正,明天又会出现新的公正问题,这是辩证的观点。理想的境界是一回事,而现实又是一回事。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

问:俄共同其他党的关系如何?

梅: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有良好的关系,订有协议。我们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派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原苏联地区,某些国家有强大的共产党,如乌克兰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其他共和国的党要弱一些。

问:摩尔多瓦共产党现在已经是执政党,那里的社会制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涉及俄共,如果你们得以执政,你们将会采取什么方针呢?

梅:这是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我们不可能今天执政,明天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不现实。这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渡时期,我国许多东西被摧毁了,为此就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国家,恢复经济,要花很大的力量,更不要说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了。对摩尔多瓦来说,这个过程将会更加艰难。摩是一个小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很大,他们的土地和水果很不错,但失去了市场。除此以外,他们提供不出优质的产品。如果能得到俄国的帮助,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但俄目前的政权对此不感兴趣。

问：普里马科夫最近辞去了议会党团领袖的职务，原因是什么？

梅：“祖国”是个不大的党团，成员立场各异。他本人未参与或者被排除出“祖国”与“团结”的合并过程。这可能是导致他退出的原因。另有非正式消息说，他有可能取代斯特罗耶夫担任联邦委员会的主席，辞职是为此做准备的。

《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俄国”运动和“复兴俄国”党

谢列兹尼奥夫其人

现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1947年11月6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州的谢洛沃。自幼父母离异,寄住在外婆家。10岁来到母亲居住的列宁格勒。家境贫寒,当过工人,参加过军,做过共青团的工作。后通过函授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1974—1980年在《接班人》报工作,1974年任副主编,1975年任主编,在此期间该报发行量剧增,比《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多出一倍。1980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80—1988年任《共青团报》主编。由于办报有方,该报发行量由900万上升到1800万,被记入世界吉尼斯纪录。报纸讨论同改革有关的各种尖锐问题,捍卫青年的利益,维护阿富汗战争的残废军人的权益。共青团报首先开通“直通热线”专栏,至今犹存。1988—1991年,苏共中央派他就任《教师报》主编,使该报由一般的行业报纸变成苏共中央政治性、行业性的报纸。他组织了“苏联本年度教师”竞赛。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项竞赛仍在继续。

1991年1月,应《真理报》编辑部之邀任该报第一副主编,1991年8月当选为主编。同月根据叶利钦的命令,苏共及其报纸《真理报》被查封。编辑部采取了应变措施,拟定了报纸的新章程,登记为自由报纸,主编由选举产生。《真理报》得到希腊共产党人出版家的赞助,但协定规定不干预出版过程。他提出创建《真理报》增刊《真理—5》的设想。1993年秋,登记出版《真理报》国外版,取名《实业真理报》(“Деловая Правда”)。1993年10月炮轰白宫事件后,《真理报》被查封。俄联邦出版委员会发布解除谢列兹尼奥夫职务的命令,提出复刊的条件是谢列兹尼奥夫无条件退出编辑部。1993年10月底召开的编辑部会议选举谢列兹尼奥夫为总编

辑。但最后谢退出了,报纸得以复刊。1993年,谢列兹尼奥夫当选为第一届杜马议员,在杜马信息政策和通讯委员会工作,设法通过国家给予大众媒体以支持的重要决议,许多报纸因此得以生存。1995年,当选第二届杜马议员,经过三轮选举,当选国家杜马主席。1999年12月,杜马重新选举。他在新组成的国家杜马中又被推举担任杜马主席的职务。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俄国议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获得应有的地位,扩大其权力和职责范围;捍卫选民利益。他说:“我相信,俄国迟早会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全部政权将只属于一个主体——法律。只有完善和扩大议会的权力,才能缩短这个时间。这就是我选择杜马作为我继续政治生活的对象。”

谢列兹尼奥夫在谈到自己的主张和工作时说:

作为议员和杜马主席,我看到了俄国的主要问题。我们急于运用盲目的口号:“干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这是一切贪污腐化、犯罪的温床,同时毒化了俄国文明的传统和道德。继续生活在这一个口号下,就意味着继续摧毁家庭、社会、国家。

对本国的商品生产者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不要用债务罚款去折磨多数企业,而需要采用区别对待的办法,考虑到债务积累的不同原因,给他们解扣。

实行灵活的税率和关税,以降低产品的成本,以现代的新技术装备企业,防止进口的不良食品危害俄国人的健康和生命。

运用破产法归还国家所需要的“私有化的”企业和破产的企业。不要增加失业人数,要鼓励创建新的工作岗位。

病态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国家。联邦和地方预算应当支持改善居民的健康、体育运动、教育。要制定专门的“俄国家庭”纲领。防止俄国居民人数到2040年下降到5000万人。

需要制定新的国防学说。

同白俄罗斯、乌克兰一体化,同原加盟共和国建立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符合俄国和我们那些被迫居住在祖国之外的居民的利益。

全俄政治社会运动“俄国”^①

2000年7月,谢列兹尼奥夫宣布组织全俄政治社会运动“俄国”(Россия)。在

^① 《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16日。

全国 88 个联邦主体建有分支机构,现有 50 多万名成员和支持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俄共党员。

2001 年 1 月 13 日,“俄国”召开成立后的首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谢列兹尼奥夫的报告,修改了组织章程,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谢列兹尼奥夫再次当选为运动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说,“俄国”运动成立半年来,队伍不断充实扩大,已将一些政党和组织吸收为它的集体成员,并且同左翼民主力量和社会民主力量建立了联系。他表示,“俄国”运动支持现在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并称该组织不打算改建为政党。

谢列兹尼奥夫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一年来,俄国发生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变化,金融寡头干预政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他强调,今天的俄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立法权力机构和执行权力机构开始协同工作,这是国家政局稳定的标志。“俄国”运动将继续和当局合作。^①谢列兹尼奥夫表示,他成立“俄国”运动是为了把更多的中左派选民团结在人民爱国联盟的周围,无意与俄共分庭抗礼,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未出席成立大会,而俄总统普京却发来贺电,希望运动尽快度过其最复杂的初创阶段,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谢列兹尼奥夫与俄共分道扬镳使俄左翼阵营矛盾复杂化,必然会削弱俄共的力量。包括久加诺夫在内的俄共领导层曾极力反对谢列兹尼奥夫建立新的政治组织。据说久加诺夫曾几次找谢谈话,希望他放弃这一计划,但遭到拒绝。后来,久加诺夫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也曾希望总统不要在“俄国”运动问题上支持谢列兹尼奥夫,但也遭到回绝。

不过谢列兹尼奥夫并不想激化同俄共领导的矛盾。因此,尽管久加诺夫等人对他另立山头的做法进行公开批评,他还一再表示自己绝无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

在对现政权的态度上,“俄国”运动与俄共存在原则区别。在理论上,俄共把自己定位为“不妥协的建设性反对派”。谢列兹尼奥夫领导的“俄国”运动则公开声称支持现政权。

应该看到,1998 年俄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后,中左立场在俄国社会上逐渐走红,中左政治联盟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祖国—全俄”运动、“团结”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莫斯科 2002 年 1 月 13 日电。

运动、“统一社会民主党”等,均持中间或中左立场。就连一贯以不妥协的反对派自居的俄共也放弃了激进的左派立场,成为温和的“建设性反对派”。

“俄国”运动的宣言和纲领

有两个文件显示“俄国”运动的纲领主张和奋斗目标。

一个是《左翼民主运动“俄国”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9年的议会选举,叶利钦下台,选举新的总统,重新选举新领导的最初一些措施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根本性的修正。俄国的政党和社会政治运动中心的结构和配置也同时起了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左翼政党同当局的正面对抗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在总统选举中,在议会选举中,左翼爱国反对派没有能够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以有利于自己。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左翼力量的立场得到了巩固。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坚持的国家的、爱国的倾向在我们的社会里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思考的人们修改我们的战略。

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国家是左翼力量的基本要求。爱国的反对派一直为统一的俄国及其坚强的政权(渗透到“从莫斯科到最边缘地区”)而奋斗。这一点终于为克里姆林宫所理解,成为领导国家的官方学说。因此指责当局持反国家、反俄国、亲西方方针已经不符合现实。当前要求我们负责任地参加社会的集中化、支持执行机关的中央集权、为从战略上巩固我们的祖国而工作。这项神圣的工作号召所有爱国者集中到它的旗帜之下。

新总统普京准备同俄联邦内的一切分离主义作斗争;巩固俄国和白俄罗斯的联盟国家;积极促进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全力加强政权的垂直行政系统;使社会中的强力机构的地位正常化。我们支持新总统的这一战略路线。我们必须做国家建设新阶段的真正参与者。

然而政府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纲领中也存在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极端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极端派、寡头、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力求在新的政治环境里争取主动。

不能同意“国家加自由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плюс либерализм”)”的口号。右翼身上的那种自由主义不能同国家,同我们历史、经济、文化的传统,同客观上形

成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相容。特别是不能应对俄国所遇到的挑战。这主要的挑战是社会—技术工艺的挑战,要求俄国的经济急速现代化。我们赋予国家以关键作用。我们的任务是向领导提供国家参与俄国经济现代化的具体纲领和战略。

我们今天必须加大力量反对超自由主义的方案。不是反对市场,而是反对市场激进主义,反对经济中的“右的极端主义”。

由此必然提出需要左翼民主爱国力量作新的配置,提出新的队伍的政治形式,以适应俄国的新条件。

旧战略已经过时,现在需要制定新的战略。在国家问题上的建设性必须同否定反人民的犯罪性的方案相结合。为此就产生了成立左翼爱国主义的、左翼民主主义的广泛组织的必要性问题。现在成立的“俄国”运动应运而生。它应当吸收最大数量的愿意积极参与复兴俄国的公民。我们的政治盟友有俄共以及其他目标与我们相近的政治社会组织和运动。我们的运动要联合彻底的左翼反对派、温和的甚至忠顺于当局的公民,只要他们认为不能允许第二轮超自由主义的实验。为实现具体的社会纲领,为了达到巨大的政治目标,它可以同其他社会爱国运动建立联盟,在联盟中保留自己的声音。

在当今世界的许多议会中,左翼政党是执政党。这是发达的议会制度的一种规律。我们也想向这种制度过渡,左翼爱国者在国家立法会议、地区和联邦执行机关中人数并不少,甚至占据多数,但不成功。

“俄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国家,公正的团结的社会,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繁荣的俄国,保持平衡的多极的世界。

我们成立左翼民主运动“俄国”,是为了复兴我们的祖国,恢复俄国的尊严!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文件是《“俄国”运动纲领性声明》:

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要求俄国所有左翼力量修改自己的战略。新的国家领导给政治生活带来新的国家—爱国取向,使得可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方针。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向社会提出俄国社会改造的左翼民主纲领。左翼力量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应当开始实施自己纲领性的原理。这就是实践任务,为解决这一任务今天成立“俄国”运动。

总结十年的改革,我们看到,国家需要改造。然而右翼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是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最坏的方案。右翼激进试验的恶果到处可见。它的思想根源是

政治经济的无知和贪婪。

苏联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基础及其崩溃的原因是计划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这只适用于 20 世纪初到中期那种类型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计划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了经济和军事力量,使苏联成为领导世界的强国之一。然而这种体制不适应新的后工业化的经济管理,不适应立足于灵活的生产体制,小批量生产,完善的工艺技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任务是使国家的管理方式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实。

“俄国”运动的经济纲领是国家后工业化纲领。十来年的经济破坏使我们只能从极低的水平起步。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的经济将是赶超型发展的经济。20 世纪初的德国,中期的日本和当代的中国的赶超型发展的经济可以作为借鉴。赶超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使有发展前途的经济成分防止外来的强大竞争,同时集中全国的力量搞经济突破。在这里国家应起主导作用。“俄国”运动的经济纲领是动员型的纲领。国家已经没有时间犹豫摇摆了。俄国自然原料一类的资产越来越少了。这意味着,必须紧急动员传统的经济成分用之于后工业化的俄国经济之中。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进行这种动员。这是不可避免的,“俄国”运动当尽一切力量使之实现。否则,在 15—20 年间俄国就会从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一个地理概念。

“俄国”运动的基本社会政治取向是现代社会主义。要使社会主义思想排除各种杂质,批判地评价俄国和国外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们强调两项最根本的标志: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和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精神在于提供如下的社会保障: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获得教育和保健,保障有劳动能力者的就业,社会关怀无自卫能力的人群——孩子、残疾人。其余一切都是过渡性的特点,取决于每一个具体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历史经验。

俄国的改革者从事于“在俄国建设资本主义”,要同世界整个文明结合在一起。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东西:在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等等),执政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工党)政党组成的政府。

至于真正的人民政权,那么它同选举的“民主制”毫无共同之处,受报纸电视愚弄的选民们顺从地去投那些把更多的金钱投给大众媒体的人物。我们主张的民主形式叫做参与民主(Демократия Участия)。参与民主是各种公民组织参与制定和解决有关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政治形式。参与民主的一个形式是生产民主。现在的劳动者没有任何可能参与自己的企业的管理。需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监

督养老金的使用,医疗保障,监督政权机关。

俄国运动的政治纲领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要成为无所不包的参与民主的形式。

社会公正、人道主义、为祖国服务、不谋私利、合作和热爱自由、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思想,将成为我们文化的特点。

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三大支柱是:社会保障、人民政权、高尚道德(СОЦИАЛЬНЫЕ ГАРАНТИИ, 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 ДУХОВНОСТЬ)。^①

以上两个文件概括起来说,就是认为自普京上台以来,俄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当给普京的治国方针以支持。“俄国”运动不再充当普京政权的反对派。“俄国”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过这种社会主义同过去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同,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和人民政权”。这就是像在西欧所见到的那种社会国家,它所主张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

杜马风波

本来“俄国”运动暂时可以同“人民爱国联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然而今年(2003)春天出现的杜马事件却打破了平静。

议会制历来是根据各党派的力量大小分配其中的席位的。在1999年12月本届国家杜马刚刚组成的时候,共产党是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但是,随着俄政坛各种政治势力进一步分化组合,议会几大党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两个议会党团与“人民代表”、“俄罗斯地区”两个议员小组正式联合组成议会中派联盟以后,他们的议会总席位已经远远超过俄共,成为俄杜马事实上的第一大党团。随着俄国国家杜马内各党派力量的消长,今年3月,以“团结党”为首的部分政党在国家杜马发起了一场撤换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职务的运动。杜马通过一项决议,杜马主席今后只有主持会议的权力,在杜马理事会中不再享有表决权。“团结”党、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集团要求杜马章程委员会起草一份建议将谢列兹尼奥夫撤职的决议草案。

对于部分议会党团发起的这场运动,俄共持反对态度。俄共杜马议会党团召

^① <http://rossia.virtualave.net>.

集人列舒尔斯基表示,俄共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谢列兹尼奥夫下台,包括阻挠杜马通过任何法律草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主席米罗诺夫也表示,他不赞成在离下届杜马选举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里更换其领导人。^①

在“政权党”的策划下,俄议会对其所属各专门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2002年4月3日,中派议员和右派议员联合,以251票对136票通过决议,决定重新分配各杜马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剥夺俄共7个杜马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结果俄共失去经济政策、劳动和社会政策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只剩下文化旅游和社会团体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俄共领导很不冷静地宣布:“俄共退出杜马中的所有领导职位!”连最后留下的两个委员会主席职位也一并放弃。不仅如此,俄共还要求俄共党员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也辞职不干。

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去留问题

在失去杜马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之后,俄共高层开始考虑,中派力量已经把俄共逼上绝路,俄共除了转向完全、彻底的反对派以外,已经别无选择。在目前这种对俄共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党的整体利益,谢列兹尼奥夫个人应该主动辞去议会中的职务。4月8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闭门开了一天会,讨论谢列兹尼奥夫是否应该继续担任国家杜马主席。会上争论激烈。会后久加诺夫对记者说:“就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将要继续磋商。等到10日,俄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时候,一定会有最后答案。”^②最后,4月10日通过决议,决定放弃在杜马中的所有领导职位,要求谢列兹尼奥夫辞去杜马主席的职务。

谢列兹尼奥夫不同意俄共中央的决定,决定继续留任杜马主席的职位,另外两位担任杜马委员会主席的俄共党员——杜马文化委员会主席古边科和妇女和青年委员会主席戈里亚切娃也决定留任。针对俄共中央的方针,4月23日谢列兹尼奥夫表示,俄共只有联合其他中左派力量一起参加选举,才有可能在下届国家杜马中获得席位。他在做客《俄罗斯议会报》时说,为备战下届杜马选举,俄共应该在人民爱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左派竞选联盟,农工联盟、“俄国”运动以及其

^① 新华网莫斯科2002年3月23日。

^② 《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10日。

他中左派组织都可以加入该联盟,而俄共应成为这一竞选联盟的核心力量。他认为,如果俄共单独参加下届国家杜马选举,只能获得10%的选票,从而失去在国家杜马中拥有的席位。^①

鉴于谢列兹尼奥夫不顾俄共中央决议决心继续担任国家杜马主席,俄共莫斯科市委首先发难决定将其开除出党。但是谢列兹尼奥夫表示,他是俄共中央委员,只有俄共中央才有权决定他是否继续留在俄共。

俄共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

5月25日,俄共中央举行第八次中央非常全会,决定开除俄共中央领导成员、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他两名俄共议会党团成员的党籍。表决的结果是:76人赞成开除,25人反对。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据久加诺夫透露,谢列兹尼奥夫等三人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

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对此解释说:“党是一个维持纪律的统一机制。如果有人违反纪律,那就必须开除他。”还说“在战争中永远都有英雄和叛徒”,暗示谢氏在党派斗争中背叛了党。至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将对俄共产生什么影响,久加诺夫表示:“党是统一的,不会因此而发生分裂。”

俄共中央6月4日向各地方支部散发的公开信说,俄共之所以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三人党籍并将他们开除出俄共议会党团,是因为他们不再代表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已沦为“杜马右翼势力的庇护者”。^②

俄共党内不少人对开除谢列兹尼奥夫感到惋惜。俄共知名议员维克多·伊柳辛说:“俄共不会再有第二个谢列兹尼奥夫。我们应当珍惜他们才是啊。”俄共党员克麦罗沃省省长图列耶夫对此大发牢骚:“对于久加诺夫没有远见的错误政策,我没有好说的。”他甚至表示,久加诺夫此举是担心党内有人对其领袖地位构成威胁。国家杜马“人民代表”议员团领导人赖科夫认为,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是俄共分裂的开始。^③更多的政治家也同样认为,俄共必然因此而导致分裂,这在明年杜马选举时将暴露无遗。

① 新华网莫斯科2002年4月23日电。

② 新华网莫斯科2002年6月5日电。

③ 中央电视台2002年5月26日报道。

对谢列兹尼奥夫的立场也有人叫好的。共青团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联合会通过决议认为，“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都应当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别政党的利益之上”。谢列兹尼奥夫真正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不顾俄共的压力，“在议长的岗位上继续为俄国的利益而工作”。^①

谢列兹尼奥夫等人被开除的消息刚刚传出，俄总统办公厅立即表态说：“谢列兹尼奥夫杜马主席的职务不应当受此影响。”5月27日，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晤谢列兹尼奥夫，普京劝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并半开玩笑地说：“你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为国家工作了。”杜马中派和右翼力量也对谢列兹尼奥夫留任杜马主席表示了支持。

一些评论家认为，俄共现在的境况确实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表示，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降低了民众对俄共和久加诺夫本人的支持率。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杜马内中派力量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日益坐大，已对俄共形成压制之势，而今俄共又失去了谢列兹尼奥夫等有影响的精英，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②

“复兴俄国”党的成立

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俄共之后，即依据其早先创建的“俄国”运动，筹建新的政党。2002年7月5日“俄国”运动决定建党，9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复兴俄国党”(Парт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成立大会，谢列兹尼奥夫当选为党的主席。

会议确定的党的目标和任务是要在左翼阵线建立一个取代久加诺夫的人民爱国联盟的政治组织。大会的决议呼吁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相互配合以解决社会国家形成中的关键问题”。

谢列兹尼奥夫认为党的性质是“左翼民主主义”政党，是在“俄国”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运动的积极分子构成与会600名代表(代表71个地区)的多数。复兴党准备同总统和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支持政权，同时也要批评它，不过如果批评，就要提出解决方案。

党的基本目标是发展公正和合作的机制，实施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消除多数

^① www.rosbalt.ru.

^② 《环球时报》2002年6月3日。

居民与少数最富裕的公民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当久加诺夫的俄共转入强硬的反对派,从而为其他党派让出一片政治空间的时候,复兴党建议实行妥协,把自己定位为“中左派”(левоцентристы)。

谢列兹尼奥夫在成立大会上说,党的最低的政治任务是为杜马选举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目标是把俄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国家,确保俄国的国防能力和国家安全,巩固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确保社会公正,为此“复兴俄国党”将与总统、政府以及各政党和社会组织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谈不上同什么组织统一的问题。谢列兹尼奥夫还宣布“复兴俄国党”将参加下届议会选举,并争取获得5%的选票进入杜马。他说,如果所有左翼政党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作出历史性妥协,制订新的战略,将有望重掌政权。

10月9日,谢列兹尼奥夫在接受采访时宣布,如果俄国人民爱国联盟不同亚·普罗汉诺夫的声明“划清界限”,他的政党可能退出人民爱国联盟。这是因为人民爱国联盟主席之一普罗汉诺夫在访谈中说,不排除共产党人接受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资助。

10月29日,“俄国”运动政治委员会宣布,出于道德和政治原因,运动不可能继续留在人民爱国联盟之中了。这是因为人民爱国联盟的主席及其协调委员会不断攻击“俄国”运动的领袖谢列兹尼奥夫是独裁者、运动本身的瓦解者。政治委员会认为,久加诺夫等人的“对抗路线是非常错误的,特别是在今天,因为今天已经明显地现实地获得社会和谐,团结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和争取国家复兴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运动强调,退出人民爱国联盟“并不意味着放弃共同的思想 and 价值,同真正人民的和爱国的力量决裂”。运动对所有参加人民爱国联盟的组织是敞开大门的。

10月14日向内务部提交登记申请,当时有党员20282人。

2002年11月16日,在弗拉基米尔召开“俄国”运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70名代表参加,代表72个联邦主体。他们讨论了由于“俄国复兴”党的成立和人民爱国联盟开始瓦解而引起的左翼力量的变化。谢列兹尼奥夫宣布在“俄国”运动基础上,组织“左翼民主力量联盟”,使之成为人民爱国联盟的取代者。他强调,运动的战略任务是为复兴俄国党建立群众基础,争取该党在杜马选举中越过5%的门槛,在第四届杜马中建立议员联盟。号召同其他支持左翼民主和国家爱国思想的政党

和运动建立积极的合作。他强调，“俄国”对久加诺夫的人民爱国联盟中同意“俄国”立场的成员也敞开大门。“俄国”运动的主要纲领目标是在宪法第七条的基础上把国家变成社会国家，只有在企图取消走社会国家的道路的情况下才会成为反对派。然而反对派将不是不负责任的，而是建设性的，具体的。^①

11月11日，谢列兹尼奥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复兴俄国党是“欧洲型”的政党。他在意识形态上同俄共不同，它没有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伟大任务。它的整个纲领建立在规定俄国是社会国家的宪法第七条上。就精神、内容而言，我们是左派或者中左派政党。我们不是破坏性的党，而是建设性的党。不会提出政府和总统下台的要求，可以向政府提出具体的问题并建设性地予以解决。

谢列兹尼奥夫表示，在未来下院的选举中复兴俄国党能够成为俄共的竞争者，有不少过去投久加诺夫票的人现在看好谢列兹尼奥夫，并且可能投他的票。在2003年的杜马选举中复兴俄国党将在人民爱国联盟以外参加竞选。但不是单独参选，其盟友有劳动人民自治党（费多罗夫 Федоров）、在国家杜马中有议员（奥列格·舍因 Олег Шейн）的劳动党。

复兴俄国党于10月29日向司法部登记，11月12日获得批准。

复兴俄国党的成立引起俄共的激烈批评。俄共领袖梅里尼科夫说：如果谢列兹尼奥夫加入“团结”党，那要更为合适一些。克宫早就喜欢上谢列兹尼奥夫，以便在杜马贯彻其政策。它追求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建立几个貌似左派的政党，以从俄共手中夺取选民，特别是年轻人。这样的党有复兴俄国党，“新共产党人”党（勃列日涅夫孙子的党）。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没有任何机会赢得选举。俄共不会为此丢掉任何东西，我们的选民不会这样幼稚，他们知道谁是谁。^②

俄国统一社会民主党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复兴党的成立表示欢迎。9月10日他表示，终于出现一个现实的竞争者了，这就是复兴俄国党。他说：“我出席了复兴俄国党的成立大会，读了它的全部文件，我可以声明，它90%—95%同我们是一致的。”他祝贺成立“谢列兹尼奥夫的党”，表示准备同它合作，如果它能够成为一支现实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主张各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冷静的合作。他说，他的

^① Strana.ru/news/166238.html.

^② Strana.ru, 2002年11月12日。

社会民主党有具体的行动纲领,共有 62 个地区分部,3 万多人。已经用了九个月来制定党的章程和纲领文件。戈强调,在杜马和总统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组成联盟,这对参加竞选和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是必需的。如果我们分散行事,那将一事无成。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斯拉文也说,戈尔巴乔夫当然愿意同谢列兹尼奥夫的组织合作,但估计谢列兹尼奥夫不会同意和戈氏合作。从目前的情况看,事情也确实如此。

2002 年 11 月 14 日,“俄国”运动信息服务部主任谢尔盖·卡斯托尔诺伊介绍了复兴党的情况。他说:由于复兴俄国党的建立,左翼阵线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列旺·阿赫马赫昌(Левон Ахмахчян)领导的“劳动人民自治党”同复兴党及运动关系密切,我们将一起参加竞选联盟。现在复兴党有 61 个地区组织,25 000 名党员。我们是强大的,首先在下面各地区是强大的。党接近中派,但采取左的方针:经济上是市场方针,在社会领域是社会取向的党。我们的选民是较为年轻的人群,其中包括俄共党员和同情俄共的人。我们不要老年人,他们活到这种年龄,已经不可能改变观点了。

俄共主张国有制应当扩大到所有部门,但这是一条死胡同。谢列兹尼奥夫不想走这条死胡同,这就同久加诺夫发生分歧。与俄共不同,我们对总统极为尊敬。我们认为,总统在多数场合是正确的。在立场不同的地方,党将在政府一级提出自己的主张,如较为快速发展的经济政策,总产量的增长不是 4%—5%,而是 10%,这将使我国得到较快的发展,等等。

在俄国左翼运动中出现“俄国”运动和复兴俄国党,根本原因是政见的不同,然而俄共在处理杜马风波和党内分歧上出现的明显的失误,也促使俄共的分裂提前到来。一个是要不要从事议会工作,利用议会开展斗争,俄共在遭到中派和右派的夹击下,“一气”之下退出议会中的所有职位,是欠考虑的决策。要让出职位很容易做到的,也是对手们求之不得的事。但以后要再取得这些位置,就难了,特别是像议长这样的职位。从事议会外的斗争,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这一切并不妨碍俄共留在议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上开展工作,哪怕只剩下两个主席位置。而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则直接导致俄共的分裂,导致人民爱国联盟的分裂。在杜马选举在即的情况下,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在目前情况下,复兴俄国党的出现还构不成对俄共的重大威胁,但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目前俄国的社会思潮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或一般群众中有一定的市场,甚至某些中间派别也打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希望俄国出现西方某些地方存在的那种社会国家,并且建设社会国家的目标已经写入俄国宪法。但是,俄国至今没有出现一个有号召力有吸引力的社会民主党,各社会民主党派各自为政,单独行事,戈尔巴乔夫想把这些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但收效甚微。但这并不排除有朝一日出现有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式的可能性的。从俄总统普京建议俄共改名社会民主党,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组建复兴俄国党,可以看出俄国的当权者也希望俄国出现一种类似西方的社会党,以使俄国走上西方现代政党制度的道路。群众需要,当权者需要,社会党的命运未必是没有前途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苏联剧变后俄国左翼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失败。毫无疑问,这是社会主义遭受的最大的挫折,是由斯大林创建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

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内的左派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党派和学者,纷纷对存在70多年的苏联,对活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从中汲取教训。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是一些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其中许多人并不属于任何党派。目前有几个较大的组织在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取向学者协会”、“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联合会等。它们组织过多次圆桌会议,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当代社会发展构想:社会主义观”,“当代社会构想:自由主义观”,“改革:构想、实现、教训”学术讨论会,等等。《自由思想》、《选择》等杂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左派力量的命运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出席这些讨论会的是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思想较为活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但这些学者的探讨多数情况下是脱离运动的,多半是学者们在研讨会和报刊上的议论,甚至他们拟定的各种纲领,也不免是纸上谈兵。从所能得到的资料看,他们提出的观点大多数是个人的见解,有的有待作进一步的论证和阐述,有的有待实践的检验,有一些作者的观点比较一致,而在某些作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甚至矛盾对立的

看法,有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

作为动态跟踪,本文着重客观介绍各种观点,以使读者了解俄国学者研究的情况和进展。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一些问题做力所能及的分析,但由于涉及的问题甚多,并且有些是全新的问题,到底应当如何看待,暂时难以作出评价,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其正确与否有待实践的检验。

苏联的社会性质

在总结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教训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问题,最多只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已。

最近几年来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说法,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政治贵族主义,过渡社会,或干脆就是极权社会。瓦斯连斯基称“国家封建主义”,政治学家韦特称“社会工业封建主义”,社会学家施卡拉坦称“极端的国家极权主义”,沙赫纳扎洛夫称“全面的思想极权制”,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称“工业封建主义”,希腊的苏联学家科斯多利阿吉斯称“军管制”即军阀统治,哲学家阿波温·叶盖杰斯认为是精英或“精英主义”的统治。

尽管说法繁多,但基本上是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承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予以维护的,如塔恰耶娃认为,斯大林消灭了整个寄生阶层——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商人,总之吸血的经纪人,我们的先辈在那个年代建立了社会公正的社会。另一种是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为的是彻底否定它。其逻辑是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罪孽,苏联的社会主义证实了这一点,如沙法列维奇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反人类和反人道的力量的体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又存在不同的情况。一种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苏联的崩溃,并不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因而苏联的失败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无关。哲学博士布坚科写道: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脱离并被官僚攫

为已有的社会,一个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的社会,是没有任何理由被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甚至不能叫做遭到歪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种观点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评价,试图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另行定性定位,有人认为苏联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可以名之为“超国家主义”或“国家主义”。关于这个说法,需略加介绍。

主张“超国家主义”者认为,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两种制度,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消灭封建主义的机构和实现工业化。

社会经济制度是由两个基本特征构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要这两个特征中有一个发生变化,就会改变制度。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之所以会存在两种制度,是因为所有主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存在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在古代有古典的奴隶制(西方)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此两者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大商品的非机器的(家庭的)生产。区别仅在于所有制的形式:西方是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私有制,而东方存在的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换句话说,马克思所定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叫做“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

与此类似,苏联和西方存在的也是同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而苏联的是“超国家主义”。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所有制:西方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苏联是国家所有制。

在“超国家主义”下,国家是所有主,而全体公民则变成为国家服务的雇佣工作者。这样,国家变成了攫取剩余产品的剥削者。但这种“超国家主义”具有几个优势:(1)消除了对抗阶级。(2)消除了竞争。(3)可以借助于计划克服市场的自发性。(4)可以把巨大的物质、人力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一只手中(国家),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保证制度具有极高的生存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

官僚是从“超国家主义”得到真正利益的唯一的社会阶层。官僚虽也是雇佣工作者,但他们又是管理者,是部分雇主。他们把国家看作自己的集体财产。这意味着官僚寄生在国家上,经常企图重新分配国家的部分收入,因而给整个社会,也给国家本身带来损害。如果官僚们发展到意识到本阶层利益,即成了自为的阶层,那么“国家对于失去自己的财产,对于官僚(管理者)变成所有主(资本家、官僚资产阶

级)的危险是无能为力的。这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已经看到了。

社会主义和所有制

关于所有制的议论是很多的。上述“超国家主义”仅仅是其中之一。按照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这个标准看,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存在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苏联以国有制的形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苏联应当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认为,苏联的国有制不等于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并不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是官僚所有制的形式。也有人认为所谓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无主所有制,劳动者对这种所有制不感兴趣,因此缺乏生产积极性,等等。

目前俄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这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下可以存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1)应当区分剥削的私有制和劳动的(非剥削的)私有制。(2)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个人所有制,这些成就必然导致“扬弃”私有制和确立公有制。(3)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的私人所有制和由公有制派生出来的消费的(个人的)及生产的所有制。(4)没有个人所有制,公有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在新的基础上,在这种集体活动和个人劳动活动,而首先是智力活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向个人所有制的回归,创造了形成“自由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斯拉温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谈到“消灭”私有制时,说的是Aufhebung,本意是“扬弃”私有制,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它。

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形成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正是其潜力导致产生新形式的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形成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社会处于过渡状态的特点。

劳动集体(工人合作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实质是消除这些合作社里存在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就意味着消除雇佣劳动的条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在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经典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关系,因为劳动集体所有制不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并行,而是在其内部实现的。但新

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资本主义内部诞生和发展。

列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对合作社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劳动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他来说,劳动合作制(用现代的术语说,劳动集体所有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是“新的组织居民的原则”。由此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文明的合作社”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劳动集体所有制被列宁用来解释社会主义本质本身。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指令性经济,或叫动员型经济。在动员型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从早期社会主义向较高形式社会主义的过渡。首先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即消灭雇佣劳动。实际上的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要求。就生产的技术工艺而言,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乃是两种形式的工业社会。生产的实际社会化问题的本质是在整个经济体制中消除雇佣劳动。实现这种历史性改造的方法是在一个人身上把工作者的劳动和老板的劳动合为一体。

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所有制,必须对这种所有制进行必要的改造。

普列特尼可夫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作者把直属的国家企业和自治的(人民的)国家企业做了区分。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完全所有制和对产品的不完全所有制,即一定数量的产品,其货币等价物成了劳动集体所有制。在第二种类型下,国家只保留生产资料的“最高”所有者的职能,而生产资料转归劳动合作社“全权经营”。产品归劳动集体支配,是劳动集体的财产。国家不实行直接管理,而是通过劳动集体的自治机关的中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国家企业使人能同时兼为劳动者和老板,消灭雇佣劳动。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问题

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在俄学者中存在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实际执行的体制的危机,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

社会主义危机还是苏联模式的危机

佩列古多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在发挥作为日益增强的国家的作用之化身时表现出的危机。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国家社会主义。

萨马尔斯卡娅认为,事实上崩溃的是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以苏联体制崩溃的事实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做结论是不恰当的。

布兹加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苏联集中了这一体制的深刻矛盾和缺陷。

B.A.梅德维杰夫认为,遭到失败的是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把它的某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社会主义危机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而首先是由于世界上整个文明性质的变化造成的,而这些变化是与工业化时代潜力的耗尽,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西方能适应新文明的条件和要求,而自称社会主义的社会却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自我改造和适应。

苏联失败的原因

对于苏联的破产,学者们普遍反对从帝国主义的阴谋,从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本身,从党内出现叛徒去寻找原因。俄学者指出的苏联失败的原因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

(1) 脱离人民,压制人民。苏共有意培养人民不去关心政治,竭力把工人变成只会机械执行的没有自己意志的群众。它压制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任何政治独立性的表现。苏共组织在其活动的最后阶段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感觉不到它是自己的党。人们不会奋起捍卫已经不再信仰的思想和价值观。

(2) 建在“铁幕”后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设施与传统,缺乏经济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的保护机制。它不允许异端和反对派,粗暴地压制任何批评,对上级机关的批评往往被看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以镇压手段来保证政治上的无菌性。结果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

(3) 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非常时期结束之后本应及时从动员型的社会主义转入正常发展轨道,转入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轨道。但它没有实现这种转变。最后形成了极权的、技术官僚的、官僚化的

社会主义。

(4) 不能满足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视角。社会主义诀别了对抗的社会经济的阶级的结构,满足不同社会心理类型的人的需求被提到了首位。有学者指出,存在不同心理类型的人:①道德基础不同的人,如利他主义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②创造才能不同的人,如发明家、创造性的执行者和普通的执行者;③组织倾向不同的人,如天生的首领,天生的民主管理型的人(“平权主义者”)和服从命令的人。

资本主义能够根据不同的心理类型,为社会三分之二的人创造相对稳定的合适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没有能满足大家的期待:①它企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成为共同的准则,这个企图破产了。其自身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得到实现。这一切不能不破坏对社会制度本身公正性的信念。②发明家和创造性的执行者的才能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运用。以参与政治生活、生产和地方自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创造的无限空间,受到集中管理和军营式的生活的压制。③天生的首领和“平权主义者”多数在不民主的制度压制下苟延残喘,只有顺从的“俯首听命者”认为这种制度是正常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下半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它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优越性和潜能发挥不出来。

(5) 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有一种片面的观念——认为社会化仅仅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合作的、国家的或者全民的。社会化的规律并不要求把国有化或者没收作为自身的目的。它要求逐步发展机器技术,而当前则是控制论技术、信息技术,使生产集中化,最后才会形成社会所有制和相应的分配形式。共产党人忘记技术—工艺社会化,组织—技术社会化的必要性。结果是,苏联的敌人掌握了前两步,而苏联几十年来只抓住第三步,认为公有制、并且是官僚集中化的公有制会自动工作,现在尝到了苦果。

社会的基础应当建立在当代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原则之上。而苏联的社会体系在半个多世纪里把国民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前的技术之上,约5 000万工人,其中40%是在没有前途的手工劳动的工业之中工作(60%的工人在建筑业,75%—80%在农业)。

(6) 苏联社会形成了在册权贵体制,或叫官僚体制。管理者摆脱了社会的监督,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老爷,组成了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现在俄国通常

把他们叫做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上级任命的列入干部名录的官员”)。它利用自己支配人民(似乎是“国家的”)财产的权力寄生在社会上。这样就形成了官僚极权社会主义。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变成为监视甚至镇压的机关。

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60年代)取消这种体制,这些官员拒绝以“各人按能力劳动,按劳动成果获得收入”的原则去取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形成人民政权;在册权贵阶级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并把政权转交给人民。这促使苏共和苏维埃政权蜕化、产生和加强资产阶级。

(7) 领导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马克思认为,“不学无术(或译作“愚昧无知”。——引注)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

有学者以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为依据,指出列宁一直致力于同落后、不学无术、愚昧、不文明做斗争。但斯大林开始了向愚昧无知倒退,他取消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经济核算及其他经济原则都不复存在,自然资源以非劳动创造为借口而不作估价,学校不再讲授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课程在整个教育系统被取消。强制命令、肆意妄为、平均主义、惩罚镇压、官僚主义以及其他灾难开始在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国内形成了违反经济规律的局面:价格按成本确定,不考虑利润,浪费机制开始运行。经济杠杆由进步的强大动力变成了阻力,而这更强化了对经济的不重视。甚至“经济”这一术语也不作科学解,而被等同于经营本身。赫鲁晓夫企图把苏共从政党变成经济机关,限制接受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入党,结果在70—80年代领导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负责的是具体行业的专家,他们不懂得下一步向何处走。戈尔巴乔夫文化浅薄,有外省局限性而又傲慢。叶利钦主义是集不学无术之大成。叶利钦缺乏教育,有病态的虚荣,贪图权势。现在俄国左翼运动也沾染了不学无术的病毒,如庸俗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寻章摘句地使用列宁的个别著作,简单化地利用从列宁那里胡乱摘引来的口号,等等。

(8) 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造成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在这一事实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适应向新的文明过渡的条件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节约时间的规律,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根源是科学技术革命。而苏联忽视了科技革命,也没有能找到新的依靠力量。实际上社会存在另一种力量,这就是发明者和合理化工作者。这种力量使美国和日本变得强大,它们取胜靠的不是市场,而是创造潜力。

还有不少学者从时代的发展,从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角度去分析苏联崩溃的原因,深化上述论点。

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

俄国的一些学者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时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如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转而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去观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垮台,主要是因为不能根据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科技发展,使自己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在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确定未来的任务时,实际上就是以后工业社会作为基本点的。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在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有学者指出,现实社会主义是古典工业主义的产物,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固有特征:耗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明显的所有制界限、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阶级对抗、党派性的政治结构。但现在“后工业社会”已在取代古典工业社会,其特征是:灵活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工业、所有制关系与阶级划分模糊不清、国家职能改变、出现新的社会主体和没有党派性质的运动,等等。社会关系受到新需求的影响,这些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不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利益。而历史上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没有准备好接受时代的挑战,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不完全符合当今的历史变动了。

列宁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共同点是对平等的追求。资本主义以市场(通过货币使各种商品和劳动均等)和民主制(所有的人作为选民是平等的)确立了平等。而社会主义提出了更深刻的平等方案(方案之一就是财产公有化)。寻求比自由民主的平等形式更深刻的形式,构成了工业时代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主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两种社会主义即使发展到相互对立的时候,仍保留着基本的相似之处。两者有四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1) 把工业进步看作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贫困、失业的必要

条件。

(2) 把无产阶级看作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直到 50—60 年代才有所变化：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感到有必要以“白领工人”来扩大选民群，而苏共则宣布自己为全民党。

(3) 承认国家在组织与调控生产和分配、实行涉及广大社会阶层的保护主义方面的巨大作用。西欧出现了“社会国家”，苏联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体制。

(4) 相信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并同它相对立的特殊社会形态。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才放弃了通过同资本主义决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两者也存在差别。一战和俄国两次革命期间考茨基、希法亭、伯恩斯坦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有巨大的潜力，能够通过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等适应大工业生产条件。列宁与此相反，他认为德国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

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实行激进的改造，而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社会保护领域。列宁认为既然竞争让位于资本主义垄断，接着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社会主义。

可以把列宁主义看作一种适合于农业国条件的、新的（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形式。列宁主义包含两个方面：①它是世界落后地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②它包含一个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改造方案。确定俄国改造方向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技术革命，它将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建立，它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工业时代已经显示了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相互渗透。

后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

联系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运动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使社会主义形成体系的最一般的原则遭到怀疑，这包括：

(1) 生产增长是无止境的，使一切都服从于生产的论点。工业的发展对地球生存构成了威胁，必须以质量的发展、对生态的考虑、对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利用，而不是以数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存在的必要的新形式。

(2) 社会领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缩减，新的生产只需要人数不多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是新的高收入的精英，他们的社会利益往往具有后物

质主义的性质。大部分新的工作位置是服务部门创造的,劳动者的基本群众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他们从事的是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他们不能承担领导社会的使命。在后工业社会里,只有精英劳动才能构成追求在生产、政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承担者。

(3) 新的时代使“社会”国家遭到有力的打击。这一过程在西欧国家和俄国是相同的。

总之,后工业社会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使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进步是人类走向物质丰富和普遍幸福的道路、关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仰成为问题。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仍将继续保留。

老的社会主义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服从质量标准的必要性,不过它还没有达到把整个自然界包括进去的地步。它按照绝对否定市场经济的精神提出解决办法,这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接近于“宗法制家庭”框架内的经济,即带有少量交换因素的自然经济。社会民主党人摆脱了这种观念,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思想。后工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应该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

从根本上讲,后工业社会将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那里人的异化将被完全消除,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事实,劳动将成为人的自然需要,社会将普遍实行自治,国家将消亡。这不是“民族社会”,而是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是全人类的解放。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类借助科技革命的成果努力摆脱科技革命带来的困境的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说,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当前的状况向上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知识经济和知识(智力)所有制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真正实现同时兼劳动者和老板于一身的要求,必须把生产方式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之上。亚·塔拉索夫教授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知识成了新的生产力。只有知识才能满足马克思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要求,能满足马克思向公有制提出的要求,即它同时也是个人所有的。马克思还在 1857—1859 年就意识到正是知识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直接生产力。

工业生产方式必然是商品化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是非商品化

的。物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变成商品,只有知识不是商品。商品在交换(出售)时由一个所有者割让,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知识在交换(出售)时成为购买者的“财产”,但并不脱离出售者。因此,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能够消除脱离(割让)的生产方式。这样知识实质上就成了人类的公共财产。人类全部知识的99.95%是人人可以获得。“信息社会”是向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社会迈出的一步。

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是“每个人对所有制的权利”,当然,不是对任何形式的一切所有制的权利。正是社会所有制才是每个人的所有制。现代生产中这种普遍的劳动条件首先是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知识是现实的社会化的主要对象。从更广义上说,社会所有制是对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所有制,社会精神财富是很难私有化的。科学、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既属于每个人,又为全体所共有。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能实现社会化。因此,社会所有制只适合这样一种生产类型,它被马克思叫做“科学”的生产类型(区别于机器、工厂生产),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型”、“信息型”等等。

可见,知识能满足马克思向公有制提出的要求,即它同时也是个人所有的。马克思认为,不这样就不可能克服异化,不可能辩证地扬弃私有制。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时代出现之后,才出现一种能够实现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的物质载体。个人电脑就是这样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它可以同时是个人财产和公有财产(如国际互联网所展示的)。在自己的电脑上工作的学者、作家、建筑师、音乐家、模型工都依靠互联网和数据库。另一方面,这些互联网和数据库如果不被利用也就毫无价值。

最后,全面电脑化和信息化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人人拥有电脑可以使社会全体成员参加重要决定的制定、通过及其贯彻执行。

知识成为基本生产力以后,必然会消灭工业生产方式。自动化、机器人化和电脑化无须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工厂,它们的本性是力求“小型化”,非集中化。经济上的非集中化应能导致政治上的非集中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作自治公社的联合体)。最后,自动化和电脑化将排挤工业劳动,使工作者转向高智力的创造劳动。在高智力创造劳动中将克服异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为此应当形成世界经济机制,世界资

本主义市场。但直到今天才形成真正的世界市场,即拥有全部民族典型特点,遍及全球的市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推动世界政治一体化。与此同时,粗放发展道路结束后,资本主义不得不走集约化的道路。这会促使知识分子形成群众性的社会阶级——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革命的主体应当在社会制度之外出现。不是奴隶消灭奴隶制,不是农民消灭封建主义。有学者认为,从这种方法论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主体不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无产阶级,而应当是学者,或广一些,知识分子。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是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同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着的新阶级,它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在未来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盟友是全体雇佣工作者(包括产业无产阶级)。

更换社会主义范式的必要性

一些学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更换社会主义观念范式,这指的是改变整个观念,直至改变观念的哲学基础。即使迫于生态问题,也需要一个现代的,形式和内容崭新的、能对当代世界及其前景提出社会主义认识的社会主义观。

制定社会主义构想的基本方向是:

- (1) 从结构论转向价值观。
- (2) 从“摧毁”论转向有机论。
- (3) 从目的论的决定论转向对社会历史创造活动的非预先决定的不同方案的意识。把历史看作人们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由无个性的客观规律所预先决定的。这就需要重新思考衡量社会主义方案的社会哲学尺度。例如,把进步理解为直线上升的发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还必须放弃革命救世论。关于社会和谐一致(它被用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观念也是天真的。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应当寻找调节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

(4) 从对人类社会以及相应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完全单一性,转向包容各种社会、文化、文明的多形态系统的观点,转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即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5) 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认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转向全球的角度。

(6) 从社会主义观念(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排他性转向在思想和政治

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哲学和政治意义上,这种讨论意味着各个社会政治力量、运动、思想流派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社会政治思想运动的建设性进程。

俄共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苏联共产党也不复存在。在原苏联地区成立的各独立共和国内或者出现独立的共产党,或者在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党。在俄罗斯联邦内则同时出现好几个共产党。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号称有55万党员。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俄共渡过了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和最大的反对党,对俄国政局的发展发挥重大的影响。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成为唯一有实力同叶利钦竞选的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俄共也面临众多难题。这就是队伍年龄老化,支持者队伍老化;党内意见分歧严重,无法取得统一;理论力量薄弱,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无力作出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结合的回答;俄国共产主义队伍处于分裂状态。俄共为解决这些难题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俄共总结历史教训中的两难处境

一个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的党,只有从失败中找到教训,才有复兴的希望。在俄共面前摆着严肃认真地总结苏联解体、苏共破产的经验教训问题。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了新党纲,其第二节是“俄国的历史教训和摆脱危机的途径”,用专门的一节来总结教训,这说明俄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认真对待了。

俄共是建立在原苏共的基础之上的,自认为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这就使它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从苏共那里有所继承,包括苏共的理论方针政策中的正确的东西和好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同苏共的历史错误划清界限。这里的关键是分寸的掌握。对苏共的历史,俄共不能像其他党派那样认为一无是处,骂倒一切,而必须作出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纲领肯定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空前社会成果。它指出俄国的历史证实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在国家面临崩溃,大难临头之际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夺取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国家夺得政权后怎么办,采取什么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追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

俄共党纲肯定了苏联走过的发展道路,包括30年代开始提出的“赶超”任务,为国家工业化而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措施,仅否定其强制性质和高度集中化。这里就出现问题了。首先,苏联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同高度的集中和集权分不开的,是同超高速分不开的。没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本不可能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在目标和方法上,不可能分开来肯定一点而否定另一点。其次,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加速实行”或强制的问题。苏共在农民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是违背了列宁关于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吸引农民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示。

另一方面,党纲在肯定30年代的“赶超”的同时,却又否定50—60年代提出的“赶超”任务。这种肯定和否定本身陷入了自我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在劳动生产率上必须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摆在社会主义面前的一个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然而,这个任务直到苏联解体仍然没有完成。“赶超”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应当清楚,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决不是可以用一两个运动在短短的几年里所能做到的。其次,不应当简单地把赶超归结为几个数字指标的赶超,而应当是劳动生产率上的赶超,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整个国力上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纲领把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看作是“过时的生产力模式”,而不承认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可能性,在这个论点的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观念。

苏联的解体显然是同苏共本身的错误分不开的。党纲说的完全正确:“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的。”然而在正确的命题下所作的分析却是值得质疑的。党纲说,苏共内部历来就存在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民主的和官僚主义的倾向。十月革命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由于人数众多和长期存在,“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所谓小资产阶级,而完全避开无产阶级自身的问题,这同列宁比起来,是个退步。列宁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指出了无产阶级本身蜕化的可能性,并发出过警告。

党纲指出,党内存在“两翼”,“两股潮流”,它们之间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实际奉行的政治路线。然而在这两翼中到底谁代表正确,谁代表错误,纲领并没有具体地对一系列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除列宁外,党纲仅仅肯定一个领袖——安德罗波夫。

苏联的改革,起因于斯大林时期推行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带来的后果,包括因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造成的畸形发展的国民经济,对农民的长期剥夺,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的盛行,缺乏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苏共党内的有识之士已深感这种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作了多次的改革尝试。应该说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的代表。这里问题不在于个人多么高明,而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党内广大党员的要求和愿望。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错误,其中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无疑是负有责任的,但不能由此不加分析地用一句话对他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多次见过一些曾站在历史的潮流前面的人物最后被历史所抛弃的事例。对苏共的某些人也可作如是观。

俄共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它所处的两难处境。它需要强调对苏共的继承性,但又想同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因此就把过去的错误推给某些“叛徒坏蛋”。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未必明智。一个严肃的党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正确吸取教训,避免以后重犯以往的错误。这里的困难是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清是非,作出合理的解释,求得广大群众的谅解,从而再次获得群众的拥护。

苏共的纲领也对苏联历史作了初步的总结。它肯定了十月革命、卫国战争、苏联的建设成就,认为这些成就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中包括劳动者的苏维埃政权,各族人民的友谊,集体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的计划性,等等。它认为,严格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阶段是必要的,它保证了工业化的成功、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在军事战略上同美国取得了均势。不过纲领指出,生产资料的过度国家化、过度集中化,抑制了劳动创造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造成了平均主义。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改造没有进行到底。这一切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

总的感觉是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对历史的总结尚有待深入。

俄共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提法

1996年1月召开的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党的标志是“锤子、镰刀和书——象征城市、乡村、科学文化界劳动者的联盟”。这就是说俄共的社会支柱除了工人和农民，还加上了知识分子这个在当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集团。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明确写上党纲，除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外，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处在目前这科技革命的时代怎么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归根结底，也就是怎么估计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俄共党纲写道：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劳动将越来越变成主要是智力劳动”。

1996年1月12日，俄共召开秘密的中央全会，久加诺夫在会上对作为“未来代表”的“先进阶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这是“能以自己的活动为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创造条件的劳动者。这个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第一部分是指俗称技术人员的人。他们又可分为两种：

一为物质、高技术 and 科学密集型的生产者，即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学家、建筑师、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

二为非物质产品，即保障生产系统和社会基础设施功能的软件生产者。在发达国家，这类劳动的产值已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这部分劳动者作为主导生产力，其活动是科学和他们本人的科学知识 with 自我发展。

第二部分是指人文科学部门的劳动者，他们保障作为劳动和社会生产主体的人本身的再生产。这包括保育员、教师、使休息得到充实的服务人员、医生等等、现在正是通过他们的劳动实现主要的生产投资，对人和对个人发展的投资。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称作生产者。”

久加诺夫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目前正经历深刻的质的和结构的更新阶段。在生产工人的成分中实际上加入了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他们同高度熟练的工人阶层一起构成新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核心，社会突破和技术突破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这是“21世纪新的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大俄罗斯主义

俄共是目前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大的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在社会主义思想失去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俄共在设法制定出能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

为此俄共提出一个论断：“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历史上，所谓“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预言。其最早的含义是，在拜占庭——第二罗马崩溃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已从君士坦丁堡转到莫斯科，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负有救世主的“世界使命”。

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使命感并未消失，当时的苏俄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欧革命，另一方面又把莫斯科看作世界革命的基地，负有解放全世界的历史使命。这样，“第三罗马”的观念就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得到了发展。俄共在其纲领中所使用的“俄罗斯思想”一语就是东正教“第三罗马”，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思想的继续。

不仅如此，“俄罗斯思想”还包含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俄共党纲断言：“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所谓恢复苏联，是以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为出发点的。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苏联版图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在斯大林时期还有所扩大。俄国需要恢复苏联的版图，这是俄共的一个目标。为此，他们对沙俄向周边殖民扩展的历史作了美化。久加诺夫称：“我们地域的开发和新大陆不同。不是高举刀剑，而是举着十字架往前走的。带去的是语言、知识，而不是毁灭。因此自古就住在这里的所有民族都留在俄国。把我国联结在一起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

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继承了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传统说法。历代沙皇经过几世纪的征战，把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扩展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同西方的殖民帝国一样，靠的同样是刀剑和枪炮。别的不说，车臣问题至今闹得不可开交，历史原因就在于车臣是沙俄通过多年的战争兼并过来的，并且在苏联时期又遭到无端的全民族迫迁。

分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俄共纲领设想分三个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一阶段是争取建立救国政府，其任务是消除“改革”的灾难性后果，制止生产下降，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促进原苏联各共和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体化。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时期，恢复时期。劳动者将广泛地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的主导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第三阶段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符合最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要求的经济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关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将

占优势。随着劳动的实际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这些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将逐步确立”。

俄共纲领中关于第一阶段的任务,在其“最低纲领”中阐述得较为详尽,而对社会主义阶段到底要实施哪些措施,显得比较抽象。对俄共来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是可以理解的。

新的形势与俄国左派的任务

俄国的当前社会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导致俄国向资本主义倒退,国内出现新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抗。一些学者对俄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当今的俄国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但资产阶级(“新俄罗斯人”)远未事实上成为统治阶级,未能建设性地解决管理社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小撮寄生虫,其中包括大部分原苏联党政机关干部。这一小撮人掠夺人民财产,做投机买卖,放高利贷,积极为外国资本服务,道德沦丧,使社会犯罪化。

社会成为没有主人的社会。有私有者阶级,但没有主人阶级。以前工人阶级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主人阶级,而现在连名义上的主人阶级也不是了。

目前俄国的社会生活具有下列特点:

(1) 客观同主观脱节。客观上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已无法忍受,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执政当局的主观抗议,忍受的心理占上风。缺乏能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思想、组织、政党和运动。

(2) 下层同上层脱节,即共产党人、劳动者、公民的下层运动同官僚化的空谈的上层领袖的脱节。

(3) 近年来上层不断制造左翼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

(4) 左翼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同工会、青年、妇女、军人以及其他组织联系薄弱。爱国主义力量分散和相互对立。

(5) 最危险的是错过开展全国共同行动的许多机会。过错在目前的多数左翼领袖,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新的能采取行动的领袖。

走向新社会主义的道路

俄国的社会已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反人民的社会。右翼反动力量已经破坏

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的吸引力,特别是斯大林的和斯大林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但目前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揭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用民主、集体主义和个人的首创性的结合,采用不同的经营方法,全国性的利益同私人的首创性的结合等等丰富了社会主义。

学者们认为,通向新社会道路的主要原则应当是:

- (1) 创造的道路,排除不必要的新的破坏。
- (2) 社会发展的社会方向——为人民的福利,为提高劳动者、退休者、青年、军人以及其他劳动居民的福利。
- (3) 经济中保留一切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的东西。消除社会寄生现象。依靠劳动,依靠生产,而不是依靠投机。
- (4) 劳动者和人民用5年时间整顿和提高经济和文化。
- (5) 合理使用社会国民财富。

这些举措将会提高“更新的、民主的、人道的、人民的新社会主义”的威望。

需要人民民主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在得到多数人的民主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革命的悲剧,不在于2月用暴力推翻了专制制度,而在于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没有将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突变性发展和社会主义幼苗的全面危机。

俄国左翼力量在最近几年的战略应是“培植”人民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动力。不急于恢复或重建社会主义,原因是向新社会过渡比不久前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左翼运动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继续。

和平革命的前景

需要使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在人民取得普选权、罢工权、政治统一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完成和平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

通向政权的合法道路要求采取难以想象的迂回手段,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取向。在存在核能装置和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热内战,对俄国及其邻国来说等于自杀。为此普通劳动者应当团结在“向人民政权前进!”的口号下。但是,它要成为和平的革命需要若干条件,其中有:①哪怕部分地修改宪法和选举的做法,给予更多

的民主。②大部分军队、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保持起码的政治中立。③雇佣工人和居民的组织以及其他的民主组织比现在有更高的质量。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学者的反思和总结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1)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党政权,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已摆脱了统一的模式的束缚,也没有了行政干预,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自由探讨的局面。

(2) 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呈日趋多样化。对社会主义的阐述、解释、议论已不限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等传统范畴,而是拓宽领域与视野,把社会主义放在俄国的历史传统、当前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等等多角度去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对于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开始结合20世纪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末出现的许多变化了的形势,来回顾、反思、检讨,总结其成败得失,其中不乏一得之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趋于深化,但仅仅是个开始,仍然缺乏系统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新和现代化的一个契机,是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适应俄国现代发展,特别是适应21世纪要求的良好契机。

(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俄国第一大党,也是最大的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它经过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它目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既无时间,也缺乏具有较深理论修养的理论家去总结历史教训,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失。有些理论家如斯拉文由于观点分歧而退出了俄共。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对苏联和苏共历史做了总结,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创新,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但总的看来其总结和对理论问题的阐述仍显得粗糙,而且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清,甚至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4)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占多数的观点是:①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失败。②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某些原理和公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修正和补充。但对如何具体发展学者中意见不一,短期内也不会达成共识。③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应当是公有制为主,他们反对实行私有化,但承认私有制的存在,不少学者把马克思所说

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同新出现的知识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点。④多数学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应当是计划经济,目前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计划同市场结合起来的“中国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市场经济的提法怀疑者不少。这也是他们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⑤多数认为,俄国应当继续走社会主义。但目前不应当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应当争取建立“人民政权”,进行人民民主革命。⑥除极少数,普遍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的合法斗争,也反对在未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承认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等西方通行的制度。俄共把自己定位为“建设性的反对派”,指望通过议会斗争、民主选举、全民公决取得执政地位。但这条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5) 在原苏东地区,俄国比较有可能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有一批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的学者,他们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有切肤之痛,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弊病有亲身感受,因此有可能从失败中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有可能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相形之下,中东欧国家则比较薄弱,这里许多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外来的东西,是苏联强加的,不符合本国国情的东西。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学者由于较早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危害,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剧变后左翼政党忙于政治斗争,从事这项工作的只剩下少数左翼学者了。

然而不管是谁,也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派,对他们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我们有必要注意跟踪,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辨别、分析,从中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

上下求索,各陈所见

——俄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1992—1997)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溃灭,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失败。毫无疑问,这是社会主义遭受的最大的挫折,是由斯大林创建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

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内的左派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党派、学者,纷纷对存在70多年的苏联,对活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竭力从中汲取教训。

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主义的概念

苏东剧变后许多理论家普遍感到,由于时代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过去传统的或现实的社会主义概念显得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在俄国的理论界出现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有的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定义,有的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俄共纲领的定义基本上回到列宁的定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按劳动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资料的,没有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资源的后工业化工艺的基础上达到的具有高度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的社会。这是具有真正民主和发达的精神文化、鼓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①

^①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2月2日。

在此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将占优势,而随着劳动的实际社会化的提高,将逐步确立公有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按照这个定义,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是过渡社会,而是无阶级的社会。此提法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有质的不同,后两者虽都称社会主义,但都未消灭阶级,是仍然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

另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公正的社会。

1996年4月,《真理报》编辑部就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举办“圆桌会议”,会上库拉什维利(博士)在发言中提出需要有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新社会主义是非官僚主义的,是计划—市场的、民主的和自治的。其特点是:公有制占优势;生产具有最大限度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人民生活水平高;优先为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投资;使计划管理和社会的自我调节相结合;以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苏维埃人民政权形式和多党制为基础的始终如一的民主制度。这是通过把中央集中管理和广泛的民族地区自治、各民族的自决及民族文化自治协调地结合在一起途径排斥民族—地区分立主义。”^①

1996年俄总统候选人之一沙库姆列举了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

- (1) 公正。
- (2) 社会主义是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中争取公正的一个永无休止的进程。
- (3) 社会主义是不断扩大民主的进程。^②

乌克兰的弗·希洛夫对社会主义作了更为广泛的解释。他认为,“任何一种主张限制市场自发势力、主张对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政策。既然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所有国家的政策就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部分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都宣称他们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运动,比我们改革前要广泛一些。”^③

有一些理论家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梅朱耶夫认为,社会主义本身的未来不是回归过去,而是与复兴和革新社会主

① 《参考资料》1996年5月31日,第24—26页。

② 《莫斯科真理报》1996年4月24日,《参考资料》1996年5月22日,第41—45页。

③ 《自由思想》1995年第3期。

义思想,与把社会主义思想溶入现代精神文化相联系的。与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一起,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社会—哲学知识和我们时代全部精神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梅朱耶夫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以“自由的个体”为取向,这种个体不同于自由主义所维护的“私有者”、私人。如果说个体原则是全部欧洲文化发展的基础的话,那么私人(私有者或私有工作者)所体现的私人原则,作为分工的结果,则构成了全部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私人原则在生活的一切领域的胜利,也就是这一文明的主要成果。与其对立的是包含在文化中的个人原则,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恰恰是这种个人原则。从这一观点看,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西方文明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的自我批判。所以,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自身内部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只能在西方社会以后的演化中得到解决。

在我们这里崩溃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即千方百计使之现代化而仍然保留了传统主义和古代“胎记”的社会。社会主义在此不是以其本来特性,而是作为一种现代化(或工业化)的方案出现的,这种现代化不仅使国家保持了完整,而且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工艺上的和经济上的差距。不要完全消灭所谓社会主义选择,而应逐步使其向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方针靠拢,使之民主化,将之纳入法律规范和设施的作用之下。社会主义者今天应以自由主义口号武装起来:市场、民主、法制国家。否则,就不会有现代文明,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并不是要社会主义者处处像个自由主义者。市场经济的口号是由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几乎被他们看作是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这是一回事,而同一口号落入社会主义者“手中”则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主义者明白,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其中不包含终极真理,需要国家和社会结构对它的消极后果进行一定的限制和调节。

要求社会公正首先是自由主义的口号,是社会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那里取来的。无论如何,社会公正的思想不是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准,而是使他们接近并联合起来的東西。把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事业。

除自由主义捍卫的个人享有的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外,社会主义还补充了

人人享有文化、自由发展和自我表现(自我实现)个性的权利。它所捍卫的人权,不仅包括根据自己劳绩和劳动努力而拥有(获得)的权利,而且还有成为上帝、自然或他本人所创造的人的权利。自由主义主要诉诸权利,社会主义则诉诸道德。就本性和起源而言,社会主义较道德化。权利是实现公正社会的条件,道德是其人性、人道的基礎。公正原则极其重要,但却不能解决人所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所以,奉行平等权利原则的自由主义,不是导致“历史终结”的完成的社会理论;它不可避免地要向更高级的价值方向漂移,不仅保护人、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平等,而且保护其社会和文化的实际平等,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上搞平均主义。^①

哲学博士 Б.Г.卡普斯京认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存在三种错觉。

(1) 错误理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把集体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

(2) 认为国家与市场是对立的。

(3) 把社会主义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与私有制的绝对化联系在一起。

卡普斯京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取决于能否克服这三种错觉。而目前,社会主义确如梅朱耶夫所言,只能成为一种批判,首先是文化批判,而不是独立的实践纲领。

Ю.А.克拉辛也认为,在国家与市场两分法的框框内,确实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可以跳出这个框框,克拉辛援引哈贝马斯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三个调节因素的思想,这三个因素是政权、货币和团结。缺乏团结这个因素则整个社会主义构想就毫无意义。

实际上,政权和市场(货币)已经表明了自己能做到的极限,超出这些极限,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只有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力量的团结才能做到。正是团结才能限制国家和市场的三专横。

在揭示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特有立场时,梅朱耶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正是“每个人对所有制的权利”,当然,不是对任何形式的一切所有制的权利。正是社会所有制才是每个人的所有制,但这只是对成为所有人

^① 《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

劳动的条件即“劳动的普遍条件”的东西的所有制。那些成为分工劳动手段的东西,那些只有在一定生产部门工作的人才能利用的东西,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化的对象。社会所有制仅仅是每个人缺乏不能进行劳动的财产的所有制。现代生产中这种普遍的劳动条件首先是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知识是现实的社会化的主要对象。从更广义上说,社会所有制是对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所有制,社会精神财富是很难私有化的。科学、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属于每个人,亦即为全体所共有。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能实际社会化。因此,社会所有制只适合这样一种生产类型,它被马克思叫作“科学”的生产类型(区别于机器、工厂生产),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型”、“信息型”等等。在这里,科学正在成为主要生产力,而人与科学的结合决定整个生产进程。如果使科学仅仅成为私人所有,那么生产就要停止。文化和科学永远是全民财富,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也应成为每个人的财富,这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它们实际上的社会化。梅朱耶夫最后说,没有人断言,私有制在今天已经丧失了作用。但也有某种它不能覆盖的东西。如果说在物质财富领域要求自己劳动所得或成功从事经营所得的那部分财富是合理的,那么在精神财富领域要求一切,同样是合理的,并且与个人收入无关。^①

C.伊·冈恰鲁克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是合作互助的集体社会关系的制度,其基础是生产工具和手段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劳动集体及其委员会广泛参与生产活动的管理。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属于劳动者,采取的形式是有不同集体代表参加活动的人民代表苏维埃。劳动代表苏维埃在转变为自治机关。

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在有科学根据的工艺基础上为满足社会成员合理需求稳定发展而组织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剥削关系是不能接受的。在社会消费基金的基础上按劳动分配,而自由表现在人民政权上,表现在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发挥在一切领域的才能上。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占优势地位、采取苏维埃形式的劳动

^① 《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

者政权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的制度。^①

马恩列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近年来不断受到攻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做文章,断定实践证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社会主义没有前途。哲学博士阿纳托利·申德里克教授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社会主义面貌及其对当代俄国左翼政党制定战略的意义》一文中对此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为了真正理解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应当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对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经典作家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他们在不同的著作中谈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恩格斯1875年3月18—25日给倍倍尔的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哥达纲领批判》。他们拒绝构想某种社会理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他们对社会主义面貌的描述是随着理论观点得到政治的检验而逐步展开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这样,共产主义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崭新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社会。这个新制度的因素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产生新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意识的世俗化,使个体从教会的精神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资料,《对话》1997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20页。

神压迫下解放出来(“共产主义立即从无神论开始”)。

必须指出,任何一个马克思的批判者都没有提到上述社会主义的定义。

按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看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资本家阶级手中没收了生产资料,也就消灭了竞争、社会财富的浪费,停止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变互相竞争的私有者集团为劳动者的协作社,这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和工具,按照共同协议分配产品。至于社会主义下的国家制度如何,是否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阶级,暂且还没有涉及。关于异化理论、国家学说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等,也同样如此(这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定义为没有财产的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出卖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的劳动力的社会阶级)。

但这样看待社会主义的时间并不长。社会主义的面貌不断地得到新特点的补充,得到具体化,更紧密地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联系在一起。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未来社会已经是没有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但个人劳动所有制仍然保留,因为它是“任何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细胞是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此联合体把所有权力的功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公共权力不具有政治性质,因为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只在新社会形成的第一阶段利用权力的力量,这时候有必要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以后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将取代对人的管理。在这一时期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下是没有阶级的,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废除了旧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它也消灭了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消灭了一切阶级及其自身作为阶级的统治。他们设想新社会将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所有的银行业务将只由拥有国家资本的中央银行来操作,其余银行将实行国有化。人人必须劳动,等等。

可见在早期阶段经典作家设想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的权力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立即产生的社会,这里存在的不仅是法律上的平等,还是实际上的平等,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总财富的分配同所付的劳动的数量相当。这是没有商品、没有阶级的社会,这里没有货币,付出的劳动的等价物是专门的收据。没有军队、警察和宪兵,对付内外敌人侵犯的职能由武装的人民承担。这种社会制度在自治的基础上运行,每一个达到一定年

龄的社会成员都参加这一过程。

遭到一些人猛烈批判的正是这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

但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没有停步不前。巴黎公社促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性质和结构成分作了重大的修改,得出了全新的结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记载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里。如果过去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现在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存在一个带有明显的旧社会印记的社会机体。资本主义的胎记是不能一下子消除的,将到处显示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一过渡阶段国家将存在并履行自己的职能,由于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活动的内容及要解决的任务已经改变。随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的停止,国家将把自己的职能转交给劳动者联合体。

平等问题的提法也变了。在早期他们倾向于在“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那种对平等的理解,并批评圣西门及其追随者(因他们坚持按照劳动贡献分配产品),现在马克思确认,平等的权利仅仅是用劳动来衡量个人的效益和作用的权力。由于一开始就存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不平等、熟练程度的差异等,这种平等如同所有的权利一样,就其内容来说乃是不平等的权利。

对社会主义下的分配机制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完全单一地断定,在社会主义下创造的价值不再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坚持直接的产品交换,现在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形态的低级阶段,“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①

发生变化的还有他们对工人阶级统治的方法问题的观点。如果过去他们坚决主张革命的暴力,现在他们承认通过赎买来消灭私有制统治的可能性。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思想。还在不久前,恩格斯曾嘲笑杜林主张存在城乡矛盾、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矛盾、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他们承认存在这些矛盾,虽然他们强调,这些矛盾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第一阶段。

对所有制的统治形式问题他们也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1页。

条件下公有制必然以国有制的形式出现,但随着国家成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国有制将变成全民所有制。

《哥达纲领批判》对社会主义下了一个精彩的定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模式。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轮廓作了最后的描述,1886年恩格斯写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①这样,恩格斯就宣布了社会主义下所有制的多元化,这在经典作家的早期著作中是予以否定的。既然存在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也就存在不同的阶级,它们的消失需长时间,不是一个历史时代能解决的。

结论是:在马恩那里,社会主义的面貌在他们活动的后期同前期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谈谈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列宁著作的分析显示,直到1921年以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遵循《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虽然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的思想是《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思想的继续)。由此出现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尝试,直接的产品交换,按照劳动的数量分配生产出来的价值,公务员和产业工人领取同等的工资,劳动军,把农民看作是不不断再生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阶层,粮食税,把金融和生产手段和工具集中到国家手中等。有一切根据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列宁观点的大转变发生在1921年,这时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列宁承认,错误发生在规定不同等的劳动给予同等的报酬,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机制和在农村成立公社,企图靠热情建设新社会,在实行改造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416页。

不考虑个人利益。

正是在这时候列宁产生了新经济政策思想,它立足于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的理解。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最全面的阐述是在其“政治遗嘱”中,特别是《论合作社》,其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强调工作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

列宁最后时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社会主义是有商品的阶级社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国有制,它同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其中包括私有制进行竞争,基本的生产组织不是公社,而是合作社,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劳动者的联合体。

列宁为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的文明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①

列宁设想的新社会是价值规律和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酬原则起作用的社会,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存在强有力的国家,但国家官员的机关处于人民的严格监督之下,劳动者通过苏维埃和社会组织最积极地参加管理。

可以看出,列宁保留了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原则原理,但也放弃了许多东西,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

左翼政党在制定纲领,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时至少要考虑两点:

(1)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

(2) 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考虑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如经典作家指出的,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②

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产生以来不是永远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俄哲学博士伊·康·潘金教授在《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逻辑》一文中说,在思想方面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整体。问题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不断发展和丰富,提出和解决前人不存在的理论问题,也不仅在于在工业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在向较不发达的和落后的国家传播时,有一个使之现代化的问题。不要忘记,如果忽略像社会政治实践这样的重要的来源(巴贝夫、勃朗基、俄国的民粹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5页。

^② 《对话》1997年第1期。

义思想家、伯恩施坦和列宁都把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当作政治实践问题),那就不能客观地评价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1) “伦理型”或“启蒙型”的社会主义

这是立足于公正的理想观念之上的,它同现存的制度对立,符合未来的社会。“启蒙社会主义”把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加于个人和社会,这种规范或符合“人的本性”,或符合真正的道德、人性的法则,是能解决所有现存的矛盾和对抗、保障人类关系和谐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模式。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思辨地构想能指出摆脱现存社会的出路的较高级的新知识。启蒙社会主义者相信,求助于理智就足以使人们改变其世界观。

作为理论家,启蒙社会主义的多数代表不懂得社会(包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望“有教养阶层”的自我修养。“启蒙”(“空想”)社会主义者观点中的伦理文化部分使得他们不能去思考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以及阶级对立的必然性的深刻根源。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社会主义中的革命派(布朗基派)认为,觉悟的少数人通过突然的迅速的暴力夺取政权及接着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改革社会,就能够建立社会公正。鉴于苏联人民的牺牲和沉痛的教训,这条道路不再能吸引任何人了。

在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形式的时候必须经常看到,第一,如伯恩施坦正确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第二,当代历史发展过程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纳入了自己的运动轨道,这常常造成一种不考虑社会文化(和道德)因素就不能找到出路的局面。

(2) 本体论型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常常被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寻找合理的思想,而是面向现实本身,现实由于其发展过程本身所具有的规律的作用而会产生通向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被解释成它将来必然胜利的证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产生的。它有自己的思想来源。但他们所依据的主要的东西,并且在著作中很少提到的东西,是在19世纪形成的对科学理想的“经典”理解,其“科学解释”的特点是内在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科学社会主义”获得了欧洲社会主义精英的完全承认。在倍倍

尔、考茨基、盖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等同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运动唯一可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去丰富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它还唤起产业无产阶级投身积极的政治生活。

不过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至少以三个假设作为自己的前提。

一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古典”(按 19 世纪的精神)理解,这种理解使它有很高的理论水平。20 世纪初出现非古典的物理学使这种类型的科学解释成了问题。同时,开始(由于修正主义分子的努力)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机械决定论。结果很清楚,作本体论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只适用于分析工人运动还没有走出相对原始的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论》中客观具体的从属性决定了个人地位和行为,而主观的选择和目的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无论如何,同列宁的论断相反,《资本论》的观点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哲学的基础:为解释政党和阶级的自觉行动要求有另一种抽象和另一种科学设计。

二是,人类发展的欧洲中心观。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方案主要是欧洲方案。当然,也设定解放应当包括全人类,其中包括最落后的民族。这些将获得自由,同时也获得与时代相当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民族的命运,是同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欧洲和北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希望“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①。然而历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过去被看作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一个台阶的时代,在整个 20 世纪变成了并列的诸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的现实,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发展向量,而他们合在一起互相作用就构成了叫做世界历史过程的东西。马克思的世界不再符合现实,现实是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的选择。

三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属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那时的工厂制度是在残酷剥削劳动力的不规范的基础上运作的。在这一阶段很难确定,经济危机、失业、人民群众的贫困化等是否属资本主义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35 卷,第 353 页。

的东西,因为这只是它的初期形式,由于工人运动、社会立法和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它自身在克服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把合理化生产和更新的社会前景同无产阶级革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缘故,无产阶级革命将消除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社会的束缚。然而以后的历史进程显示,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的完善中得到了解决(工资的提高、大众消费的增长、社会立法、资本和管理力量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的联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标准更适合过去,而不是现代,更不要说未来了。

“科学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积累应能推动欧洲社会主义者去扩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早框框,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提出对欧洲及其他地区历史发展问题新的和较有前途的看法。可惜,社会理论的运动不是沿“直线”进行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同样如此。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统派)僵化的保守主义导致一部分人通过根本“修改”“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学说(“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另一部分人通过用无产阶级雅各宾精神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为社会主义运动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运动朝这个方向发展远不是偶然的。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具体实施是不中用的。第一,它没有指示如何在政治上把理论变成群众行动所必须的因素。第二,它没有具体指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生产力(大工业、农业、交通工具)的发展到底应处于什么水平。因此到19世纪末,在变理论为政党的策略和纲领的时候,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做大规模的修补,一般理论最多只是指出运动的方向,而运动直接追求的完全是另一些目标。慢慢地社会主义运动的调子改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来定,这些人是在20世纪初登上政治生活的舞台的,他们不具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知识。无论党代表大会对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的猛烈抨击,还是俄国普列汉诺夫的威望,都不能阻止运动的参加者把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向实践(实用主义的实践或者革命的实践——都一样)。

转向实践的始祖在德国是伯恩施坦,在俄国是列宁。在上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中他们首先认识到,历史(和理论)的正确性并不总意味着真实的政治力量,要克服失去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前景,只有使社会主义政党把方向定在当前条件和当前形势的范围内现实可能和实际可达到的上面。

这是新思路的起点。社会主义大多变成了指导复杂的实际事务的政治学说。作为政治流派,它不再几乎集中注意力于解释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和规律,而是集中注意力于政治过程中那些社会主义政党可以起影响的,可以推向前进的或者可以放在一边的因素。实践的社会主义者现在已不是在现实的范围里活动,而是努力建立新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社会各因素的新的平衡。

“化为历史行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越出“古典的”机械论的决定论的解释的框框。谈到创造今天和未来的历史的时候,已经不能仅仅限于把社会主义当作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成熟起来的趋势来加以论证。应当学会影响具体的社会力量的政治方向,吸引他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向他们实际证明,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新的历史群体能够解决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由此社会主义者必须懂得产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及其他问题,也应懂得其他阶层如中小资产阶级、农民、雇农、知识分子等的经济及其他问题;在原则上承认“自己的”和“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相容的;最后,要相信创造共同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一起走能够克服社会障碍。

换句话说,如果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并没有脱离世界(社会现实),而被看作是揭示在它面前的历史现实的一部分,那么在“修正主义”那里(包括伯恩施坦和列宁),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是有别于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的。同旧社会主义的本体观不同,在新社会主义的天地里,说的已不是理想社会,而是“经验”社会:有效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所面对的是经验社会,而不是理想社会。

包括俄国在内,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都朝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方向演变,懂得了合理性和可企及性的作用,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主义纲领抛弃了猜测和幻想的成分。诚然,在左派社会主义者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革命这把“万能钥匙”,但连这种包含未来秘密的魔方也在被逐渐忘却。

社会主义理想的意义也在发生根本变化:在伯恩施坦主义和列宁主义那里,其基本意义都归结为帮助无产阶级政党站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之上,以现实可能的作为行动的方向。

总之,如罗素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从抽象的公正问题一天天地变成了可能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在理解战争所提供的可能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对立。

(3) 实用主义型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的特点是认识到必须同社会发展(也包括工人、妇女和生态等群众运动)积累的经验相适应。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水平的降低。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却是前进了一步。过去只是理论假设的逻辑结论,因而通常具有思辨的抽象的性质,今天已成为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研究的对象。依据他们的研究,考虑到多数阶层的情绪,社会主义者规定自己活动的目标,组织能够依靠民族的一致(例如反对新的贫困的斗争)使之实现的力量。

在19世纪末“右翼”修正主义的思想环境下产生的“实用型”社会主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致命的打击,但挺过来了,从40年代末起得到了复兴并获得了发展。当代实用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在这一意义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首先是在西方战后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待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在世界急剧变化(特别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不断地适应新的局势和环境,这就要求把过去的世界观变得较为复杂一些和现实一些。

严肃的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明白,生产的公有化(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并不会带来幻想中的复兴。相反地,庞大的官僚机关、领导者和执行者缺乏效率和刺激,为国营企业同私人企业股份企业的竞争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公有化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简单的经济合理性问题:社会自身应当决定,怎样有利,是把该企业、部门国有化,还是由私人掌握。但生产管理的民主化问题,生产集体对领导的监督问题(“参与问题”),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简而言之,以往社会主义纲领中的抽象性和空想主义消除了。

19世纪末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无产阶级的贫困并不是社会的贫困和野蛮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组织的不足造成的,它有利于对其解放条件的理解。20世纪的历史经验向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展示,贫困,甚至无产阶级的贫困,不能成为动员力量和教育(社会主义意义上)力量。正如30年代德国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它反而为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无论如何,事先规定的被叫做“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行列式,是不存在的。此

外社会民主党人还应当看到,在雇佣劳动中形成了或至少在形成两种不同的成分:传统的产业工人和所谓新的工人阶级(主要是从事现代智力劳动的人们)。前者的人数在减少,虽然今天还占多数,后者则在不断增加。建立这两者之间的合作不是没有困难和冲突的,这表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斗争上。

自然,像过去那样,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竭力使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成为“自己的”的问题,如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妇女问题、生态问题、个人享有不受国家机关压制的自由、民主的发展、微观结构同宏观结构并存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现在不是看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的问题,而是看作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选择的问题。因此当代社会主义者不把为社会主义斗争同资本主义的大决裂连在一起,而是同长期地改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连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个人享有不受机关压制的自由”,但并不侵犯当代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的那些大组织。

换言之,当代“实用主义”社会主义乃是实际上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世界观的前景(同作为出发点的一定公设联系在一起的)的否定。可以说,这是工人运动、解放运动的真正进步。无论如何,“实用主义”立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从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转向了实践领域,从政治精英的信念和意识变成了在一定经济发展和在一定的社会力量的配置基础上进行的历史的客观过程。

现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不把社会主义学说看作是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日常生活问题)的万能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性质往往促使它们根据近期的成就和失败来衡量自己行动的意义,这有丧失目的和前景的严重危险。但不应忘记,现代社会主义早已放弃“目的决定手段”的提法,对牺牲多数人利益的任何目的都持批判的态度。

当代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同时也失去了使之成为解放的意识形态、赋予道义动员力量的重要组成因素。

面对文化多元主义和已经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使经济利益的冲突退居第二位),社会主义再次面临更新自己对自由的解释、提出对解放使命作新的较高的理解的必要性。就像过去把阶级方针改为市场和民主方针成为摆脱运动危机的出路,今天从“经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观点转向对自由作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理解,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把自己同解放思想联系

在一起。^①

一些学者设想的当代社会主义的新概念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哲学博士布坚科从苏联改革以来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他在《今日社会主义:经验和新理论》一文中针对苏联和俄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他认为:

(1) 必须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社会理想三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曾经呼吁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活生生的运动,而不是僵死的强加于人的教条。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理想观,把社会主义理想当作马克思主义一劳永逸建成的、一成不变的逻辑构成体,以后的任务就是进行全面具体的解释。卢森堡对此提出过批评。1918年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指出,“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专政理论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事,只需要努力去实现就行了。……事情并非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

她强调一切都要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形成。“为了把社会主义原则引进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而采取的大量具体措施是什么样的,对此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党纲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加以说明。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社会主义是不能依据少数空头思想家的意图由上而下通过指令来推行的。

(2) 当代社会主义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的全部性质。当代社会主义观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恩列思想的简单再现。自马恩列思想问世以来,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他们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要求当代社会主义观予以解决。

(3) 是否需要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给皮斯的信中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

^① 《政治研究》1996年第4期。

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4) 社会主义的标准和对社会主义的总体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所有制类型做标准,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提出了新的标准——劳动者的利益,即离社会主义更近的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的社会,而是劳动人民生活得更好的生活。

马列主义宣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最重要的标准。某个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规模越大,所占比重越高,则距社会主义越近。如果这样,蒙古在70年代已生活在比民主德国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了。德国在70年代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比蒙古低得多。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际上被宣布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和内容。然而苏联生产资料几乎100%的公有化并没有把人带到“幸福乐园”。

生活在没有私有制、没有资本家的社会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过上了社会主义的生活。一个制度是否为社会主义,标准在于对劳动者的态度,对劳动者的利益和需求的态度。社会主义应当使人摆脱剥削和压迫,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并创造条件,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果一个国家消灭了私有制,代之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称为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满足劳动人民的重大需要,没有使劳动者成为生活的主人;而另一个国家虽然没有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限制了剥削和压迫,劳动者不仅日益充分地满足了自身的需要,而且在决定祖国命运和社会前途方面获得日益扩大的社会威望。两者相比,显然后者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在论述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实质时,用“劳动解放”来表述。斯大林只把这种解放局限于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却闭口不谈消除人对人的压迫。

压迫和剥削不是一回事。剥削是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一个人的产品被另一个人占有了。压迫则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斯大林的曲解是别有用心,是为官僚所培植的兵营式假社会主义提供根据。

官僚集团在不牺牲自身利益的条件下也完全能够使劳动者摆脱昔日的剥削形式。但按其本性,他们不会使劳动者摆脱压迫和新形式的异化与剥削,这些新的异化和剥削形式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即表面的而不是实际公有化)的兵营式假社会主

义条件下四处蔓延。

(5) 当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质的理解,不应依据某种所有制形式所占的比重(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比例首先取决于科技进步的程度及其在不同国家的特点),而要看怎样保障科技进步,怎样更好地使科技进步服务于劳动者和全体公民的利益。如果忽视个人的利益,不注意私有制的作用,就无法做到这一点。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是祸害,可以而且应当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应形成多元化经济。社会主义并非到处都只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是具有多层次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制、私人所有制等。

虽然现在很难确定“社会主义多元化经济”的结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硬性规定何种形式的所有制占多大比重,也与社会进步的过程和地方特色无关,而在于无论在生产组织方面,还是在分配方面,劳动群众的利益应高于一切。

人为地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合并为一种共产主义公有制,同时消灭私有制,这种做法经不起现代科技革命进程的检验,因为现代科技革命利用了多种小生产的形式。过去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6) 人民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要以新的观点认识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也接受议会制、分权制这些人民政权的实施手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新观念要求承认多元化民主及其特殊的多党制,另一方面要求在根本利益有重大分歧甚至对抗的条件下探索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新形式。既然充满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采取这种形式都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在少数富人的利益居社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保证了多元化民主的运行,就没有任何根据去反对进一步扩大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时确保多元化民主的顺利实施,因为这是一个公民利益更加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政权的首要问题是形成两种机制。

① 必须有一套政治保障体系和组织形式,即“监控体系”。

② 必须把全国所有公职人员都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7) 俄国的直接任务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走出社会经济困境,即从极权主义过渡到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长远目标则是确立社会主义,建

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①

哲学博士鲍里斯·库拉什维里教授在《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中论证了建立“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列举新社会主义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向新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他写道:

在我们这没有主人的社会里,只有组织在劳动集体中的人民才能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使它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一种新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人民心里出现,虽然还是模糊的。未来属于这个思想。新社会主义是俄国走出灾难性危机的最佳出路。

新社会主义不是多种成分的、不是国家主义的、不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自治的、计划—市场的、彻底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基本特点是:

① 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人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独占的统治地位。不允许使用雇佣劳动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允许多种成分。经济上没有存在多种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必要性,而在政治上这是有害的,可以排除的。

人民所有制只是有条件地叫做国家所有制,其实现形式是国家直接管理在垄断条件下(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国防工业,等等)活动的企业,绝大部分采取把人民财产无偿转交劳动集体全权经营(按照人民所有,集体经营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治的人民企业。由劳动集体负责其效益。这样就确立了自由劳动,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掌握者,实际参加生产的管理。

鼓励合作生产和家庭个体生产。

② 物质财富按照社会公认的劳动成果分配。

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在刺激自由劳动的效益的基础上,在发展工作者的个性和科学技术进步中保障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生产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人民的高生活水平。

公共消费基金稳定增长,这就能保证优先资助科学、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和保健,赡养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③ 国家的计划管理(主要是非指令性的)同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市民社会”)

^① 布坚科:《今日社会主义:经验和新理论》,《选择》1996年第1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④ 确立彻底的民主制度,其基础是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少数的利益,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兄弟合作,最重大的问题由全民投票决定,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代表权力机关优先的三权分立,在相互竞争并相互取代的社会主义取向政党发挥主导作用下的多党制。

⑤ 集中的国家管理同地区的和民族—地域的自主性、同它们的国家的或者民族文化的自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障构成统一的多民族人民的地区共同体、民族的正常发展。

新社会主义将成为自愿重建苏联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某些前加盟共和国可以在保持其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特点下同苏联联合在一起。

⑥ 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合作优先的原则之上。重建相对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能保障它们的独立、安全、工艺技术不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⑦ 新社会主义不怀疑人类总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向,但不企图人为地加速这一发展,主张让资本主义世界自身的矛盾和规律性去发挥作用。

对资本主义国家贯彻和平共处、互利的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方面的合作,而对发展中国家除此以外还给予力所能及的非军事的支持,使它们能以自己的力量保障进步和独立。欢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其中包括工作者所有制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社会纲领。

这就是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果社会取向的发达资本主义继续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形式,那么其超前的形式——新社会主义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正如我们看到的,新社会主义具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基础”,具有以前社会主义的某些变形的特点,具有与迄今为止已实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一系列崭新的特点。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征同时也是当代文明的特征。

经过不长的过渡时期,新社会主义将使社会回到没有阶级对抗的状态。由于其崭新的特点,首先是生产自治,该社会制度排除了产生官僚蜕化的可能性。“在同一地方两次摔跤的人是最笨的傻瓜”。然而,新社会主义甚至将比当代日本的生产组织体系更全面地符合人的本性、个人的意愿和社会中所有社会心理

阶级的利益。^①

L.拉斯托维茨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中也提出对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看法。

马克思确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没有阶级的社会的第一阶段。他没有把它看作是独立的社会形态,更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阶级的范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他支持并发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与西方不同的)的思想。

稍后,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由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完成的资本主义自然进化发展的结果。

列宁肯定可以在工农国家的监督下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其物质基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实际上是列宁同恩格斯的妥协。妥协表现在列宁承认必须有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10—20年),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共存。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实现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手段,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必须巩固农村公社的思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社会主义首先是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社会监督,而不是财产的全面公有化。这里重要的是为每一个阶级而实施这种监督。

生产资料的集体股份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是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但通常是人数不多的掌握资本的社会阶层支配和利用公有制的大部分,他们利用自己建立的立法原则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样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现代的理解,社会主义,还有民主,都是阶级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定义看,今天在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中有三种社会主义形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正在西方实现),在册权贵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在册权贵体制下曾经有过),人民社会主义(只有在真正的人民政权下才有可能)。

总的讲,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对生产和消费的监督。^②

^① 《对话》1997年第1期。

^② L.拉斯托维茨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2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资料。

社会主义和所有制关系

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俄国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按照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这个标准看,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存在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苏联以国有制的形式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苏联应当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认为,苏联的国有制实际上并不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是官僚所有制的形式。也有人认为苏联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无主所有制,劳动者对这种所有制不感兴趣,因此缺乏生产积极性,等等。

哲学博士尤里·普列特尼可夫教授在《所有制关系和社会主义》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主要论点如下。

(1) 什么是所有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所有制同类的概念是占有。但占有可以是自然关系(如占有空气、阳光和太阳的温度、森林的树木等等),也可以是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占有对象问题上的关系。在第二种场合,占有即所有。因此可以说,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对象的历史的一定占有方式。所有制总是同占有对象——物(物质的和思想的)联系在一起。然而,所有制并非物,而是人与人之间因物而发生的关系。所有制关系可以是经济关系,也可以是法律关系。换言之,经济所有制关系包着法律的外衣。经济所有制关系是广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使人们在对生产资料的相互关系上社会平等的(其占有的唯一标准是活劳动)是社会所有制。而社会不平等使得一些人(所有主)可以占有其他人的劳动(非所有主),这是私有制。根据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和实际占有的情况,可以划分两种私有制:基于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私人所有制,基于自身劳动的劳动者私人所有制。这第二种私人所有制形式,例如现代农场,不使用或者几乎不使用雇佣劳动,在我们时代可以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整合在一起。就主体而言,私人所有制可以分为个体的和集团的两种,集团私人所有制中包括股份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全民的(人民的)和劳动集体的所有制。

在所有制体系中智力所有制具有特殊地位。其客体(思想“物”)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马克思称为普遍劳动)的结果。智力所有制总是个体化的。其法律地位由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其他法规确定。法律规定的时限过去之后,思想“物”就不再成

为所有制的客体(只有造型艺术除外,对它的所有权没有时限),只保留其社会财富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占有。因此精神思想财富并不总是能成为所有制的。

也可以把私人所有制同社会所有制及国家所有制作一比较。国家所有制并不总是和社会所有制等同的。问题不仅在于社会所有制可能具有国家的和非国家的(集体的)形式,还在于社会关系的本质本身。国有化作为把所有制改造成为国有制的方式,是政治法律行为。它意味着形式上的生产社会化,即仅仅是所有制的法律关系的改变。因此,在我们时代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都可以采取国有制形式。只有真正做到生产的社会化,国有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除了雇佣劳动的那种社会联系可以看作是排除了一切歪曲的直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实际社会化的本质,以实际的社会主义内容去补充公有制的法律形式。

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外,在学术著作中还使用个人所有制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4章写道: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应当区分剥削的私有制和劳动的(非剥削的)私有制。②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个人所有制,这些成就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导致“扬弃”私有制和确立(这同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之后的下一段所说的是一致的)公有制。③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的私人所有制和由公有制派生出来的消费的(个人的)及生产的所有制。④没有个人所有制公有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在新的基础上,在这种集体活动和个人劳动活动,而首先是智力活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仿佛向个人所有制的回归,创造了形成“自由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

在我们时代消除雇佣劳动乃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32页。

(2) 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尽管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暂时的失败,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当前时代仍然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层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对立,在 20 世纪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首先同资本的社会化相联系的不可逆转的进程。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一进程包括从社会主义那里借用来的计划化和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劳动阶层的利益),在一些经济职能合作化的基础上的个体企业(例如,农场合作社、销售合作社、修理合作社,等等),使用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集体企业。产生了要求根本改革所有制关系的其他问题。资本主义走上了自我否定的道路。

到 20 世纪中叶以前,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选择。在下半叶出现了新的形势。国家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不再成为唯一的经济选择。在独立的社会经济成分中,开始形成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各种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现在平均约占 10%,国家的和私人的所有制,包括联合的所有制(股份公司)约占 30%和 60%。

从事中小生产的一般劳动合作社简单的数量上的增长并不说明问题。主要的是劳动集体所有制和劳动集体企业的潜力。正是其潜力导致产生新形式的企业。同普通的合作社不同,这些企业是同大中型生产相联系的,它提供了利用以最新科学技术的成就更新生产的无比广阔的天地。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形成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这样一种多种经济,其中存在就其社会形态的性质上是不同的所有制的历史类型。混合经济是社会处于过渡状态的特点。不是偶然的,在俄国和国外的著作中越来越经常地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叫做后资本主义国家。

劳动集体所有制具有它的优势。新形式的集体企业同工艺上可比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相比,除了工资较高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平均要高一倍,赢利率要高 0.5 倍,提供的就业岗位要高 2 倍。

劳动集体所有制确立了这样的原则:“谁在该企业工作,谁就占有该企业”,或者“不工作者不得占有”。因此离开企业的工人必须把自己的股票以及其他资产卖给劳动集体。他们获得货币补偿,而集体避免了潜在的剥削者。

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比较了他那时代的劳动合作社(工人合作工厂)和那时产生的第一代股份制企业,注意到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变资本为生产者的财产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①

马克思结论越来越得到实践的证实。新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一方面是合作社联社、联合体、联盟等,另一方面是工作者(工人和职员)的有限股份公司。

产生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成分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雇佣劳动的危机。雇佣劳动效益不高,并且随着最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其效益更加下降。雇佣劳动是没有前途的。

为回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劳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问题,还要请教《资本论》。如果说那时存在的股份制联合形式在马克思看来是变资本为生产者的财产的“过渡点”,那么劳动集体(工人合作工厂)不仅是“过渡点”,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实质是消除这些合作社里存在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就意味着继续马克思的思路,消除雇佣劳动的条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成为特殊的“他们自己的资本家”^②。马克思总结说,劳动合作社“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③

我们的时代证实了马克思的结论的正确性。新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诞生和发展。在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看作是经典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关系,因为劳动集体所有制不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并行,而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因而其发挥职能和发展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为了使新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至少必须具备两条先决条件。这留待以后再说。

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讨论的就是这个议题。会议特别注意稳定发展问题。会议的要求是限制物质需求,特别是“金十亿”的物质需求的自发增长,以此提高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形成合理的物质需求工艺过程的生态化和生态生产,即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保障保健和教育;调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498页。

节人口。会议的讨论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的最大障碍是私有制。人类正处于自己历史的转折点。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是私有制不可动摇,还是文明的灭亡。这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不仅意味着以社会主义为取向,而且是以共产主义的前景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是资本主义所没有解决的,这就是确立计划性作为历史进程的的决定性形式,没有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所作的当时看来是抽象的特征的表述,如克服奴役人的劳动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等,今天在发达国家中已是看得到的一种趋势。

世界舞台上出现新的工人阶级,其成分同 20 世纪初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同。新技术实际上打开了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道路。现在受过教育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成了工人阶级的基础。这里还应加上从事生产的脑力劳动工作者。现代工人阶级除了体力劳动工作者,还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工作的脑力劳动工作者。

在政治著作中提出一种关于在向后工业发展道路上形成更为广泛的人们的共同体的设想,它由不仅生产和再生产生活资料,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本身的劳动者队伍(“技术人文族”)组成。当然,在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这种共同体可以叫做特殊的新阶级。但是,如果看得深一些,看到同技术工艺学趋势并存的还有消除私有制的社会经济趋势,那么另一个问题消除阶级和阶级结构的趋势就变得现实起来了。

现在考察的当代世界的现实是无法纳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范围内的。它们要求作出自己的评价和概括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注意过的许多问题,已变得不需要或干脆被遗忘了。这也适用于列宁在制定新经济政策体系时提出的一些原理。

(3)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经济政策(合作社计划是其组成部分),是列宁思索十月革命的命运、探寻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产物。

在《论合作社》的文章里列宁谈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但

是有过改变没有？某些列宁思想遗产的解释者片面认为没有。他们认为，列宁的这些话不具有构想性质，因为这一段后面接着说，对社会主义看法的变化表现在把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向和平的组织文化工作上。

关于此类议论能说些什么呢？

第一，对列宁理论思想的辩证转变不能作如此狭隘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根本改变的话应当不是同个别的语句，而是同整篇文章，同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所有文章联系起来考察。第二，引用要得当。现全文引用有关语句如下：“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是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如果遵循列宁思想的逻辑，那就非常清楚：问题正是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的科学结论。列宁提到首位的是“文化工作”。这个工作本身是当时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造成的。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对改造整个社会关系的体系具有多种意义。

列宁对劳动合作社的理论分析同马克思的思想是吻合的，继续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把它运用于新的形势下。

列宁首先阐明了劳动合作社的社会经济本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体系。在私人资本主义下集体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不同，一个是集体企业，一个是私人企业。同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这种企业由于其非国家企业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是私人企业。不言而喻，在劳动合作社内部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消除，更加加剧了劳动合作社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

列宁明确规定了把劳动合作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缺口改造成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条件。^①政权转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②确立“大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然而列宁不是简单地指出合作社社会经济本性的改变，合作社在新的条件下向集体的（与国家的企业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转变。

列宁揭示了劳动合作社中马克思没有能也不能指出的新东西。对他来说，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动合作制(使用现代的术语是,劳动集体所有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是“新的组织居民的原则”。由此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文明的合作社”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劳动集体所有制被列宁用来解释社会主义本质本身。

由此还应当理解列宁的一个警告:实现合作社计划(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农民群众)在俄国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它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变成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杠杆。问题并不仅仅归结为在工人国家的支持下成立生产、信贷、消费等等合作社。新的组织居民的原则是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紧密联系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总的特点。

苏联曾取得当代无与伦比的劳动人民的社会成果,然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指令性经济,或者换一种说法,动员型经济。

动员型经济当时在国家国有化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它能集中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以保证卫国战争的胜利,并在短短的时间里恢复了国民经济。但在新的非动员的条件下,保持动员型经济就产生了消极作用。在动员型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从早期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建设较高形式的过渡。首先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即消灭雇佣劳动。因此国家所有制不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实质上变成了某种类似国家的形式,它也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生命。个人劳动,其成果和劳动报酬之间的经济联系带有形式上的性质。保存了诸如雇佣劳动和相应的工作者脱离财产,同时也脱离政权之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

管理的权贵排斥了劳动合作社,为自己攫取了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所有者的职能。在群众的意识中国家所有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某种官家的异己的财产。关于培养每一个工作者的主人翁感只是一句空话。

产生了更新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在俄国,实现此任务的必要前提是,使国家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过渡时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新经济政策,在这一时期是完全适用的。通过新新经济政策更新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衢大道。

劳动者政权的中心任务是,全力支持和巩固国家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完成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及归还劳动合作社被夺走的财产。

实际上的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要求。就生产的技术工艺而言,社会

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乃是两种形式的工业社会。因此生产的实际社会化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技术工艺基础的现代化问题。这里需要的是从社会经济上去解决。其本质是在整个经济体制中消除雇佣劳动。实现这种历史性改造的方法是在一个人身上把工作者的劳动和老板的劳动合为一体。

在实践上在劳动集体所有制的水平上实现这种改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俄国要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去,必须利用当代劳动集体所有制的所有形式,把合作联社(联合体)和工人的有限股份公司提到首位。

怎么对待国家所有制呢?在这方面可以利用作为“组织居民的原则”的劳动集体所有制。但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应当是对国家所有制的系统内部的补充。现在在理论上也清楚了,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作者把直属的国家企业和自治的(人民的)国家企业做了区分。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完全所有制和对产品的不完全所有制,即一定数量的产品,其货币等价物成了劳动集体所有制。在这种完全归劳动合作社支配的所有制的基础上,作为对工资的补充和与此相应形成了每个工作者的个人收入。在第二种类型下,国家只保留生产资料的“最高”所有者的职能,而生产资料转归劳动合作社“全权经营”。劳动集体不能改变企业的面貌,或者例如关闭,出卖生产资料。产品归劳动集体支配,是劳动集体的财产。国家对此类企业不是直接管理,而是通过劳动集体的自治机关的中介。

这两种形式的国家企业使人能同时兼为劳动者和老板,消灭雇佣劳动。只有消灭雇佣劳动才能实现以下原则:“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①

国家所有制变成全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程就是如此。只有实现这些要求(更不必说消除混合经济中的剥削成分了)才能得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结论。

列宁的合作社思想(整个劳动集体所有制)作为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并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这一原则是同生产民主、广大劳动集体的权利、它们参与生产的管理和自治分不开的。其实际实现还要求私有劳动阶层高度的政治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0页。

极性,其中包括按生产地区组织国家政权代表机关的选举。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列宁关于文化和文化革命的言论。列宁提出的原则对当代,对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现在重要的是不要重复旧的错误,要从过去中吸取教训,不是倒退,而是前进。^①

哲学博士里·科索拉波夫教授在《列宁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俄国现有的所有制旧行了分析。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和期间的著作,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成分,预言了它们的命运。不知道现在有哪一位,其中包括想坐上总统宝座的人,曾这样明确无情地作过这样的分析。列宁指出的成分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基本上是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宗法制。

当代俄国有哪些成分?社会主义的两种经济成分的旧模式(全民国家的和合作的集体农庄的)。直到“改革”之时,也没有人分析过影子经济,而它实际上已经渗入我们的国民经济体系。现在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认为今天还有社会主义成分,那是幼稚的。资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国有制乃是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统治阶级还没有能掌握的社会主义的“胎记”、残余,那是另一回事,它还很弱。

第二,私人资本主义,无疑有的。但它在生产领域较少,而大都同交换和银行联系着。

存在合作成分。集体农庄没有完全死亡。一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头换面了,但有时还保留了基本的经营原则。农村现在处于混乱状态,但合作社还存在。顺便说一下,集体农庄庄员多次证明了30年代的集体化在历史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小商品成分也存在。到处都有表现。

当代经济的特点是中介资本成为其巨大的助溶剂。实质上这是寄生性的资本。按照人口平均我国的银行数占世界的首位。中介资本没有给社会提供任何产品,然而却是最繁荣的。目前的制度是依靠这种成分的。它借助于贸易自由的法律得以迅速增长。但其弱点是,其社会基础是市场的泡沫。并且不是国产品市场,而基本上是海外产品的市场。很难说这是特殊成分,但其中有相当比重的买办资

^① 尤里·普列特尼可夫:《所有制关系和社会主义》,《对话》1996年第8期。

本的成分。此成分内部存在很大的矛盾。每一种成分都是一种社会阶层。但其特点到处都是：我们的社会分化了、流氓化了，资产阶级也如是。

要看清过渡社会和社会主义下的成分结构。列宁在《论合作社》的文章中提出来了。

首先，共产党人应当到处说明，不管处于社会发展的什么阶段，不应当有不拥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民，也不应当疏离政权。

列宁区分了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建立在全民土地上，属于国家），合作企业，最后，同私人（本国和外国的）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一成分我国 20 年代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

在以后时期和恢复社会主义时要复兴的大致上就是此类体系。我们不去杜造，而只是利用过去的经验总结所犯的错误的。现在报刊上到处宣传，共产党人上台后将没收一切，把大家关进监狱，如果不是处死的话。应当向基本居民群众解释，共产党人明确区分个人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永远不会触动国民经济中以个人的生产资料工作，靠自己及家庭成员的劳动谋生的那种经济成分。^①

《共产党人能提供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列举了俄国内四种社会经济成分：

- (1) 带有社会主义“胎记”和“残余”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全民所有制）。
- (2) 私人资本主义（四分之三是中介的、商业银行资本）。
- (3) 合作社（原工业和农业劳动组合）。
- (4) 小商品成分（手工业、服务业、农场、私人商业）。^②

自由和社会主义

B.A. 格列宾希可夫认为，仔细观察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可以看出，它等同于自由的概念。自由不是什么人类生存的局部问题，而是基础的、关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社会的重要的方法论的钥匙。

自由不是人类的暂时价值，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是个全人类的问题。现在甚至最反动的政党也不敢公开反对普遍自由的原则。他们在普遍自由口号的假面具之下培植一种歪曲的社会主义构想，似乎社会主义同自由原则是不相容的。

① 里·科索拉波夫：《列宁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对话》1996 年第 8 期。

② 《对话》1997 年第 1 期。

结果社会上许多公正和自由组织的真诚拥护者错误地把自己列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之列。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研究在普遍自由的形式下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途径的任务,将把持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的人联合在一起。重要的是,人们要真诚地追求普遍自由的真理,并且按照自然科学中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去进行论证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在通向自由的社会组织的真理道路上,许多现在认为自己是敌人的人,服从认识的客观逻辑,会变成志同道合者。说到底,重要的不是名词,而是一无例外地所有人的自由。^①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社会主义观

俄共是目前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大的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失败的原因,探寻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的答案。

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俄国目前缺乏一个把全国统一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为此叶利钦在1996年提出制定新的“国家思想”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思想失去支持的情况下,俄共也在努力寻找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传统结合的途径,制定出能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久加诺夫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这一问题。

1995年3月31日,久加诺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题为《当代俄罗斯思想——把我国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谈话。招待会是为两本著作《当代俄罗斯思想和国家》、《1995年俄国国家安全观》的出版而举行的。久加诺夫说:

“大家都看到我国所处的局势,我们的社会,懂得局势已经到达危机的边缘,并在寻找摆脱戏剧性危机的出路。不管我们鼓吹过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构想,但每个人都有一系列价值观,它们具有并非一时的意义。这就是文化、高尚精神、生态、安全、健康、国家的领土完整、应有的民主交往等等。实质上我们的壮士伊利亚·姆罗梅茨目前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大车臣道路。一条是把国家变成大哥伦比亚,使政治同黑手党搅和在一起。第三条道路是民主发展的道路,它建立在俄国的国家性、高尚精神、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传统把过去和现在联结在一起,给予民族和人民以未来。为此许多专家学者集中力量写出这两本大部头作品,我认为它们形成了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其

^①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资料》,《对话》1997年第2期。

中一本书的导言中引用了杰出的俄国思想家伊凡·伊里奇的话：‘设想未来的俄国，在想象中为它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它的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和强国的基础和利益。我们无权变卖，也无权挥霍我们全俄的、全民族的财富。我们无权代表俄国向任何人作出任何许诺。我们应当记住它，并且只记住它。我们必须忠实于它，只忠实于它。采取另一种做法的那一代俄国人在历史上将被看作是垮掉的一代，背叛的一代。俄国人民是团结的人民，是强国的人民，围绕斯拉夫核心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并且像历史所展示的，经过各种各样的混乱和动荡，俄国成了更巩固、更伟大、更相称的强国。我们也会渡过这自由主义的民主混乱时期。’”^①

久加诺夫在另一次题为《走幸福与公正的道路》的谈话中继续发挥这一思想。记者问：我们的好多政治家都在谈论俄罗斯思想，有时赋予截然相反的内容。按照您的看法，俄罗斯思想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久加诺夫回答说：不久前出版了由我编辑的关于此问题的大部头研究著作。它叫做《当代俄罗斯思想和国家》。参加写作的有历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宗教活动家。俄罗斯思想的基础是两个基本价值观——俄罗斯的高尚精神，没有东正教的处世态度以及对自己在尘世的真正使命的认识，这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的强国精神，国家性。没有道德的净化，没有健全的精神，在广阔的大地上就不可能有局势的稳定。理解俄国文明的历史特点极端重要。^②

俄共正式提出一个论断，“俄罗斯思想”就是社会主义。

俄共纲领写道：“可以大胆断言，‘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久加诺夫在俄共三大的总结报告中解释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弄懂的最主要一点是，共产党人应当与人民共生存，尊重并热爱祖国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人民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我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历史继承性的坚实基础之上，并以俄罗斯的共同性、爱国主义、强国精神和人民性的文化和道德传统为依据。可以大胆地断定，令西方感到如此神秘、如此不可理解的‘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

① 久加诺夫：《我相信俄罗斯》，沃罗涅日1995年版，第219—220页。

② 《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同上书，第347—348页。

会主义思想。今天历史再次使我们祖国人民面对 1917 年与 1941 年那样的选择：或者是伟大强国和社会主义，或者是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沦为殖民地。”^①

俄共这里使用的是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有相当历史渊源的思潮。

“俄罗斯思想”一词最早是 19 世纪俄国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在 1888 年首次使用的，然而关于俄罗斯使命的思想则在此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后来哲学家别尔嘉也夫和尼·奥·洛斯基^②曾就此写过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俄罗斯思想的基础是教士菲洛菲伊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历史哲学思想，他认为，在拜占庭——第二罗马崩溃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已从康斯坦丁堡转到莫斯科，莫斯科是东正教徒的神圣首都，是最后的罗马。

俄学者弗·伊·柯罗塔也夫总结说：“‘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预言，关于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思想’是关于俄罗斯的预言的命运，也就是对‘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的命运问题的回答”。^③

安·尼·萨哈罗夫（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1996 年在我国讲学时指出：

俄国人民今天感到痛苦的是国家解体和意识形态危机。国家疆域实际上回到了 18 世纪初，即彼得大帝时代的状况。意识形态也出现了真空，这样，维护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探索新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俄国目前所面临的两大课题。俄国地缘政治利益仍然在原苏联地区，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放弃这一利益。关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萨哈罗夫追溯了历史渊源。俄罗斯人一向有一种救世主的“世界使命”感。东正教认为从罗马、拜占庭那里得到上帝赋予的“救世使命”，俄国的马列主义又把这种救世主的“世界使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使命。

由此可以看出，俄共在其纲领中所使用的“俄罗斯思想”一语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历史使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的继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月革命以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使命感并未消失，当时的苏俄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欧

① 《我相信俄罗斯》，第 204 页。

② 尼·奥·洛斯基（1870—1965）——俄唯心主义哲学家，俄直觉主义和人格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弗·伊·柯罗塔也夫：《“俄罗斯思想”在苏联传统中的命运（20—30 年代）》。阿尔汉格尔斯克 1993 年版。

革命,另一方面又把莫斯科看作世界革命的基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负有解放全世界的历史使命。这样,“第三罗马”的观念就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得到了发展。不难看出,俄共纲领中“俄罗斯思想”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俄共纲领强调了共产党人保持历史传统的必要性。纲领写道:

“俄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它的创造性传统和历史继承性的牢固基础之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和经济状况,使俄国成了下述文化和道德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传统的主要价值观是共同性(общинность)、集体主义(共议性, соборность);爱国主义,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的互相联系(强国精神, державность);对体现真理、善良和公正的最高理想的追求(高尚精神, духовность);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和其他差别一律平等和具有同等价值(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

党纲在这里连续使用了好几个传统用语,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共同性”,此语俄文为 общинность,源于俄国历史上的“村社”(община),直译就是“村社性”或“公社性”。村社往往被看作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然而,村社实际上是宗法制的组织,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从它所代表的生产力看,它未必是一种先进因素的体现。在党纲中“集体主义”等同于“共议性”。“共议性”俄文为 соборность,其词根 собор 有两解:①古代召集比较重要的讨论行政或宗教问题的高级会议;②大教堂。соборность 由此转出共同讨论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它未必等同于我们所常用的“集体主义”。

从用语的选择可以看出,俄共党纲竭力把现代概念同传统观念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理论同俄国历史传统结合的道路。这种做法本来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俄罗斯思想”包括对俄罗斯帝国当年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这在俄共党纲和久加诺夫的言论中都是直言不讳地公开承认的。党纲写道:

“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国内外破坏者主要致力于丑化我国的整个苏联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的践踏者们从而充当了一个伟大强国的掘墓者的角色。因此复兴我们的祖国和回

^①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2月2日。

归社会主义道路两者是分不开的。历史再次使我国人民面临 1917 年和 1941 年那样的选择:或者是伟大强国和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沦为殖民地。”

俄共坚持恢复的苏联,从根本上讲,是以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为出发点的。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苏联版图基本上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在斯大林时期还有所扩大。俄国必须恢复苏联的版图,这是俄共的一个目标。这同列宁当年的政策并不吻合。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列宁曾经坚持民族自决权,主张让各民族自由决定独立或者联合。他说,可以让乌克兰尝试独立,以后如果愿意,也可回来重新实行联合。他并不主张各民族非得捆在一起,是否联合应通过民族自决决定。

俄共对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的全盘肯定,至少表现了他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们对俄国向周边扩展的历史作了美化。久加诺夫在谈到俄国历史上的扩展时说:“我们地域的开发和新大陆不同。不是高举刀剑,而是举着十字架往前走的。带去的是语言、知识,而不是毁灭。因此自古就住在这里的所有民族都留在俄国。把我国联结在一起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①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继承了苏联时期的传统说法。历代沙皇经过几世纪的努力,把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扩展为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同西方的殖民帝国一样,靠的是同样是刀剑和枪炮。别的不说,车臣问题至今闹得不可开交,原因就在于车臣是沙俄通过多年的战争兼并过来的,并且在苏联时期又遭到无端的全民族迫迁。历史上俄国的民族关系自然有它好的一面(主要是在苏联时期),但决不是一切美好,在沙俄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和迫害是主流,正因为如此,列宁在生前的最后时日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

俄哲学博士伊·康·潘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变化的学说,他在具体历史现实中的应用,促使它对最初的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正。

^① 久加诺夫:《走幸福与公正的道路》,《东正教莫斯科报》,载《我相信俄罗斯》,第 347—348 页。

他说,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可以用他关于培根学说所说的话:其中“隐藏着全面发展的萌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把马克思的理论用于具体历史现实,同时也是对最初学说的修正。无论如何,一方面经伯恩斯坦,另一方面经列宁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同历史的马克思的体系很少有相同之处,虽然两人都从自己的导师的基本思想出发,并力求用他的理论去解释现实。

在某种界限内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初始内容是有其道理的。必须准确地重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它同其战友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完全相符),应当看到,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遗产中有不少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遭到歪曲和庸俗化的东西。

然而潘金认为,对恢复马克思主义“真正”思想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

毫无疑问,当代的历史发展使马克思(还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许多出色预见成为迫切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使这些问题成为同当代类似的问题时,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而转到更广阔的基础之上,主要的是被安放到崭新的历史文化的联系之中。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已经不能再作为指路的标志和确定历史运动的方向。

长期被看作理解社会现象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当代世界历史运动的特点也显得过于狭隘和贫乏。需要能在理论上达到当代的水平的新社会主义的范式。

社会主义必须同自由主义对话,要记住社会主义是19世纪初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分出来的。正是为了一切人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要求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正是为了自由,他们必须取得对生产的共同管理权,限制官僚的权力,培养个人的尊严和责任感——这是从束缚向自由过渡的首要条件。^①

俄著名经济学家利希基金指出:“斯大林先后向列宁发了11炮,把列宁学说轰成碎片,按照他所需要的逻辑进行了剪贴,并添加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在重新拼成的产品上盖的也不是作者——斯大林主义的印章,而是贴上了假的标签,断定这一

^① 《政治研究》1996年第4期。

产品是大师们的创造。”^①

20 和 30 年代的争论焦点往往是应当怎样根据当时的条件来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怎样发挥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学派》的前言中指出:“高踞于革命阶级之上的官僚们随着其统治地位的确立,也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以说明他们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确保他们免受下层不满情绪的袭扰。正因为如此,才大张旗鼓重新剪裁、删削甚至直接篡改墨迹未干的革命史。”

在“马列主义”的标签下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伪造。如:剥削与压迫的差别,社会化与国有化的差别,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差别,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被取消,因为它同斯大林的生产方式极为相似。大力宣传五种社会形态,认为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的。

《共产党宣言》说的是“扬弃”私有制,而不是消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对私有制的否定将导致个人所有制在新基础上的再生。

被歪曲的还有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列宁认为俄国就发展水平而言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所以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是进行第二阶段的革命,是完成二月革命的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叫做“工农”革命。

列宁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有两个列宁,即军事共产主义的列宁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对此应当做具体的分析。^②

苏联的国家性质

不同的说法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对苏联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对苏联现实存在的社会给予各种各样的名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超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资本主义后社会,过渡社会,东方专制主义,官僚集体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等。

^① 《新世界》1989 年第 3 期。

^② 《选择》1996 年第 1 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 年第 1 期。

一些人从肯定的意义上承认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认为这是非常美好的社会主义。塔恰耶娃肯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她写道:还在战前我国就消除了文盲和财主老爷的精神奴役。这是有才能的人和热爱劳动的人的黄金时代。我们拥有剧院和如此有天分的演员、音乐家和作家、艺术家和运动员。这是任何西方文明所没有的。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领导国家的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斯大林消灭了成为无用废物的整个寄生阶层——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商人,总之吸血的经纪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恶魔。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在那个年代建立了社会公正的社会,这激起了那些习惯于靠他人劳动为生的人及其走狗的极端仇恨,但赢得了那些生活在不寻常时代的西方国家的好人对苏维埃国家的深深的敬意^①。塔恰耶娃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而结束了。

卡拉·穆尔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必须诚实地告诉人们,我国大多数公民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下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不会长久,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从整体上说,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硕果仅存的,以奇异的方式在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所达到的顶点。现在甚至很难解释,我们是怎么达到这个顶点的——达到这个顶点的可能性是多么的……小。我们必须向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人民鞠躬。他们以自我牺牲精神,在自己的白骨上建立了良好、安宁、节俭而又慷慨的社会。它的经济具有不寻常的无法解释的效率。为了达到这个顶点,把许多力量团结在一起,而最后做到了……^②

另一些人承认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承认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但这是非常可怕的社会。舍尔表示,在俄国诞生的确实是社会主义,并且毫无疑问是极为糟糕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起避雷针作用的带有欺骗性的术语,想以此把社会主义的过错推给一个预谋犯罪者,而后者乃是体制的典型产物。实际上负有罪责的是各国的乌托邦分子、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

① 《主义》1993年第3期。

②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9月10日。

义者,是他们制定了阴险的集体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残暴行为负有罪责。负有罪责的还有贪图权力的左派、追求升官发财之徒、狂热的宗教徒和同路人,幼稚的工人和农民,落入未来天堂神话的圈套的唯心主义者……

沙法列维奇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反人类和反人道的力量的体现。俄国的社会主义企图消灭家庭和宗教、私有制和个性。但是对社会主义的暂时胜利人们是无罪的。“社会主义是永恒的和无法避免的,正如无法避免生和死的斗争一样,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掌握的人们,其行动同样很少受这个清楚的目的所支配。”^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未曾有过任何社会主义,不论作为国家,作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都未曾有过。

哲学博士布坚科写道:“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存在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关于在这里建成社会主义及其存在本身是一种神话。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脱离并被官僚攫为己有的社会,一个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的社会,是没有任何理由被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不仅如此,所有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能像还在不久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叫做遭到歪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社会。”^②

布坚科是持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而许多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同意他的这种看法。

伊戈尔·丘拜斯宣称:苏联政权是可怕的,任何一次外国侵略者都没有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给苏联造成如此大的损害。共产主义政权消灭了俄国活的心灵——它的教会,它的寺院,这些祖国文化的根基……为的是在连根拔除俄罗斯思想的地方植进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一种灾难,就其规模而论,甚至超过了大屠杀的惨剧,虽然所有这一切至今仍被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个人崇拜时期的非法镇压”。然而这不是社会主义。关于那些改革派发动的争论,我要指出,在苏联未曾有过任何社会主义,既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也没有遭到某种歪

① 沙法列维奇:《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社会主义》,巴黎 1977 年版,第 376 页。

② 《莫斯科真理报》1991 年 7 月 13 日。

曲的社会主义。^①

那么在几十年里苏联是什么社会呢？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研究者、政治家给苏联的社会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政治贵族主义，过渡社会，或干脆就是极权社会。吉拉斯称“工业封建主义”。瓦斯连斯基称“国家封建主义”。政治学家韦特称“社会工业封建主义”。社会学家施卡拉坦称“极端的国家极权主义”。沙赫纳扎洛夫称“全面的思想极权制”。希腊的苏联学家科斯多利阿吉斯称“军管制”，即军阀统治。哲学家阿波温·叶盖杰斯认为是精英或“精英主义”的统治。宇航科学院院士瓦基姆·弗洛罗夫甚至发明了“劳绩主义”或“梅里特主义”(melit)。他认为，各种劳绩在社会上履行着资本的职能，而有劳绩的人是资本的所有者。官僚制度在劳绩人士身上获得了全面的完备的形式。这个社会政治体制被冒充和当作了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私有制和剥削关系的体制，我们把它叫做劳绩主义。^②

不同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评价和定义。早在80年代初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就曾试图证明，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认为是真正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甚至“经典”的共产主义，这个制度不仅具有很多优点，并且是空前稳固的，所以不会灭亡。“西方有许多人论述和议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过时的问题。此类议论纯属肤浅的胡说八道。共产主义社会是如此稳定，在这种社会中能从内部瓦解它的力量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指望共产主义国家内部会出现倒向西方民主的剧变是荒谬的。至于保持国家完整意义上的稳定问题，那么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培育史无前例的手段以达到这一点。”^③

历史学家罗易·梅德维杰夫就此评论说，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很稳固的，但远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无论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都不存在有明确方案的社会主义。它不可能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反复检验的图纸和计算来进行建设。只能通过试验和错误的道路前进，每一次只能勾画出大致的工作草图。毫不奇怪，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厦对它的居住者来说，不仅不舒适，而

① 《独立报》1996年1月31日。

② 《对话》1995年第8期。

③ 亚·季诺维也夫：《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慕尼黑1980年版，第401页。

且也不特别牢固,虽然看起来它还是非常宏伟的(或者是可怕的——对这些评价可能有分歧)。在如此艰难的历史中,苏联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或“完美的”制度。但是它无疑以众多的社会设施和关系的形式存在过,这些设施和关系是上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早已梦想的,甚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也常从我们这里借取并做得卓有成效的。

他表示同意历史学家明多林的观点:“否定国家垄断主义中存在社会主义因素是荒谬的。实践上,相对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就业)、相对的社会平等,平等的教育条件、免费医疗、国家对科学和文化的支 持,这些算不算社会主义因素呢?算社会主义因素。今天喜欢把这叫做社会国家。但是,构建这种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动机不是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和1917年10月以后苏维埃国家的活动。”^①

沙赫纳扎洛夫也持这种看法:“我们是否有过……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在苏维埃社会组织中建立了我们今天叫做社会保障的原则,也就是保证社会每一个成员享有起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苏维埃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实施这一原则,由于形成新的官僚阶层和国家的军事化,它在多大程度上遭到了歪曲,这是另一个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模式之一。”^②

很多西方思想家就持这种观点。波兰的亚当·沙夫说:“一些幻想家为规避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断言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模式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事实同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存在巨大的矛盾。要知道,也可以存在变形的制度,被历史地歪曲了的,但却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产生的制度,而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形容词是恰当的。这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③

社会主义不可能以具有新社会的全部特征的现成形式出现。而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采取特别复杂和矛盾的形式,虽然许多困难是可以避免的。苏联从来就未曾有过“标准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存在的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或与此相接近的

①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现实问题》,新西伯利亚1993年版,第23页。

② 《共产党人》1991年第4期。

③ 《未来的社会主义》(莫斯科-马德里版)第2期。

关系同假社会主义关系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口号下掩盖着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封建农奴制关系(在农村),甚至奴隶制关系(在斯大林—贝利亚的古拉格群岛)。各种社会制度的混合加剧了苏联社会的不稳固性和矛盾性,削弱了它的生命力。^①

M.H.格列茨基在《是否有过社会主义?》一文中对过去世界上关于苏联社会性质所作的论述作了综述。他归纳了四种基本看法:

(1) 认为是社会主义,虽然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理论所规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其根据是: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结果。它消灭了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劳动者的社会,这里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将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原则。有人批评这种社会主义,认为它在劳动生产率、自由、民主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距离。“现实社会主义”一词是对这种批评的回答,因为现实总是同理论有差距的,现实不可能同理想完全相符。

也有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因为这里的基本所有制是归国家所有的国有制。

(2) 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它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某些趋势引向了极端,被叫做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苏联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样的”。在苏联保存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分工,同样存在领导者和执行者的等级,存在雇佣劳动,“生产过程的形式,分配过程的形式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在总体上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存在国家资产阶级,它拥有政权,通过政权支配生产资料。

托尼·克里夫在1948年出版的《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1991年译成俄文出版)中写道:“在俄国,国家是雇主,而官员只是管理者。所有制和管理的职能在这里是完全分开的。然而这种分开仅仅是形式上的。实际上财产掌握在作为唯一的群体的官员手中,财产的体现者是官僚国家。”因此这种社会应叫做“官僚国家资本

^① 参见罗易·梅德维杰夫:《社会主义:思想和体现》,《自由思想》1996年第12期。

主义”。A. 卡里尼科斯在不久前出版的《历史的报复》中认为,苏维埃社会把在一战中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发挥到了顶点。像德国和美国一样,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 30 年代初形成的,要解决的是同样的任务:摆脱危机,加快发展速度,开展军事领域的竞争。由于经济和文化落后,苏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拖得较久,并且具有极端的性质。最后,正是这条道路上的成就把苏联引向了危机。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使得重工业自己为自己生产。自我保障和自给自足的倾向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而这恰恰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突破民族框框之时。与此同时,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刺激了消费的增长。在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接着就发生了连锁革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因为不曾存在过这种社会主义本身),而只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向多民族的或者民族后的资本主义“推进”。东欧的革命并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就像法国 1830 年和 1848 年那样。这是“历史的报复”,不是对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复,而是对这些国家建立了某种与社会主义全然不同的,与之对立的社会的报复。

(3) 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而是过去任何理论都未预见到的某种新的社会制度。它被叫做官僚集体主义,东方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后社会。

官僚集体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有共同之处,都承认苏联国家官员是掌握财产的统治阶级。但意大利的布隆诺·里茨认为,此财产既非私人的,也非公有的。他提出阶级所有制的概念,建立在这种所有制上的制度,既非资产阶级制度(建立在私有制之上),也非社会主义的(建立在公有制之上)。作为国家官员所有制的阶级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过,如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这同古典资本主义相比是个倒退,因为它压制和取消市场、竞争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刺激。里茨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赞同者之一。他认为,市场要一直存在到产品丰富到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为止。

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立足于“现实社会主义”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同之上。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以官员为代表的国家拥有无限权力,它支配财产和人,组织大型工程,其中包括改良土壤——修堤坝和水渠。表面上这确实同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同斯大林模式非常相像。俄国的“亚细亚性质”来自沙皇专制和保持俄国面貌的“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专制主义传统。这个社会存在由上头强加的计划,

缺乏“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不是自决的自由个人，而是服从于异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这些社会同马克思的理想截然不同。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中有人把此社会叫做“资本主义后社会”，或“革命后社会”，目的是避开社会的实质问题。这样就可以把此社会看作是取代资本主义，或者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或者是比资本主义退步的社会，而不必为此社会下定义。

(4) “准社会主义”。这是格列茨基提出的名称。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同意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从分配上讲，未必可以把谁也没有按资本获得利润的社会叫做资本主义。官僚中间“按地位”的分配，也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就像不同工种的工人一样。这同资本主义的利润毫无共同之处。至于官僚的特权，把它叫做不公正的东西是不足为怪的。这一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形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它同生产和分配的基础矛盾或不相适应的话。^①

苏联的制度是“超国家主义”

新社会学和实践政治研究中心“不死鸟”主任专家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认为，苏联(和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超国家主义”。他对此做了系统的论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个制度是按照先进的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奴隶制度，由奴隶主，而不是由奴隶得名；封建制度，由封建主，而不是由农奴得名；资本主义——由资本家，而不是由工人得名)。在这个意义上把“超国家主义”叫做国家主义要正确一些，但可惜在社会科学中这一术语已经被“占用”了。

为什么会出现过去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遇见过的这种复杂局面，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框框内存在两种制度？这是因为所有主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两个基本特征构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要这两个特征中有一个发生变化，就足以改变制度。实际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所有制的形式没有改变，在这三种情况下都保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在同一种生产方式下存在两种社会经济制

^① 《选择》1994年第2(5)辑。

度:在古代存在古典的奴隶制(在西方)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东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在最后时日决定修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他怀疑曾有过任何单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逝世使他没有能完成这一工作。然而马克思的怀疑是对的。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资料可以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生产方式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大商品的非机器的(家庭的)生产。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所有制的形式:西方是古典奴隶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东方存在的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有时采取隐蔽的形式:如“神”所有制(生产资料形式上甚至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一个或多个的神),或者是生产资料的“沙皇”所有制,这里沙皇(最高祭司)不是私有主,而仅仅是“沙皇”(“神”)所有制的管理者。换句话说,马克思所定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叫做国家主义(国家主义—1,以区别于国家主义—2,即“超国家主义”)

一种生产方式下存在两种制度的现象,我们在从原始共产主义向阶级社会、私有制过渡,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都可以看到,这证明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或者在不同的文明中过渡的非单一性。也许这是因为该社会存在或缺乏像公社这样的组织。

在“超国家主义”下,国家是所有主,而全体公民则变成为国家服务的雇佣工作者。这样,国家变成了剥削者,攫取剩余产品。

“超国家主义”具有几个优势:

(1) 消除了对抗阶级,阶级区别被推到上层建筑领域。社会由三个基本阶级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智力劳动雇佣工作者阶级,后者又分为两个子阶级——①管理人员和官员,②知识分子。社会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单一性。阶级间的界限受到冲刷,易于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当然这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

(2) 消除了竞争,以及用于竞争和广告的资源 and 资金的大量耗费(在西方这些费用往往占一个公司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三)。

(3) 可以借助于计划克服市场的自发性,这就可以(理想中)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源,预见并致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4) 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可以把巨大的物质、人员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一只手中(国家),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保证制度有极高的生存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

鉴于通常都把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塔拉索夫对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写道,“超国家主义”的社会措施——免费教育、保健制度、学前教育 and 校外教育、大休息制、廉价住房和公共交通,常被“现实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说成是“重要成就”,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超国家主义”的“优点”。它们是国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产物,这使人想起封建主同农民的关系:由于劳动力市场受到现有公民人数的限制,而又不存在劳动力的外部市场,所以国家(雇主和生产资料所有主)自然不得不关心自己工人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生产,首先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国家的收入。在“超国家主义”下高额剩余价值是靠极端压低工资取得的,与此同时,国家取得的部分超额利润接着又通过国家机构作有利于雇佣工人的重新分配,在国内市场人为地降低生活必需的产品和商品的价格、住宅和公共交通费用。这样,第一,国家迫使公民把收入的一部分用在有利于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主和雇主)的方向(例如用于教育和保健卫生目的)。第二,能够进行监督,以保证全体公民不受歧视,也不自我歧视(有意识地降低)地获得最必要的起码的服务和权利。

这样,在“超国家主义”下,雇佣工人获得不一定是高质量,但有保障的(甚至通过强制程序)东西,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下必须到市场去购买和得到服务,在这里支出的刚好是(当然是大致的)在“超国家主义”下没有付足的。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和“超国家主义”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只是优先的方面不同而已:在“超国家主义”下是能够得到和有保障(但失去质量和多样性),在资本主义下是高质量和多样性(失去可以得到和保障)。不难看出,所有差别是实用主义的原因造成的: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的所有主实际上拥有无限的劳动力市场,而在“超国家主义”下生产资料的所有主缺乏这样的市场。

“超国家主义”过去和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消灭封建主义的机构和实现工业化。

在这个意义上“超国家主义”的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领导者,常常利用无产阶级和农民作为革命的群众性动力,而“超国家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或农民——在中国、越南和古巴等等)从群众性的动力变成了领导者,除了消灭封建主阶级,还消灭资产阶级。

“超国家主义”的特点是它作为制度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得不借用他人的,甚至异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还在封建社会就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是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不是阶级,国家只是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的机器,因此没有人,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创造把机器神化的意识形态。缺乏相应的自己的意识形态是苏联和苏联集团各国“超国家主义”破产的原因之一。

在斯大林制度的几十年统治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超国家主义”制度的需要。整个说这项工作是不成功的,但有一定的成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使国家神化”的努力的后果。有意思的是,在后资本主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出现了思想家甚至意识形态学派,它们制定的恰恰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纯粹的“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明显的例子是斯金纳(B.F.Skinner)以及接近他的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们。^①

看来,这是同后资本主义时代官僚的极度加强联系着的。官僚是从“超国家主义”得到真正利益的唯一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公务员即官员、官僚身上得到人格化。在“超国家主义”下,官员、官僚同国家的关系如同其他人一样,是雇佣工作者。然而,在同其他雇佣工作者的关系上,他们是管理者,政权的代理者,是部分雇主。国家不是阶级,而仅仅是没有思想的机器,它在“超国家主义”下没有什么阶级利益。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官僚把国家看作自己的集体财产。这意味着官僚寄生在国家上,经常企图重新分配国家的部分收入,因而给整个社会,也给国家本身带来损害。

任何国家都本能地同它斗争。除了国家,通常统治阶级也同官僚的贪欲作斗争,因为统治阶级也把国家看作自己的集体财产。在没有统治阶级的“超国家主义”下,国家或者严酷地同官员的私欲作斗争(例如在斯大林时代管理机关遭到不断的清洗),或者是容忍官员把国家收入偷光的危险,而在未来对国家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局面最后在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国家里出现了。国家机器只有利用其他官员才能够对抗官员们的私人利益。如果官僚们从意识到自己的私人利益发展到意识到本阶层利益,即官僚成了自为阶层,“超国家主义”的国家对于失去自己

^① B.F.斯金纳是美国心理学家,现代行为主义领袖,提出一些改造社会的空想的方案。

的财产,对于官僚(管理者)变成所有主(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的危险是无能为力的。这在 80—90 年代之交的苏联已经看到了。^①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B.梅朱耶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其中包括几十年来未出现能同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相比的大理论家。他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例证,即至今还未见具有《反杜林论》水平的批判 F.哈耶克和 M.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

莫斯科大学教授、俄共产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科索拉波夫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掌握和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教条化了,没有领会它的基本内容。^②

也有人认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贬低马克思主义,不掌握马克思主义。不研究社会主义毁灭的危险,造成出人意外的社会主义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组织的圆桌会议通过的致国际科学界的公开信认为,当代世界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危机之中,没有任何一种现有的理论能够作出完全符合实际的解释,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左派以及其他倾向的左派提供机会去制订有效的社会选择方案,然而我们对这一挑战还没有找到答案,没有制订出新的现代理论。^③

有不少学者否认存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C.M.米哈伊尔指出,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如说是渗入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危机。X.季特金也强调目前的时期不能说成是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危机,而只能说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至今未失去其作为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作用。

① 《自由思想》1996 年第 12 期。

② 《对话》1994 年第 12 期。

③ 《选择》1994 年第 2(5)辑。

“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

如果说存在社会主义危机的话,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危机呢?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危机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

佩列古多夫认为,社会主义危机的主要本质特征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在发挥作为日益增强的国家的作用之化身时表现出的危机——“不仅在我国如此,在西方也同样如此”。“因为除国家社会主义外,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的危机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危机。”

也有学者给国家社会主义以肯定的评价。И.戈鲍佐夫认为斯大林建成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个强国。而这个强国从法西斯主义下拯救了世界。我们有过国家社会主义,我们批判过它。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它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本应当完善国家社会主义,然而党的在册权贵们的政策把它引向了灭亡。

萨马尔斯卡娅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她写道: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从总体上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然而,事实上崩溃的是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上述国家同社会主义思想和这种思想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同苏联经验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以苏联体制崩溃的事实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做结论是不恰当的。这还意味着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流派的多样性归结为一种苏联经验,这就会使对现在以资本主义化为取向的俄国的发展前途的看法变得极端狭窄。^①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他说,我国也集中了这一体制的深刻矛盾和缺陷。这表现在广泛采用超经济的强制劳动(30年代大量采用犯人劳动,强制集体化)和把农民束服在土地上;对劳动者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剥削;极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和主观前提极其薄弱;而官僚主义则太强(其中甚至包括资产阶级以前俄国的和苏维埃特有的官僚主义,还有客观形势造成的——在大机器生产和高公有化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技术造成的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上缺乏效率和社会上不公正的体系,官僚命令“结构”变得过时了,在其自身的重压下瓦解了。替换存在了七十多年

^① 《自由思想》1995年第4期。

的体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解决危机的道路使我国和整个国际左翼运动遭受了更大的沉重的危机。

B.A.梅德维杰夫认为,遭到失败的是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把它的某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社会保障变成了依赖他人养活,对社会过程的自觉调节变成了硬性的集中管理和全面的国家化,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结合变成了对个人需求的压制。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另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危机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而首先是由于世界上整个文明性质的变化造成的,而这些变化是与工业化时代潜力的耗尽,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西方能适应新文明的条件和要求,而自称社会主义的社会却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自我改造和适应,从上面进行的改革的尝试又遇到来自保守主义的、惰性的力量的顽强反抗。结果危机转变成了崩溃。^①

苏联失败的原因

世纪之谜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20世纪末的最大事件。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大党在一夜之间突然垮台,历史学家罗易·梅德维杰夫认为同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统治的垮台极为相似。1917年在几天之内俄国存在了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和1000年的专制制度便垮台了。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和戈尔巴乔夫放弃总书记的权力;科尔尼洛夫将军建立军事专政的企图和国家紧急委员会的叛乱。几十万宣誓忠于沙皇的贵族军官没有起来捍卫王室,30万宗教人士、百万哥萨克、1000万军队都没有去保卫君主制度。而1991年秋苏共1000多万党员群众也没有起来保卫自己的党,千百万苏联工人和农民没有去帮助这个党。

在苏联剧变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工人阶级拒绝给予苏共以支持。《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评论员卡尔穆尔扎把这一现象叫做“世纪之谜”。^②一些理论家、政治家都在设法寻找这个谜底。

罗易·梅德维杰夫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写道:

^① 《国外理论动态》合订本,1995年,第213—214页。

^②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7月16日。

到80年代初,苏联的社会机体就已经得了重病,但苏联的权贵们不想也不会治疗,让它病入膏肓,还掩盖其危象。拥护者和反对者都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感到出乎意外。连布热金斯基到1989年还断定,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还能存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为此他设计了使共产主义瓦解或变形的方案。诚然,布热金斯基没有排除苏联突然和迅速瓦解的可能性,但他还是认为出现这种结局的可能性极小。^①

然而出乎意料并不等于偶然。如果把苏共的垮台同改革联系起来,那是自我欺骗,忘记了充满矛盾的党的历史、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党的组织结构、党在国家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忘记复杂的苏联的历史、它的结构及其统治者贯彻的民族政策,而单纯认为苏联的垮台仅仅是三个别洛韦日阴谋家的决定造成的,这是自我欺骗。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世纪之谜”。存在的只是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后来又自称“全民党”的苏共“教育工作”的合乎规律的后果。苏共有意培养人民不关心政治,它压制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任何政治独立性的表现。他们竭力把工人变成听话的螺丝钉,变成只会机械执行的、没有自己意志的群众。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变成为监视甚至镇压的机关。人们不会奋起捍卫已经不再信仰的思想和价值观。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仍然很困难,所以他们听信了新政治家的宣传。工人明显地分裂为具有不同情绪的群体。奥兹雅布金反思1991年工人阶级的行为时写道:“过去时期的外行领导和冒险家的错误和罪行,成为我们的噩梦。对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遭到歪曲和背叛……很多人简直无法理解。我们的工人阶级被分裂成出卖灵魂的工人贵族、丧失了阶级性的工人和组成雇佣劳动大军主体的工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丧失了集体主义意识,失去了对共同事业的责任感。现在我们的许多人既不想要社会主义,也不想要资本主义。与他们谈论依靠暴力回到过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犯罪。今天,工人群众是不会去追随亲共产主义的外行和冒险家的……”^②

对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也没有人举行罢工和示威以示抗议。1991年3

^① 《大失败》,纽约1989年版,第229页。

^② 《主义》1993年第3期。

月17日的全民公决大多数人赞成保留苏联。但不要忘记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曾一致批准了关于独联体的协议。“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看来并不那么牢固。“由伟大的俄罗斯所联结起来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看来也是脆弱的。关于苏联人民是一种新的人们的共同体和它具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的说法，不是个神话。但是，这种一致性的牢固程度还不足以抵抗激进民族主义、盲目分裂主义和有害的瓦解力量突然增强的压力。

到“犹太复国主义”、“共济会会员”或者“国外的密谋”中寻找当前悲剧的深层原因是荒唐的。关于“外国的密谋”。反对苏联的“冷战”并非神话：这是精心策划的两个体系间的残酷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和心理的搏斗。出现了不堪重负的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结果我们在冷战中完全失败了。

这并不是说苏共和苏联的结构是软弱无力的。诚然，在某些方面党和国家失去了以前的巩固性、灵活性。但在其他方面，1991年的苏联和苏共仍然像过去一样强大。党和国家的上层机构，继续依靠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系统，依靠强大的军队、庞大的国家经济体系、有许多分支的大众媒体系统等。如果苏共领导决定采取暴力以恢复自己的全权，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崩溃本来是有可能防止的。但这是十分危险的道路，因为党的领导将不得不实行大规模镇压，而不是简单地恢复改革前的秩序。戈尔巴乔夫后来说：“我也可以不着手改革，制度的牢固系数还很大，足以坚持几十年”。

但是，70—80年代体制的坚固度就像玻璃那样，它可以几百年地遮护我们的房子，然而却会在小玩具锤的轻击下变成碎片。要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应当按照全然不同的方式进行。

许多人倾向于把70年代看作是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最平静的十年，而不是停滞时期。许多人觉得甚至斯大林的残酷“体制”也比现在肆无忌惮的犯罪要好得多。然而现今社会上存在的最深刻的危机和绝境，毕竟不能作为把我们的过去理想化的借口。在我们以往的现实中有许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而且也是靠粗暴的伪造和欺骗维持的。有人说，目前的许多罪恶是“愚蠢的改革”造成的。但是，诸如存在了几十年而现在合法化了的“影子经济”或者贪官污吏的无限权力等其他许多罪恶却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

建在“铁幕”后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设施与传统，缺乏经济竞争和意识形态竞

争的保护机制。它不允许异端和反对派,粗暴地抵制任何外来的批评,以镇压手段来保证我们政治上的无菌性。结果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社会体制是很容易抵抗这些疾病的。我们社会的弱点太多了,经受不住如此粗暴和轻率的改革,虽然不改革国家同样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苏联社会可以保持它原来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不进行合理的改革,就不能阻止深刻危机的爆发。谁能担保,再过10年或者30年苏联的毁灭不会以更加令人痛苦的形式出现呢?①

左翼的迫切任务之一是认识苏联失败的原因

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自由思想》杂志上指出,对全世界左翼力量来说有两个最迫切的问题:认识苏联实验失败的原因和更新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弄清楚,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到底是什么,确定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左派的任务是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弄清楚自己的过去就无法前进,还因为在苏联后的广大地域存在相当有影响的在政治舞台活动的力量,他们以恢复“现实社会主义”为方向。不解决上述两问题就不可能更新社会主义理论,而更新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旧社会主义理论在那些思考问题的左派的心目中已经破产。现实推动自认为是左派的相当多的人走上同资本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的道路,而领导这一斗争的力量多数还受旧社会主义学说的教条的控制。显然,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只会导致历史的重复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②

H.C.尤罗夫在一次讨论会上也指出,理论上的停滞状态对苏联社会主义命运的影响。他说:不低估“改革设计师”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灭亡中的作用,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暂时退潮的原因之一,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先进学说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随之向共产主义推进国家应当消亡的提法,论据不足。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资本家老爷在加强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在它们面前却解除武装。③

哲学博士鲍里斯·库拉什维里教授认为苏联的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苏

① 罗易·梅德维杰夫:《社会主义:思想和体现》,《自由思想》1996年第12期。

② 《自由思想》1996年第12期。

③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资料》,《对话》1997年第2期。

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能把理论正确地用于实际,在非常时期结束之后本应及时转入正常发展轨道,转入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成了社会大悲剧的根源。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非对抗阶级组成的:①生产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工作者,②管理阶级——特殊的工作者,即人民财产的支配者。管理者摆脱了社会的监督,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老爷。组成了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它开始利用自己支配人民(似乎是“国家的”)财产的权力寄生在社会上。这样就形成了官僚极权社会主义。终于导致苏联的最后垮台。他写道:

由改革开始的危机已经十几年了,其特点是极大的破坏性。原因很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政治方针更替引起的危机,而是同社会制度更替相联系的社会形态的危机。

就其实质而言,社会形态危机触及社会各阶层最深层的根本利益。只有借助群众行动才能摆脱危机。需要基本阶级、千百万社会力量自觉的和自发的、合法的和法律外的行动,这些社会力量将依靠国家或者从它的对手手中把国家夺取过来。

我们确实生活在大转变的年代,在我们的面前展示的历史过程,就其规模和意义而言,是可以同十月革命或者卫国战争相比拟的。这是苏联历史的终结。

像革命经验所揭示的,新的社会制度起初都是在新的、不发达的、原始的形式中产生的,它不仅否定过时的形式,也否定旧制度中具有生命力的成分。由于极端的破坏性,新制度往往遭到失败和倒退的惩罚,或者遭到暂时的毁灭,经历自己的波旁王朝。而在再生的时候,它就会吸取旧制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发挥自己的潜力,协调客观上没法消除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形态获得智慧、稳定和长存。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实质。在70多年时间里它没有获得这种智慧并破产了。部分原因是不利的外部环境和领导人的背叛,但主要不在这里。

十月革命在理论上准备得比资产阶级革命要好得多,但也不免存在空想的成分(如取消国家,取消市场的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被叫做“科学社会主义”。但这种称号除了使自己陷入谬误之外,没有任何真理可言。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没有成为,因此没有能防止破产。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并承认,社会主义理论(马列主义),尤其是把这理论用于实际政策存在很大的缺陷。这是

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非常的条件下,正是在加紧创立现代军事、经济潜力的战前时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创造同帝国主义对抗的基础时期,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苏联形成和确立了专横的动员型的社会主义。这是新经济政策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不民主的,因此是极权的、技术官僚的、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它成功地(虽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解决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把国家从灭亡中拯救出来,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摆脱了非常条件之后,在50—60年代特殊的、极权动员型的社会主义应当转入正常发展轨道,转入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成了社会大悲剧的根源。

苏联社会分解为工人、农民(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和知识分子,但这种阶级划分实际上已失去过去的意义,各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准确点说,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非对抗阶级组成的:①生产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工作者,②管理阶级——特殊的工作者,即人民财产的支配者。人民财产有条件地叫做国有财产,后来被看作“官家的”或“无主的”财产。原先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工作者实际上脱离形式上属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是不牢靠的。

管理者摆脱了社会的监督,忘记了自己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老爷。组成了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它开始利用自己支配人民(似乎是“国家的”)财产的权力寄生在社会上。这样就形成了官僚极权社会主义,实际上又是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影子”经济的生意人和党和国家管理机关的营私舞弊的工作人员是资本主义成分的代表。背叛的“改革”给这个半社会主义以最后的一击。①

通常都说,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是在生产效益、利用科技革命成果、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的生活水平上输给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而自己的不民主和官僚主义又在政治上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一切都对。但哲学博士鲍里斯·库拉什维里教授认为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从人的本性,社会人心理状态这个独特的角度去分析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破产的内在因素。他写道:

① 鲍里斯·库拉什维里:《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1期。

痛苦的真理在于,以国家主义的变体出现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为使人的本性回归其良好本质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其人道主义的本质。并且社会取向的新资本主义不仅利用了人的本性中的坏的东西,也给予好的东西以一定的位置,它在总体上比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更有成效地掌握作为社会基础成分的人的本性。

社会主义如果能在自身的基础上理解并解决人的本性问题,它就能像凤凰那样在灰烬中再生。具体点讲,这是要考虑社会的社会心理结构,顾及下列事实:人不是一样的,存在不同的社会心理类型,每一个人都要求“阳光下的空间”,想要生活得同自己的潜力和倾向相当。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中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总的说,它比任何资本主义都要全面地符合人的本性。

社会的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与之并行的社会心理的“准阶级的”结构在社会中则起从属的作用,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诀别了对抗的社会经济的阶级的结构,应当认识到,但没有认识到社会心理的“准阶级的”结构,满足不同社会心理类型的人的需求被提到了首位。它无视这种需求,这就成了其崩溃的“原因之原因”。

如果抛开人的生物特点,而注意其这种或那种社会的或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的因素,那就很清楚,这里无须证明的经验事实是,存在着暂时还没法解释的在每一个新的一代中不断重复的东西:①道德基础不同的社会心理类型,如利他主义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②创造才能不同的社会心理类型,如发明家、创造性的执行者和普通的执行者;③组织倾向不同的社会心理类型,如天生的首领(“主导者”),天生的民主管理型的人(“平权主义者”)和服从命令的人(“俯首听命者”)。“中间”类型的占社会的多数,如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创造性的执行者、“平权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发明家、天生的首领虽然人数不多,但起巨大作用,而在状况不佳的社会还有自我中心主义者。

作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作为当代社会取向变体的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人类败类——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并不都是资本家,许多人过的是贫困的生活,甚至梦想社会主义养活。但对富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了,并且最好是古典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在那里不会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纲领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对新资本主义应给以应有的评

价,它在离人道主义甚远的基础上能够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创造像人的生存条件:①给合理利己主义者的劳动以接近于公平报酬的水平,给利他主义者提供应得的工作(社会纲领);②在实践上发挥发明家和创造性执行者的全部潜力,使之用于科技进步和解决企业的创造问题;③在生意场上为天生的首领提供竞争的天地,而通过民主管理形式甚至在要求严格工艺纪律的生产中,为平权主义者创造令人满意的氛围,对俯首听命者就更不用说了。总的说,为社会三分之二的人创造相对稳定的合适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显得并非是一个好样板。它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①它企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成为共同的准则,这个企图破产了。其自身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得到实现。让正常的劳动者抱怨的平均主义加上更加令人抱怨和愤慨的官僚的奢侈浪费和收入外的“影子”事务的做法(很大一部分管理机关都卷进去了)。似乎自我中心主义已被根除,而实际上是予以纵容。这一切不能不破坏对社会制度本身公正性的信念。②发明家和创造性的执行者的才能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运用。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只允许实现人的少量创造潜力。以参与政治生活、生产和地方自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创造的无限空间,被压上了庞大的集中管理的混凝土的厚板和军营式的生活。③天生的首领和“平权主义者”多数在不民主的制度压制下苟延残喘,只有顺从的“俯首听命者”认为这种制度是正常的,成为这种制度的生活支柱。苏联社会主义下半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它掩盖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优越性和潜能,使它失去得救的最后希望。①

C.伊·冈恰鲁克指出,苏共压制民主是个严重失误:苏共的统治高层阻挠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它更关心的是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民主发展的进程被遏制了。工人自治的经验遭到了批判。

对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受到阻挠。对上级机关的批评往往被看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学家没有制定总结社会发展经验,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方法论,这是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严重失误。②

① 鲍里斯·库拉什维里:《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1期。

②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迫切问题”学术讨论会资料》,《对话》1997年第2期。

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出人意料地迅速崩溃,使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和作为社会制度)重新成为论战和政治斗争的对象。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批判已经转变成对作为理论和实践,也作为新的进步社会的思想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如今甚至以前众多的积极拥护者也在脱离作为实践和作为思想的社会主义。这引起了那些坚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担忧。沃达拉佐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今天面临三个主要危险:第一,来自它的直接敌人。第二,来自比敌人还坏的‘朋友’。第三,由于它的拥护者不能赋予此思想以适应我们时代的新形象,把它从意识形态的抽象顶峰的语言翻译成具体的政治纲领的语言。”^①

布尔加林认为,社会主义在经历危机,但不是破产。为克服危机,需要思考 20 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出能回答 21 世纪挑战的新的左翼思想。^②

哲学博士里·科索拉波夫教授在《列宁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③中做了详细分析:

现在都谈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危机。然而,文明、我们的危机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体系下”的危机。这一事实应当从整体上去考虑,从当代的世界经济关系、总的政治关系和思想沟通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去考虑。因为资本主义的胎记我们还是没有消除掉,而其新的疾病,溃疡、病毒等等又传到社会主义年轻的机体。到 80 年代中我们已经是带菌体了。有人说,社会主义不行了。我们可以回答说:是的!但这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像连通器那样相互影响。

他同意一种观点:俄国现今需要超级思想。70 年来我们一直以为共产党握有人类幸福的“蓝鸟”。现在这种感觉动摇了。需要根本的思想重新武装,并且还必须从一大批祖国“拯救者”中冲出去,这些人除了自己的纲领外,不承认任何纲领。其中某些人说,只有一个纲领,这就是我的纲领!这些人经常同马列主义划清界限,而借用东正教之类的著作中的东西,因此不是用俄语同自己的人民说话。在资

① 《左派报》1993 年 5 月第 11(17)期。

② 《自由思想》1996 年第 2 期。

③ 《对话》1996 年第 8 期。

产阶级阵营现在流行一种福山提出的非常时髦的历史“终结”的概念。它认为,资本借助于核遏制得以中止革命进程,使社会发展转到自己的轨道上来,保障市场经济拥有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完善的终极的形式。

第一条。如果说超级思想,那么今天俄国需要在历史螺旋线的新的一圈螺旋线上即资本主义后的自由的公式上去设想社会主义。老黑格尔是“民主派”非常不喜欢的人物,因为他不承认任何一种最终的社会形式,他指出,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些社会形式不断更新、消灭和再生,世界历史就是原则发展的过程,其内容是对自由的认识。实质上全部历史就是,人随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积聚,越来越超越其谋生的需要,而使自己成为自身的创造者、体现者和改造者的真正的实在。做人是难的。人是变动的,各种各样的。他常常是同时既好又坏,既是野兽又是天使。然而像劳动这样的力量能使我们回到古代的一条准则:“人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社会主义不是立足于劳动和生产普遍的客观的社会化的基础之上,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慈善事业。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就是:共产党人必须抛弃一种片面的观念——认为社会化仅仅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合作的、国家的或者全民的。在历史过程中这一行动不是出发点,而是完成的终点。如果从这开始,那就必须迅速地使新的所有制立足于相应的“一层楼”上——工艺技术和相应的生产组织。社会化的规律并不要求把国有化或者没收作为自身的目的。它要求逐步发展机器的、控制论的、信息的技术,这种技术必然把人同集体的工艺技术过程连接在一起,保障这个基层结构的社会化、使生产集中化和聚集化,这形成第二层楼,只有在最后一层才会迫使社会形成社会所有制和相应的分配形式。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会有这些楼层的交错现象。我们的政敌掌握了这两层,而我们几十年来只抓住第三层,认为公有制,并且是官僚集中化的公有制会自动工作。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即使之在组织上和经济上个体化,使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同它连在一起。现在我们尝到了苦果。

为什么“民主派”能使许多人相信,国有制是无主所有制?为什么他们能用私有化证券来搞欺诈?人们自愿地把全民财产非国有化。对此应当好好想想。我们这里不是按照马克思,也不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干的。

1918年春在短暂的和平喘息期间,列宁写了两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他在那里说:法律上的公有

化(社会化)是不够的,应当从组织和经济上掌握。应当从会经营开始。这里的基础应当建立在当代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原则之上。而我们的社会体系在半个多世纪里把国民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前的技术之上,约5 000万工人,其中40%是在没有前途的手工劳动的工业之中工作(60%的工人在建筑业,75%—80%在农业)。

资本主义掌握了这一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它加速了科学技术进步,靠智力劳动力获得了隐蔽的利润来源,借助于向第三世界转移解决了紧张的劳资关系。

我们现在当然在责骂自己的工人阶级。但我们到底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呢?相当数量的被看作“穿工作服的领导者”,在70—80年代甚至不能想象自己的未来。苏共的过错在于,他在自己活动的最后阶段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感觉不到它是自己的党。这是第二点,是完全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说的。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好好想想,在所有纲领和实践活动中必须加以考虑的。

第三条。列宁在什么时候曾说过在国际范围内存在“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这里很容易掉进某种机会主义,因为这里说的是非常矛盾的东西。社会主义在欧洲分解成两半。一方面是很好组织起来的机器生产(加上德国的强大的集中化),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而另一方面是苏维埃政权,工人和农民占优势的新的社会生活组织体系。当代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它分解成对立的部分,这些相互关系仍然起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总的社会主义趋势下我们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发现可称之为“社会主义碎片”的小块东西,只有一个例外,严格讲,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能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即集所有者与工人于一身,工人在任何领域(体力或智力)履行基本的生产职能,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一切制度下都起作用的社会化规律证实了马克思的一项原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大好理解):历史的所有运动都是产生共产主义的实在的行为,其经验的存在的表现,是其形成的运动。换句话说,人类不管经历了多少中断、爆发、进化和革命,但都是沿着自己的共产主义化的道路不断前进,当然也受到私有者力量的利己主义倾向的抵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谈到在世界帝国主义蛋壳下的“两只”社会主义小鸡。“欧洲的两只社会主义小鸡”……这一点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敌人用于另一种目的。他们把自己的市场塞给我们,说是当代文明的高度产物,同时摧毁了文明的工业和农业。但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社会主义也

就非常近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现在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同第三世界脱离联系的情况下,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靠牺牲我们保证了资本主义市场得到补偿,停止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我们只不过是培育“超帝国主义”的肥料,暂时的肥料。

存在一种规律: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涣散的领域扩大,即其不发展的、欠发展的形式推广开来,那就延缓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由于这个原因,俄国现在是世界反动的后备力量。我们的任务是扭转这种倒退趋势。

结果是,从赫鲁晓夫的空想纲领到著名的柯西金 1965 年改革,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宣布为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指标,这种改变方针,让我们白白失去宝贵的历史时间。而这期间西方却建立了类似赫鲁晓夫的消费性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从而在一定阶段缓和了社会局势,保证了稍后“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成功。我们的敌人做得比苏共的意识形态专家和组织者做得要内行一些,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在 30 年代资本主义航船的船长们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了凯恩斯的建议和我们苏联的经验。非常建议你们读一读列宁的《大难临头》。

苏联社会主义暂时失败的根本原因

L.拉斯托维茨基认为,60 年代形成的有利的国内外条件没有被利用来实施从在册权贵体制(行政命令体制)过渡到人民政权体制。

缺乏人民政权促使苏共和苏维埃政权蜕化,产生和加强资产阶级。

政权的基本杠杆被在册权贵变成为本阶级的党。共产党人在党内成为联结在一起的党的消极体“苏共党员”,组成党内的多数(直接和转义上的),他们入党并不是出于思想考虑。小部分人入党是为了成为在册权贵,升官发财。

苏维埃政权没有发展成真正的人民政权。这从对人民政权构想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该构想的 24 条到 1985 年中只实现了 4 条,而在 1985—1987 年期间只有 9 条(其中 4 条由于资产者的努力后来又被取消)。群众对机关失去信任。

这促使得得到巩固的资产阶级利用在册权贵阶级为自保而开始的改革,把改革的主动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使改革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991 年 8 月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接着是 1991 年 12 月,到 1993 年 10 月 4 日完成。和平爬行的反革命最

后以资产者上台告终。

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60年代)取消在册权贵体制,在册权贵拒绝以“各人按能力劳动,按劳动成果获得收入”的原则去取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形成人民政权:在册权贵阶级不会自愿地放弃政权,并把政权转交给人民。

在消灭私有制和缺乏人民政权的条件下,政权机关蜕化为新的统治阶级(在册权贵阶级)及接着同资产者互生是不可避免的。^①

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萨普雷金教授是俄国社会主义取向学者协会主席之一,他在《列宁主义:遭遇愚昧无知》一文把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看做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②

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不少,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其中之一并且极为重要的,是不学无术的魔鬼主义。

马克思写道:“不学无术(或译作“愚昧无知”。——引注)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不学无术描绘成悲剧的灾星。”^③

列宁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懂得不学无术对社会主义事业,对革命的命运的可怕作用:“没有知识、技术、文化的积累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④(1919.11.18)他一直致力于把俄国纳入社会进步的大道。同落后、不学无术、愚昧、不文明做斗争的问题对他来说总是主要的中心的问题。1919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写道:“在俄国,假如千百万备受压抑、愚昧无知、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世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没有一个为他们所了解……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自己的身旁……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⑤

正因为如此同愚昧无知做斗争、从文化上复兴国家的问题始终贯彻列宁的全部著作,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著作。他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同社会主义的历

① 《对话》1997年第2期。

② 《对话》1997年第7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1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52—53页。

史命运联系在一起。文化水平对社会制度的胜利是主要的东西。没有文化是不可能建立真正自由、文明的社会的。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消除愚昧无知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常常谈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人们特别突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我不知道,这是对列宁的无知,还是企图摧毁社会主义。其实列宁本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转向和平的组织文化工作,农民的文化工作。

列宁知道,革命是在落后国家中取得胜利的,落后是指社会文化发展上的落后。①部分人民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十月革命后的长时间里还是生活在宗法—氏族的发展阶段。②许多民族在科学、教育上处于落后状态。某些民族甚至还没有定居,他们缺乏工业、城市、工人阶级,没有文字、书籍。③在民主传统的意义上他们也是落后的:强烈的农奴制、君主制传统,不仅对上帝、阿拉,而且对沙皇、汗以及所有长官的崇拜。

应当承认,这些传统在俄国和苏联的主导民族——俄罗斯族中也非常强烈。

思考这一切,不由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只要苏共在某种程度上忠实于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只要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保持其思想上的领导,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并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掌握在可靠的手中。

正是赫鲁晓夫第一个向党发起了进攻。他第一个企图把苏共从政党变成经济机关,从智力的先锋队变成替领袖起草讲话的办公室。列宁和斯大林亲笔书写自己的著作。他们的继承者赫鲁晓夫翻开了总书记工作新的一页——他们不是“书写”,而是宣读他人写的东西。有一批专事代笔的活动家如雅可夫列夫、布尔拉茨基、鲍文、阿尔巴托夫、沙赫纳扎洛夫、比可宁之流的伪民主派。

此赫鲁晓夫决定把苏共分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他让党委服从经济领导人。根本改变或歪曲了党的职能:削减了理论和意识形态职能,而扩大了经济职能。

列宁的理论体系,①是科学的,②是批判的,③是革命的。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得到自我发展。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以后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只起附属的作用,演绎领袖的言行。由于庸俗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他限制接受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入党。这样在苏共的“舰艇”上就充满了叶利钦们、切尔诺梅金们、雷布金

们和戈尔巴乔夫们。各级党的领导只用国民经济的专家。结果在70~80年代领导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负责的是具体行业的专家,他们不知道、不懂得下一步向何处走,怎样完善发达社会主义。不是偶然地,非国民经济专家安德罗波夫得出可怕的结论:我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国家。

赫鲁晓夫开始的事业由他的忠实学生戈尔巴乔夫继续下去。他经常强调自己也是“60年代的人”。戈尔巴乔夫是双料的无知,文化浅薄,有外省局限性而又傲慢,他完成了赫鲁晓夫开始的事业。

叶利钦主义是不学无术之尊。叶利钦也是苏共培养出来的。缺乏教育、病态的虚荣、贪图权势。他是十月革命果实、苏联社会主义的主要摧毁者。

叶利钦主义在苏联后的社会中的表现为:无力掌握社会、自然、科学联系和中介的多样性和多层次;全面压制智力、经验、知识、创造;叶利钦主义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破坏。

俄国左翼运动中的不学无术的病毒。

俄国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应当向列宁的理论和政治遗产请教。遗憾的是,现在的左翼阵营患了三种病:①徒劳地、赤裸裸地、庸俗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②表面地、照本宣科地、寻章摘句地使用列宁的个别著作;③简单化地、吵吵嚷嚷地利用从列宁那里胡乱摘引来的口号。

掩饰甚至否定国家的阶级本性,掩饰甚至否定俄国过去的现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目前马列主义推翻者的基调。并且连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本身也顽强地进行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斗争。别洛夫和久加诺夫做得最彻底。久加诺夫的著作贯穿一个主要思想:抛弃“关于阶级斗争的激进主义提法,因为它以分裂和内部冲突威胁人民的后方”。(《俄国——我的祖国。国家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莫斯科,1996,第233页)

下面是其最新著作《生活的教训》(1997,莫斯科)中的几个例子:

“我们过去的庸俗社会学几乎都教导人不把现实看作全民族利益的范畴,此范畴把人民看作共同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互相对立的集团斗争的舞台。”(第24—25页)

“1917年的革命是损害国家生活和民族意识的普遍危机的结果……作为全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的人民性,在党的领袖和民族地区权贵的无度的政治傲慢打击

下崩溃了。”(第15页)

阶级利益不会在所有问题上到处都是一致的。但这些不同应当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对话的根由,国家合理改革的推动力,而不是混乱、暴乱和战争的推动力。正是在企图建立阶级专政(不管是什么样的专政——贵族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地方会出现暴乱和暴动。(第298页)

其主要的理论政治结论是:“俄国在革命起义上花费了全部力量”。(第106页)

那么,被抢光的俄国人民怎么办?

千百万饥饿的人民怎么活下去?

遭受社会、民族、和精神压迫的“邻国”俄罗斯人往哪儿跑?怎样拯救俄国的民族独立?

对这些问题,久加诺夫避而不答。他把那些认为反抗剥削和掠夺是人民的天然权利的人叫做“激进分子”、“保守分子”、“教条主义者”,甚至“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一词被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危险。但迄今为止没有指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字,只有暗示。但主要的打击方向只有一个,是主张阶级方法的人,即公开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人。

久加诺夫的理论游戏并不是毫无害处的。俄国革命斗争百年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十年的经验表明,这样做的结局是俄共上层的蜕化,或者是久加诺夫本人的蜕化。而最主要的是党和整个左翼运动将遭到新的打击。他的党能否经受得住,是个问题。

到底怎么办?回到列宁那里去,不是圣像、救世主的列宁,而是学者、思想家、革命家的列宁。没有列宁,没有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就没有未来,国家的前途就不可能回到社会进步道路上来。用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武装起来,我们还有机会走上进步的大道,大道名字就是社会主义。^①

1921年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强调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方式。新经济政策成为新社会发展的闪光时期,成为共产主义原则和理想具有活力和优势的实际证明。

剥削者清楚新经济政策对他们的威胁,开始散布苏联正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流

^① 《对话》1997年第7期。

言。共产党人出于无知就警惕性不高而向这一欺骗妥协了。“大转变的一年”的1929年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一切价值核算及其他经济原则都不复存在,自然资源以非劳动创造为借口而不作估价,中小学不再讲授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课程在整个教育系统被取消。强制命令、肆意妄为、平均主义、惩罚镇压、官僚主义以及其他灾难开始在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国内形成了违反经济规律的局面:价格按成本确定,不考虑利润,浪费机制开始运行。领导者不得不监视下属的行为,免得他们因工作出色而招致惨祸。经济杠杆由进步的强大动力变成了阻力,而这更强化了对经济的不重视。甚至“经济”这一术语也不作科学解,而被当作经营本身。“经济就是经营”的口号就是着重态度的反映。国内局势开始恶化。

1965年至1985年间进行的以经济方式进行管理的经济改革尝试以及为此推行的“经济普及培训”未能战胜反共分子的挑拨。俄国全体劳动者和共产党人为忽视经济规律已经付出、而且在继续付出巨大代价。^①

哲学博士布坚科是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不承认苏联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的丧失,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认为:

① 关于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崩溃,或追求自由的群众推翻了使他们厌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是散布亲斯大林的谬论。如果从事实出发,就不会把那种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都同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制度叫做社会主义。

②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仍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不同国家确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发展条件等问题)。^②

戈尔巴乔夫谈苏联改革及其教训

苏联解体前后,戈尔巴乔夫成立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其全名为“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经常邀请一些持各种各样观点的学者就当前的迫切问题举行圆桌会议。

1996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谈话中表示要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他

① 《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2期。

② 布坚科:《今日社会主义:经验和新理论》,《选择》1996年第1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8年第1期。

说：“我当时可能是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了”，“我们发起了一场人民对之期望值太高的革命，然而我们没有能向整个社会解释这条道路是艰难的和渐进的。”“我们本来是能够加强市场发展，增强农业部门，使商店里商品充足的”。^①

关于上述说法，199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构想、实现、教训》讨论会发表题为《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开幕词中有较详细的叙述。

根本改革的必要性

戈氏说，我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已经确信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根本的改革。早在战后的恢复时期已经有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人，在其执政之初都想到了改革。生活需要变化，不自由的状态使它窒息了，政治体制堵塞了一切通道，扼杀了一切首创精神，国家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的竞赛中失掉了自己的阵地。到80年代中期无痛苦的变革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丧失，国家明显地滑向没落。这是强加给国家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极权的以宗派命令的方式操纵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人民对此已是忍无可忍了。粉饰太平已经不行，应当刻不容缓地进行改革。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想借助于召开讨论科学技术进步的中央全会来启动改革，但全会没有举行。

改革已无孰先孰后的选择

应该同时采取全面行动：改革经济、使国家的民族国家的体制现代化、重新认识外交政策的原则和优先点。这一切应当在更新我们对社会、对其继续发展的道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和中国人不同，我们那时根本没有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可选择，上述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推到未来去做。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无序地进行，具体步骤应当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连续性。此逻辑性表现如下：

在长期停滞和改革过迟的条件下，应该首先保持改革的有利环境，获得人们的信任，用下层公民的积极性来充实上层的首创精神。因此一开始就采取公开性和政治民主化的方针。此方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改变了国家的局面。它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基本群众转到改革方面来，这些人在数十年间亲身经受了政治

^① 《参考资料》1996年3月4日。

制度和意识形态垄断的沉重压力。

在经济领域的打算是,以科技进步、国民经济的科技改造及其结构性改革的综合纲领为基础,达到经济的加速发展。这是当时受到抨击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们并不像今天所描绘的那样蒙昧无知,因为我们看到了需要做什么,并且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人们的社会条件。经济形势甚至迫使政治局内建立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例如解决连裤袜脱销问题委员会、有机硅委员会。赤字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但预算赤字却被精心隐瞒起来,我们把手伸向储蓄银行,用透支来弥补赤字。我国产品的单位价值比“世界价值”高0.5—1倍;消耗在单位国民收入上的能源、水泥、金属等比国外多0.5—1倍。这是自杀性的浪费经济。而最复杂的是我们无法依靠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转到新的生产工艺上来。如果不使俄国现代化,要运用新的工艺就必然受国外进口供给的支配。不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加入到经济发展进程中去,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事变进程表明,不能用治标的办法治理好经济状况,而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结构性的工艺改革计划就难以实现。在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加速实行政治改革,然后是在联盟的范围内更新民族关系。早期的欣快情绪被批判的现实主义所取代,预期很快取得的社会成效没有实现,这就使当局逐渐失去居民的信任。政治风暴开始动摇国家的根基,一直闹到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试图发动暴乱,以终止改革。

改革失败了。但改革不是徒劳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它是领导集团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下不恰当的行为,甚至直接错误的结果。正是主观战术的错误以及任务的复杂性,致使某些政治力量推翻了改革的领导,使事件的发展方向转向另外的轨道。

戈氏个人的错误

戈氏认为他个人的错误,首先,在改革之初花了不少时间去开展经济改造,后来在1987年通过激进的改革纲领后,在原教旨主义和保守势力、冒险主义和激进势力的反抗下,缺乏足够的耐心、果断顽强的意志去实现它。例如价格构成的改革,这是正确的步骤,但社会反对这一举措,甚至提出价格构成问题的院士和记者也因遇到物质方面的某些不便而表示反对。这迫使我公开发誓,没有社会的认可,决不放开和提高价格。这使我们丧失了速度和时间。这是战略性的失败,因为那

时我们还享有威信,拥有权力,苏联还存在,可以做很多事情。

第二,破坏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同步性和协调性。搞了批判,但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对实际改善人们的生活却做得很少。

第三,对族际问题的尖锐性和在真正联邦的基础上更新联盟国家的必要性估计不足。各共和国宣布主权的浪潮损害了国家的统一,最终导致它的解体。

第四,始终不理解对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结果党越来越陷入原教旨主义的情绪之中,而社会上怀变革情绪的民主力量却活跃起来。这导致党的消极退化,自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结果苏共事实上和形式上消失了。改革失去了能扭转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杠杆。

这样,改革在自身的矛盾中被扼杀了。改革者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没能牢牢控制政权,将社会向民主化转变的进程继续下去,使问题得到无痛苦的解决。政权落入激进力量手中,国家进入历史的新阶段。

改革的教训

政治制度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深刻、过分的革新。它一感觉到受到严重的侵犯,立刻开始反抗和报复。存在着“原始森林效应”——上头呼啸,下头寂静。改革的思想在政治决议中成了形,但一转到现实政治中去,通过层层官僚主义的行政体制时就被消除了。地方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实际上是制度在反抗。到1988年我们认识到,不革新体制本身就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它立足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其基础是社会民主思想。

我们的经验值得注意。首先必须随时随地坚持现实立场。如果改革不被社会所接受,如果它不顾及业已形成的政治实践,如果它不符合现实、传统、习惯、社会思想倾向、改革的前后联系,它与文化、社会以及社会中人的心理状态不适应,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渐进的发展道路,尽管它遭到了失败。

改革的出发点是:我们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开始改革的,负载着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我们有最军事化的经济,有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因此改革必须十分谨慎,不要用急转弯去损伤人们和社会,要走进化的道路。然而1992年以后,改革者的犹豫受到诅咒,特别是那个“主要改革者”因其软弱、政治上无能而受到诅咒。

改革的政治方针失败了,所争取到的一切——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公开性、代表机关和选举出来的政权机关的作用的提高等等都受到了压制。在所有的主要

点上当局目前的方针都是对改革路线的否定。但是不能回到苏联去,我们需要新的联盟。社会并没有停滞。应该更换目前的制度,不过要运用民主选举和宪法的方式。必须拯救民主制,它可能不完善,但却是最好的,绝对有力量的政权。我说的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指的是强有力的行政权、强大的议会,有效的司法体系,自由独立的报刊。因此我认为必须真正自由民主地选举新的议会和总统。^①

戈尔巴乔夫受到的指责颇多,有些人把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丧失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个人。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做法。潘京声明:我反对这种做法,未必需要寻找罪魁祸首。第一,不能仅以错误来评价一位历史活动家——从法律的观点看待过去是不能接受的。第二,政治家,甚至大政治家,都有可能成为巨变、不可抵御情况等等的人质。因为我国的情况是,政治舞台上自发势力浪潮,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共产党人和民主派、改革派和改革反对派的预料。第三,戈尔巴乔夫及其志同道合者没有能够改造斯大林时期现代化的主要工具——苏共。顺便说一下,列宁要把俄国变成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然后才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打算没有成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创建的政党未能走这条路: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的传统在党内比自我改变能力更为有力。俄历史学家萨哈罗夫也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以为苏联是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搞垮的,那简直幼稚可笑。当然,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权软弱,改革失误,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崩溃,对民族主义起了促进作用;而一旦中央政权削弱,旧有的各种民族争端都暴露出来了。当前俄国的各种民族问题,实际上都是昨天遗留下来的。

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

近年来俄国的一些学者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时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如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鉴于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并未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许多学者转而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去观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垮台,主要是因为它不能根据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科技发展,使自己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

^① 《自由思想》1995年第3期。

1994年俄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召开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构想:社会主义观”,基金会全球纲领中心起草的供讨论的提纲认为,造成社会主义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崩溃;然而,其深层根源是在这一事实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适应向新的文明过渡的条件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

会议的参加者A.巴尔索夫认为评定社会制度有三个标准:所有制形式,收入的形式和基本经济规律。我们过去存在的制度,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节约时间的规律,主要要求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根源是科学技术革命。因此社会主义危机是因为不注意高新技术革命的成就。B.亚库尼奇金指出,西方在冷战中胜利的原因是高于苏联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程度——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范围内。M.鲍可夫指出,至今信奉共产主义多半源于传统。科学共产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个动力。1969年选择了老的力量,这导致失败。然而,社会存在另一种力量,这就是发明者和合理化工作者(在苏联从1950年到1985年他们从55万增加到1400万)。这种力量使美国和日本变得强大,它们取胜靠的不是市场,而是创造潜力。^①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许多俄国学者接受西方流传多年的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在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他们运用这种理论去分析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先前存在的现实社会主义是古典工业主义的产物,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固有特征:耗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明显的所有制界限、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阶级对抗、党派的政治结构占有优势。但目前后工业社会已在取代古典工业主义,其特征是:灵活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工业、所有制关系与阶级划分模糊不清、国家职能改变、出现新的社会主体和没有党派性质的运动、政治文化一致。社会关系受到新需求的影响,这些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不归结为经济利益。这些根本性变化发生在相互依赖,同时又成分各异、相互矛盾、充满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强烈反差的完整世界之中。历史上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没有准备好接受时代的挑战。这种社

^① 《选择》1994年第2(5)期。

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不完全符合当今的历史变动了。

萨马尔斯卡娅持类似观点。她认为,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生产单位和资本的扩大、生产资本同银行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紧密联结、计划调控原则渗入经济。后工业革命的特征是刺激私人企业经营活动和私人首创精神。苏联同样是在世界工业进步的轨道上运行的,尽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陷入困境

哲学博士 Ю.А.克拉辛以进入后工业社会为根据强调指出,不仅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社会观念,包括自由主义观念,都处于需要更换观念范式的危机之中。克拉辛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陷入了困境,这是由于这两种观念都是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之上的,而正是社会制度和发展中的一元论首先受到工业化现实及其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构想把社会关系相对化,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作为体制的社会存在任何稳定的结构,以离奇的模式集中了某些现实问题,并按自己的方式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理性主义的构想发出挑战。

更换社会主义范式的必要性

克拉辛认为必须更换社会主义观念范式,这指的是深入改变整个观念,直至改变观念的哲学基础,让观念在多层次的社会思想总潮流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表明社会主义立场同质的标志应当是:①方法和评价中的社会性,即意识到反映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地位的利益和志向对历史行动的社会决定性作用。赋予劳动者的利益以优先地位;②团结,这是社会主义一词本身一开始就有的概念。③国际主义,它表现了国际团结,这种国际团结是面对目前的全球性挑战所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

历史学博士 B.T.洛基诺夫从全球和现实的(而不是纯学说)问题角度肯定了新范式的必要性。他说,即使迫于生态问题,也需要一个现代的、形式和内容崭新的、能对当代世界及其前景提出社会主义认识的社会主义观。他说,我们正经受着利己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危机,这种方式在大众意识中培植一种“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企图把一批“文明国家”置于其余人类之上,置于居住环境之上,置于自然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福山热情描绘的在 20 世纪末出现的自由主义的胜利,确有变为“历史终结”的危险,而且已不仅仅是按黑格尔的方式。如同早期基督教曾帮助人类进入其发展的新时期一样,构成社会主义世界观核心的团结和集体

主义思想,在获得新形式和新内容之后,是能够成为拯救的手段和向文明的新阶段过渡的旗帜的。

梅德维杰夫也强调更新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新,使之同 20 世纪末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为下世纪初作出筹划。如果社会主义不对目前社会中的变动和文明性质的转变所产生的问题作出回答,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①

制定社会主义构想的基本方向

克拉辛认为,寻求制定社会主义构想的崭新看法,可以而且应该按下列基本方向进行。

(1) 从结构论转向价值观。根据某些固定的结构(公有制、国家计划、工人阶级领导权等等)来设计一个与资本主义模式相对立的、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尝试,都带有历史暂时的性质。当今多种多样的现实,提示了另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即对各种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等等)加以系统综合的途径。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把这些价值观念同某些经济范畴拴在一起是不够的。在每个领域内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相互依存和从属关系的问题日益突出。以往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是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现在已经清楚,异化的根源要深得多。社会主义要成为能唤起具有巨大能量的社会行动的伟大目标,就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解放的概念,能够揭示出克服各种不同形式的异化的方法。

(2) 从“摧毁”论转向有机论。这里说的是革命与改良的相互关系,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是荒谬的。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应当融入历史进化的有机进程之中,而不是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它,否则,现实一旦予以“拒绝”,这种主观逻辑就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摧毁价值的暴力和极权。

(3) 从目的论的决定论转向对社会历史创造活动的非预先决定的不同方案的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本体论”的观点把历史看作由客观规律决定而不取决于人的意志的不同阶段构成的某种序列,它与政治中的极端唯意志论结合在一起。唯意志论政治援引历史必然性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① 《国外理论动态》(合订本),1995年,第214页。

而这种说法更多的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的认识。

当代社会的后工业化趋势,尖锐地提出了一项任务:把历史看作人们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由无个性的客观规律所预先决定的。历史进程的轴心是主体及其广泛范围内的自主的活动。行为动机的多因素化和社会群体和个体探索的多元化,使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后果变得无法预测。

这样就需要重新思考衡量社会主义方案的社会哲学尺度。例如,把进步理解为直线上升的发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还必须放弃革命救世论,这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说法的直接产物。关于社会和谐一致(它被用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观念也是天真的。显然,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可能的只是变动着的社会平衡,但这种平衡丝毫不消除社会冲突: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它们扮演着社会发展发电机这一不可取代的角色。而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寻找调节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

(4) 从对人类社会以及相应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完全单一性转向包容各种社会、文化、文明的多形态系统的观点;转向其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前景的观点;转向平等的、摆脱了“社会联盟”人为障碍的、作为人类文明自然状态的观点;转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即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5) 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认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转向全球的角度。

(6) 从社会主义观念(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排他性转向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哲学和政治意义上,这种讨论意味着各个社会政治力量、运动、思想流派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社会政治思想运动的建设性进程。通过该进程,掌握多方面的社会经验、对各种价值观作出选择和综合,使不同的社会政治传统互相充实。在我们时代,这一讨论正成为社会认识和政治实践发展的主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特殊性、排他性、分立性对任何社会观念,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观念都是有害的。

作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西方百年来的发展可以称作高度现代化,克拉西利希科夫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在现有工业化生产和保留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在经济社会形态范围内,是变得高尚的人道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工业社会主义作为在可能程度上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使西欧得

以完成科技革命,——起初是其 50—60 年代的第一阶段,然后使它进入了第二阶段——信息革命。西方开始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尽可能地贯彻社会公正原则,这就为工人子女打开大学之门,保证消费的增长;这一切意味着培养了新型的工作者,新型的人,意味着劳动与科学知识的结合,这决定了西方在 30 年前就能取得技术和经济成就。但是,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西欧的社会主义开始过时了。现代工作者首先依靠社会国家的成就,极力争取自我实现、自我肯定,能够独立地保证自己获得高工资、送子女进私立学校、请私人医生看病,等等。由此产生了社会国家的危机:现代极其复杂的劳动力的载体对社会国家的需求已大大小于他们的父辈。社会国家不能满足已提到首位的需求——自我肯定的需求、消除人的异化的需求。这样一来,社会国家不能,看来客观上也不可能实现文艺复兴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作为资本主义自身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也必然标志着另一个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具有神话性质的“第一阶段”——“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现实社会主义”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失败了,因为它首先在智力方面失败了,这不仅是指没有提出新思想,而且也指没有掌握全部科学成就,没有在实践中实现所提出的思想。克拉西利希科夫认为,在今后几十年内,俄国将不会实行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俄没有产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些文化和历史根源。在俄国,只有当左派力量彻底铲除自己的反资产阶级和反西方的特性,能够提出实现现代化和向后工业化过渡的口号时,才能期望获得成功。

造成当代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化时代社会主义所需的条件丧失了,至少在世界发达地区如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新阶段必须彻底更新。

这种情况本身就提出了文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互关系中形式与内容的复杂辩证法纳入现实的观察过程。从这方面看,对俄国来说,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否现实的问题的传统辩论开始显得有点闭塞。

社会主义和俄国的现代化

有人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只是实现其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并且其中不包含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成分。历史学博士 B.Г. 普利马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是个现实,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发展极为困

难。1917年以后的俄国史,就是尝试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的历史。

B.B.卡拉什尼科夫认为,恰恰是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某种其他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上半叶成了加速俄国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只有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在当时的具体形势下提供条件以满足加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保持国家统一,即保持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实现了作为社会主义主要标志的按劳分配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是以原始的方式实现的。卡拉什尼科夫强调,当时国内存在的社会制度按其类型来说是社会主义的。这是极为粗陋的一种“野蛮的”社会主义,是用“野蛮”的方法实现的,但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方案。^①

潘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是革命后时期(也可以说还要早些,从1861年起)出现的那种现代化形式的危机。相应地,俄国的社会主义问题,首先是现代化的形式、方法、速度、社会代价问题。今天国家面临着完成旧意义上的现代化、向现代化的新界线过渡的任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由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必然会成为历史运动的向量,其实不然。正如任何其他学说一样,社会主义并没有先天拥有这种能力。它必须在每个历史阶段重新使自己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者今天应当成为比多数自由主义者更加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成为比“市场派”自身更为坚定的“市场派”,否则社会主义会再次变成一种抽象学说,而不是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俄国的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当然是特殊意义上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化因社会主义而具有了解放(当然是按我国的标准看)性质。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败给布尔什维克的原因,不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未能描绘出符合俄国历史发展基本向量的前景。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做到了这一点,甚至不惜以背离学说为代价。由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使自己的纲领在历史上扎根,赋予(尽管是暂时的)全民性质(解决土地问题、退出战争等)。

斯大林的现代化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走的仍然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军事领域,将西方技术成分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又未对

^① 《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

这片土地的结构进行根本改造,未给社会关系的体系创造相应的现代性。到80年代中叶,当戈尔巴乔夫在政坛上崛起时,俄国最初出现的那种形式的现代化已经过时。按此模式继续发展,已与经济、居民的需求相矛盾,使国家倒退。应当使工业服务于国家发展、人民富足的需要和需求,使现代工业成为革新全社会的杠杆。除此之外,80年代俄国的现代化还应解决一个任务——为俄国与科技革命有关行业(不仅是军事领域,而且还有民用领域)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同样要求改革社会关系、政治领域,要求经济非国家化、放弃命令式的管理方法,等等。归根到底,遇到的是造就新的个体问题——动态的、技术发达的、关心自己努力结果的、能够借鉴他国经验的个体。

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

叶莲娜·萨马尔斯卡娅在《从后工业社会的远景看社会主义》一文中分析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的共同点是对平等的追求。资本主义以市场(通过货币使各种商品和劳动均等)和民主制(所有的人作为选民是平等的)确立了平等。而社会主义提出了更深刻的平等方案(方案之一就是财产公有化)。寻求比自由民主的平等形式更深刻的形式,构成了工业时代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主流,包括古典马克思主义或后来的各个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最适合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虽然它们在政治目标、战略和意识形态上有差别,但两者是相类似的。

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而这种传统也哺育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世纪之初也参加过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第二国际。这两种社会主义即使发展到相互对立的时候,仍保留着基本的相似之处。相似的先决条件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情况,那时西方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对现时代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测就是以此为检验和衡量的标准的。那时经济中存在积聚和集中的现象,同时还产生了生产和财产分散化的过程。积聚是占优势的方向,它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反自由主义意向。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多数拥护者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拥有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生产,这样的生产起先在民族范围,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将成为唯一的生产。

企业股份化的结果是所有主被排挤出生产过程,不再需要他去发挥职能,对企业的领导更多地转移到雇佣职员的身上。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认为,资本主义向着生产和财产的全球积聚运动,因而也是向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竞争运动,向着实行自觉的和总体调控的社会运动。列宁也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积聚和集中、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成的事实为依据去论证社会主义将迅速到来的预测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正是沿着这种观念的航道最终制定出来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同样长期沿着此轨道前进。这两种社会主义形式有四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1) 信仰工业进步,把工业进步看作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贫困、失业的必要条件。

(2) 把无产阶级看作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诚然,到50—6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已感到有必要以“白领工人”来扩大选民群,而苏共大致也在同一时期宣布自己为全民党。

(3) 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两者都承认国家在组织与调控生产和分配、实行涉及广大社会阶层的保护主义方面的巨大作用。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社会国家”,而苏联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体制。

(4) 相信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并同它相对立的特殊社会形态。他们的意识受控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命题。西方社会主义者前不久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长时间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活动看作不得已的暂时的立场。直到1959年,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时,才放弃了通过同资本主义决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苏联社会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工业型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都是工业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虽然否定资本主义,但是都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基础紧密相连。

两者也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也证明它们共同的历史基础——资本主义工业化按照不同方式对它们发生影响。一战和俄国两次革命期间考茨基、希法亭、伯恩斯坦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有巨大的潜力,能够通过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等适应大工业生产的条件。德国11月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认定,只有在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才实行生产国有化。列宁与此相反,他认为德国是一个已经

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生产国有化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激进的改造,而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社会保障领域。起初他们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变成通过建立混合经济,使社会主义政党变成许多欧洲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扩大和深化社会保障措施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觉的社会改造的纲领。

列宁实际上忽略了证明资本主义与大工业生产条件可以相容的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继续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谈论竞争和垄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定律的对抗性,认为竞争让位于资本主义垄断,然后让位于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全面垄断化的社会主义空想,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薄弱的国家里兴起并付诸实施的。可以把列宁主义看作一种适合于农业国条件的、新的(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形式。列宁主义包含两个方面:①它是世界落后地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②它包含一个按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制定的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改造方案。列宁主义制定了在后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俄国工业化的方案,它是本世纪初工业进步中所出现过的最极端的结论的集大成者。列宁主义常常被看作是俄国西方化的意识形态。但还应补充一点,俄国的现代化从来都是通过激进的政治改造途径和强有力的国家实现的。1917年10月并没有越出俄国传统的范围,它为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在30—50年代俄国建立了完全可以与西方相比的强大工业。工业化的任务在最初几十年里比社会生活社会化任务完成得顺利。

确定俄国改造方向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技术革命,它将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建立,它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工业时代已经显示了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相互渗透。

后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的挑战

社会主义作为运动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既向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也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使社会主义形成体系的最一般的原则遭到怀疑,这包括:

(1) 生产增长是无止境的,使一切都服从于生产的论点。工业的发展对地球生存构成了威胁,必须以质量的发展、对生态的考虑、对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利用,而不是以数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存在的必要的新形式。人类必须学会在生产

和消费上更加节约。

(2) 社会领域的变化也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缩减,新的生产只需要人数不多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是新的高收入的精英,他们的社会利益往往具有后物质主义的性质。大部分新的工作位置是服务部门创造的。劳动者的基本群众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他们从事的是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他们不可能获得领导社会的使命。在新的后工业社会里,只有精英劳动才能构成追求在生产、政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承担者。此外,无劳动的居民的比重在增长。失业成为真正的灾难,后工业社会将不能摆脱尖锐的社会问题、不平等和所谓的“新贫困”。

(3) 新的时代使“社会”国家遭到有力的打击。这一过程在西欧国家和俄国是相同的。

总之,后工业社会的临近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使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进步是人类走向物质丰富和普遍幸福的道路、关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仰成为问题。有人以此为根据,断言能适应未来的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后社会。但是在新的条件下,尽管它的哲学和经济尺度、社会和政治尺度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仍将继续保留。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得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

后工业主义的基本标志是生产应当考虑自然界,否定会动摇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而工业时代完全相反,它鼓励生产的抽象增长:增加资本的利润、规模和运动速度(资本主义世界)或单纯增加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在实践中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是在抽象的统治下转动着生产和消费的车轮的。

老社会主义的质量价值还没有包括整个自然界,老社会主义否定的仅仅是市场抽象,维护的是追求质量的劳动(与抽象的劳动相对立),和它所生产的消费价值。老的社会主义已经认识到了经济服从质量标准的必要性,不过它还没有达到把整个自然界包括进去的地步。它按照绝对否定市场经济的精神提出解决办法,这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接近于“宗法制家庭”和“共产主义部族”(希法亭语)框架内的经济,即带有少量交换因素的自然经济。不是工业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

者全都否定市场抽象的意义,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就摆脱了这种观念,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思想。后工业主义时代的新社会主义应该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

在政治领域,虽然各种形式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已不适宜,但是即使在后工业时代其一般方向仍具有现实意义。这种方向活跃了反对国家集中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方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方案,但是,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管理方面现代情况的思考和现代化仍然具有理性潜力。社会主义有反国家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是无政府主义所特有,而且也是马克思和列宁所信奉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所特有的。马克思和列宁不仅相信国家消亡的遥远前景,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政权主要不应该是代议制的民主制,而应该是直接的民主制,是无产者和全体人民的直接自我管理,这将导致国家作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机关的消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述了这种政治净化模式。但是列宁感觉到在一个大国的条件下人民自我管理形式的政权将没有行为能力,因此在无产阶级体系中引入了一个新角色——党,赋予领导地位。这样他就为把苏维埃变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开辟了道路,这条道路在后来苏联历史中成了现实。否定代议制在实践上导致了苏维埃极权主义。

从根本上讲,后工业社会将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布兹加林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那里人的异化将被完全消除,人和自然的和解将成为事实,劳动将成为人的自然需要,社会将普遍实行自治,国家将消亡。这将不是“民族社会”,而是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是全人类的解放。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类借助科技革命的成果努力摆脱科技革命带来的困境的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当前的状况向上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①

后工业社会提出的新问题

在工业时代,社会问题可归结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确定了把劳动从资本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任务。在我们的时代社会问题没有消失,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产品文明”的终结是后工业主义的标志,劳动、生产、无产阶级将逐渐丧失主导作用。原因是在工业化和信息技术时代,必需的体力劳动减少,不参与生产的人

^① 《选择》1995年第2期。

数增加,新的工作岗位大批转入服务部门,部分或完全失业增加。

要重新审查团结的概念。不单是工人的团结,而且还有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所有雇佣劳动者的团结。为了割断劳动时间与报酬之间习惯性的联系,还应当支付费用以做到要人干活就有人干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已经过时。

在社会问题中还有生态问题。社会主义者今天的口号是少消费一些,使生活和工作得好一些。

后工业社会使民族问题变得特别尖锐,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族问题。它涉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国居民和来自东方和南方的移民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党国际在国际方面的立场是对世界财富进行有利于穷国的重新分配,向穷国提供全面援助。

各种形式的工业社会主义的意图都是使工人阶级获得物质保证和执掌政权,新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广泛:在减少必要的活劳动的条件下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获得应有的积极的生活,保证全球社会成员生活和活动的周围环境的清洁,使穷国和富国的生活条件一致。可见,在向后工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价值不会丧失自己的现实性,虽然其具体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鼓励垄断和集中倾向。因此,专横的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取代它的将是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其方向是与市场社会和自由民主国家长期共处。

欧洲社会主义者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是建立具有特殊的经济、特殊的国家制度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从苏维埃体制崩溃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必须抛弃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特别的社会经济态的图谋。任务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按照“另一种发展方式”的方向,通过多角度人道主义变革来改造资本主义。

在俄罗斯,这就意味着首先承认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准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是合乎规律的。其次,必须实行规模广泛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政策。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的不幸和错误就在于没有提出改革的明确纲领。在现代俄罗斯还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联合组织并能提出为大多数居民所理解的政策。原因何在?除了其他原因(缺乏稳固的社会主义传统、组织方面的困难,等等),还有一点:一个长时间生活在意识形态检疫环境中的社会突然之间热衷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最初是大众传播媒体热烈宣传社会不平等的好处的思想。但

是,在上述不平等的某种积极方面产生影响之前,我们却亲眼看到了它的有害影响——居民贫困,政权腐败,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俄罗斯复兴的希望在于在人道主义平等思想的鼓舞下广泛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应当唤起人道主义、人类团结和文明的崇高理想。

现在,当现代化一方面应结束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应开始解决工业化后发展的更高任务(在俄罗斯所有任务必须一同完成)时,大家都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者不想成为徒有虚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就应当在现代条件下反对富人靠牺牲穷人的利益、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获得自由,争取在不发生混乱、不出现嚣张犯罪的情况下使政权民主化,开展斗争以争取更新的联邦、法律在全国领土上的威力,消除专制的管理方法,采取措施来发展文化事业。这些任务的解决未必就会把俄罗斯推向“社会主义”(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可为国家无障碍地向当代人类社会前进的共同方向发展创造条件。^①

俄共纲领中的后工业主义

1995年1月通过的俄共纲领对人类20世纪和未来的21世纪的分析,就是立足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的。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浪费的社会,它把生产看作是对人和自然资源的普遍开发,毫不考虑社会付出的费用、对后代和周围环境的有害后果。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一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靠这种滥事开发,进入了“消费社会”,把消费从人体的自然功能变成个人的“神圣义务”。实际上,这是强制从事超强度劳动的形式,是资本发挥职能的最新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劳资矛盾的两极已超出发达国家的国界,而按洲际来划分。资本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种族社会问题。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方式已接近其极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走到了其内部的极限,而且也走到了其自然的、天然的极限。生产的增长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纲领指出,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不得不对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整个人类史上最艰难的选择”:第一条道路是保留现有生产分配和消费结构,限制甚至停止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条道路是保持全球的生态平衡,通过生产力、生产方式

^① 《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

和消费方式的质的改变,使科学和工艺进步采纳人道主义取向,不断提高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这第二条道路被叫做“稳定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从整个文明的趋势、现有的生产力以及社会的精神传统的特点和追求出发,制定本国的稳定发展战略。对俄罗斯来说,最站得住脚的、最符合它的利益的是选择最佳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作为学说、作为群众运动和社会制度,将获得第二次生命。

纲领依据对生产力的客观分析,勾画了 21 世纪“最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的总轮廓”。它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浪费性质将逐渐地完全被克服。随着新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将在生活中处处奉行全面保护资源的原则。劳动生产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生产劳动越来越变为主要是智力的劳动,这时候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了生产的主要条件。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投入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劳动将逐渐由生产手段变成个人的自由创造的自我表现,劳动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方式,作为实现和完善人的创造才能的过程,将具有独立的价值。人们的消费的性质也将发生根本变化。他们的需求结构将得到根本改造。

这些改革是生产力领域的新的革命变动的结果。社会将从工业化工艺过渡到后工业化工艺。

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恢复过程,将合并成为与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循环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统一的工艺过程。人的劳动活动的客观意义将发生重大变化。迄今为止自然界似乎是劳动取之不尽的永恒的基地。现在,劳动的使命是成为保护和再造自然环境的基础。各种表现形式的公共安全将成为生产效益的主要标准。灵活的自动化工艺将取代传送带工艺。在完善运输和信息体系的基础上,合理分散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使人的居住环境非都市化。

从社会经济含义上看,工艺的进步同劳动社会化的进程是一致的。劳动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工人阶级仍然是这种转变的动力。

俄共纲领认为,在科技进步的进程中,工人阶级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其质的和结构的更新”。生产需要狭隘的专业化的工作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生产越来越需要具有高深的技术知识、眼界广阔的高度熟练的劳动者。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知识分子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这些相迎的过程形成现代工人阶级的先

进队伍,它的核心。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劳动者的加入,社会的阶级划分将逐渐消除。^①

可以看出,俄共纲领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联系起来,这既包括它复兴的前提,也包括它所面临的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任务,以及其发展的前景。

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未来社会主义

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超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寻找革命的主体时有一个失误,即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然而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知识成为新的生产力。只有知识才能满足马克思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要求。新的革命阶级应当是智力工作者阶级。知识能满足马克思向公有制提出的要求,即它同时也是个人所有的。

马克思的失误

塔拉索夫认为,如历史实践所表明的,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①主要的原因是,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相反,在最近的未来没有看到新生产方式的症候,更不用说新生产方式在旧生产方式内部形成了。^②对革命的基本主体——无产阶级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本人就犯了第二个错误。本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设定,革命的主体应当在社会制度之外出现。不是奴隶消灭奴隶制,不是农民消灭封建主义。同样,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不过马克思的议论不难改造。马克思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发现像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那样的阶级,它存在于基本经济成分之外并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就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对资本主义最不感兴趣的阶级——无产阶级。马克思设想,对自己的雇佣地位不满的工人,在掌握政权之后就会竭尽全力去改变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产方式自身。马克思还在 1857—1859 年就意识到正是知识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但此革命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下期才开始。从方法论

^①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 年 2 月 2 日。

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主体应当是学者(广一些,知识分子),但马克思生前在实践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丝毫迹象。

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

这一切导致马克思构想中的明显矛盾。一方面工业生产方式必然是商品化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说得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非商品化的。物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变成商品。严格说,只有知识不是商品。商品在交换(出售)时一个所有者让渡,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知识在交换(出售)时成为购买者的“财产”,但并不脱离出售者(与出售者异化)。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从来不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这也表现在创造和转让知识者(学者和教师)的劳动报酬上。

不仅如此,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能够消除脱离(割让)的生产方式。知识并不与其创造者和持有者异化(脱离)。他监督知识的全部“生产”过程。

知识现在实质上已最终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尽管有的人企图变知识为商品,使智力财产为个人所掌握,但人类全部知识的99.95%是大家都可以得到的。甚至在核物理学中也只有0.35%的信息是保密的,而真正的知识还要少。公众的客观需求迫使保持知识的可获得性和公开性。^①

如果知识的“所有者”不同社会分享,那么生产和掌握知识就毫无意义。学者(在科学知识领域工作的)和艺术家(在艺术知识领域工作的)事先就已确定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提供给周围的人们。

最后,知识能满足马克思向公有制提出的要求,即它同时也是个人所有的。马克思认为,不这样就不可能克服异化,不可能辩证地扬弃私有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并不同时是个人所有制,这样的公有制会激发攫取经济。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时代出现之前,还不清楚靠什么样的物质载体能够实现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个人电脑就是这样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它可以同时是个人财产和公有财产(如世界互联网所展示的)。在自己电脑上工作的学者、作家、建筑师、音乐家、模型工都依靠互联网和数据库。另一方面,这些互联网和数据库如果不利用也就毫无意义。

最后,全面电脑化和信息化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伏尔泰曾经说过,对小国来

^① 参见《从社会前景看计算机革命》,《自由思想》1996年第7期。

说直接民主是好东西,但大国(例如法国)由于距离远、花时间多无法实行直接民主。现代交通可以不问距离同时行动。人人拥有电脑可以使社会全体成员参加决定的制订和通过及其贯彻执行。

知识成为基本生产力以后,必然会消灭工业生产方式。自动化、机器人化和电脑化无需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工厂,它们的本性是力求“小型化”,非集中化。经济上的非集中化应能导致政治上的非集中化(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作自治公社的联合体)。最后,自动化和电脑化将排挤人的工业劳动(甚至高熟练程度的),而需要使工作者转向高智力的创造劳动。在高智力创造劳动中将克服异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为此应当形成世界经济机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像现在看到的,马克思这里也性急一些了,超前了,把世界市场看得有点简单化了(后来的列宁也一样)。直到今天才形成真正的世界市场,即拥有全部民族典型特点,但遍及全球的市场。世界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世界原料市场几乎完全(甚或完全)形成,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正在形成,开始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只要这一过程一完成,资本主义粗放发展的时期就过去了。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推动世界政治一体化(其中包括在帝国的形式下)。与此同时,粗放发展道路结束后,资本主义不得不走集约化的道路。这会促使知识分子形成群众性的社会阶级——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而资本主义总是企图把它变成脑力劳动的雇佣工作者阶级。

智力劳动工作者阶级是新的知识分子,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同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着的新阶级,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为此,它自然必须成为“自为”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摆脱雇佣工作者的地位)。也就是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展开革命的宣传解释工作。显然,在资本主义下知识分子(雇佣劳动工作者)作为阶级只有以智力劳动的雇佣工作者的形式才能存在,这不仅不符合他的利益、要求和可能性,并且经常是对其创造的个性的贬低。相当清楚的还有,在未来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盟友是全体雇佣工作者(包括产业无产阶级),因为消灭雇佣工作者的地位符合其阶级和社会利益,而变成自由创造者和劳动者的前景对他们也有吸引力。

后资本主义不会自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它现在已经在全力抗拒自身经济机制中的新生产方式的萌芽,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由于“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利润”的竞

争,“电脑革命”已经开始走味,出现把私有制扩大到知识和信息里去的企图(所谓知识所有制),从而导致为私人 and 公司的利润而浪费地球的资源。

最后,资本主义企图以信息范畴偷换知识范畴。然而这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学者、艺术家和整个社会所掌握的是知识,而信息是私有者可以作为商品掌握的(例如,官僚历来作为商品掌握的正是信息)。错误的知识不是知识。但假信息的价值也许不下于真信息。

“信息社会”是向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社会迈出的一步。信息的性质和知识的性质,其社会使用的机制是相近的,最后,信息和知识都是“价值不全的商品”,因为它们交换(出售)时是并不完全让渡。

最后,对革命力量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与世界市场和统一的世界经济一起形成的还有世界帝国体系;

——以金融和财产收买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靠同第三世界的不等价交换),因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以“市侩的天堂”的形式出现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

——资本主义利用科技革命反对先进的社会、革命力量。

对全世界左派来说会出现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建立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帝国)体系的时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第三世界”的集体剥削者,而这会使宗主国变成类似后期罗马帝国那样的寄生虫,因而在宗主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的主体。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左派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必然会采取反对新殖民主义、反对工艺上和政治上依附的斗争形式,这就有蜕变成民族主义运动的危险(或者让左翼民族主义者扮演反帝斗争的先锋队的角色的危险)。

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 21 世纪必须解决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互相联系的,因为现在这三个因素已经一起发挥作用了。如果左翼力量不能消除今天自发形成的世界发展的景象,那么地球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①

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是前苏联地区各国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文章研究保守派意识形态,剖析保守派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人甚至断言,“弘扬保守派世界观乃是我国社

^① 《自由思想》1996 年第 12 期。

会学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乌克兰苏梅大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教研室主任弗·希洛夫在《共产主义后社会中的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一文对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把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看作是一支同自由主义激进派对抗的力量,给予相当的肯定。^①

保守主义的含义

保守主义就是固守旧有的事物,主张保留现存的事物。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领域,它具有两个基本含义。

一种是普遍人类学诠释。这里保守主义被理解为全人类的永恒立场,其中包含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和思想,如传统、稳定、秩序、权威、自由以及与之相结合的责任感、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不平等、怀疑主义等等。人类学的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历史渐进成长的天然有机产物。在这里“生长”是与“制作”对立的,因此反对对社会进化过程进行任何人为的干预。他们主张,与其支持未经验证的新制度,不如维护那些体现先辈智慧的现存制度和治理方法。

另一种是情势诠释。在这里保守主义是指力图保留现存制度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撇开具体的历史情势,保守主义乃是不同的群体、党派在不同时代不断重复的立场。这样,俄国历次革命中保皇派和目前的正统共产党人都可算作保守派。亨廷顿认为,没有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促成保守主义的因素是理论家所面对的挑战。……人们之所以投奔保守主义阵营,是因为对事态变化感到震惊,是因为恐惧地感觉到,他们曾支持过的或者视为天经地义的、并与之息息相关的成规定律或典章制度,突然之间不复存在了”。因此,人们往往是以革命者开始,以保守主义者而告终。

保守主义视其对社会变迁的态度而有所区别。有反动的保守主义,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的保守主义,还可以分为价值观保守主义和结构保守主义,前者在忠于原则的同时,愿意改变社会结构,而后者反对改变结构。

当代的保守主义

希洛夫认为,当代的保守主义是对自由派激进主义实践的负面后果作出的反应。自由主义宣称,自由之于社会发展,既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是一个充足条件,

^① 《自由思想》1995年第3期。

然而自由主义在原苏联境内却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因而目前的口号不是自由,而是保守主义主要价值之一的秩序。秩序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际关系受制于特定的规则。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的居民都渴望秩序。社会中许多事物都同秩序联系在一起,如社会发展的稳定性,社会公正。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权力和秩序。1991年国家被削弱甚至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过渡到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步骤,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是组织公民社会并使其结成整体的根本,这也是保守主义的观点。

保守主义世界观具有现实意义的另一个因素是,保守主义从不相信绝对化理论,而更相信经验。在改革中理论和满脑子装着抽象方案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破坏性的。人的才智有限,不可能预见自己干预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人无权承担改造世界的使命。对社会改革而言,“培育”比“制作”更为恰当,猛烈摧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社会改革中循序渐进,审慎行事,宁取生长而勿选“制作”,也是保守主义者的传统口号。在共产主义后社会中,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主导形式。

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未能奏效,其原因不仅在于未考虑到经济生活制度化的特殊性,还在于社会传统的惰性作用,大众意识价值取向的惰性作用。改变外部标志如国旗、街道名称等等是很容易的,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定型观念是很难的。时至今日,在共产主义后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社会主义意识,大多数居民期望的不是市场改革,而是改善生活。

对于过去的传统,应努力使其成为社会改革中的支点。有一句保守主义的格言:“如果我们今天珍惜过去,过去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在观望中抛弃过去,过去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

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

对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东欧国家和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做一些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版本比起“自由派保守主义”版本,在经济上收效更大。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越南),生产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科研和教育拨款不断增加,外国投资不断涌入。一种情况是,依靠现有传统,十分谨慎地对待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稳步前进。

另一种情况是,大破意识形态信条,摧毁旧的政治体系,弃绝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传统,从计划经济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而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一跃却等于坠入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深渊。

共产主义后国家的社会机体是排斥自由派激进主义的。左派力量在一些国家大选中获胜,左派力量在俄国取得显著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乌克兰,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业党人)在最高苏维埃中占到三分之一,共产党党团是议会中人数最多的党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阵地在加强,虽则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绝非铁板一块,但把斯大林制度视作理想境界的反动的保守主义集团人数甚少。

现在乌克兰政府执行的方针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的一些特征。显然,社会应当从反共的极端中解脱出来了,应当克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字眼的抵制态度了。任何一种主张限制市场自发势力、主张对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政策。但是,既然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所有国家的政策就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部分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都宣称他们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运动,比我们改革前要广泛一些。

不过,那个时期也并不是一切都不好。对诸如集体农庄或传统的生产领导方式这一旧的、不完善的、在没有新的之前仍起效用的东西主张加以保留,就和保守主义有关。但这是改良派的保守主义,因为这里认识到了旧事物的不完善,并为扶持诸如农场主、中小型商业、吸引外资这些新事物而工作着。这种保守主义就其性质而言,乃是价值观保守主义。因为在坚持社会保障、集体主义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这里还存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决心,而相对于这些价值而言,经济和政治结构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这种隐蔽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比公开的“党的社会主义”更为优越,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开申明自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它们提出的建议往往超出最佳极限而偏左。他们力求使诸如退休人员或其余经济成分中的弱者都得到温饱,有时提出全盘社会保障的主张,而这样做归根结底反而使保障对象身受其害。国家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褒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对所治理的人们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对所谓的“普通人”表示出合乎理性的不信任,这就是

人类学方面的保守主义所在。

对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方法的态度显然也在改变。民主的狂热已经过去。居民把自身生活条件的恶化,同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种机构的活动联在一起,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机构是反映全国多数人的意见,是代表人民意见的。但是,人民或者说其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永远正确吗?经验表明:民意可能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可能考虑不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可能很容易被大众传媒所操纵。有一种见解越来越明确:无论是关系到自身命运的决定,还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决定,人们做决定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国家级的重大决策,应当由有责任感和有专业知识的人士作出;人民只需在这个或那个负责的政治精英集团之间作出孰优孰劣的选择。属决策水平上的政治无需群众性。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不应拿到群众集会上去解决。政治作为管理社会的一门艺术,和任何艺术一样,都是属于精英的。民主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民主不是绝对价值,而是次生性价值,相对于诸如人的生命和安全,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这些绝对的东西而言,民主只表现为辅助价值。

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逐步实现自由化并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乌克兰及独联体其他国家,这一过程我们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将观察得到,然而这种自由化和转变的一次良机已经被错过了。

社会主义的大众心态失去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为凡是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词句的意识形态体系,均被搞得信誉扫地。大众媒体大量灌输自由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而它们在我国土壤中则被庸俗化,把不惜任何代价直至用犯罪手段谋求个人发财致富和发迹视为天经地义。

独联体各国人民向往一个能够为人提供保障的富强国家。对“改革前的”怀旧之情在增强。的确,人与社会相互关怀的社会主义观念至今尚存。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必须强化这一观念的建设性和爱国主义即献身于社会的一面。这种保守主义价值应当存在于社会,其存在的程度应当不亚于自由、自我表现这样一些自由主义价值。

激进革命的陶醉时代在结束,一个头脑清醒的时代正在到来。循序渐进地推行改革,依靠社会机体内部的力量,以社会自然生长为重点,自由只能建立在责任感和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这些口号在原苏联内新兴国家中正在成为当前口号,成为通向可预见、可控制未来的指针。

系统论的分析

系统论是当代的科学方法之一。有的学者试图借助于系统论的方法对社会主义及其失败的原因作一分析。B.B.纳夫罗茨基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后社会:试比较分析》^①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分析显得比较肤浅,但系统论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值得注意。

纳夫罗茨基根据系统论方法的分析,认定共产主义即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同共产主义后的社会并无质的区别。在共产主义后的社会里掌权的主要还是苏联时期的在册权贵,他们仍然占有生产资料,仍然享受特权,他们通过市场、银行、股份制以及其他商业结构这些垄断性的控制系统所实行的强制,一点也不比在国家垄断经济中所实行的强制少。无权的居民人数并未减少,也未降低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作者写道:

在原苏联和东欧的最后十年间出现一些过程,其深度和广度可以证明,“社会制度的基础正在更换”。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却感到,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对此社会学家作如下表述:如果说社会相当轻松地摆脱了旧制度的外在特征,那么“内在的共产主义”却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在科学文献中还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后社会进行比较分析。重点要么集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回顾性的描述(西方历史学家大体上如此),要么只对过渡时期进行分析。

共产主义系统的基本成分和结构非常简单:居民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小部分人(3%—10%)拥有全部权力、生产资料和某些特权,而大部分人只执行纯劳动功能,处于对少数人的完全依附地位。这就为把“阶级”这一术语应用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依据。人们常常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称为政治精英或者在册权贵,严格地说,只有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共产党的党的机关人员才是政治精英。

共产主义系统的基本要素,即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是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相互联系着的。在共产主义下的这些关系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深入到了社会群体的内部,不仅在宏观上而且也在微观上决定着层面的特点。在宏观上维护这些关系的稳定调节机制包括三个子变量。其中一个子变量可以确定为

^① 《社会政治杂志》1995年第5期。

被奉为政治学说的政治暴力,只要不服从行为规范,就会成为行使强制作用的对象。其他两个子变量——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成并维护某种行为准则和思维准则。经济这一子变量可以作为系统的一个独立变量来考察,这个变量是由经济运行的基本准则——严格的中央集权的管理性质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来确定的。

共产主义崩溃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党的机关、享有特权并拥有全权的社会集团的消失。不再有这个集团作为统治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要素的政治暴力已成为过去,确定了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经济变化趋势,发生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民主化。

共产党机关退出政治舞台并不等于该社会集团的消失。这一要素变成了在系统结构中实际占据那个位置的那种类型的另一种要素。实际上,大部分政治精英变成了经济精英,以政治权力换取钱财。小部分人成了国家官僚或重新回到了政治上的俄林波斯山,尽管是以反共的角色出现的。在册权贵也进行了重新组合。他们从精明能干的科技知识分子代表、刑事罪犯和从事有组织犯罪的权势人物那里得到补充。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未对作为系统基本要素的在册权贵的地位产生影响。他们仍旧占有生产资料,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占有的:以前是集体占有,而且是不明确的占有(国家占有),现在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个人所有。特权仍然保留着,甚至扩大了。无权的居民并未减少,也未减少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正统的共产主义还以某种社会保障来回报公民的虔诚,共产主义后的社会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形成因素,在系统中出现了某种位移,党内系统的基本成分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仍旧占主导地位。发生变化的只是维持这些关系的方式:不再有政治暴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指令性经济迅速崩溃。这就意味着,稳态调节机制的结构在变,但还谈不上这个结构的基本原则也在变。

实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整个意识形态的消失。目前代替它的是市场意识形态和“光明的”资本主义前景的意识形态。形式上这是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但实质上还是那种粗俗的、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接受或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是随意的。新学说的胜利不需要镇压来加强。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工具都在宣传它,而根据心理学的摆动定律,群众意识接受这种

新学说比接受别的东西更容易。本世纪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的成功也是首先靠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取得的。至于稳态调节机制中的经济成分,那么在册权贵通过市场、银行、股份制以及其他商业结构这些垄断性的控制系统所实行的经济强制,一点也不比在国家垄断经济中所实行的强制少。

系统的五个变量中,只有两个变量发生了变化,并且远不是最重要的变化。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向市场关系的实际过渡既没有在财经领域,也没有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经济中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旧系统的发展逻辑。换句话说,经济中的主要因素仍旧是在册权贵中的不同群体在某种经济条件下所实现的利益,而提高经济效益、稳定与发展的要求只起着次要的作用。

通常把指令性经济、禁止私有制、国家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治暴力当作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特征,但实际上这不是系统形成的特征。它们只是描述了实现其基本公理的具体途径。这些途径以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途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而系统却保持了它的完整性。

作者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后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存在基本的共同特征:

- (1) 在拥有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特征方面存在重合的两个水平的层面;
- (2) 在社会中“统治一服从”关系占主导地位;
- (3) 存在调节社会垂直结构形成过程的准则的总和。

作者认为,这些特征描述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共产主义”,它比苏联8月不成功的叛乱或者东欧“天鹅绒革命”所能展示的更具生命力。在不同国家,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内核保持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它还是非常高的,足以对那里所发生的进程给予显著的影响。

新的形势与俄国左派的任务

哲学博士瓦季姆·谢苗诺夫教授在《新的世界现实、俄国现实和新的理论立场》^①中从全球形势的变化出发,探讨了俄国面临的任務。他认为,理论不应当落

^① 《对话》1997年第1期。

后于生活,应当同新的现实一起发展。新的实践必然要求出现新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不应当落后于生活,还应当向前看,看到前景,作出预测,捕捉新的趋势,发现社会生活中新的转折。

第三次世界瓜分

1989—1990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第三次世界瓜分——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第一次瓜分是在“一战”之后。“二战”期间和战后是第二次瓜分。第二次瓜分极大地加强和扩大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三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世界),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这一均势在苏联“改革”期间遭到了破坏,开始了第三次瓜分。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0—1994年。表现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压力下,作为第二超级大国的苏联被排挤出世界舞台。这根本改变了全球的形势。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世界从两极变成一极。美国成为唯一的“首领”,实际上的独裁者和国际宪兵,它担当起建立由它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和干预世界事务的职能。这导致新的全球矛盾和对抗的产生和加剧。

瓜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994年。其目标是瓦解俄国本身,使独联体国家受美国和西方的支配。

可以把目前的全球危机看作是三个互相联系的特点的表现:①不同国家所实施的具体模式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片面性。②把世界划分为对抗性的富国和贫国,首先是北方国家(七国集团及其他国家)和南方国家(在亚非拉)。③社会、人、自然发展之间的脱节甚至对抗。

应当看到,第三次瓜分世界首先是世界右派、反动派、亲法西斯分子、正在法西斯化的力量和法西斯力量搞起来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是美国的右翼、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由于失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右翼势力增加了自己的比重,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过世界左翼力量(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斗争和反抗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其证明就是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意大利和南非共和国选举中的胜利。俄国和独联体许多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也在积极开展活动。

左翼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他们的行动,共同对抗右翼。思想上的联合应当是国

际主义,所有左翼运动 and 政党的国际联合。需要有新的彻底左的共产主义国际。需要逐步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布兹加林认为,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全世界的过程。从异化时代和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全世界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局是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尖锐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是曲折的,而且是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不一定同时所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数量上和质量上的进步或退步是统一的,它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倾向,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理论、思想现象的社会主义。因此需要开展统一和协调的工作,以从国际范围内更新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俄国的现实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导致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生活,国内出现新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抗。一些学者对俄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

哲学博士鲍里斯·库拉什维里教授《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1—1993年间反动的社会变革,声名狼藉的“改革”使俄国退回到阶级对抗社会。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但资产阶级(“新俄罗斯人”)远未事实上成为统治阶级,未能建设性地解决管理社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小撮寄生虫,其中包括大部分原苏联党政机关干部。这一小撮就其社会本性而言完全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掠夺人民财产,做投机买卖,放高利贷,道德沦丧,使社会犯罪化。他们积极为外国资本服务,因为外国资本在掌握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料来源、使竞争者破产、“输出大脑”、进行金融业务时需要这种中介。他们已经向国外转移了2000亿美元。

现在一代的新俄罗斯人,无非是些神话般地发了财的、被自由放任变得愚蠢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是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寄生虫、强盗、恶棍。在他们手中社会成为没有主人的社会。有私有者阶级,但没有主人阶级。这是生产削减一半的原因。这种灾难性的下降甚至在德国人已到达伏尔加河时的艰苦的战争年代都不曾有过。更糟的是,生产在下降,高工艺的企业在毁灭,科学、教育、医疗保障都在崩溃。居民每年减少100万。学校毕业生的健康率只有25%。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新政权的破产同新阶级的破产一样明显。使国家波拿巴主义化的企图没有任何成效。它仍然是寄生虫、恶棍、强盗等一小撮人的奴仆,并且是外国力量的傀儡。只是有时在口头上装做民族利益的保卫者。

诚然,国家机关中也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尽管有些变形的生活潮流,但是只能把他们看作将来非背叛、非买办、非官僚的政权的后备力量。

不幸的是,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流氓化了。以前他们虽然是名义上的主人阶级,而现在连名义上的主人阶级也不是了。劳动者听任自己被愚弄和抢劫。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三分之二和更多。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他们还在期待国家把他们从盗匪和投机商中解救出来,实际上这个国家是为这些盗匪和投机商效劳的。他们还在无可救药地期望某些企业能够出现“好老板”。

与现在的社会经济灾难(是的,还具有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相比,以前的社会心理的不适意已显得微不足道了。“拥有时不珍惜,失去时才哭泣”。正如社会学调查所显示的,社会上60%的人希望回到社会主义去。可惜,很多人的愿望是柏拉图式的。参加1996年总统选举的抱有这种希望的人中,只有一半人投左派的票。其余的人还在指望别的什么。不排除,甚至很可能,在人民的深层正在聚集社会的怒火,会在某个时候为某个问题而爆发燃烧。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处于革命前的状态。^①

哲学博士瓦季姆·谢苗诺夫教授在《新的世界现实、俄国现实和新的理论立场》中做了类似的分析。他写道:1989—1990年间俄国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目前俄国的社会生活具有下列特点:

(1) 客观同主观脱节。客观上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已无法忍受,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执政当局的主观抗议。忍受的心理占上风。缺乏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思想、组织、政党和运动。

(2) 下层同上层脱节,即共产党人、劳动者、公民的下层运动同官僚化的空谈的上层领袖的脱节。矿工、教师、地铁建设者、医生、学者以及劳动者的其他群体在罢工、抗议、行动,而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和运动的正式首领却不同他们

^① 鲍里斯·库拉什维里:《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1期。

在一起,不领导他们。

(3) 近年来上层不断制造左翼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不久前又分裂为俄共和“劳动俄罗斯”两部分。这是不能容许的。

(4) 左翼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同工会、青年、妇女、军人以及其他组织联系薄弱。

(5) 爱国主义力量同样分散和相互对立。不久前在俄国人民爱国联盟旁边又产生了新的左翼爱国主义联合——俄国社会主义力量联盟(CCCP)。

(6) 最危险的是错过开展全国共同行动的许多机会。过错在目前的多数左翼领袖。因此现在迫切需要新的能采取行动的斗争的领袖。^①

走向新社会主义的道路

俄形成社会主义运动的矛盾条件

布兹加林《未来》一文中指出,由于历史民族文化的、地缘政治的以及其他特点,90年代中期俄国形成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其矛盾的条件,对社会主义改造来说更是如此。

① 物质技术前提。俄国从苏联继承了极其矛盾的技术结构。国家拥有遭到破坏的大量后工业化的发达的工业技术,正在下降但仍具高度水平的文化、科学和教育,生态良好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大部分工业、农业以及服务领域,就技术水平而言落后于发达国家达几十年。目前的危机加大了这种差距。

② 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前提反差明显。由于历史和民族特点,俄国具有丰富的集体关系的经验,因此具备其复兴的潜力。俄国比其他国家要少一些商品拜物教、个人主义文化、私人生活和私人劳动。社会仍然记得群众性的奋发热情。另一方面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对抗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个体化的过程,需“造就”摆脱宗法制的、村社的、民族的、官僚的依附关系的“经济”人。而这是人获得解放,作为个人参加历史创造的绝对必须的前提。俄国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诸“正常”阶级,没有形成劳动者的现代阶级意识,他们没有成为雇佣工人阶级,没有达到有组织地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水平(当局对劳动者的剥削在90年代初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罢工)。俄国缺乏真正有力的群众性的工会

^① 《对话》1997年第1期。

及雇佣工人的自我组织形式,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极其薄弱。

③ 俄国社会主义前景的国际背景也极其矛盾。苏联的瓦解没有导致国际矛盾的解决,反而加深了矛盾。因为被摧毁的不仅是“中央”的官僚主义形式,还有各民族的经济、个人、文化的实际一体化。这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社会不同的阶层追求国家的统一。但国际主义的基础蜕化成了被歪曲的大国主义倾向。结果苏联各族人民重新一体化的客观必要性变成了恢复官僚政权的主观(但具有现实的根据)趋势,其使命是恢复秩序,恢复超级大国的原地缘政治并以此为代价解决国内问题。

④ 俄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也极其复杂。一方面,相当多的劳动者(几乎达三分之一)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有传统好感;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最大的党;存在对苏联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怀旧情绪。另一方面,俄共及其盟友的主要支撑——对“社会主义”的怀念固然有助于抗议目前的官僚政权,但可惜对从下而上地创造新社会并无助益。只有建立在自由结社原则基础上的社会运动(联合)才能复活正在没落的集体主义的传统。劳动者从下面发展起来的组织却微乎其微。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俄共正在复制苏联官僚机关的传统。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回答不容乐观,在最好的情况下矛盾将被冻结。

布兹加林的《未来》一文认为,俄国面临下列选择:

① 国内继续实行“亲西方的”官僚投机资本主义的模式,其起点是“休克疗法”。

② 多数执政权贵在 1993 年选举和公决之后开始执行的方针。其特点是把金融领域中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同最大的金融工业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有院外集团)官僚调节相结合。这一图景实现的重要条件是居民的顺从,这种顺从采取了极其危险的大国沙文主义形式及“铁腕人物”对权力的渴望。政治上这意味着加强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其意识形态形式是市场—强国的沙文主义。

③ 官僚公司资本主义的父道主义平民主义模式。其基本特点和第二类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为支持国有成份和民族商业而更加注意对经济的调节,防止多数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这条道路的社会基础是持父道主义方针的官僚及与之相联系的本国私人商界,再加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劳动者和领养老金者。能执行这一方针的政治力量是父道主义官僚的各种各样的院外集团、左中翼政党、农业党和俄

共。这一方针的结果对劳动者较少痛苦,但实质上同第二种相同。后两种图景在目前最为现实。

俄国复兴的条件是根本改变发展方向,转到能回答第三千年挑战的超前战略——优先实现社会文化价值,向智力圈型的发展过渡,把创造性劳动的进步作为人类活动的领导领域。

这种从衰落的工业体系向立足于科技革命的第三浪潮跃进(从生产信息转向生产文化:知识、新工艺、人的创造能力、稳定的生物地球群落),不比列宁的电气化计划显得空想。

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

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

第一,建立人民政权的法制和机构基础(新的宪法和重要的法令,拥有全权的生产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人民政权的基础,苏维埃类型的代表权力机关,独立的司法权力,大众民主组织和运动的广泛权力,承认要求自决和合作的各国和各民族的独立并在此基础上订立新的联邦和联盟条约)。

第二,采取实现人民政权的实际步骤,从普遍彻底的民主计算和监督开始。

第三,不是简单地对大公司和银行重新实行国有化,而是对所有制实行民主改革,创造投资基础,以便把大部分最大企业的经营权交给劳动者。

第四,实现国家活动中新的优先点,包括采取并实现“向 21 世纪突破”的全国性的战略纲领。

第五,改变重要的国家机构——政府、军队、警察的性质:大大削减国家官僚机关以及公司,取消官员的所有特权和优惠,实现巴黎公社提出的要求:廉价和高质的人民政府,对强力机关进行质的改造并予以大大削减,等等。

这些初步措施还可以列举。但重要的是要懂得,怎样使这些措施得到实现,怎样防止建立社会主义的最初尝试不会像苏联时期那样发生蜕变。

需要社会主义改造系统

布兹加林在《未来》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的改造系统包括如下步骤:

——制定结构改革的长期规划。

——培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①民主统计监督和调节,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领域实行自治;在消亡中的市场关系应当在民主制定的生活、生态和

人文的规范和纲领下发挥作用,建立“旧的”经济活动的刺激(这对传统的工业领域特别重要)。^②就内容而不仅就法律而言的公有制,把对财产的基本权力集中到地区和联邦级的劳动集体和他们的联合体(苏维埃)的手里,同时保存消亡中的个体(家庭)所有制和民主股份所有制(在社会监督和在一定范围内运作)。^③社会公平关系,包括按劳分配,提高财产和资本收入税,对公民的收入及其使用实行社会民主监督,社会自我保障,无偿和优先发展教育和经常性的再教育,发展文化、保健和体育事业。

——在完全实行国际公认的普遍民主价值观和在人权的基础上社会政治生活的彻底非官僚化;形成苏维埃类型的基本民主制并逐步过渡到社会的自治;给予俄罗斯联邦的各民族和地区以自决直至分离权,在俄国国内(联邦)和苏联(邦联,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范围内实行自愿的一体化。

——实行真正的文化革命,把这一领域的“低层”工作者(教师、医生、图书馆员、俱乐部工作人员等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艺术家最大程度上摆脱金钱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国家和社会对创作的支持);把艺术文化不仅变成人人都能享受的,而且变得能鼓舞人唤起人们创造热情的文化,使人们去追求自我完善并完善世界;执行扶植西方型的和乡土型的大众文化的政策;无条件的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和无神论活动具有同等自由,条件是宗教同国家与学校分离。

关于人民政权的设想

人民政权是当今包括俄共在内的俄国多数左派提出的用以取代现政权的形式。这既是针对现政权的,也是针对苏联过去存在的个人专权的。

里·科索拉波夫在《列宁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指出:

俄国不存在地方代表机关。存在的只是总统的垂直机关,很像尼古拉一世时代的行政体系。而这种东西竟然叫做民主!通向民主的道路是非常复杂的。过去我们有相当稳定的党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们应当从下而上推进,按两个方向组织管理机关:按照居住地和按照工作地点——恢复苏维埃的生产地区原则,执行机关服从立法机关。他认为,应当用人民政权取代现政权。人民政权问题不会取消,自下而上的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永远具有活力。^①

^① 里·科索拉波夫:《列宁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对话》1996年第8期。

L.拉斯托维茨基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对“人民政权”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具体的设想。他认为,“人民政权”和“民主”是同义词。被普遍接受的民主的概念是阶级的概念,一般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民主。他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普通劳动者阶级的民主。这是同今天俄国的“民主”对立的。为把政权转交给人民,需形成人民机关的法律机制,他具体列举了作为人民政权所应当实行的原则和措施。

① 政权机关在下列基础上的选举: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必须普遍参加选举。

② 国家所有政权机关的选举制: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元首的选举。

③ 在下列基础上划分各级立法权和执行权:低层的自治。把全权由较低层政权转交较高层。

④ 选出执行权力机关:从基层劳动组织首长到政府首脑,按生产选区进行。

⑤ 按照地区选区选举立法机关。

⑥ 用自荐的办法推荐代表(首长)的候选人。

⑦ 从最相近低层的代表(或首长)中自荐高一级的权力机关的候选人。

⑧ 空位的候选人名额不受限制。

⑨ 必须检验和公布候选人才能的水平。

⑩ 保障所有候选人在竞选中的平等,如:平等权利,平等条件,同等的宣传经费。

⑪ 组织选区选民代表会议。

⑫ 赋予选民选区代表会议和选区全体选民大会以下列全权:听取每一个候选人的纲领并作出评价,批准代表(首长)的纲领,听取代表(首长)关于完成自己纲领情况的报告,召回代表(首长)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只有实现所有这些条款才能确定是真正的人民政权。^①

当前的口号

瓦·谢苗诺夫在《新的世界现实、俄国现实和新的理论立场》中提出当前的口号:

① L.拉斯托维茨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2期。

① 国内斗争应当同外部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应当看到国内的敌人,也要看到外部的敌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在所有的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世界性的矛盾和对抗。不改变世界的文明的发展性质和方向,想仅仅在国内取得成就,今天已是不可能的。

② 当代世界左右翼的现实斗争决定所有的左派、进步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必须站在一起,反对一切右派、反动派、亲法西斯和法西斯力量。

③ 因此要依靠国内的所有左翼盟友和外部的斗争战线。

④ 保证斗争中的统一的辩证任务。

⑤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只由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来代表。

当前的口号是: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即联合到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俄国共产党中去。如果领袖不想这样做,共产党人应当立即从下面开始。

⑥ 统一的共产党应当是激进的、革命的政党。

⑦ 革命共产党近期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革命的跃进,从目前反人民的方针转向为人民福利的社会发展方针,从目前总统和政府的反人民政权转向人民政权。现在的迫切问题不是争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正义的事业一定能胜利,但只能通过斗争。

⑧ 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必须有坚决的、真正革命的领袖。没有这样的领袖,俄共就会像苏共一样灭亡。目前俄共的领导不称职,具体说就是久加诺夫及其身旁的人。

⑨ 向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实现革命转变的社会内容就是通过总政治罢工、人民总抗议实现的人民行动,是全国性的民主革命,是反对目前反革命、反人民的资本主义政权的民族解放革命。有时把这叫做俄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但这是人民的核心——共产党的口号。显然,民主主义的、人民的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就其内容而言首先是社会的。但不是每一个抗议者都会支持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的。

近期的口号是“为人民的社会”,“人民的社会”,“人民政权的社會”。

⑩ 走向什么社会?

俄国的社会已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反人民的社会。右翼反动力量已经破坏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的吸引力,特别是斯大林的和斯大林以后的社会

主义。但目前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揭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用民主、集体主义和个人的首创性的结合,采用不同的经营方法,全国性的利益同私人的首创性的结合等等丰富社会主义,不损害全民事业也不同人民的传统对立。

通向新社会道路的主要原则是:

- 1) 是创造的道路,排除不必要的新的破坏。
- 2) 社会发展的社会方向——为人民的福利,为提高劳动者、退休者、青年、军人以及其他劳动居民的福利。
- 3) 经济中保留一切能给社会带来好处的东西。消除社会寄生现象。依靠劳动,依靠生产,而不是依靠投机。
- 4) 立即贯彻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路线。保护民族利益,实行合理的保护主义。实行新的“劳动货币”。
- 5) 劳动者和人民用5年时间整顿和提高经济和文化。
- 6) 合理使用社会国民财富。

这些举措将会提高更新的、民主的、人道的、人民的新社会主义的威望。^①

建立劳动者的党

拉斯托维茨基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说出真相,恢复他们对人民社会主义和社会制度的信心,没有这一切,俄国的国家制度就不能够存在,必然灭亡。

只有普通劳动者的党能够领导达到这种团结的运动,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人民政权构想,而党章能保证党员群众在党内的权利。目前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但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

有三条建党路线:

① 在承认人民政权构想的基础上把所有以人民政权为目标的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政治联合、政党和运动联合为统一的普通劳动者政党。

② 由一个有影响的政党接受这种构想。

③ 建立新党。

党的战略目标是保障俄国在真正人民政权条件下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党在

^① 瓦·谢苗诺夫:《新的世界现实、俄国现实和新的理论立场》,《对话》1997年第1期。

上台执政后分阶段地完全实现人民政权构想,其结果是政权转交给由人民选出的机关,它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并按俄国人民的意志更换。这是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①

需要人民民主革命

1994年布兹加林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在得到多数人的民主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一个国家民主基础不够发达,那么第一步应该实行人民民主革命,以便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绝对必须的条件。1917年革命的悲剧,不在于2月用暴力推翻了专制制度,而在于后来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没有将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突变性发展和社会主义幼苗的全面危机。^②

布兹加林在《未来》中写道:鉴于客观条件,俄国左翼力量在最近几年的战略应是“培植”人民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此战略包括加速形成现代工会;协调在政治口号下的罢工斗争,积极支持地方自治和生产自治,系统的思想文化工作等。

可惜,主观条件使得这一战略在今天仅仅是个良好愿望。俄国最具群众性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口号下活动的组织执行的是另一种政策。

在当代俄国的条件下左翼民主团体的组织只能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在发达国家的“新”左翼运动中,这一原则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活动分子的公开联盟,其成员的条件是从事实工作;而内部组织则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为解决具体任务联盟可以扩大,建立浮动的职能机构,吸收远离政治斗争的人参加。

必须开始新的左翼运动,它继承20世纪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就,同时也克服其错误。在可见的未来的任务是,一方面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理论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给现行的进程施加思想和政治影响,对它们作民主的、人道的、“自由主义的”修正。

我们不急于恢复或重建社会主义,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向新社会过渡比不久前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困难吓不倒我们,但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克服急躁情绪,考虑周密地走新的道路。在世界资本的全球(不仅仅是俄国)霸权和社会创造力量、劳动群众的力量对比中,我们的前进将有

^{①②} L.拉斯托维茨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2期。

利于共产主义的未来。左翼的这条道路要走长长的几十年。今天我们应当证明,我们不仅是祖先父辈事业的批评者,同时也是合格的继承者。

布兹加林在《未来》中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向对“原社会主义体系”的中等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一致的。在俄国(以及其他许多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及在国家过渡的类型上与之类似的国家)要走上这条道路,起码需要人民民主革命(而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左翼运动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和工党运动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继续。^①

原因在于国内形成的经济的、政治的以至意识形态的权力,这就是同有组织的犯罪合为一体的官僚—公司资本的权力;这种权力保存了极权的传统,仅仅表面上按照西方的办法予以“民主化”。现政权的这一实质必须予以摧毁,而这除了革命道路别无他途。这种人民民主革命的实质不是再一次炮轰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任务要复杂得多——要自下(企业、村庄和城市)而上(这里的任务也不是更换总统,而是过渡到新型的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基础民主)地改变政权的性质,当家的应是工作者和居民,而不是又一次改换招牌的上级圈定的官员。所以这一革命需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

和平革命的前景

鲍里斯·库拉什维里认为,形成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基本环节是把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化为劳动集体经营的企业,建立人民自治的企业。在拯救国家的阶段,劳动集体掌管企业将为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社会支柱,而在确立新社会主义阶段,自治的人民企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如果社会爆炸能具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向,新社会主义可立即实现。这不是得到军队支持的人民的武装行动,而是全俄罢工,先宣布企业属于劳动集体,“工厂是我们的!”其余的一切都将随同解决。新社会主义也可以逐步实现,作为国家政治一系列进展的结果。第一个进展可以是俄共久加诺夫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通向政权的合法道路要求采取难以想象的迂回手段,直至放弃社会主义取向。但全部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化的和半社会民主主义式的俄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半

^① 《选择》1994年第2期。

殖民地。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之得救。

第一步是建立与久加诺夫的“俄国人民爱国联盟”不同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运动,可以叫做“俄国社会主义复兴联盟”。此联盟建立于1996年10月,联合了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在争取复兴社会主义的这一斗争阶段,此社会主义是已经试验过的模式还是新的模式,并不重要。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都能够得救。而具体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将取决于生活本身,取决于恢复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①

左派学者布兹加林发表一篇文章《论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过渡过程的特点)》,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条件、困难等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他认为,俄国需要的是和平的革命。但是由于主观原因,目前和平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俄国的可能性非常小。需要使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在人民取得普选权、罢工权、政治统一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完成和平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平的“冷革命”的可能性犹如1991—1993年和平的爬行反革命一样。在存在核能装置和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热内战,对俄国及其邻国来说等于自杀。为此普通劳动者应当团结在“向人民政权前进!”的口号下。但是,它要成为和平的革命需要若干条件,其中有:①哪怕部分地修改宪法和选举的做法,给予更多的民主。②大部分军队、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保持起码的政治中立。③雇佣工人和居民的组织以及其他的民主组织比现在有更高的质量。^②

俄共的方案:分三个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俄共纲领设想分三个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一阶段是争取建立救国政府,其任务是消除“改革”的灾难性后果,制止生产下降,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促进原苏联各共和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体化。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时期,恢复时期。劳动者将广泛地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的主导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第三阶段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符合最佳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要求的经济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关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将占优势。随着劳动的实际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这些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

① 库拉什维里,鲍里斯:《通过社会形态危机走向社会主义》,《对话》1997年第1期。

② 《自由思想》1996年第5期。

位将逐步确立”。

俄共纲领中关于第一阶段的任务,在其“最低纲领”中阐述得较为详尽,而对社会主义阶段到底要实施哪些措施,显得比较抽象。对俄共来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是可以理解的。关于俄共纲领过去谈得比较多,从略。

小 结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俄国学者的反思和探讨具有下列明显的特点。

(1)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已摆脱了统一的模式的束缚,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自由探讨的可能性。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是一些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其中许多人并不属于现在的任何党派。目前有两个较大的组织在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取向学者协会”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它们经常举行圆桌会议,探讨社会主义一类的重大问题,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当代社会发展构想:社会主义观”,“当代社会构想:自由主义观”,“改革:构想、实现、教训”学术讨论会,等等。《自由思想》、《对话》等杂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左派力量的命运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出席这些讨论会的是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思想较为活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也比较深入。

(2) 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盲目崇拜的对象,对于形成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开始结合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末出现的许多变化了的形势来回顾、反思、检讨,总结其成败得失,其中不乏精辟的一得之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化,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但由于仅仅是个开始,仍然不系统,并且大多数是个人的见解。不过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新和现代化的一个契机,是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适应现代发展,特别是适应21世纪要求的良好机会。

(3) 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呈日趋多样化。对社会主义的阐述、解释、议论已不限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等传统范畴,而是拓宽领域与视野,把社会主义放在俄国的历史传统、当前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等多角度去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社会主

义失败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4)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俄国第一大党,也是最大的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但看来,它目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既无时间,也无具有较深理论修养的理论家去总结历史教训,反思社会主义的得失。有些理论家如斯拉文由于观点分歧而退出了俄共。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对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总结不但极其粗糙,而且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清,甚至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理论的创新需要有自由思想和自由写作以及自由发表的环境。正因为当今俄国言论自由,各种言论都可以发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等的评论有肯定的,有否定的,有赞同的,有批评的,对诸如此类的言论,只要不是信口开河恶意攻击,而是认真探讨问题,求取解答,对苏联解体、苏共覆灭的根源,摆脱困境的出路,进行探讨的,都值得注意,需要介绍。只捡自己爱听的、认可的说法,排斥逆耳之言,是难以从苏联的失败中获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俄国学者身历剧变,感受最深,痛定思痛的反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跟踪的目的就是了解跟踪对象的真实状况,听听人家现在的想法,看看人家现在的认识,我的任务是如实反映。本人在跟踪过程中努力搜集资料,力争全面、客观地介绍俄国学者的观点,但由于手头资料的限制,个人水平的制约,肯定会有许多遗漏,挂一漏万。尤其需要声明的,介绍他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同意他们的看法,其正确错误与否相信读者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1998年初完稿

俄罗斯养老金改革方案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苏联逐步建立养老保障制度,但全面的养老保障制度始于1965年,当时实行了覆盖全民的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费用职工个人不承担,而是由国家和用人单位负担,国家统一管理,保险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扩大到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的发放采取的是按一定比率计发方式,工资越低,养老金的领取比例越高,如月工资为50—60卢布者,养老金为原工资的75%,月工资为100卢布以上者,养老金为原工资的50%。农庄庄员的养老金待遇低于全民企事业单位职工,最低为12卢布,最高为102卢布。职工养老金视不同情况发给附加养老金。

进入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陷入停滞,人口老化进程加快,退休人员增多,养老保障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为寻找出路,1988年开始实行个人与国家共同集资的办法设立附加养老保险基金,其资金由个人和国家各担一半,职工退休后每月可领取10—50卢布不等的附加养老金。

总的来说,苏联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典型的国家统筹模式,它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国家和企业包揽了养老保险的全部费用,实行现收现付的制度,即由当前工作的一代人的交费来支付前一代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实行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计划经济下的养老金制度失去了存在基础,不得不进行改革。1991年12月俄政府颁布退休养老基金法,建立独立于国有预算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来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农场主按20.6%缴纳,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的5%缴纳,其他人员为

1%。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法律条令,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修改补充。例如,对养老金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改革,延长养老金收入基数的期限,按照最后15个工作年的前五个月的平均收入计算养老金,提高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实行养老金指数化等。改革后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养老金,所有养老金领取者的领取标准都一样;另一部分是浮动的,同领取者的工龄和工资水平挂钩。除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之外,还鼓励人们向社会保险机构购买个人养老保险。

然而,俄罗斯联邦的养老金制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时期的现收现付的做法,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是以支定收,缺乏稳固的资金储备。于是养老金的发放和增办经常服务于政治需要。叶利钦总统每遇到麻烦,需要选民的支持时,就发布命令提高养老金的水平。由于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很多(3700万人),叶利钦的这一招频频奏效。但由于现收现付制与养老金的储备不挂钩,因此政治危机一过,由于通货膨胀,那些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又不断地掉到贫困线以下。据俄副总理马特维延科说,2000年养老金提高了30%,但据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第四季度大约有26.9%的俄国人(39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0年下半年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每月1185卢布(42.70美元),而养老金远远低于此数。从今年2月1日起俄罗斯又把养老金提高了10%,3月1日起把最低养老金提高为600卢布。总统也发布命令,改变养老金领取者的平均工资同全国平均工资的比例。准备从5月1日开始将目前的95%改为120%。虽然政府频频调整养老金水平,但养老保障制度本身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1997年起,就有60%以上的人要求改革养老金制度。所以近期来国家杜马正在酝酿进行新一轮的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养老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有许多因素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养老金的来源、管理和发放,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劳动报酬基金的增长,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长,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人数的增减,死亡率、出生率,扣款率,退休年龄,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可以统计计算的,但由于数量多,结果很复杂,出来的方案也很多。本来打算在3月6日召开关于养老金改革的会议,但由于许多情况还没有查清,会议推迟。

最近以来,围绕养老制度改革问题的争论十分热烈,一些重要的相关部门的官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三种主张:一种是要求维持现收现付的

现状；一种是要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第三种是折衷方案——现分积累型的混合养老金制度，建立包括国家和私人的多渠道的养老基金库，同时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这是养老基金委员会的方案，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

激进方案：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经济发展部是个人养老账户的主要倡导者，它对现行的养老基金会的运行状况存有疑虑。经济发展部认为，养老制度改革涉及未来的养老金的数量，养老基金的赤字或盈余。改革必须保证在盈余的条件下进行，否则会拖欠养老金的发放。经济发展部对最近几年养老资金是否具备支付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建立应付特殊情况的储备金表示怀疑，担心会出现大赤字。

有鉴于此，经济发展部提出，应当做出强制性规定，建立个人账户，将养老金积累计入每一个工作者的账户，而不应把养老金全部列入公共储备基金。其理由是，第一，从所有的人身上强制提成，将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付给目前的退休者（还有好多年要向他们支付养老金）；第二，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可以保证今后在实行养老金改革的过程中，避免随意性。而养老基金委员会的方案则过于灵活，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只能作为一种过渡的方案。如果条件有利，经济发展部的方案过几年就可以实现，建立个人账户制。

经济发展部的具体方案设计是，在企业缴纳的占工资总额 28% 的养老金中，把 7% 的资金划入 35 岁以下人员的个人账户，35—50 岁的人为 3%，50 岁以上的为零。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使收入走出灰色状态。因为养老金一旦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申报收入对每个人都会是有利的。

经济发展部认为，目前的储备基金库极易受到政治行情的影响。例如，可以根据某种需要把储备基金全部用于提高当前的养老金；而如果建立了个人账户，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将其国有化也困难得多。

总的来讲，经济发展部的方案是一种常规的方案。但它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 它意味着要从养老金系统提取现在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大量资金，而经济发展部门又没有提出弥补的办法。(2) 强制性规定建立个人账户，它所涉及的人员十分广

泛——7%涉及现在未达35岁的人,然后还会涉及愈来愈多的工作者;它所跨越的时间也会很长,但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可能会遇到危机。如何保证这笔积累资金的正常运行,是一个大问题。(3)养老基金库的资金向何处投资以保证增值不清楚。因此,经济发展部的方案所冒的风险非常大。俄政府本想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此方案,好在没有来得及。实际上,经济发展部的方案比较适用于中等或高度发展国家,俄国目前还不是这样的国家。

维持现状:现收现付

上述个人账户制养老金改革方案的主要反对者是国家杜马预算和税收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领导劳动和社会发展部的奥克萨娜·德米特里叶娃。她历来反对从统筹体系转向个人账户体系。

针对激进派推崇的智利模式,她解释说,智利的个人账户体系是白手起家的,在改革之前绝大多数居民没有退休金。那里强制的养老金保险是建立在储蓄的基础上的,雇主向几个私人基金会缴纳养老费,而不是像俄国那样只向国家基金库缴纳。

她指出,俄国是处于转轨时期,安排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时候,转轨的财政问题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提高缴纳养老费的数额,以做到既不减少目前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还有可能为未来退休者的账户进行储蓄。第二种办法是,缴纳数额不变,而靠削减目前的养老金进行储备。就目前情况来看,提高缴纳数额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占工资28%的缴纳额对企业来说,已经是无法承受的负担。不可能指望这笔钱既用于支付目前的养老金,又为未来储蓄和投资。因此只有第二种方案了——降低目前的养老金发放数额。现在打算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据俄国养老基金库的计算,有三种可能的情况。(1)维持现状。如果不改革,结果就是维持目前的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例:30:100。在这种情况下,到2010年平均养老金将是4149卢布。不过基金库警告,要维持30%的替代率,它将出现资金短缺。(2)保守的无赤字方案,维持统筹型方案,养老金的增长将慢于工资的增长,2000年平均养老金将是3705卢布。(3)改革方案。现分一储蓄混合型的养老金,到2010年平均养老金将是2608卢布,约为平均工资的20%。从统计

分析来看,维持现状要比实行改革好。

美国交纳的养老费是 12.4%,而平均养老金是平均工资的 40%。意大利相应地为 29%和 50%。为什么俄国的交费(不久前为 29%,目前为 28%)与意大利相同,而平均养老金却只是平均工资的 30%?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俄国工作的人少,而领养老金的人多。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现在俄国有 6 200 万工作的人,3 800 万领养老金的人,其中约 380 万是从国库领取养老金的。因此,有 3 420 万是靠养老基金库生活的。被赡养者与赡养者的比例是 1 : 1.8。

改革派的论据是,需要尽快实施改革,免得人口状态恶化,养老基金库无力支付当前的养老金。然而,第一,被赡养者与赡养者的比例达到 1 : 1 的情况要到 2050 年才会成为现实。第二,臆想的改革将恶化目前养老金领取者的状况,也不会为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提供任何保障。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储蓄养老金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养老基金库怎样投资,怎样保证储蓄的养老金不仅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而且能够增值呢? 如果国家确实想发展储蓄体系,那就需要鼓励非国家基金库。

在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公共养老基金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但与之并行的还有许多非国家的基金会,由它们决定资产的投资方式、养老金的管理办法。养老储备金的管理纯属商业行为,国家官员不必介入。

德米特里叶娃表示,她没有说不需要改革,问题是如何改革。应该从整顿养老基金库着手。如果平均养老金能够达到平均工资的 50%,那就可以做。同时需要消除养老金立法中的许多缺点。要使人们不隐瞒收入,交足养老费,首先就要是让他们建立稳固的信心,相信不会欺骗他们,不会突然改变工龄的计算办法。

现分—积累混合方案

现任俄联邦经济发展和商业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本是上述激进改革的主张者。早在 1997 年他任劳动和社会发展部第一副部长时就提出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打算仿效智利的做法,推行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这些账户的资金由适当的机构管理,可投资于各种有价证券。

但是现在他提出一种过渡方案,即现分—积累混合型方案。他希望通过混合

方案逐步向个人账户制过渡。

德米特里耶夫认为,传统的统筹型养老金制度只关注一件事——目前用来支付上一代养老金领取者的资金。

实际上,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年轻人的未来养老保障的影响。改革不仅涉及目前这一代养老金领取者,而且还涉及未来一代领养老金的人。

他指出,现在的人们在工作 and 获取工资的同时,还为上一代领养老金者支付养老金,也就是养活上一代。同时,俄政府将专门建立养老基金的投资机制,确保投资收益,使其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速度。现在正在制定有关法律。政府以自己的财产和信誉做担保,可以为每一个养老金缴纳者建立一个账户,每年或每季向其通报养老资金的投资情况和收益情况,以保障有效监督。

现分一积累型的混合养老金制度是一种过渡方案。

现行养老金立法下无法确立个人的劳动贡献同他的未来养老金之间的直接联系。养老金改革的方向是使未来的养老金同个人的劳动贡献联系起来,让每个人都关心养老金问题,保证人们能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获得他所应得的那份养老金。

国家杜马近期将开会讨论养老金的改革问题,并准备从2002年初实行新的养老金制度,现分一积累型的混合养老金制度很可能被通过。过不多久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所选定的最终方案。

总之,俄罗斯已开始关注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问题,但目前还处于讨论过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化。现分一积累混合方案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缴费比例问题,未来养老金的支付方式问题,历史遗留的养老债务补偿问题,新老办法的过渡衔接问题,养老基金的管理运作和监督问题,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问题等等都有待具体化、规范化。

叶利钦现象析^①

在苏联解体前后,俄国出现了一个过去并不太知名的人物,他以反特权起家,几起几落,最后竟然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建立起新的王朝,开始改写俄国的历史。此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叶利钦起家时打的是民主派的旗号,现在他本人已不讳言自己是“新沙皇鲍里斯”。在他的统治下政局不稳,经济一团糟,给了许多许诺,但迄今未能兑现。一句话,他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困境,走出危机。今年弹劾总统时给他列出五项罪名,尽管没有通过,但都已超过了议会的一半票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连续执政8年,在总统选举中最后能得到多数的支持,连任总统。尽管多次病危,但迄今仍然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击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这在俄国历史上确实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名之为“叶利钦现象”。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对比一下戈尔巴乔夫,人们可以看到,就经济形势而论,叶利钦时代比戈尔巴乔夫时代要糟糕得多;就国内政治生活而论,作为国家元首的叶利钦表现得比戈尔巴乔夫要独裁得多;在民族政策上,叶利钦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民族分立的出现,而戈尔巴乔夫却让一个个共和国独立出去。人们在议论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往往归咎于戈氏经济没有搞好,民主不够,民族问题处理不当。那么比戈尔巴乔夫搞得更糟的叶利钦为什么却能支持下去呢?

^① 严格地说,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引人注目的“叶利钦现象”。一次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那时叶利钦高举民主和反特权的旗号,在官场上遭贬谪,但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凭这一资本,叶利钦沉下又浮起,终于搞垮了苏联,打倒了对手戈尔巴乔夫。这是第一次“叶利钦现象”。本文要探讨的是叶利钦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可以说是第二次“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个性坚强,什么事都敢做,敢于冒险,敢于出险招怪招,在他执政的8年里在冒险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功。一个人的性格在历史上是起一定作用的,人们完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当断不断,是造成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仅仅靠坚强的性格显然不足以保证取得节节成功,应当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看看叶利钦所建立起来的体制,他所依靠的力量,他的盟友,他用以吸引选民的口号和措施,他的对手的状态,等等。一句话,要对叶利钦执政的八年作全面的考察。

八年的作为

叶利钦所建立的政权和政治体制,是一种过渡体制。这个政权的源头是苏维埃政权,这是叶利钦政权的起点。这样一种政权不免具有相当多的旧时代的影子、残余。其总体构架存在明显的苏联时代的烙印。超级总统制取代了总书记制,但总书记一人说了算的体制依然存在。政治局不存在了,但人们在总统办公厅身上处处可以感觉到政治局的影子。政府、苏维埃服从政治局和总书记的指挥,这在叶利钦的政府和杜马同总统的关系中仍然处处可见。叶利钦统治所依靠的运转机制并没有脱出旧的那一套。在基本上属于和平转变的国家里,也不能不是这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是不用另起炉灶的,一接收过来就可以自如地运转,甚至不需要磨合期。对苏维埃官僚出身的叶利钦来说,更是驾轻就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如此,叶利钦政权不断出现的危机可以说仍然是苏联政权危机的继续。

然而,如果因此认为叶利钦政权仅仅是苏维埃政权的翻版,那就错了。叶利钦在执政的八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摧毁苏维埃政权,摆脱苏维埃政权的阴影,向一种新的政权体制转变。他大体上做了以下几件事:

(1) 废除了一党制,初步确立了多党政治。叶本人担任总统后脱离政党,以全民总统的形象出现。国内出现大大小小政党林立的新局面。经过几次竞选斗争,各政党合纵连横,出现向两党制过渡的趋势。当然,这一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尚待进一步深化。

(2) 废除苏维埃制度,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出现向现代三权分立体制过渡的趋势。议会已不是原来纯属橡皮图章的苏维埃,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起制约作用。在通过预算、组织政府等问题上,议会多少可以发挥某种作用,甚至可以发展到对

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对总统提出弹劾的地步。虽然收效甚微,但毕竟已经改变了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因为如此,在矛盾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时候,就出现了炮轰白宫这种空前的局面。而作为反对派占上风的议会,它的所作所为有时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例如议会的某些平民主义措施,并不考虑政府执行的可能性,而只是为取得宣传效果,显示反对党的存在,笼络选民。因此杜马有“不负责任的议会”的名声。雷日可夫就抱怨说,议会动辄赞成提高退休金和工资,赞成给各界居民提供越来越多的优惠。1.47亿俄罗斯人中,有1.1亿人享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优惠。哪一个正常的国家会制定了这样的法规?!

(3) 成立了宪法法院,设立了总检察长等司法机构。它们名义上是独立行使权力的司法机构,然而,实际上在俄国司法机构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4) 同苏联时期实行总书记制一样,俄国实行的是超级总统制,总统拥有无限权力,整个政权是以总统为中心的结构,它迫使行政、立法和司法统统服从总统的意志。这种制度在俄国的存在有其合理的根据,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需要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否则将一事无成。但靠一个人管理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大国,长期下去显然是行不通的——权力需要制约。

(5) 自由民主领域的进展。苏联的剧变是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进行的。相对于苏联时期,俄国的民主自由是多一些了。民主自由的旗号使叶利钦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得到像莫斯科、彼得堡等等大城市的支持。大城市的支持对叶利钦政权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俄国的历史上,只要得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拥护,大体上就可以控制全国。十月革命和叶利钦上台,无不如此。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实行直接的选举制,总统、杜马都通过选举产生,某些重大的问题实行全民公决。这种选举制不能用简单的“虚假”一语予以否定。俄共的存在也得益于这一制度,所以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言论自由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例如苏联时期禁书不少,这些被查禁的著作在叶利钦时代得到了问世的机会。这对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在俄国实际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6) 苏联号称联盟国家,实际上施行的是单一制。叶利钦时代施行了联邦制,给了各共和国和地方以较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与苏联时期对地方的严密控制相比要宽松得多了。对闹独立的鞑靼共和国,给的自主权就更多了。中央的这一方针自然得到地方的拥护。当然,事情也有其另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共

和国的独立倾向,使联邦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在苏联解体之初,曾有不少人预言俄罗斯联邦有重蹈覆辙,发生分裂的危险。八年的实践表明,在维护联邦的完整性的问题上叶利钦是从不让步的。

(7) 经济上的私有化摧毁了苏联的国有制,从而彻底摧毁了苏联的基础。私有化也使社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多数居民生活水平处在贫困线之下,同时造成一批新的暴发户和亿万富翁。俄国开始出现中产阶级。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是叶利钦政权的阶级基础。

(8) 对外政策从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西方主义转向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政策。叶利钦及时地接过日里诺夫斯基首倡的民族主义口号,这对大国地位一落千丈的俄国来说,是加强凝聚力的一项有效措施。

美国商学院俄国问题首席专家列昂·阿伦在评价叶利钦的成就时说,他“制止了俄国的解体,保证了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离婚’文明地进行”;“其次,他致力于改革。他知道面临的各种风险,知道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主要的一点是,叶利钦已使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制度化。”^①

权力的基础

苏联解体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一种过渡政权,这个政权存在大量过去的残余,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叶利钦并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对原有的机器进行局部的改造,甚至其中的供职人员也大多来自苏联时期的各级官员,即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是苏联后期开始流行的一个术语,特指列入上级任命的官员花名册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目前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据统计,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②这些人是叶利钦政权的支柱,他们也许同叶利钦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不愿意退回到苏联时代——如果

^① 《参考资料》1999年9月15日。

^② 《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退回去，他们就会失去一切。

通过私有化俄国出现了一批暴发户，他们通过私有化，通过侵吞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人是叶利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例如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叶利钦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此外，八年来俄国开始出现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最近切尔诺梅尔金宣称，他的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依靠的是中产阶级，按照他的说法，这个阶层目前在俄国占居民的 15%—20%。^①这个数字也许夸大了，但中产阶层的存在是事实。这一部分人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年代。

知识分子的情况略为复杂。由于苏联时期文化的发达，所有在册权贵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其态度已如上述。其次，大批非官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叶利钦政权下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现在在职的大学教授月工资不到 100 美元，他们的退休金约 400 卢布，约合 16 美元，仅够活 3—4 天。他们对叶利钦政权不满。但另一方面，叶利钦给他们提供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不受行政干预（自然要受金钱的限制），对这一点他们是欢迎的。有一位教授说：现在俄国生活困难了，但愉快了。他指的就是饿肚子与自由的关系。知识分子往往为不回到过去而投票支持叶利钦，反对俄共。1996 年 2 月 21 日俄新社发的列兹尼琴科文章《总统选举：如果共产党获胜了怎么办？》中说，不仅发了财的新贵，而且还有“老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却也不想再回到原来的意识形态的重压之下。^②

地方诸侯在叶利钦统治下得到较多的自主权。由于地方行政长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地位比较牢固，总统无权随意撤换他们。而叶利钦为了笼络地方，也对地方的要求给予较多的让步和优惠。行政长官们在中央有上院——联邦会议，对某些事务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发言权。例如今年的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的免职事件闹了好几个月，由于联邦会议多次拒不通过，叶利钦的解职命令至今未能得到落实。地方诸侯自然不会愿意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年代去。除车臣外，其他各联邦主体中虽有独立的某种倾向，但都还没有闹大，对叶利钦的中央基本上是支持的。

《独立报》1999 年 8 月 31 日的一篇文章说：“叶利钦象征着 1991—1992 年革

① “Общая газета”，1999.8.26. 俄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也认为是 20% 左右。

② 《参考资料》1996 年 3 月 7 日。

命、改变政权和私有制的成果。叶利钦是这些成果的保证人，是俄罗斯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公开的和不开光的协议的保存者。”^①这实际上就是叶利钦历8年而不倒的秘密所在。

议会和政府

叶利钦给俄国的议会起用了一个旧名称——杜马。俄国的杜马历来是软弱无力的，从1905年出现之时起，咨询杜马也好，立法杜马也好，在沙皇时代都没有达到立宪君主制。二月革命之后，取代杜马的苏维埃本来是有力量掌权的，但它同样软弱无力，自愿让权，在国内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苏维埃最光辉的时期是十月革命前后的时期，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夺取了国家政权，宣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随着“党专政”的确立，苏维埃逐渐成为橡皮图章，已经无权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以至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另外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以取代最高苏维埃。像沙皇时代的杜马一样，在鲍里斯·叶利钦统治下杜马也没有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即使他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杜马，略有反抗和独立的表示，就出现了炮轰白宫的历史罕见局面。此后的杜马虽然还是反对党占多数的议会，但基本上还是听话的议会，在总统和议会的对抗中，大多是议会作出让步，以妥协了结。究其原因，一个是立法规定不利于议会，总统可以随意解散政府和议会，而议会弹劾总统则障碍重重，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杜马议员对总统有极大的依赖性。叶利钦给予杜马议员以高薪和优越的生活待遇和办公通讯设备，一旦议会解散，所有这一切就都化为泡影。不要说个人生活无保障，连党团从事政治活动，开展竞选斗争的物质条件都会失去。议员对总统的极大依赖使得杜马一产生就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只要存在强沙皇、强总统，俄国的议会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工具，听话的工具，任何反对独裁的举动都可能给自身带来严重的危险。俄国杜马的传统和现状就是如此。

俄国的政府同样如此。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在沙皇时代政府对沙皇负责，在共产党时代对总书记负责，在叶利钦时代则对总统负责。在这三种场合下，政府及其首脑的命运都操在最高领导人的手中。叶利钦的政府仅

^① 《参考资料》1999年9月7日。

仅是执行叶利钦意志的工具,总理的去留不取决于政府工作的好坏,而只取决于叶利钦本人的需要。

所以目前的俄国离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相去甚远。要摆正总统、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有待未来选举的结果。总统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权力,这在急剧转变年代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但发展下去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国内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一年多的时间里更换四个总理,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在频繁更换中,最能干的总理也只能是一事无成。然而,这种局面却有利于叶利钦大权独揽,实行个人独裁。

百 姓 心 态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整个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还有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如苏芬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死亡的人数达数千万。此外,还有随着天灾人祸而来的大饥荒——20 年代初、30 年代初和 40 年代战后的三次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民的死亡。这些灾难有些是在同一代人身上出现的。天灾人祸加上俄国恶劣严酷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人民刻苦耐劳的性格,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叶利钦政权带来的普遍贫困化,对广大人民来说实际上并不陌生,他们能够在苦难中求生存。

俄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沙皇制度还没有来得及转变成君主立宪,就被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和混乱时期,但很快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在革命时期是必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本来应该逐步加强民主建设,缩小专政和镇压的职能,然而斯大林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前后却在国内加强镇压的力度,扩大镇压的范围,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遭直接镇压的人数达 400 多万,如果考虑到当时株连盛行,那么加上亲属朋友,受镇压的人数当远远超过 400 万这个数。

俄国的老百姓对沙皇、斯大林等人的独裁统治早已习以为常,叶利钦的独裁并没有超出过去的记录。叶氏的独裁有其特点,大体上表现在对他所控制的权力机关的独裁,是一种机制内的独裁,而对老百姓来说,叶利钦给予了较大的自由。他们有直接选举权(选举总统和议会),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

自由,迁移和出国的自由,甚至有骂总统、政府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缺乏物质保证的自由,寡头们垄断了媒体,许多居民并不能真正行使这种自由,但毕竟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动辄进集中营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俄国人民历来有信奉好沙皇的传统。实际上他们对不好不坏的沙皇也能接受和容忍,对暴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会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叶利钦曾许诺给予自由民主,过富裕的生活。他在危急关头所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保证了你们的自由!目前对美好天堂的向往尚不可得,但将来一切会有的,这种期待使广大人民默默忍受目前的苦难。他们都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坏沙皇的时代去。在这种乱世,老百姓既希望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又害怕重新回到过去大镇压的年代,人人自危的世界中去。因此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在第二轮的投票时多数居民就在两害相权中选取了叶利钦。

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①这种极化现象在今天的俄国处处可见。

叶利钦除了许诺自由民主之外,每遇关键时刻就设法发放拖欠的工资、军饷和养老金,甚至提高某些阶层的工资。这一招确实能化险为夷,给他拉来选票,得到一时的支持。

叶利钦目前已经做到的是: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恢复。现在连独联体本身的存在都成问题,遑论恢复苏联!其次,不可能退回到苏维埃体制上去。第三,共产党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共产党作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人民群众有好处。

随着剧变的逐步结束,俄选民需要的是能改善民众生活的候选人担任下届总统。9月15日《今日报》谢尔盖·杜比宁的文章说,“人们普遍对那些主要特点被认为是谨慎和不激进的候选人抱有好感,从这种情况来判断,俄国人倾向于选择保守的方案——总统不应当破坏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而应当有助于搞好生活。”^②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8页。

② 《参考资料》1999年9月21日。

反对党俄共

叶利钦政权的最大对手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经过几年的重建、恢复,党员人数已达五十多万,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也是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对国内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俄共恢复活动以后的言论,特别是从它的党纲看,俄共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尚未进行认真的总结。他们没有从体制上去寻找失败的原因,没有认真检讨过去的错误,而仅仅把失败归罪于少数领袖个人。在苏联历史上俄共只肯定列宁和安德罗波夫两人,对斯大林时期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勃列日涅夫的僵化模式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仍然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斯大林模式仍然是人们担心的问题。结果,每到紧要关头叶利钦就用共产主义的“恶魔”来吓唬居民。在上次总统选举过程中电视台大力宣传苏联时期的恐怖,对选民的影响极大。可悲的是,宣传的内容并非捏造,而是历史事实。而作为苏共的继承者的俄共对此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做不出合理的解释,又不向受害者表示道歉。这就不免失去相当数量的选票。

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失去进行改革,挽救社会主义的机会。斯大林逝世之后本来出现了冲破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极好机会。赫鲁晓夫做了一些努力,但他本人本来就是这个阵营中人,从思想、行动到所能采取的措施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进行的改革没有能触动斯大林体制上的问题,遇到的阻力也大,到了一定时候就不得不后退,甚至走回头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柯西金的改革很快夭折,开始了“复辟”进程,推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不仅自己不改,也不允许别人改,出现了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事件。这不仅是捷克的悲剧,也是社会主义的悲剧。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由于天不假以时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实际上已经回天乏术。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乃是“补天”的最后之举。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对苏联来说,这都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大厦已经倒塌。戈尔巴乔夫只好在历史上充当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社会主义苏联的总统。到了叶利钦时代,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都无存身之地了!

对苏联的历史应当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一个失败者不认真总结教训,彻底改正错误,是难以东山再起的!

俄共对当局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先是为生存而斗争,在站稳脚跟之后,它成

了杜马的第一大党,它把自己定位于“建设性的反对派”。而在普里马科夫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共产党人直接加入了政府,甚至担任了第一副总理,俄共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权党,对政府工作的好坏自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样,俄共只好把叶利钦总统当作打击的目标。今年对叶利钦的弹劾是俄共对总统的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冲击。但弹劾提出的对总统的五项指控一条也没能通过。不仅如此,此举反而迫使叶利钦铤而走险,解除了同俄共关系不错的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也同时意味着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在这一回合中俄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目前俄共的爱国人民阵线已分裂瓦解。农业党、“精神遗产”运动离去,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运动。极左派共产党人也另成立竞选联盟。组织“争取胜利”联盟的努力宣告流产。这一切使得俄共只能以自身的名称去登记竞选。

由于“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的崛起壮大,实际上,叶利钦已不把俄共,而把“祖国—全俄罗斯”看作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固然可以减轻俄共的压力,但也说明了俄共地位的削弱。

中派的崛起

在俄国,中派历来没有得势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一度出现最民主的形势。遭查禁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半合法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说明问题了。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希望俄国从此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建立民主国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革命不能停顿,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们不是进行议会斗争,而是举行武装起义。结果,激进派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联共(布)内部出现了托洛茨基左翼激进派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翼”。斯大林实际上是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的激进派。在斗争中虽然托洛茨基遭到了失败,但比他更加激进的斯大林派却掌握了党政大权。布哈林所持的右的或中间的立场遭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的逼迫下,也曾提出“中间主义”作为救命稻草,试图在各派角逐中依靠中派,取得各方的支持。但中间主义没有救得了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当政年代,曾多次出现中派团体。1993年杜马选举时的“公民联盟”,1995年杜马选举中的“公众大会”,都打过“中派”的旗号,结果在事前普遍看好的情况下两者都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中派的失败说明社会还处在动乱之中,激进主义还有市场,叶利钦政权还没有走下坡路。

苏联剧变经过叶利钦八个年头的统治已逐步走向定型。风暴时期已经过去。大凡风暴时期,激进派总是占上风,但风暴基本过去之后,社会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从人心思变转为人心思定。历史的发展有张有弛,弦不能总是绷得那么紧。法国大革命(1789—1794)中激进派陆续上台,一个比一个激进,到罗伯斯庇尔上台,把激进主义推到了极端,于是出现了热月反动,社会从革命转入演进。

俄罗斯经过八年的折腾,早已人心思定,希望有一个平静稳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这时候出现的中派已不像以往那样无本无根,而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群众需要的一种思潮和运动。因此卢日可夫的“祖国”运动一打出中派旗帜即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今日的俄罗斯无论是右的激进主义还是左的激进主义的极端都已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中派加左翼或右翼,组成中左或中右联盟,是目前俄国普遍看好的组合,是有可能接替叶利钦政权的力量。这一次打破俄国历史惯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叶利钦起用的普里马科夫已经试行了中派主义的方针路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只不过总统本人及其家族的利益促使叶氏在社会进程取得良好态势的时候,中断了这一进程,再一次自己乱了自己的江山。

* * * * *

叶利钦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根据。叶利钦现象的合理性在于适应了俄国大变动的需要,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叶利钦现象对剧变后的俄国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稳定的因素,它保证了社会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向苏联后时代的过渡,使俄国得以避免出现大混乱、大动荡、大分裂。叶利钦现象不是虚拟的,它得到俄国特定阶层的支持,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俄国民众的支持,所以能够保持长期不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俄国政局动荡不稳的重要因素。国家需要正常的秩序,需要法治,到了叶利钦统治的后期,叶利钦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复兴的阻力,因此叶利钦退出政治舞台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将逐步走向比较正常的三权分立的西方模式。只要俄国不再出现大动荡大混乱,就不会出现叶利钦第二,也无须叶利钦第二。通过正常的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向叶利钦后时代的过渡是最理想的结局。所以俄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呼吁不要去刺激总统,

让叶利钦总统任期届满,并对其下台后的生活和地位提供保障。1999年底叶利钦已提前下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叶利钦的下台不会是叶利钦所开始的历史的结束,俄国的发展进程已经难以逆转,不可能回到苏联时代去。但叶利钦现象将结束,叶利钦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势必出现不同程度的“非叶化”,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总统的权力将减少,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联邦制、强国方针等等将继续下去并得到逐步完善。当然,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俄国历来是一个谜,只有历史才能揭开其谜底。

《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苏联史研究在中国^①

——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苏联史的研究在中国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严格地讲,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对苏联史的科学研究(本文把苏联史限定在 1917 年以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苏联史作了大量的介绍,但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现成结论和公式,再加以某种演绎,谈不上独立的学术研究。不仅如此,它还深受当时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的影响,往往根据某一时期形势的需要,选取某些问题做文章。例如,在 60 年代初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发表连篇文章,追溯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历史,文中只有取自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引文和结论。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同理论界一样,中国的史学界也开始了反思,从这时起才有了对苏联史的真正研究。当时研究的资料相当缺乏,但中国的学者有自己的长处,其一是中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历史有许多相同之处,其次,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斯大林模式或体制的弊病以及有害的后果有了切身体会,这样,对苏联史上的一些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独特视角,过去无法理解的现象,现在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优势恐怕是西方苏联学者所不具有的。从这时起,中国的学者们对苏联史提出了大量疑问,作出了新的评价。对苏联史的研究视野也大大拓宽了,学者们关注的不仅有党内斗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历史,还把视线扩大到社会史、文化史、民族问题等以往很少涉及的领域。

^① 20 世纪 90 年代几位朋友打算和俄国同行合作在莫斯科出版一本中国学者的苏联史论文集,我应约写了这篇综述。

80年代是中国在苏联史研究上取得丰收的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们把注意的目光集中在苏联史的早期,即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我们正在对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历史学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20年。这段历史包括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3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命运。苏联实际上就是经过这20年左右的时间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令人遗憾的是,对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及其教训,长期以来苏联没有总结过,中国也没有总结过,以至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斯大林的模式,重犯他们的错误,而在某些问题上甚至犯了比他们还要严重的错误。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关心这些问题,首先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一下苏联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对于本文所做的综述有两点需要说明:(1)我们着重介绍新观点,不言而喻,对这些新观点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2)这里介绍的是从大量论文和著作中综合出来的观点,同样限于篇幅,我们只开列著作的名称,论文的篇名从略。

1. 关于十月革命

在70年代中国曾经出过一本《十月革命史》,但基本上是按照《联共党史》的口径编写的,未必是一本有独立见解的著作。显然,对十月革命的许多问题还需做深入的重新研究。学者们认为,历史主体的选择对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以往对十月革命前提的认识受机械的决定论的影响,总是简单地套用“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公式。事实上,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各阶级和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并在选择过程中互相斗争和冲突的结果。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方案是诸多选择中最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同人民群众的选择完全一致。然而,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是不够成熟的,列宁作出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具备成熟的政治和经济前提的论断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列宁设想的把俄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总范畴并使之成为世界革命序幕的判断,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基本失效了。从实际的革命内容看,十月革命虽然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但经济和文化方面所要完成的却主要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口号是“自由、面包、和平、土地”,其本身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如果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不完全的

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现实社会主义形态,不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和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形式走向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当今时代的主要内容不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是两种制度,即两种现代化模式共存和竞争的时代。竞争方式也由战争与革命变成战后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把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理解为一种现代化模式过于狭窄,从发展观点看,社会主义有兼容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就的能力,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发展道路是广阔的、开放的、观念不断更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应使用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法。

对十月革命的研究仅仅研究政党史、政治史是不够的。姚海著《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1996),把十月革命的研究同俄国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为研究的深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2. 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期思想

这是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前身是军事共产主义,过去对它的评价是全盘肯定,认为这是为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所必须实行的政策。然而研究表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固然同战争的环境有关,但也是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他们企图借助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节生产和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像《简明教程》所说的是在1918年春至1936年间实行的政策,而是1921年春或秋才开始执行的。因为列宁本人也承认,1918年春天根本没有提到商品货币问题。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如布哈林所说的是市场关系,没有市场关系也就谈不上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1921年春实行粮食税也只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一个标志,只是在提出经商买卖问题以后,即1921年秋,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同样,一旦取消市场关系,实施非常措施,新经济政策也就终止了,其时间不是1936年,而是1929年。在1929年苏联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就不排除以后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另一种选择是斯大林作出的选择,实际上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就是在俄国的具体国情下实施

了新经济政策,开创了通过商品市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根据列宁思想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不过它是人们可以用计划进行调节的商品经济。列宁晚期思想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它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文化革命,农民的合作化,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遗嘱”以及列宁逝世前后的党内斗争,等等。1996年出版的郑异凡《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对列宁思想中的“新东西”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接过了列宁的遗产,捍卫、论证、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总体上说,新经济政策对当时的苏联是有效的政策,那个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得相当快。布哈林同斯大林的斗争是捍卫列宁遗产的斗争,是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斗争,所谓布哈林模式实际上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从7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了对布哈林的重新评价,对过去一直受到批判的布哈林观点,如“发财吧”的口号、“阶级斗争熄灭论”、经济“平衡论”等,以至于他同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1928—1929年反对斯大林的斗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出新的评价。对布哈林的重新评价是中国学者在苏联史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出现了好几本有关布哈林的专著,其中有范玉传的小册子《布哈林传》(1987),闻一和叶书宗合著的《布哈林传》(1988),张伟垣和许林森合著的《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和布哈林问题》(1989)。1997年出版了郑异凡著的《布哈林论稿》,对布哈林各个时期的理论观点以及他同列宁、斯大林的分歧做了较为系统详尽的分析。

3. 农民问题

同新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农民问题,即十月革命后的农民政策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结果。然而胜利之后,列宁把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大敌,苏维埃政权在农民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在资本主义还相当不发达的农村执行反对小生产者的政策,反对富农、中立中农,禁止农民做买卖,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的打击对象。结果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终于在1921年春酿成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列宁的《论合作社》,彻底改变了对农民的评价,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力量,把农民参加的做买卖的合作社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列宁思想的重大进展。

苏联的富农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经过贫苦农民委员会时期，旧俄的富农遭到剥夺，实际上已不再存在。20年代出现的所谓富农，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富农了。被叫做富农的农户，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因善于经营而走上富裕道路的中农甚至贫农。这些富裕农民，在新经济政策下在使用雇佣劳动、出租生产资料、获得非农业收入方面都和十月革命前的富农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出现的贫富差异，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极分化不同，这是经济水平普遍上升基础上出现的差异，绝对贫困化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盘集体化过程中所谓消灭“富农阶级”，在许多场合消灭的是富裕农民。至于那些因不交“余粮”而被打成“富农”者，同富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同样，城市的耐普曼除极少数是真正的新资产阶级外，绝大多数是在活跃城乡交流中起重大作用的小商贩，对搞活当时的经济起了促进的作用，是不应予以消灭的阶层。“耐普曼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源于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认识。

学者们认为，1928年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并非城乡资产阶级进攻造成的，主要是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措施，如粮食价格、税收政策等引发的。而更深的原则则是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猛增，粮食超计划支出。“左”的政策失误，给仍有很大潜力的个体农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助长了农业的自然经济化。斯大林的“大转变”是克服危机的一种办法，但给苏联农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结果形成集权型的经济体制，在农业生产中也推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

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对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借鉴。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同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伴随“大转变”而来的是全盘集体化。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使用了强迫的方法，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问题还在于这不符合列宁的合作化思想，不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列宁提出的合作社是“做买卖的”合作社。而从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看，其发展方向不是把农民束缚在封闭的生产组织——集体农庄里，而是把农民组织到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朝着农业的社会化方向发展。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前景，但按照他的思路是有可能走上这条发展道路的。苏联的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是集体农庄这样的组织形式造成的，它不

是促使生产发展的组织,而是保证国家从农村取得粮食的组织。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1994)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4. 工业化问题

这是个研究得不很充分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法是一种欺人之谈,工业化本来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任务,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苏联实行的工业化实际上仅仅是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是置轻工业和农业于不顾的片面的工业化,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生活的工业化。超高速度的片面的工业化造成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5. 《简明教程》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斯大林模式主要也是通过此书传入中国的,它长期以来被当作“马列主义基础”来学习,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1987年曾在上海举行《简明教程》学术讨论会,多数学者认为,简明教程严重歪曲历史,不惜用篡改历史的手法来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此书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做法,如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强制集体化、根据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进行的大清洗等固定化,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官僚化的封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简明教程》起了把斯大林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化、模式化、固定化并向全世界推广的作用,是一本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

6. 苏德条约

1979年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0周年,史学界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得失利弊展开了讨论。学者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签订此条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能回避其消极后果:(1)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利于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推迟战争的爆发。模糊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认识,不利于推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使希特勒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困境。(2)从外交策略看,签订条约也不是苏联的最好办法和最好出路。当时英法德都有求于苏联,英法的外交政策已朝联苏抗德方向发生变化,因此苏联不必同英法决裂,而应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苏德条约客观上促成了德国对波兰和西欧的进攻。条约超出了“互不侵犯”的内容,所包含的与德国共同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有损于第三国,也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在二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中国学者对二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根据新的资料,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苏联也是一个绥靖大国,对纵容法西斯侵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慕尼黑协定并无本质区别,其后果是加快了战争的步伐。此外,苏联对日本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几乎贯穿整个“二战”的始终。苏联利用二战前后的国际环境,侵占他国领土,扩张自己的版图,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像过去一样,学术界高度评价苏联在打败法西斯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苏联军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7. 赫鲁晓夫

长期以来赫鲁晓夫问题在中国是个研究的禁区,其本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今天仍有人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者,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元凶之一。不过从 1979 年开始,已出现了另一种评价,认为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改革者,是打破苏联发展僵局、打破国际共运僵局的开创性人物,是试图冲破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前驱者,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多元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得到了承认。赫鲁晓夫对国际形势采取了比较现实的立场,倡导和平共处,在缓和国际局势上起了良好的作用。中国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曾把他的一系列观点归结为“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纲领。现在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些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然而,由于时代和主观原因,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历史局限性,它虽然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但未能深入到这一体制模式的根基,因此也无法防止斯大林现象的复活。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有成功,有失败,处于不成熟的试验中。赫鲁晓夫难以完全摆脱沉重的历史负担,他既是斯大林的批判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斯大林政策的继续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赫鲁晓夫改革中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体制上的问题,因此改革具有修补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在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倾向,这主要反映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采取的过分做法以及在一些理论与实践忽视乃至否定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上。

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则要差得多,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较少,投入的研究力量不多,至今没有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问世。

8.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的改革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严格地讲,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苏联的解体同时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一时期成了苏联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是苏联为什么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丧失了政权?戈尔巴乔夫对此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公认答案的问题,虽然中国出版了几本试图对此提供答案的著作,但看来还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并且这几本评析著作,均非历史著作。有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向的错误,同时也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方针中寻找失败的历史根源。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的失败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长期得不到纠正,致使问题越积越多,赫鲁晓夫的改革又半途而废,加上戈尔巴乔夫本人缺乏驾驭改革全局的能力,不断出现失误,终于导致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这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一两个人身上寻找罪魁祸首未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然而要真正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事,需要集中一批不同领域的学者,根据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才有可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是一项有待继续开展的研究项目。

在人物的研究上这些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在布哈林、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的研究上,对列宁晚期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有自己见解的著作。

9. 斯大林

关于斯大林的研究在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过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至今仍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然而研究者虽多,但成品却不多见。不过,可以说斯大林时期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中国学者涉足,并且形成了这样那样的看法。关于斯大林早期(即上台执政之前的时期)的历史和活动,是研究得较少的领域。1995年出版了姜长斌的《历史的孤独》,对斯大林前期的活动有很深入的考证。预计不久还会有论述斯大林的著作与读者见面。

10. 托洛茨基

长期成为禁区的托洛茨基问题在8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以及在建立红军、夺取国内战争胜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986年出版了李显荣的相当详尽的《托洛茨基评传》,对书中的观点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作为一个开端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11. 苏联史

中国在 80 年代组织了一批苏联史的专家集体编著了《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1991 年出版)。此书基本上反映了中国 80 年代苏联史研究的水平,某些章节的设置是以往史书所罕见的,例如,“第九章:列宁病中的活动和列宁晚期思想”,“第十二章:布哈林和联共(布)反右倾运动”,“第十五章:个人崇拜的盛行和大清洗运动”。在苏联解体之后上海很快出版了由周尚文、叶书宗和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大体上勾画了苏联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1996 年出版了《苏联史纲(1953—1964)》——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史。柳植著《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时代)》(1989)是一本史论结合的很有特色的专著,有不少作者独到的见解。对苏联史的研究和专著的写作目前还在继续中。

12. 苏联文化史

苏联的文化史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姚海的《俄罗斯文化之路》(1992),从文化的角度对 17 世纪起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刘祖熙主编的《斯拉夫文化》(1993)中有一章专门论述苏联时期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文化。叶书宗、张盛发著《锤子和镰刀——苏维埃文化与苏维埃人》(1991)生动地评介了苏联时期的文化和知识分子状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96 年出版的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该书相当详尽地考察了整个苏联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理体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联兴亡的根由。

13. 俄国侨民

俄国侨民在中国的活动,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兴趣,90 年代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如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1993),吴文衔、张秀兰的《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1993),唐培吉等著的《上海犹太人》(1992),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1985)。1997 年出版的李兴耕等著的《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极其详尽地介绍了俄侨在中国的活动,并对这些活动作出评价。

还有一些独特的专题著作,填补了某些研究项目的空白。例如,沈志华的《朝鲜战争》(1995),其中利用了大量新公布的档案资料揭示了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

由于语言等原因,俄国的同行对中国研究苏联史的状况了解得不多。俄国的

汉学家关心的首先是中国本身的问题,或历史,或现状,而对中国学者研究苏联史的状况则不可能投入较大的精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状况对中俄两国学者在苏联史、俄国史研究上的交流和合作是很不利的。本文概略地勾画了从70年代末至今的苏联史研究的轮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如果俄国的同行通过本文集的论文,通过本文的介绍对中国同行20年来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作为起步我们也就满意了。

1997年8月28日于北京

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

——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

2007年夏天,俄罗斯历史学界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起因是出现了一本名叫《俄国现代史(1945—2006)》的教学参考书,其中的观点受到同行以及媒体的广泛质疑和批评。这本书在我国也有热闹的反应,好事者迅速组织了翻译。2009年1月,由吴恩远等翻译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好事,这样,中国的读者也能够一见这本有争议的教学参考书的真实面目。

据译者吴恩远介绍,此书由“莫斯科大学教授”亚·维·菲利波夫撰写,得到权威机构“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批准:“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科学部代理副部长伊·加里宁共同批准的,具有学术权威性”。译者还介绍说,这本书的作者“写这本教学参考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思考,没有任何人指使”,等等。

根据译者的介绍,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本得到权威机构批准的俄国中学教科书。

通常在翻阅外国著作的译本时我都比较注意译者的介绍,盖因译者较早接触到这本书,理应比较了解与该书有关的情况,他们的介绍一般说来是可信的。

不过为了了解俄学者分歧和争论的情况,我上网看了一些资料,却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译者介绍的背景信息严重失实。

失实的背景信息

书的译名

先来正名,说一下该书的译名。这是一本从苏联时期的1945年写到俄罗斯联邦2006年的历史的著作,苏联时期的历史显然应当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15个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所以在这里把Россия一词翻译成“俄罗斯”是不确切的。列宁当年就说过,把党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没有叫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是正确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一民族的党,而且是当时全俄国的。所以在这里不应当把“俄国”同“俄罗斯”混淆起来。在一般口语中这种混同无关紧要,但学术著作需要严谨,是不是译作《俄国现代史》要确切一些呢?

菲利波夫是何方“教授”?

再看看该书作者的身份。译者说菲利波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还在莫斯科大学见过他。但在网上查到的作者的确切工作单位和身份是“对外政策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这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菲利波夫本人说:这是个非赢利组织,任务是检验和制定对外政策的战略,协助国家政权机关,包括总统办公厅,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决定。他说,对此不能详谈,因为“问题太敏感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同官方机构,包括总统办公厅的关系。

其人没有学位和职称。此书的作者之一达尼林坦承,“我和菲利波夫都没有学位,只不过是 дипломированные историки 而已”。дипломированные 这个词不知如何翻译,但可以解释一下。按照俄现在学制,大学四年毕业获得“学士”的学位,再读二年可获得“硕士”的学位,而 дипломированные 则介于上两者之间,大学四年后加读一年,通过论文,获得此称号,相当于苏联时期五年制大学毕业,获得毕业文凭。我国未见相对应的说法,或许可译作“获得文凭的历史工作者”,“通过毕业论文的历史工作者”?不过据此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菲利波夫并非教授,并且离教授还相当远!《生意人一政权》(Коммерсант-Власть)杂志在谈到他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直说的话,他不是祖国现代史最著名的专家”。

关于此书作者还要说几句。也许俄文版的版权页只标明作者为菲利波夫,所以中文版也只写上菲利波夫一人。实际上,这是集体著作,例如最后一章“主权民主”就不是菲利波夫所写,而是上面提到的达尼林的作品。作者之一加曼·戈卢特维娜说,作者集体人数众多,包括7名各章节的作者,总共有18人之多。

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吗？

译者称：“2007年7月，俄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了面向教师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这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与科学部代理部长伊·加里宁共同批准的，具有学术权威性。普京多次对历史教材发表谈话，此次又亲自接见与会者（指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引注），无疑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也给此书增添了官方色彩。”

我们先看看这个“高等教育人文知识协会”（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знания，吴译“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знание 译作“人文知识”比较准确）是什么机构？它有权批准教科书吗？实际上这是一个学术团体，成立于2005年，各高校自愿申请加入，任务是协助提高高校人文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水平。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因为在一次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多数人认为在卫国战争中美国人取得了胜利。据2005年10月4日报道，有40多个高校加入。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正式政府组织，不具有“批准”教科书的权力，最多也只是“认可”或“赞同”而已。

在俄国，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的批准、印行和使用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的，需过三道关。第一，俄科学院的教科书委员会的鉴定，对其内容做出评价，还要评价其是否与当代科学发展水平相当。第二道关是俄教育科学院，检查其教学方法。最后，第三道关是公众的鉴定。只有通过这三关，教育与科学部才发放“推荐”的标识，才能进入课堂。高等教育人文知识协会，不管有多少大专家加入，不具有批准教科书的权力。

从译者的介绍看，菲利波夫的这本书似乎已经得到批准，成为法定的学校用书。其实不然，到2007年底它只被列入“许可”试用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目录。2007年12月26日，《俄国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公布了教育与科学部12月13日的关于批准许可和推荐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目录的命令。列入目录的有千种以上的教科书，仅历史教科书就有20种左右，其中有亚·菲利波夫主编的供教师用的参考书《俄国现代史》。

菲利波夫的教科书是供中学 11 年级使用的。在 2008/2009 教学年度它将在萨马拉区、鞑靼斯坦、雅库特和滨海边区的中学试用。俄科学院和俄教育学院将根据试用情况作出结论,这以后菲利波夫的教科书才有可能从“许可”(допущено)的目录转到“推荐”(рекомендовано)的教科书目录之中。被普京接见的叶罗辛娜说得很明确:“从 2005 年开始,历史教科书,一般来讲各种教科书,只有得到了教育学院和俄科学院的非常认真的学术鉴定后才能获得‘许可’和‘推荐’的专用字样”。

所以出版菲利波夫著作的“教育”出版社说:这本教师用书目前还未得到教育与科学部的批准,只能作为课外读物。从 2008 年 9 月起,如果试用成功的话,将推荐给所有的学校。菲利波夫自己说,教科书争取在 2008 年获得“许可”,2011—2012 年获得“推荐”的标识。但即使是推荐也不是必须使用的,学校可以在推荐的各种教科书中自行选用某一种教科书。

俄国并非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得到正式批准的历史教科书,现行的教科书就有 27 种。2007 年,教育与科学部建议使用经过鉴定的著名的教科书,例如由安德烈·列万多夫斯基和尤里·谢季诺夫(Андрей Левандовский и Юрий Щетинов)编写的《俄国史(20 世纪—21 世纪初)》或者由俄科学院祖国历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可见,当时已经存在经过教育部批准的历史教科书,菲利波夫的书谈不上是“第一本得到批准”的书,何况至少到 2009 年初,此书还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推荐”,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教学用书。

“独立思考”的产物,还是官方的“订货”?

这是一部“没有任何人指使”独立思考的产物吗?

这样一本涉及俄国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评价的读物,果然是菲利波夫等作者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吗?有许多材料指证说,此书乃总统办公厅的直接“订货”。作者之一达尼林曾经负责编辑克里姆林宫网站,他公开承认,这本教学参考书是“总统办公厅的订货”,“我们的目的是写出第一本教科书,在这里俄国历史看起来不是不幸与错误的令人沮丧的交替,而是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的东西。教师就应当这样教历史,而不是把祖国同垃圾混在一起”,“现在相当一部分历史课的教师都是腐朽的知识分子”。这位“主权民主”一章的作者口气极大,扬言说:你们向我

扔多少脏东西都可以,但你们还是要用我给你们的教科书去教学生,因为俄国需要这样做。应当清除坏东西,如果做不到,那就强制清除。你的孩子将用我的教科书学习。

媒体报道,总统办公厅就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给予了指示:“条件如下:斯大林是好的(确定了政权的垂直制度,但消灭了私有制);赫鲁晓夫是坏的(削弱了垂直制度);勃列日涅夫,按照同样标准和斯大林一样是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坏的(瓦解国家,但在叶利钦下产生了私有制);普京——最好的统治者(加强了垂直的权力和私有制)。”

很明显,这就是常说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方针。

普京总统2007年6月21日在新奥加廖沃接见人文科学教师会议代表,7月出版社推出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这个时间表也充分说明了该书同政治、同当局的密切联系,可以印证“订货”的说法。

不过“订货”之说只是说此书的基调,并非书中所有的观点和论点都能代表官方的观点,例如作者对斯大林镇压所做的辩解,就没有得到俄领导人的赞许。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扮演什么角色?

译者在另一个地方说,由于没有合适的历史教科书,所以2004年俄教育部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暂且作为教学参考书面向高校发行。

2004年俄罗斯确实重印了《简明教程》,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该书版权页是这样介绍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重印版(1945版),附有罗伊·梅德维杰夫的学术评述,对《简明教程》编写的历史、内容、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作了批判性分析。阅读对象为祖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者来说本书也颇有意思。

这本书这次重印了多少册呢?版权页上写得分明——仅“1517册”。不要说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作为一般著作,印数也太少了。而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印行1万册、10万册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

《简明教程》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就没有重印过,据我所知,1997年莫斯科“作

家”出版社重印过一次,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动静。2004年莫斯科“逻各斯”出版社重印出版了此书,说是第302次印刷。从俄国的网上看,对这次重印也没有引发什么动静。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为此书重印写的长篇后记,被说成是对此书的推荐。实际上,看过后记的人都知道,梅德韦杰夫只是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详细介绍了《简明教程》编写的经过,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对《简明教程》未赞一词,整篇文章都是批判性的。

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由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自然会成为难得一见的“珍本书”,由于某种需要,重印几本,是很正常的事,无需做更多的联想。

* * *

对一本自己喜爱的书或者自己翻译的书有某种偏爱,说些溢美之词,把它说得好一些,拔高一些,是人之常情。有人说,广告就应当夸大。不知广告学是不是这么教导的。不过就学术而言,应当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来不得虚假夸大或者随意编造,常怀实事求是之心才好。

菲利波夫为什么要撰写此教学参考书

2007年夏,俄召开现代史和社会知识问题讨论会。菲利波夫在会上解释为什么他们要编写这本书并争取使之成为教科书。

第一,苏联解体已经有15年,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官方文件、外交文件、回忆录等等,这一切需要传授给青少年。

第二,社会现在已经不像10年前那样看待自己的历史。最近几年世界的变化促使我们改变对过去的评价。

第三个原因是纯政治性的。近15年来原苏联地区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实行重新评价“二战”以及到1989—1991年的历史的政策。这里说的是政策,而不是知识深化的过程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波兰就常说,“我们的历史政策”。三年前有篇文章的标题为“必须修改历史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出现两个提法:“斯大林比希特勒坏”,“普京的俄国是斯大林制度的继承者,应当对苏联的罪恶承担全部责任。”2005年是二战胜利

60周年,这种运动从大众媒体进入上层政治。爱沙尼亚、立陶宛拒绝5月9日(胜利日)来莫斯科。这一立场得到比利时总理、葡萄牙总统的公开政治支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学校的历史教学中,针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观点给学生们打预防针。

菲利波夫所说的第一点,无疑是需要的,教科书需要把最新的资料以及根据这些新资料得出的新观点传授给学生。第二点需加分析。在以往十多年时间里俄国史学家做了大量的整理档案资料、研究历史的工作,取得大量有意义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经达成共识,无需修正改写。菲利波夫书中所写的某些结论,实际上也就是下面萨哈罗夫院士所批评的“修正”。第三点值得注意,如果不是克里姆林宫的直接授意,就是作者迎合克里姆林宫的需要。作者所提的问题四年前二战胜利60周年时存在,现今在纪念二战爆发70周年时仍然存在。例如对苏德协定、瓜分波兰、卡廷惨案、“占领”或者“解放”波罗的海三国等事件,各当事国都有自己的说法,至今仍争论不休,这种争论显然还会延伸到2010年二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俄国不仅对历史是非进行学术性的争论,并且要动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历史伪造者”。^①担任对外政策实验室副主任的菲利波夫对此自然非常清楚,这是他如此这般编写《俄国现代史》的重要动因,也是此书得到官方赏识的重要因素。

俄国的历史研究摆脱了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过,看来要卷入国际间国家利益的争论中去了。

俄国史家争论些什么?

菲利波夫的教学参考书《俄国现代史》推出后,俄国史学界一片哗然,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对该书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指责该书作者为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恢复名誉。自由派把此书叫做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批青年学者(数理科学候补博士尤里耶夫,16世纪封建制度研究专家扎尔科夫)公开怀疑教科书作者的专业水平,认为“主权民主”一章的作者根本不合格。

^① 俄政府还在2009年2月初成立了一个部级的“评估伟大卫国战争中人力和物力损失的跨部门委员会”。2月24日,俄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提议国家立法,对那些否定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和功勋的人追究刑事责任。2009年5月,俄国成立了直属总统的“反对损害俄国利益的伪造历史企图委员会”,其职责是整理相关材料,制定反伪造战略和措施。委员会成立后,编制了历史伪造者名单,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政治学家小册子,对历史伪造者进行抨击。

这里争论最大的是对斯大林,特别是对其大清洗的评价。还有就是不满该书对当局政策的歌颂,尤其是最后一章“主权民主”。

先且看看菲利波夫书中是怎么写的。

关于战后的恢复工作,书中写道:

利用犯人和战俘同样也起了作用。但是不应该夸大他们的作用——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即“古拉格”)里关押人数最多的时候是260万(1950年),然而同一年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人和职员总数是4040万人。

如同战前的情形一样,镇压也涉及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精英。事实上,镇压成为淘汰这些精英的手段。

斯大林的个性心理特征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客观情况所起的作用相比,准确些说,是处于第二位的。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要求有相应的权力制度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这些因素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斯大林所实现的变革的性质,按其规模,这一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革命”。

管理集团的中高级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

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即无条件忠实于上级领导和遵守纪律方面无懈可击的管理阶层。^①

平心而论,作者并没有完全讳言斯大林的镇压,但是他对镇压所做的解释是辩护性的,俄媒体和史家均对此议论纷纷。

网上有文章评论说,作者写了斯大林治下“对居民的残酷剥削”,还称之为“苏联最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而1937年的镇压被解释为危机后振兴国家的手段。

^①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6、70、71、73页。

镇压和集中营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说这也有其合理处,在被包围的堡垒中有“活下去和发展的必要性”……严格的军事化的政治体制是解决特殊任务的工具。

有人问道:“基本价值观除了爱国主义,还应当有人道主义。怎能为斯大林的暴力行为做合理化的辩护?”

网上还有评论说,斯大林的政策同权威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许多先辈们有共同之处……他把自己看作俄国王位的继承人,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导师,他是有意识地采用其先辈们的“历史处方”的。这就是说,要向学生们说明,斯大林的恶行是早已死去的俄国君主之过。

从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到,用镇压来保持管理机构的最大功效,把镇压说成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这种替无端镇压辩解的说法受到史家和媒体的激烈批评。实际上,无论在哪个阶段,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都严重削弱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例如在二战前夕对军队的镇压,5位元帅被枪毙了3位,并且被镇压的恰恰是最懂得现代战争的将领,留下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元帅都是骑兵出身,打不了现代战争,连一个小小的芬兰也久攻不下。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现职军官中,70%任职不到两年,团长都由新提拔的尉官担任,而军长由上校担任。在225个团长中,没有一个在军事院校接受过训练。斯大林不得不从流放地、集中营释放和召回一批将领。这种镇压能够保证军队有最大的战斗力吗?战后斯大林镇压了曾有意让之接班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人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组织了全城的防御工作,沃兹涅先斯基在战后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制造列宁格勒案件,枪杀这两位杰出的领导人是怎么也无法用“保持管理机构的最大功效”的说法来辩解的!

萨哈罗夫院士论斯大林的“大恐怖”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俄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这是位“奇特的”院士,既写学术专著,又写普及性的中学教科书。他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得到俄教育与科学部的正式批准,是货真价实的现行中学教科书。2008年9月他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斯大林的镇压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反驳为斯大林大镇压辩护的言论。

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俄国史教研室主任亚历山大·达尼洛夫在其著作中为斯

大林的恐怖政策辩护,把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说成是发展国家的实用主义工具。萨哈罗夫对此提出反驳,他的反驳也是针对菲利波夫的。

萨哈罗夫认为,这是修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确定的评价,修改对斯大林、镇压、古拉格的评价。某些人把社会的“稳定”理解为需要修正苏联瓦解时期、共产主义崩溃和苏联共产党垮台时期得出的概念和评价,认为这种修正是社会稳定的需要。萨哈罗夫就此反驳说,从科学的观点,从如何在学校传播这些科学知识的观点看,这是完全经不住批评的。一个政权出于实用主义,把千百万的人送去枪毙、移民、驱逐、流放,这算什么?“斯大林的‘大恐怖’,是对人民的残酷的、毫无理由的践踏。这是对人民的大规模的群体灭绝。我们不能用任何实用主义的原因、任何实用主义的诡辩来解释这种种群体灭绝。”

萨哈罗夫写道:诚然,被限定在 1937—1938 年的“大恐怖”在这本教科书以及某些其他教科书中也写到了。不过,第一,必须明确说明,“大恐怖”不是什么改造国家、工业化、改善社会、改善人的生活、完善人的个性所引发的。这种“大恐怖”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斯大林要消灭自己的政治反对者,既有真正的,也有臆想的反对者,而臆想的是多数。萨哈罗夫不认为大恐怖仅仅发生在 1937—1938 年。他认为,有些教科书的作者们在这里完全缩小了大恐怖的范围。最新资料和公布的文件,其中包括多卷本的《卢比扬卡给斯大林的关于国内局势的报告(绝密)》,展示了国内的真实情况,说明斯大林的大恐怖开始于 1930 年。

萨哈罗夫主张把历史教科书写成客观的、平稳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教本,让关于俄国历史的科学的知识成为高校和中学研究的对象。他说,“这是我自己平生的目标之一”。

他写道,我们结束了苏维埃时代,我们经过了 90 年代的革命时代,所有的概念都变了,所谓历史范式也都变了。现在进入了稳定时期,社会安定了。有人试图使我们的概念,其中包括历史概念与此相适应。这个进程自然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反映。萨哈罗夫认为,对各种历史事件应当作出评价,但要建立在绝对科学的观念之上的,不带歇斯底里的评价,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评价,而是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萨哈罗夫承认,90 年代的革命并没有完成,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完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们这里还有非常强烈的同苏联的历史,同斯大林,同他的斯大林主义,同整个时代的及许多其他现象相联系的倾向。人还活着,许多人还在自己

的位置上。人还留在社会,还有有影响的的重要的人物。要理解这一点。这既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不是糟糕的历史,也不是好的历史。有人抱怨,1990年没有审判共产主义,没有审判斯大林,没有举行对共产党的新的纽伦堡审判。萨哈罗夫认为,在我们国家不能这么做。因为大量的居民群众、大量的人民群众同这些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时代都同这些事件联系着。

不过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萨哈罗夫表示,“历史的进步就是人类个人的进步。这就是生活质量的进步,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

梅德韦杰夫总统:不能为镇压辩解

2009年10月30日是政治大镇压受难者纪念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他的博客中撰文纪念。他在文章中明确声明:“不能为镇压辩解”。他说:

纪念民族的悲剧跟纪念胜利是一样的。而极端重要的是,要让青年人不仅拥有历史知识,还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满怀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国历史中最悲惨的悲剧之一。

国内所有的民族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为顶点的恐怖。“在战前的20年期间消灭了我们人民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和伤害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也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了迫害。”

这受难者都是未经法庭、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人们,被遣送集中营和流放地的人们,因从事的工作或因“社会出身”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们。那时整个家庭常常被轻易地贴上“人民敌人”及其“帮凶”的标签……甚至一个人应有的体面的葬礼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的名字长期被从历史上抹去。

然而到现在为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这么多的牺牲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目的。我坚信,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解。

我们很注意同伪造我们的历史作斗争。不过为什么常常认为,问题只在于不允许改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结果。而重要性并不亚于此的是,不允许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解。

梅德韦杰夫号召研究过去,不要漠不关心和试图忘却悲惨的历史。他说,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去教育孩子们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和人的生命价值,尊重从我

们民族传统和我们宗教中汲取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自己,谁也不会去保守历史的记忆并把它传给新的一代。

实事求是地接受自己的过去,这是公民立场成熟的表现……脱离复杂的历史,脱离我们国家实质上是矛盾的历史,往往无法理解我们的许多问题、现今俄国困难的根源。

梅德韦杰夫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需要让全国人民记住历史上悲惨的一页,不能用什么崇高的国家目的、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来为大规模镇压自己的人民辩解。人的生命价值是第一位的!

普京在接见时说了些什么?

普京担任俄总统和总理以来,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极其重视,多次就有关问题发表谈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他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个是强调历史研究不应受一个政党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主张研究中以事实为依据,做出科学的结论,允许各种观点并存。2003年11月27日,他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讲话中谈到国内出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历史教科书时说:

我认为,我们可以为一点感到高兴,那就是我们不再从一个政党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阐述我国的历史了。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成就。^①

2007年6月21日,他在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代表时谈到需要有一个标准,随即解释说:他说的是教育标准,而不是思维的标准化。在教科书中,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各种观点都可以而且应当讲,即使现今的政权的代表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另一点,普京是强国主义者。普京作为国家领导人需要各项工作,包括历史教科书,为他的强国方针服务。在一个超级大国国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他要振兴这个国家,要让这个国家重新站立在世界强国之列。为此需要加强民众的自信心。这样,理所当然地需要历史读物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树立学生们对祖国的自豪感。中学的历史教材是一个重要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历史学界出现争鸣的态势,各种观点都可以发表。应当说,这是一个社会进步,是好现象。但是中学教科书不是争论的场所,可以介绍各种观点,但更重要的是客观科学地介

^①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绍历史事实,让学生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普京说:

现代的课本,特别是大中小学的课本,不应该成为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这些课本里还是应该阐述事实,它们应该起到教育的作用,特别是要在青年人中培养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①

教育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思想要有统一的标准。正是从这点出发,普京对目前使用的历史教科书表示不满,希望写出符合“标准”的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资料。

他举对二战的讲述为例说:

我说的正是教育标准,而不是思维的标准化。我不是说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对所有的人进行“梳理”,这在一种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曾经有过。当然在教科书中,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各种观点都可以而且应当讲,但应当保证教学的质量标准。在教学参考书中,如果已经讲述了某些观点、某些态度和某些评价,那就应当提出供选择的观点,而不应当只把一种观点强加于人,比如说,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就不能强加一种观点,有时甚至是有辱我们民族的观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②

这里说得比较简短,所以后面普京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你们知道,我已经举了一些对进程和结果都叙述得不恰当的例子,这是我们大家都明白易懂的例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结果叙述得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在那里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损失了约 30 万人,我们牺牲了 2 700 万人;并且像过去教科书写的那样,纳粹军队在东线有多少分队和师团、多少人员和技术装备,在其他战线又有多少;战争的第一阶段的结果是什么,第二阶段的结果又是什么,等等,那就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这本教科书的作者就可以任意下结论,而当学生读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切同第二战场所发生的一切,它在什么时候开辟的,等等,进行对比分析,那时候他就会对我国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得出自己的理解。但是必须严谨认真地阐述,不带任何偏见。

①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 页。

② 参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76 页。

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到的是: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我再说一遍,现今的政权代表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必须做到内行地、认真细致地阐述实际材料。很明显,任何一本教科书的作者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观点的讲述要得体,不要强加于人。^①

普京在这里强调了两个观点:第一,历史学家有权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不能再回到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了,即使政权的代表也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教科书不能只把一种观点强加于人,而应当介绍多种观点,以供选择。第二,一切从事实出发,要把事实客观地、如实地传授给学生,这样学生就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顺便说一下,2007年6月召开的是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代表会议,会后普京在新奥加廖沃接见了会议代表,和代表一起探讨了人文和社科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并没有具体涉及对哪一本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的评价或支持问题,普京讲话中惟一涉及教材的只有一句话:“在新学年开始前夕,我们的历史教师和社会科学教师将拿到供教师使用的新的教学参考书。我们正等待在不久的将来供中学生自己使用这一级的教科书也能准备好。”^②

普京说的历史教师将要拿到的就是菲利波夫的这本《俄国现代史》,不过他们拿到手的是尚未得到正式批准的“教学参考书”!当然,从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看,这本书迟早是会得到批准的。

至于对斯大林镇压的态度,普京总理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上述看法是一致的。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时特意讲了他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给斯大林一个整体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需要区别对待。普京肯定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强调了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没有能够解决农业问题,人们排队购买食品。普京接着指出:

此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过镇压。这是事实。我们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我们遇

^① 参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488页。我对译文做了些修订。

^② 参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页。

到的不是简单的个人崇拜,而是反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罪行。这也是事实。关于此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说的。

可以看到,俄国现任的两位领导人对斯大林镇压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承认并且谴责对自己人民的无端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同菲利波夫是不一样的。

《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